目　录

柯 灵

序

《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主办的一种政治性期刊，刊龄已近十年，很受读书界倾心瞩目。《告别“万岁”》和《领袖们的千古难题》这两部书，就是《同舟共进》重要文字的汇编，读者可以由此看出这份期刊的品性风貌。

中国一百年来的内外环境，养成知识分子侈谈政治的坏习惯，其中的惨痛经验，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白色，红色，五颜六色的恐怖浪潮，几乎淹没历史之舟，不免使人谈政色变。伟大领袖毛泽东熟读《红楼梦》，他引用王熙凤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恕我懒得查书，不能确证是不是她说的），提倡敢言，号召六不怕：“不怕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张闻天说：“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谁说得近情在理些呢？——问题不在近情违情，有理无理，而在于谁在“领导

上”，谁在“领导下”。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响应号召，说了真话，结果如何，尽人皆知。这就是政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政治理想和政治实际是两回事，政治理想常常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政治家拿来披在身上，招摇过市。知识分子刻舟求剑，就像那天真无知的孩子。也还是《红楼梦》里的故事，贾宝玉到宁国府赏梅花，秦可卿带他到上房歇息，一见墙上挂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返身却走，嚷嚷“快出去，快出去！”原来这位性情乖张的贵公子厌读经书，痛恨禄蠹，因此容不得这种世俗见解。现代知识分子多少沾染了贾宝玉的傻气，其实少沉迷太虚幻境，多学点人情世务，受用多了。

《同舟共进》虽是政治性刊物，却不唯上，不唯书，不念经，不念咒，不迂雾腾腾，“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实话实说，与读者肝胆相照。谈言微中，大多能搔到痒处，触到痛处，言之有物，嚼之有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作者曾经沧海，回首前尘，痛定思痛，拨开政治雾幛，还原历史真相，读之可浮一大白。

从前政治挂帅，满世界阶级斗争；现在经济升帐，满脑子钞票打架。道德文章，能值几文？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莫谈国是，且食蛤蜊，是为序。

1998，儿童节。童言无忌。

汪澍白

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

毛泽东在 1976 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者奠定了创建新中国的基业，后者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毛泽东为什么要断然发动并坚决维护这一场贬损他声誉的“文化大革命”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越来越觉得他所创建的党和国家同他心目中所企盼的“左”倾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差距太大。而这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既是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总结，又是早年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与延伸。为了探明毛泽东“左”倾社会主义模式的本源，本文拟就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多方追求作一番历史考察。

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自小在乡塾上学，读孔孟之书。但他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儒学信徒，还不时会萌发出一些“异端”思想。当他13岁在井湾里读私塾时，便十分嗜读被称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水浒》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演义小说。这些故事都是首先在民间流传，经说书人和戏曲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起来，最后由知识分子——作家加工改写而成。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愿望与要求，因而为一般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

青少年人爱看演义小说，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独对阅读和讲述这些小说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还思索到一些别人难以想到的问题。他后来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道：“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文官，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旧小说虽然对阶级矛盾也有所揭露，但却没有一本书是正面从经济关系上揭露矛盾的。毛泽东那时小小的年纪，却独具慧眼，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矛盾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他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却喜欢与穷人的孩子玩在一起。在家里干农活，也总是与长工同出同归。他的思想感情与那些帮别人种田的贫苦农民是息息相通的。

在众多古典小说中，唯有《水浒》写的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正如作者施耐庵在“排座次”一回中所赞叹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毛泽东从小就对这些不分贵贱的英雄豪杰深表同情。建党以后，他也是党内最重视工农群众与工农武装的人。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在一次邀约周谷城等学者谈话时，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这些话，表达出一种很深的情结。

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翻译的《水浒》英文本，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书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巧合，恰好表明，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在认同马克思主义时，早已具有在传统文化基础（特别是以《水浒》为代表的歌颂农民起义的反规范文化）上形成的认识前结构。投身革命后，毛泽东讲话和写文章，还是经常引用《水浒》。1944 年 1 月 9 日，在看了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以后，毛泽东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这封信，充分表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与水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平等、平均理想，正是一脉相承的。

二、江亢虎的社会改良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接受儒学教育，“慕大同之治”。自1901年至1910年，他三次赴日本及欧洲访学，广泛接触各种社会思潮，并把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糅合在一起，最早在中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

1911年8月，江亢虎在上海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同年11月，又在上海创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提出八条纲领，即：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建设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致力军备以外之经营。同时，又上书袁世凯，自称这些纲领“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这就表明他那时所宣扬的不过是西方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杂拌而已。

1912年春，中国社会党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支部，并通过《湘汉新闻》等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这时正在新军中当兵，精神方面处于饥饿状态。当他第一次听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并读到一些有关的小册子时，立即引起了心灵上的共鸣。他忙着与几个原来的学友联系，就这个问题提出讨论，但应者寥寥。

二十多年过去，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1911年底至1912年春在长沙当兵时的往事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中有《湘江日报》（实为《湘汉新闻》之误）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面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

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这一段回忆，是研究他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珍贵资料。

再过 20 年以后，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 年 8 月 24 日），在批判第二国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时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人民日报》1979 年 9 月 9 日）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虽则很小，但对从小就衷心向往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康有为的《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在戊戌变法前就悬想“大同之世”。1901～1902 年，在避居印度大吉岭时，撰成《大同书》初稿。该书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将社会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悬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欧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糅合在一起，以“托古改制”的手法，对儒家“大同”理想做了一番新的阐释。并指出，目前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看齐，待条件成熟时再转向“太平世”，亦即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大同书》有破有立。破的方面，指陈产生人世间诸苦的九种障碍，提出“破九界”的主张，即打破国家、阶级、种族、男女、家庭、产业、地域、人己、物我等诸种界限，以求达到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境界。在立的方面，《大同书》设

计的要点，是男女自由同居，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小、中、大各级学院。通过“公养”、“公教”，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优秀的文化素质与技能，然后量才使用，为社会服务。至老弱病残，则设有“养老院”、“养病院”，以“公恤之”。康有为的这种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它对不满旧社会而向往“大同”理想的青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在讲了一大套圣贤慈悲救世的道理之后，接着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那时深信康有为的三世进化理论，并把最终实现“太平大同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两年以后，毛泽东于1919年12月1日所发表的《学生之工作》详细地描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工读新村的设计蓝图，其中不少思想材料显然是从康氏《大同书》中撷取的。

再过30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毛泽东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和1966年的“五七指示”，追求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实现大同理想，也都同样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可见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极不容易。

四、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本来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社会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这就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早在本世纪头10年，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和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就在东京和巴黎组织团体，创办《天义报》、《新世纪》，宣扬无政府主义，强调反对强权，排斥国家政权，提倡绝对自由。

辛亥革命以后，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热点从海外移到国内。代表人物是刘师复。刘早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在广州暗杀水师提督李准，事泄被捕。在狱中悉心研读了《新世纪》，思想开始转向无政府主义。出狱后，自称属于"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几乎囊括了西方各个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思想，而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信仰中心。1912年5月，他在广州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并为该会拟定了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阀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庭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1913年8月在广州发刊《晦鸣录》，宣称："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1914年7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称："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毛泽东在第一次北游访学期间（1918年8月至1919年4月）阅读过刘师复的《晦鸣录》与《伏虎记》，并从中接受了反对一切强权的思想。1919年7月21日，他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文中写道："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在他所标举的五位领袖名流中，刘师复赫然在目。

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思想，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中有明确表示：

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激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主旨非常鲜明：反抗各种强权，争取平民的自由平等，方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

《湘江评论》接着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重要文章，对平民大联合以后的行动方式，做了更具体的阐释：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

> 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人，叫做克鲁泡特金。

通过对所谓激烈派与温和派的对比分析，毛泽东否定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主张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激烈派，而选择了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主张阶级调和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温和派，态度是很明白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很可能还阅读过岭南羽衣女士著的章回小说《东欧女豪杰》(1903 年发表于《新小说》)。该小说叙述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苏菲娅等人的故事。苏菲娅在乌拉尔工厂讲演时说："他们贵族那么少，我们平民这么多，若使我们的大众合起一个大大的团体来，……"后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这句话，似脱胎于苏菲娅的演说。

除此之外，毛泽东与提倡新虚无主义的朱谦之也有一段交往。朱谦之于 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著书立说，宣传他的新虚无主义思想。他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色空观融合在一起，提出"以无政府主义的手段，以虚无主义为目的"的主张。他不仅强调反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强权，而且认为天地本身就是一种强权，说要进行所谓"宇宙革命"，"连天然强权都要推翻"。并声称只有"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是根本的解决；一旦"天地翻覆"，"宇宙又可以从无到有，然后再加以破坏，如此循环不已"。毛泽东一向抱有反抗强权的思想，而且他对宇宙的成毁问题也早就抒发过独特的见解："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

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逾于旧宇宙耶?”两人有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朱谦之在北大读书时，常常去看望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两人谈得很投机。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还与湖南的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有较深的交往。1921 年建党以后，毛泽东肩负着在湖南发展组织与开展工人运动的重任。这时候，他把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视为“同盟者”，耐心地做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工作，两人都转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 1 月，黄、庞因发动工人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毛泽东立即发动了一个悼念黄、庞两烈士，控诉和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一般地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抗议，马克思主义可以与它结成暂时的同盟。但若作为现实的目标来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就同它形成尖锐对立了。建党初期，毛泽东之所以还与无政府主义结为盟友，基本上属于前一种情况。

五、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

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变种。它们在五四时期曾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

新村主义的首倡者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他受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否定资本主义、探索理想社会的理论体系。武者小路实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人道的，应当另立“新村”，创造一种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幸福的新社会。他说："现今世上，都以为别人的损失，便是我的利益；外国的损失，便是本国的利益。……以为若非财富归少数者所有，其余都是贫民，社会就不能保存。对于这宗思想的错误，我们也想用事实来推翻他。"他企图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害，便是我的害；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尽了必要的劳动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他经过几年鼓吹，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建立一个"新村"，掀起了轰动一时的"新村"运动。

其实，毛泽东也早有建立新村的构思。1918 年 6 月，他将要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曾偕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的湖大筹备处。他们踏遍岳麓山的各个山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却苦于找不到托足之处。恰好那时法国来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感到发起者提出的"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原则同他建设工读"新村"的理想相吻合，便同蔡和森一起，把积极性转注到赴法勤工俭学上来，暂且搁下了在国内建设"新村"的努力。但 1919 年 3 月，又读到周作人写的《日本的新村》，文中写道：

>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 Utopia（乌托邦）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 Coleridge 等发起的"大同社会"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灭了。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煞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的。新村运

> 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周作人的介绍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接着，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等便在北京组成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实行“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他们把这种“工读互助团”看作“新社会的胎儿”，以为从典型试验入手，实行“小团体大联合”，便是创造新社会。

毛泽东感到这种工读主义的理想和“小团体大联合”的方法同他的志趣相投，因此，他又重新激起了热情，草拟建设新村的计划。并于1919年12月1日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在《学生之工作》中，他首先追溯新村主义的源流说：“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年盛行所谓‘新村主义’。美国及其属地非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文章接着阐述了他自己的“新村”理想。他认为现在的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产生矛盾的根源是由于“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脱离。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要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

在这种新村里，有“公共育儿堂、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可以说应有尽有，设想十分周到。然而，试图在旧社会的基础上来建设“新村”，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为驱张运动而第二次奔赴北京。由于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他在北大很快就和首创“工读互助团”的王光祈交上了朋友，并怀着很大的兴趣去参观“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2月，他在写给陶毅的信中说：“今日到女子耕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5日，该团宣告成立。毛泽东虽身在北方，仍列名为发起者之一。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在中国最早提倡“新村”的周作人。5月5日，毛泽东离京赴沪，住安南路民院里19号。他一面积极进行驱张运动，一面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具体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同北京一样，上海工读互助团也难以维持长久。6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先生，表示要停办工读互助团。

京沪两地工读互助团的试验相继失败，王光祈等认为方向没有错，只是工作上的失误，但施存统却认为方向有问题：“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团和新村。”他并指出：“试验新生活自

然不能离开社会，既然离不开社会，自然要免不掉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要免除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一法。既然革命，还试验什么新生活？要试验新生活，只能到世外桃源去。”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工读互助团的症结所在。

京沪两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教训，推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诸君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彭璜说：“考察北京已成各团的原状，调查社会生活的实况，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不容易办到。”“这小小的工读团，尚不是那万恶的旧社会组织的劲敌，就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也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社，从事半工半读。”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试验暂时告一段落。不过，在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半工半读的新村理想始终没有完全消失。

六、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8年夏至1919年春，1919年冬至1920年夏，毛泽东曾有两次北游北京、上海访学。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北游时，对当时像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各种新思潮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那么，他第二次北游，就对各种新思潮采取了审慎的批判态度。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他刺取了哪些精华呢？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再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联系1920年3月他写给周世钊的信来看，他当时的确对各种主义作过认真的比较和选择，稍后并着重研读了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三本书，从中刺取精华，并确立了矢志不移的信念。

这三本书为什么能导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呢？

且看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开头：

> 共产主义已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
>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
>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
> 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
> ……

这些话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振聋发聩”。世界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难道不同样贯穿着阶级斗争吗？1919年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曾经把阶级斗争现象看成一种思想上的迷误和不幸，希望通过“忠告运

动”和“呼声革命”，劝说“强权者”“回心向善”。1920 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实践，证明那都是纯粹的幻想。读了《共产党宣言》，他有如拨开重重迷雾，找到了前进的指南针。后来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回忆说：“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紧紧地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把它当做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指导线索。这是他政治立场转变的标志，也是他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

毛泽东说，从这时候起，“在理论上，而且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毛泽东否定了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以互助论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往后还有自己的独特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结构和深层理论来源，这时他还顾不上去作仔细研究。原来漂浮在脑际的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的幻想暂时隐匿下来，也没有一一加以清算。以后待到他执掌大权时，便以“人民公社”、“五七指示”等扩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波折，这一方面的教训，还需要从理论上认真加以总结。

（1998 年第 3～4 期）

闻　朔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怀念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

1998年，是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在赴京参加庆祝盛典和同学聚会之前，不觉思绪万千，特撰此文，作为对母校和马寅初老校长的纪念。

心仪已久的寅初先生

我最早听说“马寅初”这个名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我在四川上小学，经常在报纸上读到“马寅初作狮子吼”、“长空响惊雷，直声满天下”、“马寅初不怕吃‘卫生丸’”等新闻标题。小学生虽然对新闻报道内容不甚了了，但给我的印象是：马寅初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解放初期，我在重庆南岸土桥的清华中学读高中，听说江北的重庆大学校园内有一座“寅初亭”，便偕二三学友步行前去瞻仰。重大的学长向我们介绍了寅初先生的事迹和这座亭子

的来历，加深了我对寅初先生的崇敬之情。

寅初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抱定经济强国的信念，毅然回到战乱频仍的祖国。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出任南京政府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为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济世之良才”。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失守，寅初先生随南京政府迁到重庆。他目睹国民党官僚集团不顾民族的危亡，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事实，义愤填膺，奋起抨击，矛头直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赢得了“长空响惊雷，直声满天下”的美誉。蒋介石怕他在大后方“扰乱视听”，派他去美国考察，他不上当，坚持留在重庆同国民党官僚集团做斗争。蒋介石又对他诱以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的高官，又被他拒绝。他只应聘担任重庆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在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的提案，并四处演讲，呼吁民众团结抗战。

1940 年夏，先生应邀到中央军政大学讲演。他激愤地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必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十分遗憾，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在前线浴血奋战；中等人出钱，为抗战担负起沉重的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屯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仗权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发超级国难财。我要明白告诉大家，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所以，首先应将这两人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作抗战经费。”先生这次演讲，石破天惊，蒋介石下令追查。不久，先生就收到了一封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写的是：“不听招呼，要请你吃‘卫生丸’，特此警告!”先生并没有被吓倒。一个月后，他在重庆实验剧院向公众演讲。他说：“我今天把儿女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

是留给他们的遗嘱。”接着他说：“那些豪门权贵，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麻将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要抗战，就必须让这些吸血虫拿出钱来！”然后将话锋一转，矛头对准了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先生也算一个，不过他只是‘家庭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属家庭，危害国家民族！蒋先生若想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最后他说：“前些日子，有人写匿名信对我进行威胁，说要是我不听招呼，就请我吃‘卫生丸’。今天我在这里发表声明：本人实难从命。会场上的警察宪兵们！你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吗？要开枪杀人吗？”说着他扯开长袍，指着胸膛说：“你们可以朝这里打！我马寅初连死都不怕，发国难财者能奈我何？”第二天，重庆各大报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标题，报道了他的这次演讲。

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马寅初，随即将他关进贵州息烽集中营，翌年8月又转移到上饶集中营。在此期间，重庆各界发起了营救马寅初的活动。重庆大学师生还为他举行了60大寿遥祝会，并自动捐款在校园里建这座“寅初亭”来纪念他。

1950年我去瞻仰“寅初亭”的时候，亭子已经有点破损，但寅初先生的精神，始终在影响着、鼓舞着莘莘学子。1954年我有幸考入了北京大学。而那时北大的校长正是马寅初。

可敬可爱的老校长

新生开学典礼那天上午，大家齐集在学生大饭厅（代大礼堂）。一会儿，党委书记江隆基、教务长周培源等人陪着马校

长来了，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矮矮的、壮实的、笑容可掬的长者。他双手抱拳，不停地向大家作揖："同学们好！"同学们也齐声高喊："马校长好！""难道这个小老头就是马寅初？"我真不敢相信。因为在我的想象中，那位敢于指名道姓地斥责蒋介石的马寅初，一定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怒目金刚，怎么却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接着，马校长用浓重的浙江口音讲话："兄弟欢迎诸位来北大学习！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民主与科学的摇篮……"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的思绪倒回了马老作狮子吼的山城重庆，倒回了重庆大学的"寅初亭"。等我醒过神来，马校长已经退席，其他的校领导讲了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了。

马校长就住在北大燕南园 63 号的一幢小楼里。每当我从那里走过，总会有一阵冲动，想要进去拜谒，但又怕打扰他老人家，始终未敢造次。不过在以后四年的学习中，我曾多次在公众场合见到老校长。

1955 年元旦，全校师生聚集在大饭厅团拜。马校长走上主席台，向大家一边作揖一边说："兄弟给诸位拜年！"大家则高喊："给马校长拜年！"接着，马老发表即兴讲话，他讲了自己学习第四门外国语——俄语的收获，勉励大家努力学习，还大谈坚持洗冷水浴和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兄弟今年 73 岁了，一直坚持洗冷水浴，所以身体才会这样好。我每天早晨都要去跑山，原来跑颐和园的万寿山，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去跑西山'鬼见愁'。我一定能够活过一百岁，还想打破人寿的最高纪录。希望诸位和我一起来锻炼身体，不要只顾学习，被人家称为'东亚病夫'。"马校长天真可爱得像个孩童。

1955 年 5 月万隆亚非会议开过之后，马校长把参加会议的陈毅元帅请来给我们作报告。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老

不像其他校领导人那样坐在讲桌的后面，而是把椅子搬过来坐在讲桌旁边，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录。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人大会议上通过后，马校长又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请来了。马老首先向大家介绍说："今天，兄弟把主持制订五年计划的李副总理请来给诸位作报告。兄弟在天安门城楼上跟毛主席、周总理都说好了，他们同意有机会一定来给诸位作报告。"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李副总理开始讲话的时候，马老又把椅子搬到讲台旁边来坐下。李风趣地说："我今天是到北大来当学生，你们的马校长就坐在旁边，看我考试能不能及格。"马老哈哈大笑地说："一定及格，一定优秀！"我当时感到上北大真是无比幸福，因为有德高望重的马老任校长，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顶尖一级的中央首长请来给我们作报告。

1957年夏，马校长在大饭厅对全校师生演讲他的《新人口论》。那天去听的人不算多，但马老兴致却很高，他好像受到一股什么力量的鼓舞，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从我国人口的状况论证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又讲了他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同，最后表示他一定为解决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大事而继续奋斗。讲演高瞻远瞩，有理有据，逻辑严密，切中要害，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然而过了不久，反右运动就在北大全面铺开了。马校长在公开场合再也没有露过面。有一天下午我路过三角地，看见大饭厅北面的山墙上，贴了一张特大型的大字报，是由经济系三年级"马寅初批判小组"写的，标题是：《马校长，你到底是那个马家的?》意思是说，马寅初宣扬的不是马克思的人口论，而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大字报，忽然听到一声大笑："哈哈！我当然是马克思这一家的！"原来马校长也在这里看大字报。我当时很想过去跟他打声招呼，但又

想，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要再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也就算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马校长。我毕业后，被充军发配到大西北，马校长也在中国政坛上和社会上销声匿迹。

忧国忧民　一片至诚

新中国成立不久，马老即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开始关注国家结束战乱、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这个问题列为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并亲自回到浙江老家去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许多数据。1953 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接受他的建议，对我国人口进行第一次普查。结果是：截至 1953 年 6 月 1 日凌晨，我国人口已经突破了 6 亿大关，估计年增长人口 1200～1300 万，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马老随即在一份给周总理的报告中说："我怀疑，统计局关于我国人口年增长率的估计可能缩小了。根据我调查研究得出的判断，我国人口的年增长率肯定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并提出在理论上正确、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可行，又十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有说服力的专题报告和建议。"

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认为马老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因此鼓励他不妨放下一些行政事务，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在得到刘、周等领导人的支持后，马老以年逾古稀的高龄，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不辞劳苦，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的数据。

1953 年 12 月 7 日，刘少奇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节制生育、限制人口增长的问题，并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老在会上谆谆告诫与会者：人口问题，千万千

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可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却对人口问题持不同看法。他对人口增长大表乐观，曾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是“杞人忧天”，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到10亿又如何？在他的影响下，各级政府自然把刘少奇提倡节育的讲话置诸脑后，有的地方甚至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并对生育多的妇女进行奖励。

全国思潮如此，马老决心逆潮流而动。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去作更为细密的调查。他走了10个县的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详细统计人口的数字、出生和死亡的比例、生产增长的情况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情况等等。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这次调查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面对一堆堆的调查资料，马老忧心如焚，坐卧不宁。于是，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等人商量。他说：“根据我的调查和分析，我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在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了千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每年净增人口1300多万。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在邵、李二人的支持下，马老参阅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又找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专家学者征求意见，最后在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为一项正式提案提了出来。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大会上就自己的提案作了发言以后，立即在人大中央机关小组讨论会上，受到康生、陈伯达以及主持国家计划、工交、财贸、文教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的围攻和批判：

“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你居然敢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简直是挑衅！是无法无天！”

“你所谈的人口问题，完全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马尔萨斯的那一套，是在蛊惑人心，危言耸听，哗众取宠。”

“你的说法虽然同马尔萨斯有所不同，但你的思想体系仍然脱离不了马尔萨斯的窠臼。我劝你还是收回你的提案吧！”

天哪！这哪里是在讨论马老的提案，简直是把他当做下属在训斥。而其实质，是以愚昧教训科学，以权势压制文明！马老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歪曲了！他对国家、人民的一片至诚被践踏了！他多年的辛劳和他的研究成果一起被抹煞了！

面对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围攻，马老却不能像在重庆立法院会议上那样拍案而起，作狮子吼，唯有满腹委屈，低头记录。最后，主持小组讨论会的周恩来允许他作一答辩。他便毫不妥协地说：“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可以收回我的提案，但我认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不会因为大家的反对就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将对这个问题继续调查研究，对自己的提案进行补充完善，在下次人代会议上再提出来。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国家民族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马寅初毕竟是马寅初。他不像有的政客那样看风使舵，也不像有的文人那样卖身投靠。

《新人口论》惹祸殃

1957年春，毛泽东主席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老把棒锤当了针（真），便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主席的面，再一次提出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对马老的意见表示赞同，毛泽东则笑了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老以为这次"廷争"有了结果，便加紧了人口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1957年6月下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论文分为十个部分：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九、就粮食生产与供应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政策性建议。同年7月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马老的《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马老受到极大鼓舞。他一面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一面在北大校园张贴着举行演讲会的海报，颇有点"壮志欲酬"的感觉。

然而马老错了。《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只是"引

蛇出洞”的“阳谋”而已。不久，康生首先发难，他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藉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的进攻，必须追查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来龙去脉。

1958年5月4日，北大举行60周年校庆。陈伯达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前来参加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向北大师生出示了毛主席手书“北京大学”校名，作为送给北大人的一份厚礼。接着陈伯达在致词过程中，突然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校长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新人口论》是一株大毒草！”弄得马老十分尴尬。

同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要多了，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说中国人口多了，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同年6月1日，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多，太落后，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指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马老意识到，既然党中央第一、二把手的口径统一了，自己也就在劫难逃了。但是年近八旬的马老并不准备投降。他手书孟子的名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请人裱好，挂在书房墙壁上。还是那身傲骨！还是那么执著！

单枪匹马　直到战死为止

最高领袖既然发出了号令，一个继反右运动以后的批判

“马寅初反动思想”的宣传活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仅在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重要报刊发表的批马文章就有二百多篇，其中包括康生、陈伯达、郭沫若、周扬、邓拓、胡绳、吴冷西等知名人物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批判马老的新人口论、综合平衡论和团团转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然后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扬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马老对如此规模的大批判很不理解：为什么对老百姓一说就明白的道理，这些大人物反而不懂呢？他以为是“上面”误解了他，于是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以申辩自己的观点。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最高领袖下了“战书”，马老义无反顾。他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如果说1958年对马老的批判还属于学术范畴的话，那么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1959年夏天，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他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祸，感到痛心疾首，便在沿途发了些牢骚。回到北京不久，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为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

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要马老违心地作检讨，实在办不到啊！他沉思了很久，最后蹦出来这样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几天以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交由《新建设》杂志发表。他在文中写道：“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好的，我吸收过来，并在小团团转综合平衡论中作了修改(共七处)。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是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老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冷藏20年而痴心不悔

毛泽东读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后，当即向秘书作了一段口头指示：在反右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要手软。

1959年12月5日，康生向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作了如下指示："马寅初最近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是针对党中央的！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马寅初已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他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更不把他这个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所谓经济学家放在眼里。他过去在国民党立法院里跳，现在又故伎重演。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他选错了地方！总之把他搞臭之后，调离北大，再做其他处理。"

康生的这番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于是应者如云，万炮齐轰。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马老家的院子里、客厅里、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小会批也变成了大会斗。"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新人口论》！""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马老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智者再一次被愚昧专政，

文明再一次被野蛮践踏。

1960 年 1 月 3 日，马老被迫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上获得批准。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并被迫搬出北大燕南园，迁到城内东总布胡同 32 号居住，并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之中，实际上以待罪之身，遭到软禁。

马老在东总布胡同被冷藏了 20 年。这位性格倔犟的老人虽然被剥夺了参政、议政的权利，被限制了人身、言论的自由，但他位卑不敢忘忧国。他天天在自家小院里坚持打太极拳，练鹤翔功，硬是练得鹤发童颜，老当益壮。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念："只要我能活过你去，还有希望。"这个"你"指谁，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关心国内外大事。1965 年夏季，他从报端敏锐地察觉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弥漫全国，如不加纠正，将会祸害无穷。于是，他又上书党中央，希望人民领袖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决不可行"领袖至上"那一套……信是交出去了，当然不会有回应。

1966 年秋季，"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席卷神州大地，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马老这个"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上门轮番批斗。这次批斗不但动嘴，而且动手，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所幸老人练就了一身功夫，棍子打在他身上被弹了回去，坐"喷气式"当做是在练鹤翔功。"这老头会武功，轻易动他不得！"在街道上传为佳话。后来，还是周总理发话："马寅初是只死老虎，早就批倒批臭，再批他意思不大吧！"这才饶了他一命。

1979 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在审阅了有关马老的材料以后，

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 10 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给马老平反的时候，他已经 98 岁了，下肢已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坐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多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不久，马老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胡乔木同志登门向他道歉。

1981 年 6 月 24 日，有关部门和北大师生的代表来到马老住所庆祝他百岁华诞。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982 年 5 月 14 日，马老安详地与世长辞。

马寅初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和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他的名字将会永垂史册。他是一面永不褪色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他是知识分子坚持独立人格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1998 年第 5 期）

于光远

忆“广州会议”

正在写《周扬和我》，抬头望见柱子上的挂历已经翻到1997年3月，想起了35年前的“广州会议”。

在广州开过的会很多，比如毛泽东在1961年就在小岛开过一个小型的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这个会议也有人称之为“广州会议”。我有幸到会了。我写的反映湖南省安化县杨林公社马渡大队的农民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一封信，就印发给这个会议的参加者看了（后来也印发给接着开的“北京会议”），而且起了作用。可是历史上更为有名、知识分子至今怀念的，还是我现在说的这次“广州会议”。怀念“广州会议”，也就是怀念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怀念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毋忘“左”倾思想的危害。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的百岁诞辰。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更想写写有关周恩来的事迹。“广州会议”就是我应该回忆一下，写点东西的事情。

这里我说的“广州会议”并不是一个会议（因此我注意避免使用“这个广州会议”这种字样），它是两个会议的合称。

一个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一个是全国戏剧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同时在广州召开，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在文化问题上起着同样的历史作用，又都是周恩来等领导人关怀的会议，因此实在没有比“广州会议”的称呼更合适的了。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两个会议中，第一个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它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的，讨论的内容是研究制定1962年到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还有一个是全国戏剧工作会议，是文化部和全国戏剧界协会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规格很高，规模很大，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办负责管理科学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全国各学科具有代表性的知名科学家参加。正式代表二百余人，加上工作人员三百人左右，整个“羊城宾馆”（现在扩建为东方宾馆）全部房间都占用了。会议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具体工作由韩光、张劲夫、于光远和杜润生等人做。第二个会议的规模也不小，规格也不低。从会议的名称来说并不全面讨论文艺工作，但事实上讨论的内容并不严格限制在戏剧的范围之内。领导会议的，除文化部的领导外，周扬、夏衍等都到会。到会的总人数我说不清楚，但是当时整个越秀宾馆也全部占用了。而这两个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会议本身，也不仅在于各自原先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有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周恩来总理，对科学和文艺工作他都领导。陈毅那时虽然不再直接负责科技工作，也不负责文艺工作，但他作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也十分关心知识分子。这次，他们在会议召开之前特别赶到广州，并且带来了要给知识分子脱帽（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冕（加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到会上讲话。这是使大家特别兴奋的事情，也大大提高了这两个会议的重要性。

“广州会议”的历史背景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1961年初形势才开始出现转机，并且在这一年的5月下旬，中央召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反省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自己在指导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要求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生活，对一部分在前几年运动中受批判的党员重新处理。就在这个时候，提出恢复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1956年初，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有关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对需要解决的事情作出切实、具体的规定。可是在这个会上制定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恰当的措施，被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和以后的几次运动所破坏了。因此这次“广州会议”带有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恢复1956年党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重大历史意义。

这次会议在广州这个城市召开也不是偶然的。陶铸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对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特别积极。在广东，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事走在全国前面。这也是会使“广州会议”开得更好的一个条件。“广州会议”是一个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会议。

对“广州会议”的历史背景作以上一番简单的交代，看样子还是必要的。但是我这篇文章是一篇怀念“广州会议”的文章，我只想介绍一些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本人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讲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不想也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来研究党和国家这一段历史，写出研究著作。我手边没有任何直接与这两个会议有关的文件或资料。我大概还保存有当时记的笔

记，但是我的笔记通常记得很乱，内容不完整，字迹又十分潦草，无法利用。好在我的记忆力还可以，还可以凭自己的记忆来写。当然这么写难得写得很具体、准确。

既然是写个人回忆，也就只能从自己本人写起。

自然科学技术的方面，我的工作受两个系统的领导。一方面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分工管我的副部长周扬的领导（我本人当时的职务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另一方面，受中央科学小组的领导。在举行“广州会议”时，我还没有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职务，但我是中央科学小组成员，而组长是聂荣臻。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直接领导过我。周恩来不必说了，在 1956～1957 年，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时，陈毅就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后来我想明白了：韩光——他是国家科委管业务的副主任，想必在“广州会议”前在北京的时候已经从聂荣臻那里得知，周、陈、聂在北戴河所酝酿的关于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主张。因此通知我、张劲夫等人，在“广州会议”开幕前早几天到广州。在他通知我时没有对我说明这件事。韩光、张劲夫和我都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由于职务上的关系，本来也应该早一点到广州。因此在 3 月初大家就住进羊城宾馆。一到广州，韩光就向张劲夫、杜润生和我透露了这个信息，大家讨论了一番。当然那时大家只是讨论了一番，并不要求得出什么结论，目的也就是让大家早点知道这个信息。

在去广州之前，我在北京时看到过陆定一写的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划分的提纲。它的基本内容是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个部分。三者的比重是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只占很小的比重，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占的比重很大。陆定一认为，工人出身、有了无产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如果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思想上入了党，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他把土改后的农民归入小资产阶级范围之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没有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边没有文件，这是凭回忆来写的，不会写得很准确）。

在北京看了这个提纲之后，当时我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分析。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属性要从他的政治立场来看。诚心诚意为我们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应该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是很多的。在世界观上不应对他们有思想入党这样过高的要求。我认为，诚心诚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世界观的主要表现。要求达到思想入党的水平，那么恐怕即便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也只有一部分算得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认为还是应该按照 1956 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里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关于陆定一提出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由无产阶级来代表。农民的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农民利益才是真实的农民的利益。如果认为可以把农民的利益独立起来，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如标榜代表农民利益的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就是站在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政党。陆定一提纲中所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国事实上不存在，至少不可能成为

知识分子的多数。不过在中宣部内还没有来得及讨论，我就出发到广州去了。

两个会议快开幕了，周恩来、陈毅、聂荣臻赶到了广州。他们住在“小岛”，即今天的珠岛宾馆。听说这几位领导人到了，我和韩光、张劲夫、杜润生等人就前去看望，并打算向他们汇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当我们到小岛的时候，周、陈、聂已经在一起。3月初广州的天气并不热，但是人们坐的都是藤椅。陶铸也在那里。国务院的秘书长齐燕铭、文教办主任（或副主任?）范长江，也跟着周恩来来了。范长江是参加第一个长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十人领导小组成员，后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关里任秘书长。这次他来，当然是为了参加科技方面的会议。齐燕铭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延安京剧改革，演出《林冲》、《三打祝家庄》，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想他在全国“剧协”里也一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又兼国务院专家局的局长（我和费孝通、雷洁琼兼任副局长）。我估计他不会参加科技会议。到小岛还没有坐下，大家还站着握手的时候，聂帅把我介绍给陶铸。陶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朋友，三七年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1937年9月我从太原去武汉，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他是小组长。但我和他同小组的时间很短，有半个来月。当时我是个新党员，认识的党员不多，很容易把他记得很牢。我记得那时我和杨学诚（他也是我们这个党小组的成员。我们这个党小组只有三个人：陶、杨和我）住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楼上（当时我们平津流亡学生在那儿打地铺），陶穿着一件黑大褂，蓄着小胡子来找我们，真是记忆犹新。陶是老革命，认识的党员很多，分开25年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他居然把这件事记得很牢，我没有料到，很佩服他的记忆力。

坐定，还没有讲什么话，周恩来就点着我的名字问：“于

光远，你看过定一写的那个提纲没有?”我答：“看过了。”他就接着问：“那你就说说你的看法。”我就把在北京原来的看法说了一遍。周恩来接着问：“你方才没有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你的看法，现在中国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说：“还有的。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是右翼，他们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上，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说的是右翼，不是前几年说的‘右派’。属于右翼的人数很少，在知识分子中的确是很小的一个小头。陆定一同志说的那个小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还是有的。”周恩来对我用的“右翼”两个字重复了两遍。“右翼，右翼”，他接着说：“这个说法也还可以。”接着就是韩光汇报，大家补充。我不在这里写了。

很快两个会议开幕了。开幕的日子是3月5日，算起来那天正好是周总理64岁的生日。周恩来没有作报告，我只知道他来羊城宾馆开了一个不到一百人的小会，主要是同参加科技工作会议的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几位专家见面。在这个小会上，他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讲整个国家当前的形势：困难时期快过去了，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是总结经验，在各方面进行整顿，振奋精神，把这几年损失的时间追回来。他对提前5年完成1956～1967年12年科技远景规划表示高兴，赞扬了科技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世界科技发展得很快，一定要做好第二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对我们在广州举行的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这段讲话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接着他就讲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全面。在讲到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他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随便给知识分子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种错误有害的做法。在这次讲话中，他也讲了在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右翼，不能称之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但

是人数很少，而且这样的人中也不是不能转变的。我听了周恩来接受我的关于“右翼”的说法当然是很高兴的。后来，过了两天，我写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划分问题的材料，交给我们会议的会务组，会务组把它印发给到会代表。这个材料保存在会议档案中，应该可以找到。

在羊城宾馆举行这个小会的同时，在越秀宾馆参加文艺会议的人也来了，但只来了不多的几个人。周恩来的讲话中也讲到文艺方面的工作，但讲得不多，因为这个小会是为我们这个会举行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另外去过越秀宾馆，同那里的人见面。当时没有听人说过，我估计没有。关于越秀宾馆的事，那时参加文艺工作会议的人会记得比较清楚。

陈毅在广州作了一个大报告。科技大会代表和工作人员都听了。在越秀宾馆开会的人也全来了。陈毅讲话有他特有的风格，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手边没有笔记或者记录，只看到《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陈毅那次讲的一段话。我转引在这里。陈毅说：“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 12 年，共产党总是不信任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他还说：“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我们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陈毅讲这几句话时，全场热烈鼓掌，后来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典礼。

在陈毅讲完之后，陶铸作为当地领导人，也讲了一大篇话，讲的也是关于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事。也还是上面提到的那篇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中说，陶铸在广州为广东知

识分子脱帽加冕比较早。“七千人大会”后，陶铸回到广州，就把广州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请到从化温泉休息，并且在那儿开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对这些知识分子说了许多坦诚热情的话，并且向他们赔礼道歉。陶说，我们错了，只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错帽子的，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他在会上说：“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也表示反对用“白专道路”这个词，反对给人戴“白专道路”的帽子。当时我就想，这两个会议到广州来召开，是非常合适的。我记不得更多的话，我只留下一个印象，陶铸的话，不是一个作为东道主讲的应酬性质的话，而是很热情地表示愿意看到脱帽加冕能在全国实行的一篇讲得很好的话。

在参加广州会议期间我也抽空出去走过几处。科技大会同剧协大会开会的地方很近，只隔一个越秀公园。穿过公园步行只需要 20 分钟。在这期间我同李佩珊、龚育之去越秀宾馆看望过周扬。他也很忙，但见面后我还是介绍了我和周恩来在小岛见面时，周恩来提出来问我的几个问题和我的回答。在小岛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韩光等人时，周扬不在。不过那次接见时的情况他已经从别人那儿知道了。他知道了周总理和我之间的谈话。我猜这是齐燕铭或者是范长江告诉他的。周扬说，在北京时他没有看过陆定一的提纲，问我是否把提纲带来了广州，他想看一下。我告诉他没有带来。他没有看到提纲，也就不愿发表意见。他只表示，关于对知识分子划分阶级的问题非常复杂，理论上不讨论清楚，不同意见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阶级划分问题马恩列斯都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看来只有靠我们自己去研究了。不过不能等研究透彻了才去解决周总理他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我从他的谈话看出他是拥护周总理提

出的那些主张的。对周扬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我是了解的。“七千人大会”之后的1961年6月，在聂帅的领导下，我们科学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周扬主持了“文艺八条”。那时还有“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似乎最早制定的是“商业四十条”等。他对周恩来、陈毅、聂荣臻这些人的意见是很拥护的。

关于周扬在越秀宾馆的会议上都发表了怎样的讲话（他一定会有长篇讲话），在这个会上都作了怎样的表示，我在写《周扬和我》时想写，但我不在越秀宾馆，没有听到。我想当时参加越秀宾馆会议的人不少，可能会回忆出一些具体的内容出来，这些回忆对于全面了解周扬会有用处。

那时胡乔木在广州养病，也住在小岛。我和李佩珊等也去看望了一下。他没有参加广州的两个会议，他不了解两会的情况，似乎对这个知识分子脱帽的问题兴趣不大，没有讲自己的看法。

回忆1962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还一定要讲讲会后的情况。会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的不同意见并没有消除，而且还有所发展。毛泽东没有对“广州会议”直接表态。中宣部内部反映比较强烈。在1962年10月北戴河会议期间我在中宣部听说毛讲了一句：“看来还是陆定一的看法正确。”陆定一部长是个很好的人，他很坦荡正直，不过那个时期对毛泽东跟得很紧。是他在中宣部的工作中强调抓政治、抓思想，很重视阶级斗争。对“广州会议”他不再讲什么话。看来他是不同意“广州会议”的精神，坚持原先的看法。中宣部内不少同志对脱帽加冕不以为然。参加“广州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并不是第一把手，看到“广州会议”后毛泽东没有表态，中宣部也没有表态，有的人就不那么放心。因此有的省市组织了传达，不少省市则没传达。多数在等来自北京的信息。

由于中宣部内有些同志的意见和“广州会议”不一致，有一次陈毅在怀仁堂的一个报告中也发了一次脾气。

不少人在看中央的表态，不放心。果真“广州会议”半年之后，在1962年9月8日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说“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虽然没有公开直接受批评，事实上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在十中全会后，中宣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文教部长的会议，会上许多代表对“广州会议”进行批评。会上有人要求中央把对知识分子阶级划分问题说清楚，意思是对“脱帽加冕”指名批评，澄清思想。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还没有到可以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还需要多作调查。他认为左的和右的思想都可能发展起来，还要多看一看，不忙处理。

以后如何一步一步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家知道的。十年浩劫中在许多斗争会上造反派把“广州会议”都诬蔑成黑会，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就斗争了我多少次。有许多人到我这里审问我，要我交代罪行。国家科委的同志不用说了，它是国家科委最大的罪行。有关这场斗争的叙述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回忆“广州会议”的范围，因此不再写了。可以补充的是，“文化大革命”后陆定一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之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文中有一段讲到“广州会议”前后的那场他和周恩来的争论，他写道：“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向周总理学习。”在这里他不但作了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批评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论在1962年站

在脱帽加冕立场上的陈毅和陶铸，还是站在相反立场上的陆定一，都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广大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比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更大的苦难。而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似乎直到现在从理论上没有见到权威的结论。结论应该说已经由历史作出，但是不愿接受或者怕接受历史作出的结论的人，世上还是会有的。

1997年3月24日

（1997年第5期）

李 新

范文澜“史谏”中央领导

1958年夏天，我国几亿人民正如痴如狂地“大跃进”，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仅农村每亩地要高产若干万斤粮食；每个机关都要建立起小高炉，用土法大炼钢铁；而且在文化战线上，也要求人人写诗，个个作画，每个作家、教授都要订出一年内创作出无数作品的“跃进计划”来。

一天，我从人民大学（我家住在那里）回到近代史研究所（我工作的地方）。我立刻去看范老（文澜），把人民大学的“跃进计划”给他看。那计划叫“十百千万亿”计划，就是要在一年内写出十大套书，一百本著作，一千篇论文，一万篇资料，字数达若干亿。这个计划用大红字印出，十分壮观。我故作兴奋地对范老说：“请看，多么宏伟的计划呀！”范老没有回答，连忙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来，对我说：“你看，我们范县的计划才叫宏伟呢，不用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范老是浙江绍兴人，抗战初期他在山东范县打过游击，所以故意把范县称做“我们范县”。山东范县地处黄河故道，到处是沙

丘，只长灌木丛，穷得要命，比起江南的绍兴来，简直是天渊之别。但它却制定出一个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范老指着一张规划图对我说："他们只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食，据说通过深耕，粮食高产得很；另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修筑道路和房屋；最后的三分之一的土地都修成花园；你看，全县有多少个公园啊，真够美呀！"说罢，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尽管外面轰轰烈烈，范老还是在那里写他的书。那时他的《中国通史》正写到隋唐。

范老在隋朝那一章里，专门用很长的一节来写隋炀帝。他根据《隋书》直称隋炀帝为"浪子"和"暴君"。这一节共分四目：第一目为"游玩"；第二目为"耀威"；第三目为"开边"；第四目为"侵略"。通过这四目把隋炀帝的丑行和暴行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既令人愤慨，又发人深思。

在第二目"耀威"中写道："隋炀帝令斐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隋炀帝要夸耀隋朝声威，使裴矩利诱西域诸国入朝。……610年，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隋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夏历）夜间，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置设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照耀如同白昼，直到正月底才停演。西域人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隋炀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服装华美，连卖菜人也用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客人们不是痴人，口头上不免赞叹一番。市上树木，都用帛缠饰，有人指帛问道，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市上人无话可对。隋朝和西域通商，当然要双方有利，现在变成隋朝民众的大害。隋炀帝本人想求得声威，像丰都市缠树的帛那样，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

……"

当1958年夏天我们正在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他的书中，明白地通过东市商人的口向西域人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我看到这里，觉得很刺眼，因对范老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老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的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

毛泽东对范文澜是比较尊重的。在延安，毛主席看到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赞不绝口；还请范老吃了一顿便餐。范老讲"经学"，每讲，毛主席都亲自去听。所以范老总想"以史为谏"，希望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者们能"以史为鉴"。但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太深了，"兵谏"尚且遭殃，"史谏"哪能有用？一个国家的领导要想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只有实行民主，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才能办到。

毛主席后来是否看到范老的这一段书，不得而知。但陈毅同志是看到了的。秋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见陈毅同志在那里写大字，范老在一旁赞赏，陈毅笑道："我的字写得真不错吗？范老，你见多识广，你看我写的是什么体？恐怕只能算'陈体'吧。"随后谈起范老写的书，陈毅说："你那四卷书是不朽之作，可以传世的。你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太好了！隋文帝俭，隋炀帝奢，老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儿子不几年就给糟蹋光了。那样的浪子皇帝，暴君，怎么不亡国呢？"陈毅越说声音越大，越激昂，而且很愤慨，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表同情。这一幕情景，我至今未忘。

尽管范文澜诚心诚意地进行"史谏"，尽管陈毅等中央领

导懂得"以史为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更直率地献上他的谏书（万言书），结果非但不能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反而在全党掀起反右倾斗争，把许多正直敢言的干部都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坚持"大跃进"，"吃饭不要钱"，"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结果造成1958年冬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近三千万！

范文澜的"史谏"虽然没有遭受到彭德怀那样悲惨的命运，但随后在史学界也开展了对"让步论"的批判，把矛头指向范文澜和翦伯赞。

范文澜虽然遭到批判，但他的书正如陈毅所说，是会流传下去的，因为他写的是真史、信史。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坐冷板凳，认真搜集资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历史的真理，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有用，才能"以史为鉴"。那些根据政治需要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人，总是被人唾弃的。尽管他也会被别人和自己吹嘘为什么历史"大家"、"泰斗"，他的书在一个时期也会风行，但历史是最无情的，一等时过境迁，他的所谓著作，就是摆在书摊上，连二折三折也没有人要。正如鲁迅在李守常文集的序言中挖苦某些骗子的著作那样，真是人未亡而书已亡，哀哉！

范文澜"史谏"虽未见效，但他治史的作风会同他的著作一样流传下去的。韩儒林曾把范文澜的作风归纳为一副联语："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认为一切历史工作者都应该学习范文澜这种作风。

（1997年第2期）

黄伟经

黄秋耘“漏网”记

——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之二

老作家黄秋耘应我的约请，于1997年2月至3月间与我作了八次录音访谈，我已整理成《文学路上六十年》和《漫谈孙犁及其创作》，先后在《同舟共进》月刊和《南方日报·海风》副刊发表。今继续据录音整理成系列文章，陆续在此刊登。

上了右派黑名单

黄伟经：请你再讲一个问题：1956年你看到了什么，是什么背景促使你写出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黄秋耘：那时候，我经常下乡。1956年我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那还算比较好的地方，但比城里的生活也还差得很远很远。那时合作化高潮早已经过去，农民仍然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吃咸菜，最多是白菜煮一点豆腐，跟北京城里的生活没法比。那时还有农民生病的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农村里没

有医生，没有药。农民住的勉强可以，穿的也还有，但不能说富裕。更不要说那些边远农村还穷得很厉害。

黄伟经：就是这些贫困的农民生活促使你写出这篇作品？

黄秋耘：是的。

黄伟经：它最初发表在哪个刊物？

黄秋耘：《人民文学》。

黄伟经：当年发表它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吧？

黄秋耘：没有，没有什么阻力。

黄伟经：什么时候才提出来说你这篇作品有问题？

黄秋耘：反右派的时候。

黄伟经：谁先提出来？是不是作协的人先提出来？

黄秋耘：不是作协，是中宣部文艺处。他们给10个人编了文集，供反右批判用。

黄伟经：除了你秋耘，那10个人里还有哪些人？

黄秋耘：有秦兆阳、刘绍棠、王蒙、刘宾雁、丁玲、陈企霞、萧乾、冯雪峰、钟惦棐。

黄伟经：哦，难怪！原来反右一开始，你秋耘就已经同这些人一块上了右派黑名单，你这个“漏网右派”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呀！当时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是谁？

黄秋耘：处长是林默涵，副处长苏一平。最后由谁拍板，我不知道。

黄伟经：你什么时候认识林默涵的？

黄秋耘：很早了，解放前在香港的时候就认识。

黄伟经：我觉得林默涵这个人很“左”，他的文章没有什么才气。

黄秋耘：他是没有什么才气，也没有多少思想。教条主义嘛！他的文章没有什么书卷气。

黄伟经：是。有书卷气的人，一般说，都有一定的学问，

会思考一些问题，少一些教条主义的。

黄秋耘：邵荃麟也是教条主义，但他的文章总是旁征博引。古典的也好，外国的也好，他都读过很多，随便引用。林默涵的文章却没有多少东西！

黄伟经：邵荃麟同志的党内斗争经验想必很丰富，他对不幸者有同情心。

黄秋耘：他的文章，基本上还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他是有学问的教条主义。

黄伟经：哈哈（禁不住笑出声）！你说得真妙，"有学问的教条主义"。你用这样的字眼，有意思！

黄秋耘：林默涵是没有多少学问的教条主义。

黄伟经：那是很浅薄的一种教条主义。

黄秋耘：也可以这么讲。

黄伟经：你早就上了右派黑名单，难怪费正清与罗·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里，把你这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和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相提并论，认为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右派言论。费正清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通"。

黄秋耘：这个人我没有见过面，只知道他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

黄伟经：费正清对我们国家、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友好的。

黄秋耘：他希望我们民主化。

黄伟经：是的。从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的，独立、富强的国家。他那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地记述了共和国 1949 年至 1965 年的历史。他在书里把你与秦兆阳、王蒙、刘宾雁的作品并提，是很有眼光的。后来秦、王、刘三

个人都当了大右派，你却很幸运，没有划为右派。

"韦君宜竭力替我辩护"

黄伟经：请详细讲讲你为什么没划上"右派"，是怎样漏网的？

黄秋耘：这跟我的经历很有关系。

黄伟经：可能因为以前你搞地下情报工作的时候，你的功劳很大。

黄秋耘：不是因为功劳，主要还是怕你跑出去。怕把你划上了"右派"，你抱恨跑掉，跑到国外去，把什么都讲出来，那可不得了。周扬就有这样的顾虑。

最初本来我差不多已经要被划为"右派"的啦，首先提出异议的，应该讲是韦君宜。韦君宜是当时《文艺学习》的主编。我实际上是副主编。当时，韦君宜跑去跟组织上痛哭流涕说："你们想把黄秋耘划为右派，我说不公平。《文艺学习》上好多事情的决定，都是我跟他一起做出的。几件比较大的事情，我跟黄秋耘的看法都一样。比如讲，《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要在《文艺学习》上展开讨论，他黄秋耘固然讲过，我也讲过。再说决定在《文艺学习》转载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个重头事件，也是我和黄秋耘共同决定的。《文艺学习》的主要事情，不管用人也好，要发表什么东西也好，都是我和黄秋耘两个人共同商量决定的。所以，要是把黄秋耘划右派，我没有划，将他作为替罪羊，不公平。"除了韦君宜外，当时下边的同志也议论纷纷。

黄伟经：韦君宜当时跑去跟谁讲？

黄秋耘：她跑去跟郭小川讲。当时郭小川和刘白羽都是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是邵荃麟。这是后来，过了一两年之后，

郭小川才跟我讲的。郭对我说，“当时韦君宜说，要是把你划为右派的话，应该把她也划上。觉得这很难处理。”

黄伟经：当时韦君宜是作协党组成员吧?

黄秋耘：她当时是作协党组成员，我是作协机关党总支委员。当时，确实很难处理（笑)。要是把我和韦君宜两个都划右派，很不好办。因为韦君宜和胡乔木的关系很密切，她一直是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的。那么，如果不跟胡乔木打招呼，突然要把韦君宜划右派，那怎么好呢?另外，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的。所以，中国党内的事，往往牵涉到人与人之间很复杂的关系。要是把韦君宜划右派，周扬不得不考虑到他和胡乔木的关系。要是把她划了，那就等于“打狗看主人”呐，给胡乔木难堪，那以后周扬怎么做工作呢?从职务来讲，胡乔木比周扬高。当时胡乔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黄伟经：一个是党的领导人，一个是党的中央部门的领导人。

黄秋耘：不论从地位、权力上说，周扬当然比不上胡乔木。胡乔木嘛，毛主席把他作为亲信。人家以为周扬是“阎王”，但真正的幕后“阎王”是胡乔木。

黄伟经：哈哈，你这个比喻有意思。

5月18日晚上的一个电话……

黄秋耘：(也笑笑）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也行将就木啦，周扬、胡乔木也已经不在人世啦，现在说出来没有什么关系了。作为史料嘛，把这类事情说出来，还可供作参考。

现在我再讲回来。韦君宜首先不想把我划右派，后来邵荃

麟也不愿意把我划右派。这事说起来也很复杂。一方面呢，有私人感情的关系。邵荃麟在地下党的时候，不但领导过我，他是香港工委的文委书记，后来他要我参加文委，当文委候补委员。当时我的资格还够不上当委员，委员有冯乃超等人。我那时是年轻小伙子，邵荃麟为什么看上我呢？倒不是我有什么文学上的才能，他那时才不在乎这个。他看我看得很低的。他希望在晚辈里边找一两个很讲纪律又受过点军事训练的、非常听话的人，他认为文化人的单位里边应该有一点"武化"，有个有点军事知识的人。这样才把我拉进去的。反右开始后，他怕我当右派，他当时心情是很矛盾的。第一，过去好几年，我是他的老部下，一起工作过，而且还参与过领导工作。当时香港文委，工作是很奇特的，固然主要是领导文化工作，但也同时做策反工作，对国民党的海军进行策反。在文委联系的人中，有一个叫叶素的，曾经去策反国民党的军舰。我知道这些，晓得内部机密的东西。另外，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前，邵荃麟表现得很天真，他认为真的要大鸣大放，跑到浙江去，要他过去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鸣放。

黄伟经：包括动员陈学昭，她生前同我讲过邵荃麟到杭州也动员她鸣放这件事。

黄秋耘：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姓曹的，也是他的老部下。他到了杭州，就去煽风点火，对那些老部下、老朋友说："呃，你们要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啦！"他天真得很，根本不知道后来风向很快就转了。

黄伟经：那是"引蛇出洞"呀！

黄秋耘：邵荃麟却非常天真！他以为动员那些老朋友、老部下鸣放就是在帮助党整风，他这是为党工作。直到后来转啦，他才惊惶失措，恍然大悟！

反右派是从1957年6月份开始的。5月18日晚上，我到

邵荃麟家里坐。我跟他之间，虽说是领导与被领导，但是如同老朋友一样，没有什么拘谨的，不像现在一般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那天晚上，他首先给我讲了去浙江“煽风点火”，鼓动很多人出来大鸣大放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听就是。后来，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我在人家家里，不便去接电话。邵荃麟自己去接，他拿起听筒听了后，连说：“噢，噢，噢！我马上就来！”脸都变颜色了！

黄伟经：（惊奇）嗄！谁给他打的电话？

黄秋耘：随后他放下电话，我问了一句：“谁来的电话？”我是准备他不答的。他说：“周扬！转啦！”真是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那时候，5 月 18 日，外边都还继续在大鸣大放，谁也不知道会一下子转为反右。那是绝密的！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有所动作，抽文章啦、改版面啦这一类的事，你千万不能做。就是要做你也来不及，来得及你也不要去做。一做就等于你知道了消息，上头一定会追问得很厉害，那你不得了，我也不得了！”嘿嘿（开朗地笑），这真是“反党同盟”啦。后来我就走了，已经 9 点多钟啦。

黄伟经：从这件事也可看到，邵荃麟对你的为人很了解，对你的人格很信任。

邵荃麟夫妇用心良苦

黄秋耘：他晓得我过去一直做地下工作，不该讲的事情决不会讲出来。后来，他为了我不致被划成“右派”还出了很大力气，可谓用心良苦啊！

他后来把我叫到他家里，让他夫人葛琴跟我谈。我跟葛琴早就很熟，在她家里吃饭就有好多趟了。葛琴问，“你是不是很紧张呀？”我说，“是有点紧张。”她说，“别那么紧张！你的

事情嘛，总可以'转'得过来，能够'转'过来的。"邵荃麟自己不讲，让他的夫人跟我讲。如果有人追究的话，他可以说葛琴讲的，他不知道。所以，他们真是用心良苦，用了一番心机呀！葛琴对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要绝对保密，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我说，"我知道。"她说，"你把你写的那些文章，像什么《刺在哪里》啦、《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啦的前因后果一一跟我讲，包括你在文章里引用过那些古书里的话，你当时怎么想的，都毫无保留地完全说出来，你不用作批判，现在还不到你作自我批判的时候。"我说，"好，我讲。"我就像平常聊天一样，一一给她讲。我讲完了，她说，"你回去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我说，"现在能发表吗?"她说，"我说能发表就能发表。你写好以后，你自己不要拿来，你交给韦君宜。她是主编嘛，由她去请示党组，自然会做出处理。"嘿，葛琴做起秘密工作来啦（笑）。其实，他们很是用心良苦！这些倒是有点史料价值。反右派有很复杂的情况。

后来我回去跟韦君宜讲了，韦君宜说："荃麟要你写嘛，你当然要写啦，不写不好哇。"我说，"我写了以后交给你请示一下党组。"她说："可以。按发稿的手续，应该这样。"我于是写了一篇《批判我自己》。韦君宜看了，觉得不合规格，把它交给了她的丈夫杨述修改。杨述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我也很熟。杨述对改这类文字当然很熟练啦，他就把我写的从头到尾改过。改过以后，要我重新抄正。我又重抄了一遍。她就拿去请示邵荃麟，邵荃麟说："在刊物上要发表什么，你主编有权决定，不必来请示我。上头又没有一个通报说黄秋耘的文章不能发表。你主编认为他的文章可以发表，他本人又同意发表，就可以发表。"你看，葛琴跟我讲过什么，邵荃麟完全不提，他高明就高明在这个地方。结果韦君宜拿回

来，就急急忙忙把它发表在《文艺学习》1957年10月份那一期上。

检讨文章登出来了，我晓得是我的问题缓和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允许让一个人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过关啦，而且很容易过关。邵荃麟还怕分量不够，他自己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论〈苔花集〉及其作者的思想》。他这篇文章在《文艺报》1958年第一期发表，我记得那一期还提前十多天出版。文章开头那一句就说："黄秋耘同志的近著《苔花集》出版了，他也送了一本给我。"接着，当然就是讲批判的话啦，但其中可以看出来，跟右派是区别得清楚的。首先，文章的标题就讲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那么，这是思想问题啦，还没有反党行为。第二，文章开头第一句就称"黄秋耘同志"，既然称"同志"，当然就不是"右派"。那么，这就等于宣布：这个人过关啦！

他这篇文章一发表出来，北京的文艺界都感到愕然。为什么突然批判，又采取这样的手法呢？其中内幕，人们当时并不知道。

黄伟经：这真的是假批判，真庇护啦！

黄秋耘：说穿了，是这样。把我划"右派"，邵荃麟是不愿意的。

黄伟经：要是把你划了"右派"，那也可能会追到他？

黄秋耘：那很容易牵连的。假如我把5月18号晚上那一番话说了出来，那邵荃麟肯定是大右派。

黄伟经：邵荃麟要是成了大右派，那作协党组也许就要"一锅端"啦？

黄秋耘：当时刘白羽的态度很奇怪。开头呢，他声色俱厉，说我如何如何反党啦，最厉害的话他都说了。后来就转过

来，他就说："黄秋耘不能划！可以给黄秋耘处分，但不能划右派！"

黄伟经：在批判你的会议上，刘白羽给你上了什么纲呢？

黄秋耘：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到了划右派的时候，他又说我不能划。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一直都不明白。后来才晓得，是周扬说了我不能划。这是后来周扬把我找到珠岛宾馆去谈话，我才清楚的。

"不能把你抛出来划右派"

黄伟经：这是哪一年？

黄秋耘：我记得是1987年。那年周扬最后一趟来广州，住在珠岛宾馆。他叫他的秘书打电话来，叫我一个人去见他。我去了以后，他屏退左右，连他的秘书和他夫人苏灵扬都不让在场。就我同他两个人在房间里。他心情很沉重，有时简直是声泪俱下，他说："黄秋耘，你认为你是受骗上当，其实我才是最大的受骗上当！"他上谁的当呢？他当然不会讲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说："我好后悔呀，做了一件错事！"我想，那时候他一方面真的很内疚，觉得很惭愧；另一方面，正如有首诗所说的："一旦英明都丧尽，周郎罢宴一场空"，他本来是文坛的主将，经过反胡风反右派以后，他威信扫地。事实上，他那天精神上已垮得很厉害，的确脸都变颜色了。后来，我坦率问他："周扬同志，最初你也主张把我划右派，为什么后来你又反对呢？"（我听邵荃麟讲过，"你不能划右派，是周扬同志决定的。"）周扬听了我的提问之后，说："我反复考虑过，也请示过上面，有两个原因（他所说的'请示过上面'，大概是指请示陆定一吧）。我后来翻过一下你的档案，晓得你一段时间做一种很需要的工作（他没有具体说出情报工作）。对这一类

人，党内是要保护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要是把你划了右派，跟判刑不一样，不能关起来，还是在外面逍遥自在，你一跑就可以跑出去。我晓得你在国外有很多亲戚朋友，包括一些外国人，跟你都有直接联系。你跑了出去之后呢，外国就会如获至宝，把你养起咨询咨询，你把你做过的工作都讲出来，那可能损失很大。当然，相信你不至于这样。”我只听他讲，一句话也没有表态。他说，“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也反复研究过，那就是你跟有阴谋的反党不同。你写文章，是你自己写自己负责。你的文章发表之前，没有给韦君宜、邵荃麟他们看过。那倒是事实，我向来发表东西都不愿意先给别人看，包括自己的老婆。”周扬说：“基于这两个原因，就没有把你划右派。你过去做的那一类工作，时间相当长，而且牵涉面也相当广，包括搞策反工作、打进日本人机关这些事，要是都说出来，那可不是好玩的。所以，对你这样的人，我们党就不能抛出来划右派。”搞过政治的人都知道，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利害关系，至于外面的舆论怎么样，那是次要的。但是我不划“右派”，有些人提出不同意见，觉得不公平。比如说陈涌——

“这样，我当然就能够漏网”

黄伟经：就是那位搞理论、文艺评论的陈涌吧？

黄秋耘：是的，他是何其芳的老部下。何其芳讲，“黄秋耘不划右派也许可以，但是照此推论，陈涌也不该划右派呀！”

黄伟经：当时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吧？

黄秋耘：是。他当时地位相当高，资格也很老。他很为陈涌划右派抱不平！搞政治运动很讲究要摆平，不然人言可畏。周扬考虑的是利害得失，他没有去考虑摆得平不平。由于周扬的态度转变了，我也就安然无恙。所以我没有被划为“右派”，

最关键的人物是周扬。邵荃麟极力想保我，这点外边也看得出来。

黄伟经：郭小川呢?

黄秋耘：郭小川当然想保我啦。我的一些想法跟他有共同之点，或者说跟他有共鸣，总之，作协党组几个领导人都倾向于保我。这样，我当然就能够漏网了。

要解答我没有被划为“右派”这个问题，应该讲，包括周扬、邵荃麟、韦君宜他们三个人都想保我。

黄伟经：他们不划你、保你，是不是对于保住或者稳定他们自己的地位也有关系?

黄秋耘：多少有点关系，但也不至于有太大影响，最多是对他们会有些麻烦。特别是周扬，他不会因为划了黄秋耘或者不划，影响到他中宣部副部长的地位，那不会的。

（1998年第9期）

林 里

陶铸与“反瞒产”事件

“大跃进”以来，农业战线上“创高产，放卫星”，沸沸扬扬，甚为热闹。“放卫星”广东落后了，但在秋冬“报高产”上，广东却“赶”了上来。稻谷产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稻谷没处放。于是，省委下命令：“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可是，没几天，就这儿告急，那儿告急。个别地方的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还有的地方水肿病开始蔓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广东省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开幕了。

会议再次要求各县报产量，并且规定，凡是达到“千斤县”的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新会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于是，打电话给县委书记。他把报了千斤县就能奖拖拉机、载重汽车的事叙述了一遍，问要不要载重汽车、拖拉机。县委书记告诉他，咱们县没有达到亩产超千斤的水平，不要那些东西。东莞县长也打电话，也问县委书记，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

回来再说。”县长知道，东莞的水稻产量没有达到千斤县的水平。锦旗、奖状拿到手以后，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当然要找个真正的高产县嘛!

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省里派来反瞒产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

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奇怪的是，县委书记在总结发言时，谈了抓春耕，抓育秧，却一字不提反瞒产。

1959 年 2～3 月之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之类的话。意思显然是说，粮食是有，只是被农民藏了起来。会议以后，省委派出大批人马反瞒产。不过，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做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派到四会县的同志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

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他们查看农民的谷仓，谷仓里确实有谷。但是，谷子是代集体保管的种籽粮，没有队长命令，谁都不准动用。有个工作队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了炉灶，又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转念一想，忽地转过身去，顺手掀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反瞒产工作队员看了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另一个事实是：公购粮，该征的征不上来；该购的购不到手。为什么？

这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订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还说，不切实际的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报告的精神，批准了报告所提出的改进办法，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毛泽东欣赏广东省委的勇气，承认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就在1959年4月27日，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这封信，印发到省、地、县、社的同时，还破例发给最基层的生产队小队长。他在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他要生产队

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

从此，反瞒产停止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也都有所收敛。

反瞒产停止了，陶铸同志的工作却没有停止。他承担了反瞒产的责任，承担了“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所带来的后果，承担了共产风、浮夸风的错误。1959 年 5 月间，省委在汕头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陶铸同志以《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为题，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向到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他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张嘴就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特地走到袁溥之同志面前，诚恳地向袁大姐赔礼道歉。他说：“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陶铸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的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1997 年第 8 期）

汪东林

沈醉智斗红卫兵

笔者和沈醉先生从认识到相熟，有不少主客观因素。我们都是1962年前后踏进全国政协大院上班工作的；又都在1965年结婚，建立家庭，而且同在西城西安门的一个小院里居住，是朝夕相处的邻居。还有一层，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他的顶头上司戴笠，戴死后接班的毛人凤，还有地位与沈醉相仿、资历甚至比沈醉更老的毛万里、毛森、何芝园、姜毅英等少将级军统特务头目，都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在下同上述这些军统头目恰巧是江山县小同乡。

笔者到政协不久，就一口气拜读完沈醉撰写的长达6万多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但一直没机会与他当面细谈。时至1965年8～9月间，因为凡是热天，晚间乘凉是最好交谈的机会，接连好些个晚上，我同沈醉都要聊到11时左右等双方的家人出来招呼为止。话题大部分围绕着戴笠的历史。

笔者同沈醉先生的"双人乘凉晚会"，谈话漫无边际。当他知道我刚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便欣然同我大谈文学。使

我吃惊的是，他作为一名以搞情报为职业的军人，竟读过那么多的名家名作，诸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大小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马克·吐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等，不但知其名作，而且能对作品的人物、背景进行分析。我不无感慨地说，你的文学专业知识不亚于大学本科毕业生，并追问他何以有这样高水平的自学成果？沈醉说："一是个人的爱好，我是个中学毕业生，没有机会上大学，就自学，系统而全面地读书，不仅读原作，而且读史论、评论、作者介绍等等；二是职业的需要。作为一名职业情报人员，要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要同他们亲近，最重要的一条是变成他们的'同行'——至少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为此，我一有空闲就看书，不仅是文学、历史，而且包括科技、医学、经济等等，各种专业的书，都尽可能的触及。可幸的是，我天生记忆力比较好，看完能记住，还能头头是道地讲一套……"这可不是沈醉先生的自卖自夸，不妨认真读一下沈醉先生解放前写的、新近出版的《沈醉日记》以及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战犯改造所见闻》等书，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手法文笔，都足以证明沈醉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虽然他本人始终谢绝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笔者当时作为一个 20 岁出头的青年人，对沈醉先生的一身功夫是如何练就的极感兴趣。我从沈醉的书中知道，他 18 岁追随戴笠，一开始就是搞行动，也就是盯梢，追捕，搏斗，等等，必须有好功夫和好枪法。我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马上答复，而是一言不发地站起来，竖起两个大拇指，双手的另外四个指头紧握，然后把拇指往地上一顶，"嗖"的一声紧靠墙根倒立起来，过了约十秒钟恢复原状与我对坐后才回答说：

"一般人是双手倒立，我这叫两指倒立，难度自然相差颇

大，但只要坚持苦练，就能学到手。中国的格斗擒拿功夫，有两句话：一是‘功到自然成’，指的是苦练；一是‘先下手为强’，指的是运用。至于枪法，最根本的也是勤学苦练，熟能生巧。任何枪法好的人，都是用子弹堆起来的，不但要认真苦练，而且要坚持经常练，天天练。比如我，过去枪法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手枪，但这些年多年不摸，现在要打，保准十发五不中！”

有时候，沈醉先生也询问戴笠、毛人凤、毛森等人在家乡江山的情况，因我当时年幼，知道情况一星半点，也是从大人嘴里听来的。但记得也告诉他两件我亲眼所见之事：一是毛森的哥哥在家乡是恶霸，土改剿匪时他躲藏在墓穴里，日藏夜出，好长时间才被发现，因拒捕被击毙，尸体被抬到江山城外示众，我当时刚进初中上学，是目睹者之一；一是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在家乡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在江山城外被人民政府处决，我也是围观目睹者之一。沈醉听后沉默了一会说：“戴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但他的胡作非为在解放前连他父亲也多次被气得发抖。戴藏宜吃喝嫖赌俱全，就是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事情。论头脑和才干，他不及他父亲的一个零头！”

1965 年整个夏天，我因同沈醉先生同住一个院子，晚间就这样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地在一块闲侃。但这年秋天，我奉命去河北农村搞“四清”，等我于 1966 年 6 月中旬从农村返回全国政协机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了。

沈醉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笔者在这里补写一段沈醉先生若干年后才讲到的“文化大革命”伊始因为钓鱼与红卫兵格斗，并得以机智脱身的故事。

1966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沈醉和其他文史专员已被命令停止到机关上班，也不许参加政协机关的运动。他虽然心中忐

忐不安，不知这个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但他生性是能适应各种难事，并能较快摆脱种种困境而自寻其乐的，他因此想到后海去钓鱼散散心。钓鱼是沈醉从小就着迷的娱乐，直至如今近八十岁的高龄，身体虽不及从前了，却仍没有放弃这个爱好。但他没有料想到，在那时钓鱼也属“四旧”之列。这天早饭后，他在院里挖了几条蚯蚓，带了两根钓竿，给爱人留下去后海钓鱼不一定回家吃午饭的条子，就骑着自行车上路了。

从我们那个地处西安门的小院到后海，骑车只有10分钟的路程。沈醉还没有到达过去经常下竿钓鱼的地方，就看见三个中学红卫兵正在训斥一个钓鱼的老头儿。他开始在十多米外驻足观看，没料到这三个不讲理的小家伙不但训斥老人，而且把老人的钓竿折断，劈头往老头身上打，边打边骂，老头苦苦哀求他们也不罢休。眼前这蛮不讲理的一幕，使他火从心中起，立即上前大声斥问：

“不许钓鱼不钓就罢了，你们为什么无故打人，还讲不讲理？”

三个红卫兵回头冲沈醉而来：

“好哇，真有不知道太阳从哪边出来的，敢挺身打老子的不平，嗯？”

三人一拥而上，劈头朝沈醉身上打来。事情到这地步，沈醉只有还手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把那个为首的一把推下了后海，然后对付另两位，几秒钟之内把他们统统扔到水中，那位挨打的钓鱼老头被惊呆了，只是一味地喊：

“同志，同志，您快跑，快跑！不然他们爬上来会要你的命的！”

沈醉计上心来：后海河堤较高，爬上来不易，再设法拖他一下，自己开溜便没有问题。真不愧是军统局出身，沈醉反应

极快，在钓鱼老头嚷嚷时已注意到这三个红卫兵还有三辆自行车停在一旁。便以最快的速度，把三辆自行车一一举起，远远扔在后海的水中。还没有来得及爬上岸的小家伙们急得一面骂，一面又折返湖中摸自行车。刹时间，沈醉招呼那位钓鱼的老头儿：

“三十六计走为上，快坐我的后车座一块逃命吧！”

老头的家离后海很近，两分钟就到了。他留沈醉躲一躲，沈醉谢绝了；问沈醉贵姓，沈答姓“牛”。这些话都是老头还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边跑边问的。等老头下了车，沈醉以更快的速度，飞一般骑到家中。平静后，爱人也下班回来了。他把事情的始末讲给她听，并表示要用日记记下此事，但被爱人力阻；他最后坚持写了一段，被爱人给撕了，并警告说：“这是留罪证，要家破人亡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爱人是有先见之明的。

我知道这桩事的始末，是十多年后的80年代初了。沈醉讲完这段往事后对我说：

“我当时逃脱红卫兵的反击，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中国的三十六计，是我国几千年传统经验的总结，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也能派上用场的。只不过说起来容易，实际运用起来不易，其中现场观察、果断决策是关键！”

他说的是经验之谈。在沈醉身上，有许多军统职业的训练有素的本领和特点，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学到的，诸如在下这样的平庸之辈，听听故事可以，自己想做是万万不可能的。

（1992年第8期）

汪东林

梁漱溟誓死拒绝“批孔”

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之前

1973年10月底，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闹剧开场。经历了八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推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当时刚刚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二百人，他们也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出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梁漱溟先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人颇有些与众不同，向来是有话便直言无讳而不顾及其他。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两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大有

"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老这个"反面教员"作靶子，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感到腻味，便不约而同把眼光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报，立刻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有二十余人都"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他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同样是不允许的。在粉碎"四人帮"后，梁先生对人说："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于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我非开口不可，而后引出了一段周折。"

梁漱溟忍不住还是开口

在当时的学习会上，当许多人都"表"了"态"而梁漱溟依然保持沉默的时候，便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

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台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

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即 1973 年 12 月 24 日，梁漱溟才在学习会上说：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意思、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会上马上有人说话："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议的人却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决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为什么叫“登台开讲”？因有这样一个细节：梁漱溟发言的那天，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里面是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摆在会议室茶几上，站起来发言。由于他已是81岁高龄的老人，是学习组最年长者之一，主持会的人请他坐下讲，他摆摆手，就像在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有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继续讲了一个半天。

梁漱溟长篇发言要点补遗

梁漱溟先生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总题目就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由于是即席讲演，许多话乃讲稿提纲上所没有，即使是1985年《群言》杂志连载的文章，也未能全部包括。笔者现根据当时的纪录本和梁漱溟的手稿，就其结论性的要点作些补充。

梁漱溟在学习会上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

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良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就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无可奈何的扮演角色

正当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运动闹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梁漱溟在学习会上发表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些既是批判梁漱溟大字报的标题，也是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当然，还得老账新账一块算，梁漱溟是长期负债户，他的老账是算不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梁漱溟自己，是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大家心照不宣，这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并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听的，说的，大家都无可奈何地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着角色，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观众。相比之下，当观众在台下一坐，当然较安稳些，上台演戏就困难得多，起码总得读一遍满纸违心话的发言稿吧。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些民主党派学习会发生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大会读批梁发言稿的事，最后只

得由领导做工作，指定了发言人。当时所谓批判会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梁漱溟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在作了上述长篇发言之后，得到的第一步反应是由他所在的学习组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批判。由于“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众口追问，不表态是不成的。一开始，梁漱溟也只是露个头，他说：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

用当时的话说，梁漱溟的这段话是“故技重演”。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把话倒出来是难过关的。梁漱溟随后终于在众人追问之下吐出真言，把要说的话断断续续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将梁漱溟当时的发言要点摘录于后。

梁漱溟说：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

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像林彪那样，说一套，做一套。要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毛主席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

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梁漱溟的批判，由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自1974年2月20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小组会对他批判的火力十分猛烈。梁漱溟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久，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无奈他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是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许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我仍然采用摘录梁漱溟当时言论的办法，用事实作出答复。

3月8日，即在梁漱溟长篇发言十余天之后，梁漱溟便在会上说：“最近我竟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更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了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梁漱溟继续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

上同人指责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指责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立即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3 月 11 日，梁漱溟又在会上说：

“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

不料在 9 月 23 日，当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漱溟却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11 月 18 日，梁漱溟曾手书《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三月而四月，而五月、六月、七月，大抵均在学习组批孔，学习组均对我进行背靠背批判。预告宣布九月将召开五个学习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 9 月 19 日、20 日、21 日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 9 月 23 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当时的主持者勒令梁漱溟作出解释。

梁漱溟解释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结到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了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这段解释，更使在座的同人哑然、木然。我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必多作解释的解释，还是留着原话，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选自作者为《同舟共进》撰写的《政协三十年见闻录》系列文章）

林 雪

迎风而立田家英

一

常常一闭眼，就看见田家英。在离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不远的那条现代化的公路旁，有一尊他的雕塑。常青的松柏为他营造出一个小小的林苑，他站在暗红色的花岗石的底座上，皱着眉头，白衬衣的袖口在手臂上卷起，任风高高吹起自己的头发，有点像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

这是他的家乡，也是38年前他带着工作组来做过调查研究的地方。这里离成都仅5公里，叫做大丰。他在这里住了将近半年，走遍了每个生产队，然后从这里走进了庐山会议，也走进了他生命的第一个风口。

和提起许多人人们就会想到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件一样，田家英也总是和庐山会议连在一起。人们觉得那是田家英生命中的制高点。他居然在那里对人说有朝一日如果要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主席说三句话：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

言。他还和几个要好的“秀才”谈论，毛主席应该“隐身免留千载笑”，退到二线去写回忆录。

这些话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都证实了，引起了当年没有敢想或者没有敢说的人，也引起今天的人们，无限的感慨。一向谨慎的田家英在那个是非之地说出这样的话来，显然和他在大丰蹲点半年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小镇，发现田家英在大丰人的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一片地方因为来了田家英，人们少受了多少苦，少死了多少人，这里的老老少少，无论是见过他或者没有见过他的，都叫他“田青天”，于是才有先富起来的人，为他塑起了这座雕像。

尽管镇上的书记一再对我说，这是他拿着田家英的照片请来著名雕塑家做的，可凡是见过田家英的人都说这雕像不像他本人。

于是我转过身去，企图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看清田家英。

二

1959年的初春，当田家英和他的调查组从那辆旧吉普车上跳下来的时候，这里还不叫大丰，这里自古流传下来的名字，叫崇义桥。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些很洋气的高楼，更没有这些年产值多少多少万的乡镇企业。这里是“天府之国”川西平原最富饶的地区，可是当时它和全国一样，也刚刚经受了1958年浮夸风的肆虐，显出一片萧条。人们也刚刚搞过上山炼铁，下地熏土，敞开肚皮吃饭，每月按时“关饷”之类的名堂，甚至一些地方也吹起了“撤房并居”、“砸锅搜碗”的共产风。不过几个月工夫，丰茂的竹林没有了，满圈的猪羊鸡鸭也没有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没有了，很多人连家也没有

了。人们挥霍掉了所有公有的和私有的积蓄，眼下每人每天在公共食堂里的粮食只有 4 两 8 钱 3 厘黄谷，碾成大米不过 3 两，连稀饭也吃不饱，简陋的医院里已经出现了水肿病人。田家英来到了公共食堂，看见一位老太太因为不小心，打倒了全家人一天吃的一盆稀饭，坐在地上号啕痛哭，最后用田家英给的 5 斤粮票，到公共食堂称了 5 斤麦麸。

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这里的群众也被突如其来的饥荒吓坏了，被当时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压吓坏了。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田家英，看着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当了大官的“亲戚”，他们不是想听他说些什么，而是想看他做些什么，能给老百姓带来些什么。也和全中国的基层干部们一样，这里的干部也处于两难之中。他们既要做假账应付上面下达的“高指标”，又得暗地里护着父老乡亲们。现在，他们还得面对从毛主席身边来的这位“钦差大臣”，真话不敢说，假话又不能说，他们也提心吊胆的看着田家英，自觉地联合起来，筑起了一堵警惕的高墙。

可是田家英，却微笑着向人们走来。

关于田家英在大丰的事情，人们已经写过。这些文章里写了他的忧虑甚至愤怒，写了他的锋芒和果敢，田家英在人们的印象里，有点像正义凛然的包公或者海瑞。可是在大丰，我问过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他们都说田家英好性子。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让熟悉当地情况的武装部长李文才当自己的警卫员，小李跟了他几个月，说从来没有看见过田主任发过脾气。有一次他和几个小年轻在楼上玩枪，一不小心枪走了火，子弹穿过很薄的楼板，打进了楼下田家英的卧室兼办公室，田家英此时正在写字台前办公。刚从志愿军转业的李文才吓坏了，心想这下子一定得蹲监狱。可是没想到田家英只是看了他一眼：“你们又玩枪了?”以后便没有 了话。听说后来也有人提出要处

理，可是田家英不同意，一如既往地带着他到处走，直到现在年过花甲的李文才说起这事还叹气：要是换了别人，不定闹成什么呢。

如果说这事还只体现了田家英对年轻人的理解和他的宽容大度，那么在工作上一贯认真的田家英，也和脾气不沾边。刚到大丰的时候，大会小会都开了，没有人敢跟他说实话。虽然解放不过十年，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好多次运动，尤其是刚刚发生的“反右倾拔白旗”。他们知道田主任的官儿再大，也是要走的，他们不愿意在田主任走了之后，全家人跟着自己像那些可恶的地主富农一样抬不起头。

田家英也不追问，他照样笑嘻嘻地下乡，要么在地头田间背一个孩子抱一个孩子，被婶子大娘们叫做“送子娘娘”；要么到社员家揭开泡菜坛子尝尝川西坝子有名的泡咸菜，夸奖主妇的手巧。他跑遍了这里的公共食堂，和社员们一起喝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每当社员干部对他的提问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它的时候，他也只是笑笑。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生产队长，说是要看看库存。队长忐忑不安地打开保管室的门，田家英看到了一座“粮山”：这就是按照上面的高产指标算下来，队里“应该”积屯的3万斤粮食。田家英也不说话，只是站上去踩了踩，只觉得谷堆松抛抛的。他顺手拿一根竹杆，往下戳戳，谷子哗哗地往下掉，露出了下面垫着的谷草。

生产队长的脸都吓白了。大家都说早晚瞒不过田主任这一关，这下真的让他抓了个现场。可是田家英还是只笑笑，拍拍手跳下来，说嘿嘿这谷子，秕壳真多啊。

我问过当时的大丰公社党委书记、兼县里派驻大丰公社工作组的组长罗远述：你们怕他查出真相吗？他说怎么会怕呢？我们自己不敢说，可是心里真的是盼着他们查个明白啊。老百姓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邻里乡亲，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喔。

我又问当时的调查是不是很困难？他说开始是困难，可后来就不了。谁都痛恨浮夸风，碰上这么好的一个田青天，很快就都说了。田主任的耐心又好，就说新民公社社长罗世发吧，人家是省里树的典型，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曾经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出访过印度、泰国、缅甸等国家。他的地盘上水稻“卫星”亩产到了 3 万斤！田主任找了他好几次，他都躲，一头是省委书记李井泉，一头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他一个小小的青年农民，敢说什么？他先是支使三个生产队长去应付，可是田主任还是找到了他，问 1958 年的产量到底是多少。他支支吾吾地说什么虫吃了鼠吃了，还有抛撒浪费，干湿水分……实在是说不清楚。田主任看着他，不问了。可是没想到就在即将离开四川时，田主任又找到了他，很诚恳地跟他讲了说大话空话的危害，讲了最近毛主席已经着手纠正浮夸风的一些举动，还讲了工作组已经调查清楚的许多情况……好多年以后，罗世发含着眼泪说：“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尽情尽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把 1958 年怎样搞真假两本账，报的产量是怎样做的假，都一五一十对他讲了……”

也就是罗世发的这个材料，后来被田家英带到了庐山会议上，招至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险境。

好多人都知道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有过很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延续到了庐山会议上，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来调解。可是无论是李文才还是罗远述都没有听田家英自己说过。斗争当然是存在的，因为李井泉当时追风追得很厉害，也算是毛泽东的一员“挑担子”的爱将，他不愿意让以认真出了名的田家英来四川揭自己的短。比如说，他就不愿意田家英到他的秘书蹲点的郫县红光公社去调查，后来毛泽东根据田家英在大丰反映的情况下达了《党内通讯》，提倡“包产落实、合理密植、节约粮食、要讲真话”等

六条精神。可是接到文件后李井泉一边继续在全省推行“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等过度密植措施，一边在毛泽东下达的文件上批示：“不要转变过急，防止消极影响……”不准向下传达。而此时的田家英却让罗远述专程从重庆赶回大丰公社，找了个口齿清楚的女孩子当广播员，一天好几次用大喇叭向社员广播这份《党内通讯》，推行合理密植，闹得附近的人们都跑来打听：怎么大丰的政策，和我们那里不一样？

田家英向周围的干部们解释说：“我已经和省委地委的领导谈过了，我要在大丰搞一些政策性的实验，即使失败了，也不过一个公社，而四川有几千个公社，影响不了大局。”

和颜悦色地，解释一下而已。

三

田家英微笑着，却也胸有成竹地在大丰工作，那年，他37岁。他13岁时，目光就穿透了那个因为没有了父母而过于冷静的家，立下了“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志向；14岁就曾在报纸上与一位刘姓老教授论战，且大获全胜；当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达延安时，还不到16岁；他的那篇《从侯方域说起》以老道的文笔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把他招至身边时，他才26岁，比自己的学生毛岸英还小一点。解放以来，田家英已经成为毛泽东了解农村情况的得力助手，从调查合作化运动开始，他跑过全国许多地方，即使在大跃进的最混乱的时候，他和吴冷西在一起到“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七里营，对当时的大兵团作战、虚报产量、所有制混乱等情况的调查，也成为毛泽东“亡羊补牢”的基本依据。到大丰来之前，他还在离此不过二十多公里的郫县红光公社蹲点。1958年毛泽东到过那里之后，那里立即就成了四

川省委的“试验田”，水稻产量一下子就放了一颗 82525 斤的“大卫星”。

十多年来，他的正直和诚恳，才华和干练，尤其是对工作的认真和热情，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赏。大丰人都知道，田家英不怕谁，包括李井泉。他可以不在郫县，但是他不会离开四川。在大丰工作期间，田家英在省委招待所礼堂作过报告，面对省市委的干部们，田家英毫不客气地大讲刚刚发生的浮夸风的危害，对先是大吃大喝“胀死人”，后来又没吃没喝“饿死人”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大丰人也都知道，除了《党内通讯》之外，田家英还给毛泽东写过好多材料，他们就经常看到“毛选办”给田家英寄来的信件。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毛泽东曾经极力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已经深入他的内心，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他只对这个原则负责。

田家英和大丰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一片，其间他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各个部门的干部们交流全国的情况。他不断地将自己的“成果”传到毛泽东那里，也不断看到它们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提高，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向全国转发，尤其是那份纠正若干坏风气的《党内通讯》。在这个时期，他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他和大丰的社员们一起到十多二十里之外的城里拉粪，还在途中建立了一个食堂，为每个拉粪的社员补贴半斤米的干饭。有一次遇上下雨，他和秘书逄先知、警卫员李文才一起，跑到省委招待所缠着要“住店”，看着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拉粪的”，守门的大爷几乎要发火，最后还是田家英打电话叫来招待所的所长才解了围。田家英爱说笑话爱开玩笑在群众中出了名，即使是做思想工作，常常也是先给你讲个故事。他还带着李文才到成都有名的春熙路古旧书店，去寻觅他历来感兴趣的名人字画。大丰的人们喜欢穿着工农蓝中山装、

卷着裤腿、穿双军用布鞋的田家英，喜欢他的宽怀大度，喜欢他的谦和开朗。

四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在当年田家英住过的小楼前。

这是当年小镇上一位士绅修建的两层木楼，雕花的槛板已经朽落，整个楼房早已不住人，田家英住过的房间也堆满了杂物。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周围的楼上相继亮起了灯光，田家英屋里的灯，也应该亮了。白天那个在群众面前微笑谦和的田家英，会在这灯下变得沉默了，四面江山，万家忧乐，又涌上了他的心头。

好多年以后，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曲折折，田家英还对人说过："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田家英的这种想法起于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可是在大丰期间，他肯定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的关于"人民富了国家才可能富"的想法，在大丰的时候就有了雏形。我在县的档案局里，看到了田家英带领工作组起草的十几份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农村当时状况的方方面面；对财务制度的规定，干部守则，各种条例、报告、会议发言……在这些文件里，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在"多劳多得"的前提下多处提到的超出奖励制度。田家英在大丰拟定的许多文件中，很仔细地划定了每项工作必须包干完成的各项指标，并定出了完成这些指标后应该得到的奖励，有的定得相当高。例如粮食生产，对超出部分的奖励比例定到了40～50%。（在人民公社的20年里，我不知道类似的条文是否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反正我自己在当知青的7年里和后来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则是

闻所未闻）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田家英在《关于分级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和许多文件中，都针对人民公社初期“大兵团作战”、“吃大锅饭”和根本不搞经济核算等错误做法，拟定了不少条款。这些条款的主要精神，即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后来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转变成由田家英牵头起草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文件交大会讨论，并选定山西长治地区农村试点。它使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当时的大公社（县）小公社（乡）回到了初级合作社，即以平均每二三十户一个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这实际上是对1957年以后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并社升级”的一种纠正。

大丰是解放后他在农村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不到半年的时间使他对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自己深思后的想法。他不但会思考刚刚发生过的“大跃进”，还会将思路向前延伸，思考解放后一系列“左”的做法；也会将思路往后延伸，包括他后来说过的“人民富了国家才能富”的思想。像他这样通今博古又有相当理论修养的人，应该非常冷静地对这一切有了一个总结。他认为一个大党，也应该对一段时间的工作有所总结。田家英在毛泽东眼里，也许还是个孩子，即便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也会对自己敬爱的父亲作出衷心的劝告，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何况田家英对的还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管理着一个大国的领袖、一个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甚至生存大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领袖弥补这些过失，也是一个党员的责任。

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诗，诗云：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

田家英在离开这里之前，将这个小镇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大丰”。他说希望这里年年都有大丰收，如果连饭都没得吃，崇尚义气又有什么用。

田家英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走上了庐山会议。

在去庐山的船上，田家英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他穿着一件白衬衣，袖口高高卷起，任江风吹起自己的头发，紧皱着眉头，看着远处的江面。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雕塑家手里的蓝本。

五

庐山会议，犹如一口大钟，只要稍有撞击，就会在中国当代史上发出巨大的回响。它前承着起于青萍之末的阵阵“左”的思潮，包括已成汹涌之势的“反右扩大化”；后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发生了好多事情，各种人物都在各种场合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于是我们看到了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强词夺理，投机取巧，反恩为仇，落井下石，挺身而出，舍己救人……而后，中国陷入了沉寂。

田家英看着自己的好友，还有自己崇拜的功勋卓著的前辈，都一个个措手不及地掉进了天罗地网，而他自己，在保护别人的同时，却被别人保护下来。这些年来好多人都以为这个保护他的人是毛泽东，而大丰的人们一直认为，主要是周恩来。就在田家英及其他三个秘书接受审查的时候，周恩来单独

会见了前来北京开会的劳模罗世发，还请他吃饭。周恩来问这个对田家英说了实话的年轻人：你们那里还好吗？罗世发说好啊都好；周总理又问真的都好？一点事情都没有？罗世发说事情倒是有一点，有的人得了点病。周总理又问什么病啊？水肿病。那还不是问题吗？于是就问出了田家英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情况。事后周恩来又派了秘书许明，以四川省妇联干部的身份，到这一带住了半个月，重新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加上在毛泽东眼里，田家英不过是被别人搅和进去说了几句错话的小秀才，毛泽东可以原谅他，也许他相信这个头脑简单的“秀才”会从此吸取教训。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大丰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田家英，只是在这一年的秋天，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问及今年水稻的收成如何。这时庐山会议的精神已经传达下来，田家英在大丰的所作所为，已经令人担心；特别是他在大丰推行的“合理密植”，比周围执行四川省委“双龙出海”、“蚂蚁出洞”的水稻产量要高出一两倍，达到了八九百斤，这就足以使得省委那位刚刚在庐山会议上“大获全胜”的主要领导下不了台。尽管对田家英深深敬佩的县委书记曹云森面对排山倒海的批判彭德怀运动冒险下了旨令：“大丰是田主任搞的试点，不予追究。”可是当地的干部们仍然惴惴不安。于是他们商量之后，统一了口径，给田家英回了一封信，信上说今年的产量只有三百来斤。

我听到这里，心里陡然掀起了万丈波涛。我不知道在这些田里栽过秧，施过肥，还卷起裤腿进城拉过粪水的田家英，不知道为了这些水稻的丰收与四川省委有过争执，还正在因此接受审查的田家英，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

不知道曾给予这些基层干部以深深同情和理解的田家英，心里作何感想。

我仰天长叹："你们对不起田家英啊！"

已经从副县长岗位上退下来的罗远述，低下了他的头。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光。

六

风停了，雨住了，田家英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也许经历了这场风雨的田家英，想过改变自己，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想过的那样，毕竟在中国，犯"政治错误"的后果也太可怕了。许多人从此之后，由一个曾经忧国忧民、立志济世的人，变成了麻木的人，嗫嚅而行的人，变成了让今天的人们为他们而痛苦的人，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这种后果的巨大压力。可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田家英根本就没有想过"改变"这个词。尽管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递上的关于在大丰调查的材料，也因为从前的"一贯右倾"，田家英也写了检讨，可是在那次风暴之后，田家英还是田家英，只是从前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他由此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直到 1961 年 1 月，毛泽东派他去了浙江农村，搞调查研究。

这时候，得以继续肆虐的"左"的思潮，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了恶果，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连毛泽东本人面临这种情况，头脑也开始冷静，决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实地全面地了解情况，以扭转全国的困难局面。

田家英在浙江农村看到的情况，主要还是一年前在四川大丰调查时看到的那些问题，只不过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以浮夸风为代表的"五风"大肆蔓延，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人们对于公共食堂的深恶痛绝；一些基层干部不但瞎指挥，还违法违纪，不顾老百姓死活……这一切都重重地敲

打着他的心。他在老农家里打下地铺，在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他看到了乞讨的孩子，尝了农民锅里的糠菜团子，知道了农民们在逃荒，在浮肿，甚至饿死……他曾经到过许多农村，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惨象。他心里明白这样的惨象同时也在万里之外的大丰，在整个四川，在全国蔓延。一年前在大丰时他还能不露声色，现在却再也忍不住了。在当地召开的党员干部和各界人士代表会上，田家英很动感情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言不成声。

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同志曾经说过，田家英并不是比别人特别高明。他所面对的那些情况，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曾经面对过，所有的各级干部也都面对过，只不过有的人视而不见，怒而不言，可是田家英却办不到。他对调查组的同志们说：我们应该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囿于现行的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同时也不要怕经过实践检验推翻原来做出的决定……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不大容易听到，可是在庐山会议刚刚过去不过一年多的时候，田家英说了。尽管风声雨声还历历在耳，田家英却不得不再次上书。和在大丰的时候不同，他知道这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对调查组的同志们说：调查和反映公共食堂问题，我是感到有压力、有风险的，可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

毛泽东毕竟是个伟人，特别是当他冷静下来之后。他认真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并同意了田家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搞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的意见。

这个意见，后来被人们称为《六十条》。

《六十条》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从深层次

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可是对于扭转当时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它在全国范围的宣传和试行之后，在农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农业很快开始复苏。

田家英在大丰思考的那些问题，在大丰提出的那些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大风大雨，再经过了浙江调查的证实深入，终于有了结果，于是有了他生命中，最舒心的这一段时光。在他蹲点的浙江农村，他再次获得了人民的敬意。他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村委会的墙上，就像那尊雕像，至今还立在大丰镇的镇口。

七

田家英后来和毛泽东分手，还是因为农村问题，因为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包产到户”问题。原来不同意这种做法的田家英，在听取了广大农民和许多同志的意见之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积极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没有想到却成了引发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从此遭到了冷淡。

田家英像任何时候一样，自己承担了所有能够承担的责任，然后苦闷地站在一边，看着毛泽东左右的那些小人，飞扬跋扈。

再后来，就到了十年浩劫初期，田家英自杀了。

田家英在他的书房里，独自度过了他最后的一夜。他到底想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田家英不仅是一个处于政治中心的“小人物”，还是一个研究明清史学的学人。既熟悉历史，他就熟悉那些冤狱，此时他会放纵自己的思路，在它们中间探索延伸。他太熟悉毛泽东，也太熟悉毛泽东的“左右”，在逼向自己的阵阵杀声中，也许曾经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被人议论”的田家英，成了隐约能预料这场运动恶果的

人之一。它已经远远超出农业的范围，远非在大丰调查的后果可比，甚至远非庐山会议的后果所能比，整个中国，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子。

这个恶果容不下田家英，田家英也无法面对这样的恶果。

不久前，他和庐山会议上被贬的密友李锐见面的时候，还共同谈到一个话题：个人的沉浮倒没有什么关系，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都无能为力。

“时局如此，当慷慨悲歌以死”，何况那个也是熟悉中国历史的邓拓，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而那个真诚地讴歌了新中国的大文人老舍，也相继走在了他的后面。

邓拓死了。

田家英死了。

老舍也死了。

……

毛泽东也到了晚年。当他感觉着周围可怕的寂静时，当他承受着灵魂的最后孤独时，他说了一句话：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句话的后面，应该是一声沉沉的叹息，它带着巨大的回音在历史的山谷中往返撞击，经久不息。

没有问题的，岂止一个田家英！

夕阳映着秋色似锦的成都平原，也映着我手里的这本《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这上面有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的赠言，还有田家英的许多照片。照片中的他有的很英俊，有的很温和，有的很儒雅，很开朗，很认真，很严肃……从中我很容易想象田家英在大丰人心目中的模样。

雕塑家却把这一切，都轻轻地拭去，只是捡出 1959 年他离开大丰，去参加庐山会议在船上照的这一张。他皱着眉头，

忧心忡忡地望着江面，江风吹起他的头发，在他的身后，水天浩淼，远山横亘。

于是从这里着手，将手里的雕刀伸向了那颗赤诚的灵魂，让田家英在这如血的残阳中，迎风而立。

（1998年第1期）

秦 川

我眼中的“阎王”们

——回忆“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

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10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的感觉。对此，我大惑不解。

我在延安时期就与日后中宣部的有些“阎王”相识，1953年调中宣部工作后，他们都直接领导过我。他们的理论修养、工作经验和领导水平我是难以企及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觉察不出中宣部犯了什么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更不

可能提供检举、揭发材料。带着这种花岗岩脑袋，我被人在大门上挂上漆黑的大字条幅："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黑藤上掉下来的烂透了的黑瓜。"对此，我也只能笑笑而已。

陆定一：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要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5日，我从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来到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部，想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周恩来来电，所有东北军来的同志通通都得回去。于是，前敌政治部把我们这些青年人集中起来，学习红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志讲第一课的，是前敌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然后是前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无锡口音过重，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王明掌权后，他受到贬斥，一直到延安整风。大概是1943年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一次批判王明路线的大会上，我听了陆定一的发言，才知道他早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就与王明一伙作过坚决的斗争。他的发言词锋犀利，很有激情，令人敬佩。

延安备战，中央机关撤向华北根据地前，我又一次见到定一同志。那次我随李卓然、胡绩伟去清凉山，谈党中央走后《解放日报》向西北局交接的问题。风云突变，大战将起，看得出定一同志的心情很沉重。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失守后，彭德怀三战三捷，周恩来在5月初参加安塞真武洞祝捷大会，宣布中央和毛主席绝不离开陕北后，我来到西北局机关所在地安塞县白庙岔的情景。我和胡绩伟去见陆定一。他正和周恩来一起吃早饭。周副主席一见面，立刻放下筷子，厉声问道："三原（陕西一县）战斗，我们打进去又撤出来了，为什么登

出西北野战军‘攻克三原’这一消息?”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似乎把我当作新华社西北前线的负责人了。我说了一句“为鼓舞士气嘛”，周恩来生气了：“你说说，无产阶级新闻和资产阶级新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一时语塞。周恩来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这种根本区别就是真实、真实、真实!”然后，他又讲起战争爆发以来，新华社所登战事新闻都经过反复核实，国民党则完全是说谎、欺骗民众。这时，定一同志大概想让已经多日睡不好觉的周恩来息怒，忙接过话来：“你们要理解周副主席的深意……”定一同志还说了一些话，使我和胡绩伟从紧张、愧疚中缓过神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当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很高兴能在我敬仰的陆定一领导下工作。然而，解放后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讲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

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胡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500万知识分子，丢了5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当时，中宣部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陆定一也有武断、粗暴的时候。在处理丁玲、陈企霞事件时，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和干部处处长张海受牵连。在三座门礼堂开宣传系统干部大会时，陆定一一上台就说：“李之琏、张海给我滚出去！”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定一同志这样的老革命的心理状态，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说不太清楚。

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央在毛泽东居所颐年堂开会时，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被采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这一方针是党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

我记得这一段时间，陆定一多次提到苏联科学界独尊米丘林、李森科、巴甫洛夫而排斥西方的摩尔根学派等学阀作风，这种学风在中国也有谬种流传。有一位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老同志深受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影响，排斥

倾向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陆定一就调动了他的工作。卫生部有位负责人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不能接受这些轻率抹煞人类以往科学成果的奇谈怪论，指出那些盲从苏联的同志嘴上总爱挂着"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是多么滑稽可笑。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中宣部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

1956 年可以说是陆定一思想大解放的一年。5 月 26 日，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我觉得这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在报告中，陆定一主张把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同政治区分开来："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陆定一提出，即使是对那些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学者，也要保障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研究、将自己的专长传授给青年。党员要克服宗派主义，在学问上多向党外人士请教。

两天后，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最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

遗憾的是，定一同志思想的光芒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很快黯淡下去。一年后的"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毛主席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双百方针"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

却从此被束之高阁。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我被打成中宣部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大鲨鱼"。但陆定一对我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他曾在部务会上避重就轻地说，秦川同志主要是读书太少。当我听到这个话时，心里很不平静。因为好几年前，陆定一就想让我到中央党校深造。1958年，他又让我到南方某省去做宣传部长，认为那样更适合我。我没有听话。我下放劳动两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体重降到96斤。有一次回京探亲，在中宣部大院遇到陆定一。他关切地说："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从此，我就结束了下放劳动，在家待业。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我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的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

十多年后再见到他，已是1979年。那天，陆定一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让我去看他。到他家后，先见到陆定一的家人。陆夫人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我脖子上，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这大概是指人民日报社帮他们递交过申诉材料。稍过了一会儿，陆定一回来，我俩相见，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清楚地记得，陆定一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时，一面端详一面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说："长大了，长大了。"眼里饱噙着眼泪。这位备受磨难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女情长令人动容。

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就提出，我们党自"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刊出前一晚，他打来电话："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当时这种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曾经引起最高领导的不满。

1986年，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举手表决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陆定一忽然站起来说：“决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句，我主张去掉前面半句。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了三次意见，但都没给我登简报。”不少中央委员为定一同志的讲话鼓掌。虽然这一建议没有被全会所采纳，但他不寻常的胆识又一次赢得了党员、群众的敬重。

晚年的陆定一回眸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这可以说是定一同志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陆定一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除了“大革命”的短暂时期和 1956 年前后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其他时间不是受迫害就是被埋没。然而，真正的金子是岁月的风尘所遮掩不住的。越是到晚年，他作为思想战线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光辉才越加被全党所认识。

1992 年，陆定一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端详着孩子们送去的各种饺子，忽然握着我的手说：“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我无言以对。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党战争年代靠什么？靠的是投身革命的‘军阀’，他们教我们如何建司令部、作战科、通讯科、后勤部，如何操练、打靶、挖战壕。我们依靠他们、驾驭他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现代化，要靠‘财阀’，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现代企业、开拓市场。我们要学会依靠‘财阀’、驾驭‘财阀’。”一席话，竟是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刻概括。

陆定一去世前一天，我来到他病房。据他儿子说，他刚刚还在念叨着我的名字。陆定一追悼会上，他女儿又说：“爸爸有过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千万不要挂在心上。”我想，定一同志临终前对我当年挨整可能还心怀歉疚。其实，我早已知道，我的“右倾”问题是康生敲定的案。我怎会责怪定一和其他同志呢？

张际春：“我是宁愿割头，不愿流血！”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也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早年教过书，参加过湖南起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提名我做主席团成员。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毕竟我是从白区到延安来的同志中最年轻的。解放后我在中宣部宣传处时，他就分管我们处，经常参加处里的会议，不过仍让我主持。每当我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就轻轻的哼一声提请注意，但从来不当场劈头盖脸批评一顿。

有一次我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文件，被部务会议否决，心里很不舒服。张际春过来对我说：“文件的缺点是没有很好研究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不过有一段话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县委书记要管宣传工作。”开完会，他又转送我两罐茶叶。在他身边工作，总是让你很舒心、很温暖。

1955年以后，政治运动升级，文艺界先后出了胡风问题、丁陈问题。张际春主管干部工作，以他军中“妈妈同志”的心态和实事求是、严肃审慎的作风处理得比较稳当，能减码时决不加码。比如，在有关丁玲问题的几次会上，他的讲话实事求是，不扣大帽子，不主张开除丁玲党籍。部内清查胡风问题没有搞大运动。宣传处有位女干事的丈夫是胡风分子，以后就见

不到此人了。完全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1998 年春节，她竟然跑到我家里来拜年。我问她，这几十年你关在什么地方？她说："关什么，就在中宣部下属单位，谁关我？"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恐怕是张际春等"阎王"的温情主义起了作用。

党的八大前，我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国庆口号，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不再提"毛主席万岁"。报告呈送上去后，有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看电影时，张际春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小平同志讲了，关于口号问题，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再也没说什么。日后，在清算我的"右倾"错误时，中宣部也没有一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康生恶狠狠地说过"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但张际春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从来没有参与对我的批判。

张际春很尊重老同志，比如每次到资深的李卓然副部长家里去，一见面总要行个毕恭毕敬的军礼。但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怕得罪人。陆定一曾经想调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张际春主持的部务会议没有通过。他的意见是"共产党员不一定都能当校长"。后来尽管陆定一拍着桌子发了一顿脾气，他仍坚持这个原则。

"文化大革命"批斗后，他的吉姆车被取消了，只好坐公共汽车上班。但他毕竟没有挤车的经验，被车门夹住，摔断了腿，不久就去世了。听龚育之同志提起，在"五七干校"的"牛棚"中，他还说过一句十分沉痛的话："我是宁愿割头，不愿流血！"这是千百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坚贞气节。他的儿子后来去了美国。女儿下乡到了井冈山，至今还留在那里，听说生活很艰难。一代人杰，晚年寂寞，身后黯淡，令人唏嘘不已。

李卓然：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在中宣部的几位部长中，我跟李卓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从 1939 年至 1949 年在西北局宣传部相识，1952 年后又在中宣部共事了。他是一个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有谜一样身世的人。作为红军五军团政委，他在长征中做后卫，打过很多硬仗，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然而，自长征结束后就凄然告别了戎马生涯，渐渐被人遗忘。李卓然是西路军政治部负责人，西路军按党中央和军委命令西进遭到彻底失败。陈云、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到新疆迎接他们，听取了李卓然的详细汇报，表示理解。李卓然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他不能接受，沉默下来。所以，尽管他资历极深，早在 1921 年就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少共”，1923 年入党；尽管他是军事科班出身，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时与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是同学，但终于不能继续留做军事工作。

在延安，他先后做过总政宣传部长、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他对人和气，作风民主，从不疾言厉色。1941 年在西北局时，他带着我和柯华（解放后曾任驻英大使）两名干事，到宜川县的固临镇做农村调查。仅有的一匹马，起初是李卓然骑，后来柯华闹肚子，就让给了柯华。我们白天与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各色人等谈天说地，晚上就睡在一个土炕上，把衣服翻过来用小扫帚扫虱子。就这样编写出《固临调查》一书，陈云读了书稿非常高兴，而且在稿样出来后亲自为我们查点数字的错误。前些日子，有些年轻人读到这本旧书，大有感慨地说：“毕竟是老布尔什维克，敢于承认土改后农村并非万事大吉。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扶助中农奔小康的问题，村干

部素质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你们都及早地看出来了。”这是指李卓然在书中得出的调查结论。

起初，我们对李卓然并不太了解。他的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但比较随和，经常与我们一起玩乒乓球，甚至一起脱光了衣服在延河里洗澡。一次，延河发大水，我起早在河边拣了一盆小鱼。他上班后找不到我，发了很大的火，同志们都为我担心。我把鱼盆端到窑洞前，斗胆建议："油煎了，很好吃。"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真拿你没办法，弄点油煎吧。"这就是他的风格，特别喜欢年轻人，处处爱护年轻人。有一次我为西北局的党刊《团结》做校对，粗心到李卓然文章的署名排成了"卑然"也没有察觉。他发现后站在山头上呼叫："秦川在哪里，真是乱弹琴!"当我跑上去站在他面前时，他指着刊物气得说话都不连贯了："你看看，卓然，卑然，你看……"但也没有因此给我什么处分。在康生一手操纵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整死人的单位不在少数。他领导的西北局宣传部，白区来的大学生、地下党多达几十人，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挨整。直到解放后我因"右倾"问题被整肃时，他也没有上纲上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秦川这个人是一贯的调皮。"

在延安时，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曾经在一座小山包上与他进行过动情的辩论。他只是冷静地问我一句："假如敌人来进攻这座山头，你知道怎么布兵吗?"现在想来，当时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也不会平静。宣传部的工作并不紧张，也就是起草文件、下厂下乡讲话一类琐事。劝我安心后方工作的他，想来会不会也常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概叹呢?

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才多少知道一点李卓然那惊涛骇浪般的过去。西路军包括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主力，曾经有2·1万人之众，是红军中的"正规军"，

最后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三百余人。说起这段历史，他的态度十分沉痛，似乎又有些委屈。他写下《十五年与一年》的个人总结，认为自己入党16年，有15年是执行正确路线的，西征那一年算是犯了错误。在整风中，人们也没有怎么与他过不去。

1949年北平和谈，周恩来指名让他参加，后来，他去了东北，任东北局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区副主席，解放后，先是接替刘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谈西路军问题。80年代末，近九十高龄的他孤身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我告诉了胡启立，第二天胡启立就带着一束鲜花去看望他，跟着习仲勋、宋平等人也去了。他拉着习仲勋的手不放，说："别走，再说一会儿。"1993年临终前，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还耿耿于怀，说："毛主席当时一直没有告诉我要跟他北上。这个情况，陈云同志来新疆接我时，我说过。回延安后，也曾经与少奇同志睡在一个窑洞里谈过一个通宵。"

去年，在一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电视片中，有关遵义会议那一段，终于播出了李卓然的画像，还有他拥护毛泽东的简短发言。这位曾经饱蘸青春的热血大开大阖书写历史的红军将领，终于在去世三年后得到了他生前未能盼来的历史的公正评价。

张子意：勇于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是共产党有生命力的表现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子意，是 1946 年在延安。我们去欢迎他和马明方等人从新疆监狱中获救归来。他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情绪非常激动。听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之一。他解放后在中宣部任副部长，分管干部和理论工作，接替张际春。他处事原则性很强，说话很坦率，敢于开展批评。

1958 年，周总理组织中直机关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他和周扬就与我们一道乘坐大卡车前往，收工回来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聊天，晚上同打地铺，摊开一张草席子就呼呼大睡。那时，我们都被编在第四支队，队长是周恩来，秘书长是习仲勋。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卫生部长李德全风趣地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同学会吧。工余时间，张子意很坦然地告诉我们，自己犯过李立三盲动路线的错误，几乎历次左倾路线都沾过一点边。由此，我们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

1959 年，中宣部组织农村调查。在四川农村，我发现当地干部宁愿老百姓饿肚子也要完成粮食外调指标。村民们只好掏出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东西吃，或者去城里讨饭。有一天，张子意陪同政治局委员李井泉来看望我们。李井泉问公社书记，粮食够不够吃，食堂办得怎样。公社书记夸口说没问题。我据实反映，农民手头没有余粮，22 个公共食堂中 16 个已经停火了。李井泉对我的直言似乎很不高兴。张子意在一旁没有说话，第二天派车接我们到成都，一日三餐以酒招待，让我们吃饱了肚子、解了馋。席间，我们争相诉说农村的困难情形，张

子意听后点点头，仍然没有表态。

庐山会议后，我因如实反映农村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康生在几次会上点了我的名。张子意主持了对我的批判会。1962年，刘少奇提出甄别干部，邓小平主张“一风吹”。在中宣部几个“阎王”出席的会上，张子意宣读了对我的甄别结论，承认1959年对我的斗争过火了。我当场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强调我跑过好几个省，各地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太厉害了，我为此说几句真话，何罪之有，岂是个过火的问题？张子意表示，有不同意见可以写下来。当天下午，我就把申诉材料写好，指责中宣部违反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这自然被视为“翻案风”，我的甄别平反又落空了。

1964年，中宣部干部处通知我可以自找工作。我本不愿离开中宣部，迫于无奈，也只好自谋出路了。听说新组建了一个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是谷牧，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谷牧当场敲定我去当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后曾坐着车子去责问谷牧为什么收留我。张子意事后也曾对别人说，秦川的问题主要是康生揪住不放。

“文化大革命”中，张子意也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有天晚上我去看他。一进门，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他就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没有等我言语就说：“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我本有些怨气，想把当年的事问个明白，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几天，听说他住院了，十分危险，我又赶去看他。他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他说：“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分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张子意在病榻上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赞扬人民日报勇于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是共产党有生命力的表现。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信中的句句话都是一颗共产党人滚烫的心，是一个老党员的临终嘱托啊！

周扬：毛主席要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

周扬自从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推动根据地的大众文化。但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

1956年，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时，我与他已经十几年未见面了。他比以前随和了，主动接近人了。有天晚上，他到我宿舍闲谈，问起我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我说是巴尔扎克。他忽然放声笑起来，说："我喜欢德莱塞。"走进我的卧室，他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完全没有什么架子。我也曾随他去宣武门外走访过几位京剧艺术家。这使我对他的印象好多了，觉得他也是可以亲近的。我虽然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我聊上几句。一次，他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我没有读过唐宋八大家，真不知说什么好。又有一次，他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现在想来，解放后，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错误方针一直很坚决，但从《武训传》、《红楼梦》事件以来，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嫌疑，

所以要把他赶下乡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

1958年，周扬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期间，一天夜里，在草席铺就的地上，他谈起上海"左联"时期的事。他和夏衍、阳翰笙等在上级组织机关屡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上海文化工作由此突破了"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倾向，取得很大成绩。他还谈到，冯雪峰从陕北苏区回上海后不愿与他们见面等情况。他的彻夜长谈，使我在敬仰之余也深受教益：周扬能在失去党的直接领导时独立思考，勇敢地扬弃左倾思想的束缚，结束了"左联"时期文艺战线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没有相当的才能和胆略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

据我观察，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真是东倒西歪、左顾右盼。整胡风，开始他并不积极，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究竟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去，至今还是一个谜。胡风问题出来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由此中央设立了肃反5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但陆定一不过问具体事宜。自从毛泽东的批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后，陆定一就把此案推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自称不了解文艺界情况，于是从中宣部调过去一批人，×××担任公安部文化系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罗瑞卿。丁玲事件，周扬确实参与了。我列席过文联礼堂的批判大会，听过周扬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在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的问题上，周扬的态度更是厉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一次，我去看他，见他刚从冯雪峰处回来，又要匆匆返回冯家。他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他曾多次向"文化大革命"前被整的人一一真诚道

歉。但当初在胡风问题上为周扬当智囊和先锋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未见只言片语表示歉意，令人费解。

过去，周扬的作风有时也可能确实会给人以“阎王”的印象，使一些战友不能接受。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那个“左”的年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但是，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上海、延安、全国解放初期，他都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作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简直是大彻大悟，以他过人的智慧为文艺和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谈到周扬在中宣部的过错，不能不提到康生。1956 年八大以后，康生参加了中宣部的领导工作。每次部长会议，他都参加，并作长篇讲话。我记得反右派斗争后一次部长会议上，康生总结出一个政治心得，大意是：延安整风引出一个王实味，这次整风又引出右派反党进攻。整风必出右，这是一个规律。又有一次，1962 年一天晚上，在沙滩教育楼放映电影《桃花扇》，演到一半，康生一声大喊：“反动！这是一部反动电影，怎么能把投降文人拍成正面人物！”从此，《桃花扇》被禁，“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殃。康生在中宣部欠下的债，似乎很少有人提及。

张磐石：拒绝“墙倒众人推”

曾任华北局书记、宣传部部长的张磐石，是富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也是 1954 年到中宣部来的。他为人率直，胸怀坦诚，作风也平实，没有架子。他主持召开过全国工矿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很有水平。在中宣部工作的侧重点上，他难以适应陆定一的思路。我批评陆定一

"只抓500万知识分子，丢了5亿工农兵"，实际上是反映了张磐石的一些观点。他对工作抓得很紧，批评起人来很厉害，我对他也难以适应。

1958年，在中宣部整风会议上，我批评张磐石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我的发言偏激过火，至今还很歉疚。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会上有人竟把他进一步上纲为"向党伸手"，这就更"左"了。此后，我与他的关系一直不很顺畅。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中宣部以我为重点的批判会中，原以为他会借机狠狠批判我一顿，但他竟然没有墙倒众人推，而是一言不发。"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说了许多对我有保护性的话。

"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下放京郊。"文化大革命"时也在劫难逃，离开了中宣部。

胡乔木：要多做第一把手的工作

从延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始终十分尊重胡乔木。1944年中央西北局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乔木来传达刘少奇、任弼时关于兴利除弊、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给我留下很好印象。1946年冬天，陕甘宁边区打算以发行土地债券的办法来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质就是和平土改。我奉命带工作组去鄜县。在鄜县塬上，我看见乔木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一个石碑前凝神观看，很为这位毛主席的大秘书能吃得了这样的辛苦而感动。乔木是同康生、陈伯达、田家英一道去陇东研究和平土改问题的。乔木支持这一正确决策，而康生回延安就作报告，反对和平土改，强调阶级斗争。

1950年，我还在西北局宣传部时，曾借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乔木请教做好工作的秘诀。他给我出了个主意：

要多做第一把手的工作。此话大有深意，看来是概括了他在党内沉浮中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他做人的准则。对乔木来说，这第一把手当然是指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53年，是胡乔木把我要到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主要跑中国科学院和卫生部。一天，乔木来电话，告诉我中央要搞原子能研究，准备让钱三强负责。胡乔木提出让科学院给他配吉姆专车和配警卫员，可见他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不同意卫生部否定中医的做法，向乔木汇报，他表示支持，并让科学处的龚育之写一篇文章，阐述中央关于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批评中医是封建医的错误观点。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想让我去看看北京的两位特殊病人，一个是康生，一个是林彪。我去请教乔木，乔木说你不能去。看来，他对这两位“政治病号”的城府早已了然于胸。为这事，我至今还感激他。

苏共中央宣传部代表团来访，乔木对他们的情况介绍，尤其是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非常感兴趣。其实，早在中国省市宣传部长访问苏联前，我们已经实行了。乔木受苏联那一套影响太深了。部里有不少同志反映，乔木对下属过于苛责，甚至有点尖刻，常常当面让你下不了台。记得一次讨论斯大林论述语言问题的文章，乔木指定我发言。我一时说不出什么，他就当众批评我，真有点受不了。应该说在初到中央机关时，乔木对我帮助不少，收益良多。当时，我确定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没有想到，事过几年以后，彼此都失望了。

徐特立　陈伯达：慈祥老人和“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也是中宣部副部长，主要工作是任毛泽东秘书，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开大一点的会，就请他来

讲话。他的讲话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所以就由王惠德同志作他的"翻译"。常在中南海散步时见着他，当时的印象是，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康生、"四人帮"沆瀣一气砸烂了中宣部，又投靠林彪成了罪犯。

令人尊敬的徐特立老人也是副部长，主要研究教育问题，住在西郊，我只见到他一次。因为部长会议经常不通知他参加，他那次站起来气冲冲地批评乔木。我印象中，这位慈祥的老人很少如此动火。

中央宣传部终于被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彻底砸烂了。陆定一等几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尤其是思想文化战线有威望的领导人多已谢世，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散落四方。但是，我想一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是不能忽略他们的。他们毕竟为我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创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组织制度，例如重视调查研究，少唱高调、不尚空谈，摆正宣传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区别中央宣传和地方宣传的侧重点，宣传干部经常下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部长、副部长、处长不能随便以个人讲话作指示，等等，都是对党的建设的开拓性贡献。这么一个有威信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导机关，由于最高领袖的一句风趣的评语，在一夜之间以非组织程序被连锅端，若干负责人锒铛入狱。如此惨痛的一幕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每当想起也终难平息胸中的悲愤和惆怅。

（1998 年第 3 期）

王若水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

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曾经发表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后来，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广州文艺》上，也都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的态度。虽然这是个人意见，但这也是一种迹象，表明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了。

作为知情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桩公案的情况写出来。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60年代批判人道主义

“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周扬，变化是很大的。

60年代初，周扬本是批评人道主义的。他在1960年7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作报告，就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谬论。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1963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高潮的时候，刘少奇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批判，当时拟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个题目就是《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挑选了几个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作为这项工作的准备，我们看了一些当代国外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虽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但他每次来都很认真地出主意和参加工作。那本语录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审定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像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

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

在这次讲话中，周扬首次论及异化概念，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扬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表扬。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泽东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

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益于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像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扬研究理论，我想也是为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不久他担任中宣部顾问。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其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胡乔木的表扬，因而被评上了《人民日报》1980年“好文章”奖。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胡乔木又授意汝信对这篇文章作检讨。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亲自物色三个人来协助他：上海的王元化、中宣部的顾骧和《人民日报》的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定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章题目，就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这次，周扬不像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地感到周扬是老了。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

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临开会时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心，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

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身体也不好，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告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谈话

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和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

就容易引起误解，好像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

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是不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

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

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

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说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对于改革却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他也回避了。

最后胡乔木建议：周扬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

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说明。”

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 90 度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我化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采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如此忧心忡忡，恰恰暴露了他自

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段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胡乔木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的预料还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

人道主义，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本来就没有准备谈异化问题。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到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有些含混。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这个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但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不一样；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异化。如果是前一种意思，那么周扬文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胡乔木的意思应该是后者。但是胡乔木在下面又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这好象是想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

第二天，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

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 13 号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讲话，14 日登报。周扬同志文章，恐怕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

报告发表引起的风波

3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虽然没有开会，中宣部的人却是在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四处奔波。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四个人上台演讲，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其中主要演讲者是北京大学某教授，他的观点很特别，说："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这个观点，比周扬和我走得更远。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异化的，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异议。至于把异化解释为矛盾，却是这位教授没有根据的随意解释。但他却批评周扬和我"滥用"异化概念，因此受到胡乔木的欣赏。《人民日报》奉命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这个讲话的主要部分，当时这是作为正面文章来宣传的。

这四位同志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大家很注意。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总编辑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

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这样，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接着当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当天下午，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接着找我。他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他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这个电话记录要点如下：

>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 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
>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

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像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

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

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段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与10日讲话明显不同，口气很严峻。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我就不会误解胡乔木的真实意图了。10日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使得我误以为对周扬文章没有很多意见。从这个电话看，胡乔木是认为周扬文章

根本没有可能修改好，那么他为甚么还要周扬修改呢？我想，胡乔木是想给周扬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胡乔木说不出周扬文章有什么错，却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我惊讶。

不过，我知道这一点已经晚了。

接受批判

起初，我还想争取使人道主义问题能够正常地讨论下去，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在西方讨论得很热闹，在东欧和苏联也兴起了“人道主义热”，中国也不应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1983月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部长邓力群讲话，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

这个讲话听起来真是语重心长，可以叫人放心（后来还发表在4月17日的《光明日报》和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第二天就明白了。

3月26日，在中宣部开会，通知周扬、秦川和我参加。这个会胡乔木主持。他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水。王若水要对发表周扬文章负主要责

任，也要对参加起草周扬文章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一部分负责。他是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此外，“近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进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段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因此，《报告》在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报告》对周扬的批评部分如下：

> 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胡乔木讲话。他在谈到我的信时，拒绝了我的建议，说不能因为国外的讨论，中国也要讨论。“国外在讨论性解放，中国也要讨论吗?”

“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化大革命”），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

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说3月10日乔木同志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的。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讲，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他们都同意查记录。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胡乔木："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胡乔木接着说："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

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秦川讲了几句调解的话。

胡乔木表示了他的大度："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今天发

生的争论而影响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更不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处理。”

接着秦川讲话，他也表示了对处理的不同意见。

我作了较长的发言，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批驳，为周扬和我辩护。周扬和秦川也说不应该对王若水采取组织措施，但没有用。邓力群说书记处还要开会讨论，届时请我们三人列席，听取我们的陈述。但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胡乔木、邓力群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在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胡耀邦要出国，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他后来也没有找我。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常委汇报思想文化界的一团糟情况和对思想文化界领导软弱。这一着收到了效果。

当年10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精神污染”问题。

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说：关于异化问题，30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再次强调，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

> 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

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作了检讨。

二中全会结束后，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个检讨使周扬过了关，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但报刊上的批评并没有停止。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

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

>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像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10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主题也是周场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过，这次是由两个广播员代念了。

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周扬接受作纪念马克思的讲演的提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该表示谦虚，说这个讲演应该由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作，比如由胡乔木同志来作，这就没事了。但他不但当仁不让，还不甘心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这就更犯忌了。这样一来，把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置于何地？周扬夫人苏灵扬曾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夏衍曾

对周扬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

胡乔木在讲话中再次声称自己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过这一点始终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一，因为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仍是"学雷锋"等，这还是几十年来的一套，没有新的东西，只是插了一个新标签而已。另一方面，他对构成人道主义核心的东西，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等，恰恰是否定的；而否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呢？第二，他对批判过去的"左"的反人道主义的错误没有兴趣；他的批判的主要矛头，恰恰是同样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这就使人感到，胡乔木只是要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而他需要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防御。

看起来，胡乔木起初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人道主义上，并没有把异化当做一个大问题，或者说他对异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意见。我听过他几次谈话，都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异化，只是说没有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10月份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乔木批评了两篇他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谈异化的文章，从那以后，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批判才突出起来。在1月3日的报告里，胡乔木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并讽刺说："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像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其实，无论周扬还是我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种观点。胡乔木把北大某教授的观点加在我们头上来批判了，而听那口气，像他从来就是反对这种观点似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

“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的文章多处对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表示忧虑，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的危害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胡乔木没有说到，对那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否也不能怀疑，也要大谈其优越性；如果这样，那么还会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还要不要走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等待到的宽容

胡乔木自己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的文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一直到 1984 年初的这次讲话中，胡乔木还批评我们说：

> 对于我们党已经做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

胡乔木忘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 1981

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在1979年和1980年就提出来了，怎么能和《决议》保持一致呢？何况《决议》根本没有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的意思是不是说，党的决议没有谈到的问题，理论界也不许讨论呢？

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北大某教授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他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讲话结尾，胡又申明，他“只是参加讨论”：

> 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甚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

胡乔木这次讲话得到了八个单位（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

央编译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协助，而且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不知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疏忽?

周扬的讲演发表时，胡乔木反对讨论，是因为他担心周扬的观点会占优势；现在，胡乔木批判周扬的文章发表了，胡乔木又赞成讨论，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把听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他的讲话的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情恳词切，给他赢来了一片赞美之声——不过很少人认真对待。我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不但未能发表，还惹了不小的麻烦。

胡乔木对他的讲话相当得意。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周扬只是割伤了手指，而这使胡乔木心头流血，可见胡乔木对周扬的友谊之深。可是这个指头上的伤口使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终于不起，我不知胡乔木有何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看周扬，他的心情很不愉快，还念念不忘地对我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1月，作协四大期间，参加这次会议的356名作家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11个代表团联合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我想，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中央出来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邓小平在对胡乔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说到：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不过，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表态。

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

10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

那时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死亡。宽容也罢，不宽容也罢，对他都无所谓了。

1997年3月

(1998年第6期)

戴 煌

死难者的昭雪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归正的急鼓仍在咚咚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12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西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

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的“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些案卷让我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进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说基本属实。

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 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母亲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

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股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望。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的唯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象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活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若敢喊冤叫屈，棒打、烟熏、火烤、水烫、踩杠、跪瓦片、吊火砖、假活埋、割耳朵，不一而足。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

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7000多字的30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困难重重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她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9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半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

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勿给予他人。”下署“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立功”之念，让飞黄腾达的权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刻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侦查，在 1969 年 4 月 30 日深夜，李九莲被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投进了插翅难逃的监狱。

1971 年 9 月 31 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叛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赞扬她目光敏锐、高瞻远瞩：当人们放足了嗓门狂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也同样狂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就看出这

位叛逃者根本不是什么“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而是一个十足的奸臣。就凭这，也应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把她送出监狱，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

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就有失“为人民当家做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就不利于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叛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出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16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三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

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局，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要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我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因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很多人都明白：这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当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73天。每当她生命垂危，人们对她强行鼻饲牛奶米汤时，她还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些隐隐可辨的话语：“让我死!”“给我一粒子弹吧!”“我都骂了你们是国民党、法西斯，你们怎不枪毙我?”……听说粉碎了“四人帮”，她也公然大喊：“寄希望于江青。”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得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

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小组女犯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四人帮’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实行‘三马一车’式的集体领导的意思。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模糊了走资派的界限，把反对他们的人，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也打成走资派……玩弄了偷天换日的把戏。

“由于历史的成因，我们国家的工业是落后的，农业也是落后的，希望有外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历来是帝国主义妄图侵吞的肥肉，因此又不能依赖外援。现在华国锋大力鼓吹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妄图改变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原料市场。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完成邓小平的‘九大整顿’的未竟事业。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说到：‘在苏联把斯大林捧到天上一万丈的人，现在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损害了‘大官们’的利益，在他们心里积下了怨仇。现在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黜的人物、被批判过的东西，又在华国锋的招幡下粉墨登场……他是不是要把毛主席贬到地下九千丈呢？……一旦宝座稳

固是否有反心呢?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6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形成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悄悄议论，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老的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而只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无异于给"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年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和导师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他们屈居少数，未能挽回狂澜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再说，1969 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又不存在了，只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作“反革命煽动”？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

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自暴自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对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省委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将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 年 12 月 14 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抗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

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住嘴唇两角，“异曲”同“功”。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公安部门为侦察是否会有未被捕获的“李调会”人员前去掩埋献花圈，也存心让其抛尸荒野。深夜，一个歹毒成性的老头子前去奸尸，并割其双乳和阴户。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执行者奉命没有将她一枪打死。她在昏死中，被一群人连忙抬到早候在刑场旁边的一辆红“十”字车上，被取出仍在蹦蹦跳跳的心脏，移植于另一张手术台、蒙着氧气罩的垂危患者的胸膛。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60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社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600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戚、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还被迫自杀，

终于形成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震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2月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明法纪，有错必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其他冤假错案件。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数；多数虽已复查纠正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复查纠正，少数法院还没有动。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1966年到1976年这11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28%，其中40%需要改判纠正。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识不足，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倾"、"包庇坏人"、"否定军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有的办错或批错了案件，怕承担责任而不予纠正，甚至

从中阻挠，妨碍落实党的政策……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假错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查纠正“反革命”冤假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然而从《请示报告》列举的阻挠和妨碍落实党的政策的种种表现中，却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15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的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出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化大革命”10年被划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83%，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131300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德市委分别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

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功用。

当然，像赣州地委与赣州地区法院的这种坚决不认错的态度，在当时的江西并不奇特稀有。南昌铁路局南昌工务段俞琛就给新华社来信申诉说，他1955年大学毕业，一直在铁路部门担任技术员。1968年，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大搞“三查”时，他被下放到南昌工务段当“道口工”，一当就当了12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就要求复职，一直未能实现。原因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的两个儿子准备应试，他帮助他们复习功课。因需要很多练习纸，当时家中的一切可用的纸都用了，本着节约的想法，他忽然想到还有几张不贴的旧画，就把它们裁开用了，没注意到，这几张旧画中夹有一张华国锋像——原来挂在墙上，后被风刮破一个角，就取下和其它画卷在一起的，后来忘记了。这事被串门的同事发现并立即揭发，他被隔离反省了三天，写了三天检查，扣了三天的工资和1978年的年终奖，还在群众大会上挨了批斗，受到了记大过处分。

俞琛说：“我错误地用了一张华主席像，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华主席。但这一错误，完全是无意中犯的……由于这一错误，至今不让我恢复技术员工作，甚至不让我参加1979年的技术考核，是不公平的。我有权利和义务为“四化”多做贡献。当然，我现在的工作也是新长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认为，恢复技术员工作更能发挥我的专长，比现在当‘道口工’贡献更大一些。所以我恳切地要求恢复我的技术员工作。”

就这么一件事，在江西都难以解决，更甭说赣州的李九莲冤案了。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

当年9月作出了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又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后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犯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报送全国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零四百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种人来说，仍是耳旁风。

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象，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的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唯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查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绩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

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绩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他们以转达地区法院对采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凳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 23 岁，就能够猛烈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毛主席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作“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 11 点，我下楼送他们坐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二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访李九莲的家庭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非尚方宝剑不行。

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刷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讲话，立即刊登于《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作了迅速而广泛的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了这样的批示：

> 彭冲、江华、赵苍璧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遵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

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 月 9 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 月 18 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 月 26 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指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 月 17 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案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 1974 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谈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查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

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查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这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这份《复查报告》在分析李九莲问题时所运用的逻辑，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观点是这样的和谐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着重总结了经验教训。

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候，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儿学习马列的杜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他说他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遵照耀邦同志批示办的。但我们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

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算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无理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还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 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小型座谈会。我认为刘复之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要私心很重、缺乏正义感的人，能够真诚爽快地承认和纠正错误，是很难很难的。1983 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在早已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回到了赣州的杜昭的领导下，赣州地区果然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这就像历史家们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

退的风风雨雨，总会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一些新旧时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开的人，往往都很擅长于手执新鼓槌，敲打他们烂熟的旧鼓点。而我们有许多人，在胜利的欣喜中却往往掉以轻心，麻木不仁。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魂得到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大口气。同时据说，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纠正。

(1996 年第 4 期)

张　扬

《第二次握手》文字狱始末

——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作

一、被　捕

1975年1月7日上午，南方农村阴冷潮湿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员们都忙着出工。工间休息，生产队长来叫我，说是公社革委会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上山下乡落户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公社机关就坐落在我们队，近在咫尺。几十秒钟后，我便跨进公社主任的办公室。

那时，"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我们知青户里，女知青各寻门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人了；男知青也八仙过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这条光棍。生产队长侵占知青组公物，我向他索还，他便恼羞成怒，打击报复，手段之一是克扣我的口粮。我虽不断向公社申诉，却无人理睬。今天终于叫我去谈话了。

走进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谈开了。公社主任神情古怪。他频频点头，似乎在倾听，却又心不在焉。

这时，门外又走进四个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环形在我面前和侧面坐下。我瞥了一眼，并不在意，继续恳切陈词。

公社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继续频频点头，一面抬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罢。"

什么，他们说说？让他们说什么，我楞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问。我回答了，却感到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时更加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稳地说出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发出的。"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砸烂公检法，检察机关被撤销，这省革委会公安局的职能相当于原省公安厅加上原省检察院。执行人姓名也写在拘留证上，叫李树贵，他身材高大，带着职业性的冷峻。我明白他是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习惯于当"螺丝钉"，当"驯服工具"，习惯于叫他干啥就干啥；无论让他去拘捕省委书记还是囚禁共和国元帅，他都会去干的。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我无意中瞥瞥公社主任，他慌忙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亏心事，"出卖"了我。其实我知道这事跟他没有关系。即使是他干的也不算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和所有政治运动中各式各样的叛卖、举报、诬陷、残害忠良和厚颜无耻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成为我们民族基本素质的组成部分……

警察们押着我走出公社主任的房间，走出公社机关，去搜查我那间破旧、低矮、阴暗的土砖屋。

我戴着手铐，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他们在屋里屋外翻箱倒柜，“深挖细找”。我忽然忆起 1965 年的 9 月，我上山下乡那天，身上总共揣着亲友们送的 14 元钱。那几乎是我 21 年生命史上私人拥有钱币的最高额！在“广阔天地”里奋斗，在“革命化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八九年之后的今天，我完全一贫如洗，身上只剩下两三元钱，而且衣衫褴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手稿《寒丹的歌》。

那时没有现在这种囚车。从省会长沙市迢迢 150 公里赶来抓我的是两辆北京吉普车。公社机关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都是熟人，大家都用难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包括那位生产队长——其实他人不坏，只是私心重一些，而这是长期贫苦造成的。我戴着手铐，疲劳憔悴，但情绪平稳，神态自若。在公社吃了午饭后，我随警察们走出大门。我冲人们微笑颔首，略略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公社距县城 60 公里。我是个知青，是当时的社会最底层的人；凭这身份，不管犯了多大的事，充其量关在县里即可。然而，奇怪，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终于，黄昏时分到达位于长沙市区东北部的上大垅。那儿房屋、街道和地形都十分凌乱，显得灰蒙蒙的。汽车开进湖南绸厂，这里原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来改归地方，但仍有不少劳释就业人员。绸厂的门牌是“东风路 11 号”，这路上没有 12 号门牌；绸厂内有个高墙铁刺网围着的院落，院门上钉着“东风路 12 号”门牌，其实是一座监狱。最初是国民党军阀何键修的“模范监狱”。后来不管政权怎样更迭，其作为监狱却不曾变化过。不知从什么时代起，这一带有个颇具神仙

味道的地名——鹿洞里。20年代后期和三四十年代，这里主要用于囚禁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者；“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多变，波诡云谲，鹿洞里前后关押过不少前任省委书记和现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之类人物，罪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有“两面派”、“野心家”和“黑线人物”，等等。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关押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鹿洞里”来说可能是第一次。

二、“破题”

一周后，1月14日上午，第一次审讯。这是一次“例行性”审讯，问些姓名籍贯、出身成分、住址简历、有无前科之类。

两位预审员，都是四十岁上下。从预审首页上可以看到他俩，一个叫周运才，另一个叫黄镜明。但是这两个人谁叫什么名字，我并不知道。他俩面无表情，显得随和、平稳。我凭着直感，对他们印象不错。我们今天如此对立，是命运的安排，并非他俩与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过不去。如果命运安排我处于他们今天的位置，恐怕也是这种场面。但我知道，假如命运安排我当执法者，我去审讯审判别人，我也会顽强坚持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啊，我想得太远了。审问得很详细，时间持续了两小时。临结束，他们忽然问：“你知道是为什么被拘留的吗？”

——这正是我想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不知道。”我摇摇头，“也许是因为我写了一部名叫《归来》的书吧？”

“是的。”他们点点头。

“但是，请问，为什么我写了这样一部书就该被你们拘留呢？”我直视他俩。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嘛！”一位预审员有板有眼地回答我。他态度严肃，语调也并不骄狂浮躁。他们只是经办人员。我想，“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种“基调”，是他们后面的大人物定的。案子就这么“定性”了，就得这么办下去了……

严格说来，《归来》并不是一部“书”，而只是一部书稿。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周围的人们习惯于叫它为“书”，说我在“写书”，那么，就这么说吧。而且我知道，即使是一部书，一部正式出版的“真正的”书，也未必有《归来》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传播范围吧……

我又想，就算是一部“反党小说”吧，终归是小说，并不触犯刑律，怎么能动用国家专政工具抓人呢？除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的作者外，当时中国的所有作家几乎都在“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都被打倒，都遭批斗，但都是“群众专政”，没有被关进正式监狱的，怎么《归来》的作者就触犯法律了？现在是“依法拘留”，今后还有个“依法逮捕”和“依法判刑”，都叫依法！依法、依法……

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哪里有法？根本没有法！根本是无法无天！对我的拘捕，也许就是依据某个权威人物的一个电话或几句“批示”……

那么，那个“权威人物”是谁呢？我立刻想到了张春桥……

我琢磨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说是“黄色小说”、“反动小说”或泛泛称为“坏书”，而特意称为“反党小说”呢？

“黄色小说”，谈不上，因为书稿中没有丝毫“黄色”，连

握手也只有两次嘛。"反动小说"或"坏书"，在当时条件下却是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给扣上的。但为什么不扣这些，而偏偏扣上"反党"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有一条"不成文法"，即"反党"必然是在作品中"公开吹捧"或"影射吹捧"了某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从小说《刘志丹》、《保卫延安》到电影《红河激浪》、《怒潮》等等，莫不如此。然而，我的《归来》中"吹捧"了哪一位"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呢……

我有两位同监难友。他俩一个原是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的矿冶工程师，政治犯，不过中国的政治犯一律叫"反革命犯"，他的反革命事实似乎是"背叛祖国"，但他坚持不承认；另一个原是省地震大队的，我始终不知他犯的什么事，多年后才听别人说是重婚犯什么的。"鹿洞里"自 1949 年以来一直是省公安厅看守所，其职责之一是羁押中央驻湘单位和省直单位的犯人，他俩就是因此被关进这里来的。单位级别高，犯人素质一般也高些。他俩就是这样，头脑都很清醒，为人也不比当时某些政治红人差。按规定犯人不准谈自己的案情，但我不知自己是什么"案情"，因此进了牢房便天南海北地聊，也讲述了《归来》的故事情节。因此，第一次提审后回到牢房，当我对"反党"的罪名表示大惑不解时，他俩便断然指出：你的小说歌颂了周总理，他们所谓的"反党"便是指这!

我仍然大惑不解："可周总理今天仍是党中央副主席呀!报纸上广播中还经常报道他，大家都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助手，毛主席的好参谋长……"

"哎呀哎呀，你真湖涂!"他俩一齐叫起来，"'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明白，还这么不了解中国国情……"

我不吭声。

"你看你看，"他俩开导我，"这一段成天批儒评法，矛头

指向谁你还不明白吗？什么当代大儒，什么周公，说谁呀？”

我仍不吭声。

“刘少奇被搞掉了，林彪也被搞掉了，现在该轮到谁了，不明摆着吗？”

我笑笑。其实，我能不“明白”吗？

我相信，即使是那位下令搜捕《归来》作者的“大人物”，也不会在他的命令或“批示”中点明要害，不敢公然触及周恩来的名字。但是我毫不怀疑，他确实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国情，就有这么奇特！

三、“前科”及其后果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干干脆脆，大声回答：“有！”

这样回答虽不符合事实，却比较符合办案人员的胃口。这样回答他们才高兴，那么且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我的“前科”怎么来的？1970 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1968 年给我的许多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话”简直不需要解释，都能看出“林立的偶像”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红宝书”、“老三篇”和“带着问题学毛著”等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而那个“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显然

影射那个号称“亲密战友”、位居“副统帅”的林彪。

反正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因此不写日记，不保存别人信件，给别人写信也很有分寸，“不谈国事”。对那“小将”算是破戒了，但一再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任何信件。然而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俨然日后要当“导师”、出“全集”似的！其实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就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竭力逃跑。长沙工厂一些青年工人同情我，掩护我，给我吃，给我住，帮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令人窒息。于是，我又重新写起《归来》，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她——啊，对这部作品，我真不愿用“它”字——在漫长岁月中，成了我最钟情的爱侣。

我一直贫穷不堪，逃亡中更加一贫如洗，连笔记本和稿纸也买不起。我弟弟的一个同学送了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爱写。我便用那个本本写《归来》。在路灯下写，在农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在车站候车室中写，在藏身的工厂宿舍里写……每次多则一两千字，少则一二十字。写得很慢，很艰难，但每天都要写一些。1969 年 12 月 31 日和 1970 年 1 月的最初几天，我是在汨罗县智峰公社一位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朋友家度过的。智峰位于大山区，那几天滴水成冰，积雪盈尺。我那姓徐的教师朋友家穷得连一张板凳也没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没有窗户，又点不起油灯。于是，白天我打开房门，让屋外山坡上的积雪将光线映入，我就借那雪光写作。

因为没有凳子，也没有桌子，我只得将本本搁在破旧的五斗柜上，站着写；站着还有一个好处，便是不那么冷。当然，不冷是假的，我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手也嗦嗦发抖，不听使唤，但我仍然写着，写着……

从汨罗回到长沙，我藏身在市物资局一位青年朋友那里。他工作的碱库在市区边缘，很偏僻。我在他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又一次写完了《归来》，恰好写到那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稿约六七万字。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旅店看一位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预感到会出事，便将随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只身前往。在逃亡的岁月里，我总是随身带着这只挎包，里面放着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和简单的换洗衣裤，还有即使在“文革”中仍然按期出版但可能没什么人阅读的活页报刊《科技参考消息》……

果然，公社新来的公安特派员带着两名大队干部在那家旅店附近“蹲堵”。特派员是新来的，不认识我，因此要带别人来指认。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特派员问。

“我没有什么生活用品。”我答。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换洗衣裤……”

“我没有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在那只挎包里。与这些东西在一起的还有《科技参考消息》和刚完成的《归来》。

“那么，你每天在哪里过夜?”

“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们会去调查的!”

“你们去调查吧。”

他们要押我回浏阳。但我没有任何生活用品，只得先押着我回家，取些东西。

我们家在板棚区，房屋简陋破旧，阴暗潮湿。家境清贫，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但清洁整齐，顶棚上堆着旧中国留下来的许多书，我自幼就喜欢那些书，如饥似渴地读，无形中积累了许多知识。“文革”开场以后，这板棚屋成了颠簸在狂风恶浪中的一只破船，时时与痛苦和恐怖相伴。半年多来，我是第一次回到这里，是戴着手铐被押解回来的……

母亲和继父都在各自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中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上山下乡当了知青而又“倒流”回城的弟弟。

板棚屋中一片愁惨萧索。因为早已抄家多次了，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空空荡荡。

板棚屋的楼上有一大一小两间屋。祖母和妹妹住在大屋中，弟弟在小屋中，因天色尚早，又很冷，都还没起床。亲人们一看就知道我被捕了，都默然无语。“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命运是经常落在中国人头上的，所以，或多或少都有些麻木了。“捕快”们不知何以对板棚屋产生了兴趣，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到处打量……

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做了点手脚。

我对仍缩在被窝中的弟弟急匆匆轻声说：“快去陈××家，将里面的东西——”我打个手势：“嚓！嚓！”

弟弟的初中还没读完，便于 1968 年和同学们一起到宁乡当了并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后来政策变了，许多知青陆续招工回了城或进了矿山，弟弟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没有这种机会，我就更别说了。他“倒流”城市，成了“黑人”，靠挑矿砂等苦力活挣点钱维持生活。我的一些知青伙伴他也认识，陈××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想到，我这个“小动作”后来造成了大波澜，甚至波及全国……

反正当时我就那么走了，戴着手铐，带着一点牙刷毛巾之类走了。先回中岳公社受审查，挨批斗，接着“升格”，关进浏阳县看守所，成了“正式犯人”。

奇怪的是“蹲”了近三年，却没见到过拘留证或逮捕证。

当然，罪名是“反革命”，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等等，简称为“恶攻”。而所有这些“恶攻”，统统等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副统帅这接班人是毛主席长期考察和亲自选定的。这样一来问题就麻烦了，性质就严重了。不过还好，我干的全是“影射攻击”，不是直接攻击，罪过据说轻一些；此外，既是影射，他就须“落实”，你则可以“狡辩”，搞来搞去时间就拖过去了。拖到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自我爆炸了。打那以后，无论对许多老干部、大人物还是对我这小人物来说，命运才开始有了转机。然而转变得慢慢来。此后又拖了一年多，直到 1972 年 12 月 29 日，我才获释，回到大围山区，回到我在生产队的那座阴森森的、古老破烂的土砖屋内。

知青伙伴们见我面色惨白，形销骨立，便偷了鸡，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砖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锅，款待和慰问我，帮我恢复元气。其场景、气氛，有些像《水浒》中那伙好汉。

伙伴们给我讲故事，一个又一个地讲。有的故事无聊，粗俗，有的却还文雅，颇具吸引力。这些故事，有的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发生在社会中的实事，有的来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与世隔绝已三年的我，不论听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

“1959 年深秋，在北京前外大街旁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慢慢开来，停下。一个人下了车，他身材很高，满头白

发，连眉毛也是花白的。他是一位科学家，名叫苏冠兰……”一个五大三粗、以打架斗殴闻名的知青，没读多少书，好像只有初中学历吧，今天居然轻声细语、娓娓动听地叙说起一个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故事。

“你说什么?”我听着，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他瞥瞥我，不高兴我打断他那美好、迷人的故事。

别人也不高兴，因为听得正起劲。

“你刚才说的那个科学家，他叫什么来着?”我追问。

“我不是说了吗?他叫苏冠兰嘛!”

“哦哦，那好，那好!你往下说，我听着。”吃惊之余，我又沉住了气。

他往下说，往下说，直到东边天空蒙蒙发亮，直到说完。

“一辆三排座黑色轿车赶到北京机场，从车上走下的竟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女科学家丁洁琼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我瞥瞥四周，发现人们都出神地倾听，好几个人的眼睛潮润了。我们这里，大多数知青素质不高，学历偏低，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因此自暴自弃，逞凶作乱成了常事，“文化大革命”以来更是如此，经常被周围的社员群众视为“土匪”。我今天才发现，这伙土匪竟也能被感化，也闪烁出人性和人情的光泽……

听完之后，我思绪如麻。愣了好久之后，我问，这故事从哪里听来的?

“听别人讲的，别人是从一本叫《归来》的书中看到的。好多人都听说过这故事，还有好多人看过这本书……”

周围的人不止一位听说过这故事或看过这本“书”，这时便七嘴八舌叽叽喳喳起来：

“对，这书叫《归来》，我看过！”

“我也看过，但故事有点不同……”

“我看的那本不叫《归来》，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故事一样，可书名叫作《氢弹之母》！”

“我看的那本叫《一代天骄》……”

“其实都是同一本书，但传来传去书名就走了样。”

“听说，写的是真人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香港人写的，他六十多岁……”

“不！美国人和香港人都写不出，是一个高干子弟写的，他了解情况……”

“我听说是科学院的一位教授……”

“不是别人，就是‘苏冠兰’本人写的！”

形形色色的说法，无奇不有。

我缄口不语，却扯长耳朵细听，唯恐遗漏一星半点。我已经意识到，这关系到我今后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得知家里的人都还活着，还住在老地方，于是我回到长沙。

我悄悄问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时，要你去陈××家……那本《归来》手稿，怎么样了？”

“啊，当时我没有毁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内容，没什么嘛！我交给了×××，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

沅江是洞庭湖滨一个县。

“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传遍了全中国！”

这时是1973年初，“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预感到迟早会出事，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出事，更无法加以避免，只要我还在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的所有地方都在继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谁也不知“底”在哪里。

四、追查“教唆犯”

我相信，在任何人群中总是有品质较好和品质较坏的两类人。文艺作品中“好人”与“坏人”的脸谱化倾向，就是从这里来的。办案人员中也有这两类人，即使在“文革”中也不例外。在鹿洞里第一次审讯中与我打过交道的周运才和黄镜明，我感觉就是品质较好的人；大概正因为品质较好吧，不宜继续办这个案子，很快就消失了，换上另一班预审人员。由于以后每次审讯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时都不让我看首页，所以一直不知他们的姓名。后来才知道，为对付我出动了最大的预审官——预审处处长孟××，他是北方人，满头白发；另一位是主要承办人，双眼皮，五官端正，身材高大，算得上仪表堂堂，可惜文化不高，满口错别字，但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心术不正。他也姓黄，这里且称他黄某人吧。

我相信是北京某个“大人物”下达了围剿《归来》，搜捕作者的命令，湖南省的执行者们才把我找到并抓起来的。我被关押在湖南省公安局看守所，就是证明；鹿洞里就是因此才开创了“知青犯人”的先例。但一开始只是想搞清情况，并没有一定要“杀”，一定要制造又一桩冤假错案的意图，因此才派了周、黄两个人品较好，亦即比较实事求是的预审员；但后来一看“油水”颇重，可以大大地向北京“大人物”邀功请赏，这才更换预审员，千方百计办成“杀”案。但要把《归来》办成“杀”案是不可能的，硬要办便只能搞许多鬼花样，搞阴谋

诡计，搞无中生有。这样一来固然有利于将我送上断头台，但搞得不好也可能使办案者作茧自缚……

啊，话说远了，还是先回到当时的现实中去。

审讯中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归来》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是什么就说什么。我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问题”。

我坦然介绍了《归来》素材的来历：

1963 年初，我去天津，看望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伯父。那时的政府机关，还真有点“人民公仆”味道，你一封信贴 8 分钱邮票要在茫茫人海中查找一个什么人，他们就当“人民来信”对待，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给你查到并回信告知你……

去天津必须路过北京。我在北京准备住在舅父家，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化学家。

我还是幼儿时代在南京舅舅家住过，已有 15 年没见过他，只从家中一些照片上知道其形貌。舅舅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理化系，想出国留学而没有去成，后在国内一些中学、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流落大后方，在贵州医学院当过副教授，抗战后和 50 年代初在南京工作，后应聘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这个机构于 1956 年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

母亲保存着舅舅 40 年代后期在南京的一些笔记本，从中可以看出他中文、英文都很漂亮，对数学、物理、生物学、博物学、科学家传记和中国古典文学有广泛的兴趣……

40 年代后期在南京，舅舅和他父亲及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住一幢小洋楼，生活条件不错。从照片上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房，书柜书架上摆满了书。外公形貌苍老而刻板，坐在写字台前，面前搁着一本大 16 开本又厚又重的书籍，精装

本深色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外文字体，旁边是放大镜、眼镜、打字机、文具和其他外文书……

从照片还可以看出，我们家的人在南京与上层社会的人物和外国人交往较多。不过不管怎样，他们中没有官僚，没有“汉奸特务”，没有商人财主，都是知识分子，我母亲也是一位医生。当然，凡知识分子便都属于“资产阶级”，都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便该受到歧视和压抑，而我们家的人也果真都受到了歧视和压抑；但除此之外，倒也没有更大的不幸，直至“文化大革命”……

啊，谈远了。总之，我要去北京，要见阔别15年的舅舅。1948年末我随母亲离开南京，离开舅舅时，才4岁，而现在已经18岁了！舅舅是一位科学家，而我一直是崇拜科学家的，他们在我心目中有一种神秘感，舅舅因此也有了神秘感。为了在北京逗留期间能与舅舅相处好，我向母亲打听舅舅的性格和习惯。50和60年代的中国人“流动性”实在太少，因此，母亲自1948年离开南京后便再也没见过她的兄长；她把她的妹妹（我的姨母）叫来一起谈，因为我姨母50年代还到过北京，在哥哥家住过。姐妹俩并没有谈出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无非是舅舅爱清洁，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只喜欢喝清茶，不多说话，但偶尔说几句却挺风趣，等等。姐妹俩感情极好，姨母后来成了医务工作者，也是母亲带出来的。两人都住在长沙，经常见面。给我讲完，两人又谈了起来。接下去的话题虽然不是说给我听的，却也没有回避我，因为没有什么秘密，不必回避。

她俩说了很多，我都没有注意，或没有记住，有一段话我却听见了，也记住了……其实岂止是听见和记住呢？它也许改变了我的一生！姨母对母亲说：

“姐姐，1954年我在北京，听嫂嫂说起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哥哥下班回来，到书房里脱皮鞋，换拖鞋。嫂嫂将做好的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他，却见他全身不动，像是凝固了似的，脸冲着窗外，显然，窗外小院中发生了什么事，吸引了他。嫂嫂连叫他几声，他竟然都没有反应……”

我听着，发生了兴趣。

“小院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嫂嫂回身，拉开通往小院的客厅门，蓦然看见门外站着一位女客人……”

客人问我舅舅是否住在这里，舅妈说是，并邀她进来。但她不肯，只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舅母跟在后边送她。

女客人在门口站住，沉默了几秒钟，“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

舅妈茫然：“是呀。”

“唉。”客人轻叹一声，“你多幸福呀……”说完，转身离去。

舅妈回屋。在餐桌上，她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

舅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来呢？”

一件什么事打断了姨母的叙述，她没再往下谈，我脑海中却留下一个大问号。

后来有人问我，是怎么为这本书构思出如此富于吸引力的开头的？

其实很简单：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基本素材一开头便以极强的悬念形式进入我的感官的。

另一方面，在监狱外，一伙如狼似虎之徒利用这点东西在加紧迫害我姨母和母亲。

我入狱没几天张春桥发表了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中提出了“教唆犯”这个概念。

按照当时中国的政治特点，凡青少年“犯罪”都得抓“教唆犯”了。

我想，他们一定会把我的亲人诬陷成“教唆犯”的。只有这样做，“战果”才会大，用来染红顶戴的人血才会多。

果然，他们跑到医院，对我那位身患重病早已羸弱不堪的姨母拍桌子打板凳，抓住她枯瘦的胳膊，掐住她的拇指往不知什么内容的“笔录”上盖手印。

我母亲则自幼性格倔强，不吃他们那一套。

“你为什么要向孩子灌输这一套货色?!”

“这一套货色？什么货色？”母亲反问。

“资产阶级腐朽没落……”

“哪一点腐朽没落？哪里能挂上资产阶级？一位女客人来到门前，我哥哥没露面，让她走了——就这么点小事，亏你们能‘分析’出那么多东西?!”

好了，回到本题上来。

那年我在舅父家一共住了6天。我对他很感兴趣，竭力观察他，因为他是我唯一的舅舅，也因为他是科学家。

我从舅舅身上意识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伟大的，从他们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我为什么要描写科学家、歌颂科学家？思想来源便是如此。

我向预审人员如实介绍了自己的思想，但他们不感兴趣。这不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深挖细找”我在京六天中与舅舅的“关系”。我明白，他们要制造一个“教唆犯”，要照张春桥的最新模式去办案。

但是，要办到这一点很难。我舅舅是个“纯粹”的科学

家，举止稳健，衣着朴素，起居有常，不臧否人物，不议论是非，在政治上很难找到他的疑点。

在狱中，我明白他们要把他打成“教唆犯”，也明白要把他打成“教唆犯”有多难，更明白他们将不择手段知“难”而进……

好吧，看他们怎么办（“办案”的“办”）！

“在北京，你和你舅舅都说过什么？”他们问。我努力地回忆着。

一次，我问舅舅：“在你们的工作中，数学用得多吗？”

他答：“用不了很高深的数学。”

另一次，我问：“你们做过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析工作么？”

他答：“这方面的工作很少。”

涉及“业务”的话题，仅此两次。

我从来没有问过那位神秘的“深巷来客”，我是晚辈，当时又只有十八九岁。

从北京回来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浪花》，约一万多字；是一部“浓缩”了的《第二次握手》。

五、香山叶正红

1964年，我写了第二稿，改名《香山叶正红》，约十万字。

书稿扉页上抄录了恩格斯的一段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以后历稿都在扉页上写了这段语录。

像第一稿一样，留在身边，顶多给几个好朋友看看，根本没有投稿的打算。“阶级斗争”已经越搞越烈，山雨欲来风满

楼，文化人和文艺作品受批判的越来越多。我明白《香山叶正红》一旦发表，注定是会触霉头的。你不是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么？但那些被打倒的作品哪一部不是在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怎么“歌颂”也不行，反正能给你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

《浪花》的结尾是个悲剧，《香山叶正红》的结尾却积极化了。突出表现在周总理的直接出场上，很多事实表明，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尊重、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在我的小说中，周总理形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我躲在生产队的土屋中写下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我那时一贫如洗，买不起纸张。此稿是写在一本材料纸上的。我替附近镇子上一位裁缝写状子，他要酬谢我，我只要他买了这本材料纸。

这一稿仍然取题《香山叶正红》，十万字左右。

后来的调查人员们，不论是为我平反的还是为了送我下地狱的，都在我下乡的地方听到这样的反映：“他爱看报，看书，爱躲在小黑屋里写、写、写，不知他写什么……”

这一稿《香山叶正红》同前两稿一样，被人们辗转传阅，“不知所踪”。

事实上，从1963年春写《浪花》至1970年写《归来》，并不止四稿，而是至少写过七八次。但是，我能够清楚忆起并乐意“交代”的只有这四次。后来我一直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本文才予以说明和修正。

在这方面，公安机关比我“实事求是”。他们四处搜寻，找到的我的手稿比我“交代”的多好几本。

他们苦心搜罗那么厚一摞原稿，当然，是为了“重证据”，用这些证据来证明在漫长岁月中我是怎样一贯坚持“反党”的。

但这很出乎我的意外。我原以为，那些手稿经过漫长的岁月，从那么多人手上传过，早该破损、毁灭了吧？可是，不，人们是那么珍爱她，小心翼翼地保护她，直到云开雨霁、重见天日……

六、《归来》

前面已经谈到，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写下了第四稿（实际上可能是第八九稿），这一稿在结构、情节上没有变动，唯一变动的是书名改作了《归来》。

用《归来》比喻书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了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仅此而已。不料，待我锒铛入狱，“四人帮”一伙竟从这个书名上给我掏出许多“狼子野心”。这是后话。

由于我的被捕而使手稿“失控”，这是《归来》流传开来的原因之一，看上去带有偶然性。但从根本上说，造成《归来》更大范围地传抄的原因，正如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她之所以受到群众的喜爱，是因为她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四人帮’的禁区，表达了人民内心的爱憎！正是因为‘四人帮’搞得一片荒芜破败，才使得这部寻常的作品得以呈现出一点特殊的风姿，引起人们的注目。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帮助了《第二次握手》的广泛流传。这是多么冷酷而又公正的辩证法啊！”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发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

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 20.5 万字，是几稿中最长的。

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即以这一稿为蓝本。

我自己为这一稿绘制了油画封面，画的是美丽端庄的丁洁琼教授手捧鲜花在首都机场……

洁白的扉页上仍然沿用了那句恩格斯语录："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较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中喝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七、"毒蛇猛兽"

从 1975 年 1 月 7 日开始的几个月内，我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归来》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把一切说清楚，就没事了。

但我错了。我越说越不清楚，"问题"越来越复杂。

很显然，不让"案情"符合他们预定的框框，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那么，他们预定的框框是什么呢？就是"罪大恶极，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

这一点毫无疑义。

他们与我不相识，并无私怨。他们向我一再申明这一点，我也明白这一点。那么，究竟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呢?

我在思忖：《归来》在湖南已经流传了好几年，省委、省革委、省公安局（开头叫"公检法军管会"）等权威部门不可能不知道情况。如果他们主动地认定这个手抄本有严重问题，那么我早就会被抓起来了，何至于拖到今天！所以，最初"发现问题"并下达抓捕作者的显然不是本省的什么人物或什么部门，而是"来头"大得多的大人物。

显然，办案人员想办成一个一鸣惊人的大案，向那位"大人物"讨好献媚。

在审讯中，他们指责《归来》中的丁洁琼是"叛徒"。

我则答辩说：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还有叛徒哩!

"你说的叛徒指谁?"

我答："张春桥。"

"哎呀哎呀！你说你怎么会不成为反革命呢?！我们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元勋，长期以来在你心目中竟是个叛徒！哎呀哎呀，我说是嘛，你看你看……你写《归来》这样的黑书，堕落成反革命，今天看来更不是偶然的了!"

我很清楚，在当时，权高位重的人吭一声，便成了法律，成了"圣旨"，下面的"办案人员"办起来就格外卖力。

明白这一点，我反而冷静下来，决心"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我在写给他们的信中说："把你们的'政策'收起来，不要再耍什么'坦白从宽'的花招了，我选定了'抗拒'之路。把你们的'从严'拿出来吧，我等着领教!"

我爱画，我继续画。我画了一幅钢笔画，题为《生命诚宝贵》，画的是一个青年慷慨就义的场面。另一幅则是忆写列宾的名作《临刑拒绝忏悔》……

我用竹签削成针，用棉纱搓成线，在毛巾一端绣上李清照的五言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绣上杜甫的诗句：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经常引吭高歌，最常唱的是《国际歌》，特别是最后几句：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过分。“四人帮”确实是一伙吃人的毒蛇猛兽。

比方说，入狱最初几个月，我如实反映情况，而他们便恬不知耻地利用我反映的情况，四出招摇撞骗，迫害无辜，大肆残害群众。

我的舅父、母亲和姨母没有任何责任，也根本不知道我写《归来》。但办案人员却竭力把他们都打成“教唆犯”。

不仅如此，他们还跑到汨罗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和“戴帽管制”等等恶劣手段威胁我在那里当教师的朋友，逼迫他们捏造伪证……

在我插队的地方，他们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来社员的印章，炮制“控诉书”，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

“一致要求”判处我死刑……

他们告诉我：“你的《归来》流毒全国！”

这使我意识到：在全国范围内，该有多少人受到这场文字狱的株连呀！

我难过，为自己连累了那么多人而难过，但我更多的是悲愤！

八、欲加之罪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年来就是这么干的。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淫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颁发的全部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情？哪一条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九、魂兮归来

在审讯的全过程中，他们对《归来》这个书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追根究底，不厌其繁，弄得我如堕五里雾中。

他们一口咬定："你另有深意，哼！狼子野心……"

在审讯室中纠缠了我几个月后，一无所获。于是，办案人员与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合作"，在1975年6月26日和7月4日对我搞了两次"人民战争"，每次都由预审处长充当"导

演”，并招来几十名中文系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名曰“帮助会”，实为批斗会、围攻会。会场设在闹市区的省公安局招待所一间会议室中，每次都将我戴上手铐，押上吉普车，送到那里；每次都是男女老少几十个人围着我大叫大骂，恐吓威胁，千方百计逼供诱供。

他们声称，讲政策，不搞武斗，但决不准我再“滑”过去，一定要狠揭猛批，搞深搞透，挖出我的“狼子野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开场白后，唱主角的是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汉子，他肤色灰暗，国字脸，戴眼镜，说起话来摇头晃脑，洋洋自得。

他先是逼迫我承认，《归来》中写的朝鲜战争期间，为对付美国的细菌战，苏冠兰教授等在金陵药学院从事的病毒学、生物学实验是“蓄意暴露、恶意诬蔑我从事细菌武器研制”，是“暴露国防机密”，“诽谤自己的国家”。接下去，便死死缠住我，要我承认是舅舅向我“泄露”此项国家机密的……

还有更厉害的杀手锏哩。

“你对古典文学是很有研究的。”他说。

乍一听，还挺受用。

“那么，你对唐诗、宋词也就很有研究……”

我确实读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能背诵一些。但这就算“很有研究”么？没等我脑子转过弯来，他又来了一句：

“那么，你对《诗经》、《楚辞》一定也很有研究……”

且慢！我读过的《诗经》、《楚辞》，也就是中学语文课本上那几篇，怎么就“很有研究”啦？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他又说：“那么，你一定读过《离骚》啦……”

《离骚》我并没有读过。

没等我喊出来，他又宣布：“那么，你一定读过《招魂》

……"

"噢，你说的是'魂兮归来'……"我恍然大悟。

全场活跃起来。

"啊哈!"他赶忙接茬，冲着我冷笑："心有灵犀一点通嘛!"

他好像唯恐我又"溜掉"，所以赶紧捂住"瓮盖"。戴眼镜的学者继续摇头晃脑，深入浅出，加以论证：

"你在1969年底到1970年初到了汨罗，不可能不想起屈原……"

我闭上眼睛绝望地摇摇头。

汨罗县境并不是只有一条汨罗江，还有广袤的山区和丘陵。我在汨罗期间所住友人家正好在山区和丘陵，离汨罗江可能有几十里上百里，哪能想到"屈原"!

但他不容我分说。

"想起屈原，便不可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当然喽，你这反革命是不能和屈原相比的。"

我想的是：屈原也该打成"历史反革命"才对!

因为他反对秦国攻打楚国，而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已经被追认为"焚书坑儒"、"镇压复辟派"的革命始祖了。

"想起屈原，你不可能不想起《楚辞》；想起《楚辞》，你不可能不想起《招魂》；想起《招魂》，你不可能不想起'魂兮归来'，想起'魂兮归来'，你不可能不想起刘少奇；因为只有刘少奇'魂兮归来'，反革命复辟了，才会有你这种人的前途和希望!"

喏，"破案"了！有这么"推理"的吗？老天爷!

看来，他们是"认定"我将"复辟"的梦想"寄托"在刘少奇身上了，换一个"反革命头子"都不行。

为什么要这样呢?

拆穿来说，他们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但又不便，不敢，“暂时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便捏造一个与周恩来类似的人物。此人必须像周恩来一样是党内“高官”，又像周恩来一样“搞修正主义”，属“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列……

后来，我在交给他们的材料中有一份《围剿〈归来〉的要害是反对周总理》——这个标题说明了一切。

我写的另一份材料题为《谁“反党”?!》，明白无误地揭穿并痛斥了他们秉承“四人帮”旨意攻击周总理的阴暗内心，指出：真正“反党”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

十、最后的斗争

上述的那番“推理”乃至“破案”过程，在今天的人们听来，也许以为是痴人说梦，不可思议。但它确确实实就是那么发生，那么“定案”的。

我把这一切写出来，是为了让今后的人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维逻辑和法律程序是怎么一回事。

以“归来”二字而论，不仅古语可用，现代语言中也常用。

我在答辩材料中写道：“归来”二字出现颇频繁，根本用不着到屈原那里去找。例如“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唐·宋之问)；“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木兰辞》)；“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唐·韦应物)；“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唐·杜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宋·晏殊)。

不论我怎样摆事实讲道理，都不能说服他们。狼要吃人时，道理永远属于狼。

在我的答辩和反驳面前，他们出去“调查”了。

他们去汨罗调查，回来后向我宣布："据我们调查，你在汨罗是谈了屈原的！"

天哪，我"在汨罗谈屈原"就构成了犯罪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谈谈屈原都不行吗？

事实上，我在汨罗根本没有谈过屈原。

在监狱中我渐渐发现，他们需要什么就能"调查"到什么。

十一、铁窗内外

1975年10月，我在给省公安局党组的一封信中揭发了我这些对手在办案中的大量违法乱纪行为，要求给予惩办，然后才可以重新开始"审查"我的"问题"。

奇怪，自交上这封信后，我的对手们忽然销声匿迹了。

我仍然不断地写信、写材料揭露他们、痛斥他们。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看守所每月十五日，允许犯人亲属来送一次生活用品，牙刷毛巾肥皂之类。我这四年中有一年多因为表现太"反动"，禁止家中送东西，后来还是开禁了。每次都是我妹妹来，有一次，"典狱长"把她叫了去："你哥哥在里面，吃了饭就骂人。你写个字条进去，批评批评他吧，但不要说我们叫你写的。"

在"典狱长"看来，我是"吃了饭就骂人"；在我看来，是斗争。

我越来越多地引吭高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以后长达 11 个月中，审讯完全停止。为了反抗对我的迫害，我多次进行绝食斗争，最后的一次绝食达 14 天。

有一次我患了感冒，发低烧，他们不给我治疗，无论我怎样要求，他们也不理睬。结果使感冒延续了 52 天。最后还是家里送来一盒银翘解毒丸，连服五天感冒才好了。但不久又出现规律性的下午低烧，夜里盗汗，浑身疲软；加之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严重营养不良，更加重了病情……

时间跨入了 1976 年。

1976年初，和我同监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反革命犯”，衡阳人，罪状是长期“传播小道消息”，咒骂江青。另一个是老年流氓犯，原是省直某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负有监视我们两个“反革命”的重任。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也算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1 月 8 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久久肃立默哀，泪流满面。来自衡阳的那位“反革命”，历来性格火爆刚烈，从不流泪，此时也端坐垂首，以示哀悼。那个“革命领导干部”这时也在通铺上走来走去，直擦眼泪……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从广播（监狱位于一个工厂内，近处有工厂的大喇叭）和报纸上（狱中可以看《湖南日报》）可以知道，周总理的丧事办得极简，规格很低，令人不解，令人愤懑！

而且，很快地，广播和报纸上不再提周总理，好像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

“刑事犯”被叫出去盘问：那两个家伙，特别是那个“姓张的”，对周的死，反应怎样？

他回到监房中说，他没有“出卖良心”。

4 月上旬的一天，高音喇叭中传来消息：今夜有重要广播。

夜里20点整，中央台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和“首都工农兵通信员”写的长篇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我们屏息静听，越听，心脏跳得越快!

听完广播，我们不止是心跳，而是整个身子都跳起来了!

广播中说，4月5日那天，大约有10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我们则想，宣传工具说10万，实际上就是100万!

广播中说，一小撮坏人“以悼念周总理为名，行反革命煽动之实”。我们则断定，人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般爆发了！人民以强烈的行动在反对“四人帮”一伙长期贬低、迫害和打击周总理的反动行径。

广播中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我们则断定：邓小平做得对，所以他深得人心，人民走上天安门广场表示对他的同情、声援和支持。迟早有一天，历史将做出公正裁决!

十二、“只争朝夕”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震撼人心的一年，也是发生关键性转折的一年。周总理逝世，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尔后是毛泽东主席逝世……

案卷记载（据1978年12月20日《张扬案件审查进程》)：

1975年1月7日，由省公安局拘留；

1976年3月21日，省公安局报经省委批准逮捕；

1976年6月13日，省公安局预审终结制作起诉书；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收案……

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在“批奇谈怪论”、“批当代大儒”妖风四起之中逝世的；紧接着，“批邓”甚嚣尘上。“四人帮”处心积虑企图扼杀人民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彻底剿灭以

歌颂周总理为主题的《归来》便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于是匆匆“报经省委批准逮捕”。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又忙着向法院“起诉”。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张春桥制定了一个以“杀人”为主题的“巩固政权”的计划，他们的爪牙亦步亦趋，加强了对善良人们的迫害。于是，11个月未曾谋面的预审人员又出场了。

9月22日，一个预审人员找我单独谈话。不是审讯，是谈话，是摸底，“摊牌”。

“怎么样？宣布逮捕了吧……你是怎么考虑的？”

“早就考虑成熟了，”我冷冷地回答，“你们也早就看到了。”

顶起来了。

他向我宣布：“就是你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案办到底的！”

我笑笑：“那你们还找我谈什么呢？简直多此一举。”

“这是看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早就十分明确了！”

又纠缠了一阵。

他说：“你不要以为捞到什么稻草了！”

我冷笑着瞥瞥他。“我这‘犯人’、‘反革命’，能‘捞’什么‘稻草’呢？”

我明白他话中有话，那意思是：“尽管我们干了违法乱纪的事，而且被你逮住了把柄，但我们照样能送你下地狱！”

他以为我动心了，赶紧往下说：“如果你帮助我们办好这个案，政府会充分考虑你的态度的，将来，你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做些有益的事嘛！”

对我而言，这是绝对的假话。凡“中央首长”“交办”的

案件，当时是一律“杀无赦”的。何况我“罪大恶极”、“流毒全国”。

我鄙视地望着他，不愿再和他罗嗦。为了赶快结束这番试探，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吧。”

他大喜过望，眉开眼笑：“那好呀！不过，要只争朝夕啊！”

他在鼓励猪羊加快脚步往屠宰场跑哩！我笑笑，回到监房。

我倒确实“只争朝夕”了，不过不是按屠夫们指望的方式。

9月23日，我向中共湖南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提交了一份控诉书，指控“办案人员”的违法乱纪和“现行反革命”行为。

指控他们为“现行反革命”，既带戏谑性质，又挺认真，因为他们捏造了许多“反革命言行”栽在我头上，因而构成了伪证罪、诬陷罪，又在客观上构成了完整的反革命罪。

我提出的控诉书是很奇特的。

“典狱长”很久以前便遵令不再给我提供纸张、墨水。我向“典狱长”申诉，说屁股太瘦，在硬木板铺上磨破了尾椎部位，溃烂发炎，要求家中送些紫药水来。“典狱长”是个不坏的老头。他没有检验我的屁股，便点头同意了。就这样，一小瓶紫药水便成了我的墨水。没有纸张，我就把已经破烂的一件白衬衣撕成几块布条当纸用。控诉书就是用紫药水在五六块白布上写的。布块大小长短不一。紫药水极易干结，写得非常吃力，字有核桃大……

22日谈话，23日交上控诉书——这不能不算“只争朝夕”吧！

十三、法官的心

1976年8月31日法院“收卷开始审理此案”。负责此案的审判员李海初，当时四十多岁，是个老司法，清瘦，灰白短发，经常是满面笑容。他虽受命“审理此案”，却并不审问我。我第一次见到他，已是两年后的1978年底了。

由省公安局“制作”的对我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关键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的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我“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对我予以“严惩”。

李海初研究了起诉书后，又认真阅读、研究各种“版本”的手抄本《归来》，也认真阅读研究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

后来，听说老海向人说了真心话：“看完《归来》之后，我受了感动！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根本不像起诉书说的那样‘反动’……”

他说，如果经他手判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会感到自己做过一件有昧良心的事。

这些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说的。在当时他当然不能说，也不敢说。他把案卷压下来，开始拖延——这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策略和手段。

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犯人在预审阶段关押多久，在审判阶段关押多久，都没有明确规定。收容、拘留、逮捕之间，也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只要手中有权，他们想怎么干便可以怎么干。

老海在这个案件上便是这么干的。

拖延，能拖多久便拖多久！

从 1978 年 12 月 20 日写的《审查进程》中可以看到，老海从“收卷受理”到“汇报”，拖了将近一年。

这是关键的一年。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形势有了根本转机，大大减轻了对本案的压力。死刑是不至于了，但平反吗？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不一定行。“四人帮”虽被抓起来，但阻力仍然很大。

形势在向好的方面一点一点地变化。在文艺方面，从《园丁之歌》开始，许多电影、戏剧、小说等等都获得了“解放”。

李海初去找当预审处长的老上司，试探道：“看来，《归来》这案子不好办呀？”

老头把脸一板："怎么不好办？你不办，退给我们，我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

李海初既不能判，又不能退，还是只能拖。

省法院和省公安局在同一大院中，大院中风言风语在散播。

"《归来》这么个案子，怎么一拖几年？"

"老海怀的什么鬼胎？"

"他想包庇反革命吗？"

谣言也在更高层次的领导部门中传播，对李海初的压力在加码……

李海初揽了许多其他案子，以便把《归来》往后挪。那些人怀疑他，却又拿他没办法……

1978年12月16日下午，忽然从北京来了两个女编辑，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四十出头。她们找到高级人民法院，找到老海。

"你是主管《归来》一案的法官吗？"她们表情严肃，"我们就是想找你……"

十四、新的转机

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复刊。

一位名叫顾志成的女编辑在经历了10年折腾后，回到报社文艺部工作。

报社每天收到的信稿成箩成筐。这天，顾志成信手拆开湖北宜昌树脂厂的一封来信，写信人是青年工人李谦。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

"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

女编辑闭上眼睛想了想。是的，几年前，北京市普遍收缴六部手抄本，其中就有《第二次握手》。今天居然有人出来为它"鸣冤叫屈"了！

她认真读下去——

这本书通过描写一个留美女科学家的归国，引起男主人公苏冠兰的回忆，揭示了解放前后两种社会生活的变化，鞭笞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热情歌颂了新中国，反映了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书中充满高尚、纯真的爱情。尤其是作者描写了周总理对繁荣我国科学事业倾注的心血和对科学家的热情关怀、爱护。这本小说内容新鲜，故事生动，语言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读后很受鼓舞。当然，这本小说写得还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

看了这段近乎"内容提要"和"主题分析"式的介绍，顾志成的兴趣更浓了。她毕竟是个文艺编辑啊！问题已经涉及了她的切身事业，更触动了她正直、刚强和历来同情弱者的良心……

她平心静气，继续看完这封来信——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人才不应当被埋没，好作品不应当长期受禁

锢。

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后来这封读者来信登在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

看完信，顾志成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动手在废弃的信稿中翻开了。因为她记得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问题的来信。

她将这些信件归纳在一起。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一天，顾志成来到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家中，恰好有几位北影的客人也在场，他们正在谈论《第二次握手》。由于职业习惯和艺术热情，他们说着说着就在客厅中即兴表演开了……

一位教授回家，在书房中换拖鞋。

窗外，院中，有人对话。

教授扭头一瞅：啊! 那是一位女客人在向邻居问起他……

有点儿面熟。她是谁呀? ……

艺术家们没有留神女编辑异样的神情。

“哎呀!”顾志成转向贺敬之同志：“我在找这个手抄本，但找不到……”她说明了原委。

“我这儿倒有一本。”贺敬之笑笑，“你们要研究，就拿去罢!”

“您看过了吗?”顾志成兴味盎然地翻弄着这部已经很破旧的手抄本。

“看过了……”

“您认为怎么样?”

“我看是本好书。”

“你知道作者是谁吗?”

“不知道。”贺敬之摇摇头，“我估计是一位电影学院毕业生写的……”

“何以见得?”

“因为它很像个电影文学剧本。”

顾志成带回《第二次握手》。她是一口气读完的，还流了泪。

她向文艺部主任王石反映了情况，报社负责同志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后来又通过其他途径找来另外三部《第二次握手》，大家对照着阅读、评论……

一天，顾志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部队作家彭荆风，聊起《第二次握手》，引起在座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主任王维玲的注意。

王维玲从中国青年报社借来一本《第二次握手》。他也是一口气读完的，直读到凌晨三点钟……

翌日，王维玲从家里来到出版社，见到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李裕康。

“这个，你看看。”王维玲把手抄本递给他，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王维玲和李裕康又碰面了。

从表情上便可以看出李裕康的感受和态度。

“上!”王维玲瞅着李裕康。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开始共同研究《第二次握手》。

经过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报》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平反，北京电影制片厂迫切希望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作者是谁? 他在哪里?

十五、来龙去脉

中国青年报派出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派出女编辑邝夏渝调查此事。二人首先访问了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几经周折，才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提到，我于1970年2月被捕前将《归来》手稿存放友人陈××家，并嘱我弟弟去取回销毁。但是，"其弟借给马衍湘，马又转给郑文立和李山，李山又借给长沙市14中学生周利亚，周在传阅时，被红卫兵搜出交给老师贺志强。1976年3月，黄××与吴××（按：均系预审员）到北京钢院（贺志强从14中调北京钢院任教）找到贺老师，取到这本书，据黄××介绍：贺老师调北京后，听说《归来》是部反动小说，正在收缴，他立刻从其弟处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缴时，原物交出。但并未主动上交。"（详见预审主卷16）

可以想见，《归来》就是在上述传递过程中"扩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对湖南省公安局说：张扬所写坏书《归国》于1972年春由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元（源?）带来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传。"（详见预审主卷1，第50页）

上述材料说明《归来》在流传时有了另一个书名《归国》；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抄本书名缺失。在北京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后来都是以《第二次握手》书名传抄的。

1974年末，湖南有关部门已经在《内参》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但尚未导致搜捕作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作者是湖南人。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4时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情况》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报社将上述"指示"向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以上均据《审查进程》)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登载了流传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该《内参》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在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没几天，我在湖南被捕。

在我入狱期间，法院对我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

1977年3月8日，李海初把全案23卷材料阅完，认为此案可以研究了。根据当时形势，他估计"判刑二十年即可"。就是说，某些人原来"内定"的"要杀"，办不到了。

1977年8月10日下午，大办公室，刑庭研究。下面摘录

一些发言（发言人用英文字母代替）：

> A：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审问时要念起诉书，因此，要公安局重新改制；
>
> 所烧毛选卷二，要有原卷（件）附卷；
>
> 写小说，是反动的，毛主席有过指示；
>
> 可以判个无期徒刑。
>
> B：……我看过一审，判刑超过不了十年。
>
> C：此案不要急于处理，建议看下小说再说。

同一天即1977年8月10日的“刑庭讨论”，参加者更多。下面摘录发言——

> A：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
> B：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爱情至上。
>
> C：这个案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件到了姚文元那里？……我看超不过十年徒刑。
>
> D：怎么定刑？
>
> C：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未听出什么来。
>
> E：主罪是写小说。我的意见，这种案子不要急于处理……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我认为鉴定一下好些。
>
> C：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不要急于处理，是不是请院长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决，判决也不好下，

判了被动。

E：主罪是写反动小说。究竟有几个方面证明他利用写小说搞反革命活动？我当时看了后只认为是本坏书……怎么反动法说不清。

C：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肯定……说是反党就说不清。

F：姚文元下批示，不一定是要杀他，也许是物色黑笔杆子……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改算了。

李海初：看来黄××同志审讯他的方法有些不大得当……

C：……我们没有及时办，看来对了。

结论：写好材料，请政法领导小组讨论。

又过了四个月，1977年12月7日上午，法院二楼会议室，刑庭向院党委汇报。摘要——

A：此案打不定主意，看来不宜急判，有些东西难说……因此，此案侧重缓判，多关几天再说。

B：定反动小说可以说出几条，很难说清……

C：这个案子难说，意见不一致……看看说他是反动的有几条，能不能定。起诉书得另外搞一下，涉及张春桥的要去的（掉）。……搞他几条判他劳改算了。

D：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未判，搞对了。

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

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A：这个案子……涉及（面）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

结论：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领导小组汇报再定。

又过了七个月，1978年7月4日上午，法院大会议室，省政法领导小组研究（有刑庭负责人列席）。摘要——

A：把《归国》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我同周预审说一说，要他们一起去。

B：就这样办。

捎带说说，将手稿送文联鉴定是法官李海初的意见。他要借助文联的鉴定来“抵消”当年师院的鉴定。这次会后，李海初将《归来》（1974年稿）送到湖南省文联。当时，主持文联工作的康濯同志和文艺界其他许多人一起，仗义执言，开始为《归来》平反而呐喊、奔走，与李海初等站在同一战线上了。

但是，文联和法院主持正义的力量加起来，也远没有前面提到的那些主张围剿《归来》的人们势力大。促使事态发生根本转折的，是从1978年12月16日北京来的两位女编辑参与此案开始。

两位女编辑得到湖南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团省委书记石玉珍同志的可贵帮助。团省委热情接待了他们，并派干部陪同他们到省法院。

在法院，她们要求，（一）同张扬面谈，（二）看看材料。当时的省公安局局长和省法院院长在交换意见后，于12月18日上午指示：“（一）向张扬提问可事先写出提纲，由我们问；

（二）看材料看哪些，由我们提供。”

18日上午，两位女编辑如约前来。院长、刑庭两位庭长和李海初都参加了接待。两位女编辑同意了院长的意见，由她们写出提纲，让李海初去问，她们旁听，有地方不清楚的，可以插话。

十六、奇特的庭审

1978年年底，凄风苦雨的冬季。我在单人牢房中更是冷彻心脾，手脚长满了冻疮。破旧而单薄的衣裤，破旧而单薄的被褥，还有特别难耐的孤独……

长期的饥饿，使我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七八十斤，我感到身体一天天衰竭下去，但并不在意，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斗争上。

我递交了六份控诉书，毫无反应。于是，我重新开始写作。

没写几天，停顿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的审讯忽然重新开场。

那一天，阴雨连绵，天空晦暗，审讯室内开着电灯。

灯光下，法官坐在高高的案台左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女书记员坐在中间，另一位三十多岁、戴着眼镜，显得文弱的女书记员坐在右端；我进屋后只是略感疑惑地瞥了她们一眼，然后集中精力对付那位法官。在两位女书记员前面放着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手提包一角印着两个烫金大字——北京。

当时我有个感觉：两位女书记员都面含微笑，那不是装出来的假笑，而是包含真挚的抚慰和鼓励。

我感到奇怪，虽然与我谈了约半小时，但没有触及任何实质问题。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出动两名书记员吗？

回到监房，我又想起那两位女书记员……她们笑得那么真诚，那么美丽！

十七、个中曲折

为了弄清《第二次握手》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法院曾请省文联给予鉴定。

李海初在案卷中记录："21 日下午 5 时到文联取了书面意见：'《归来》是好书'。"

文学编辑刘云写道："自从领导交下来手抄本《归来》起，我们已经请了六个同志审阅。其中有工人业余作者二人，文科大学生一人，编辑三人。

"就作品本身而言，有如下几点读后感：一、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健康的。二、故事是曲折的，不是一般化的，是吸引人的。三、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个性特色……"

省文联一位诗人写道：

1. 这部小说不是毒草，主题是爱国的。

2. 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

3. 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

4. 作者如果是一位青年，应给予培养。

5. 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除湖南的六位同志外，顾志成、邝夏渝也于 22 日写下一份意见，肯定《归来》"不是一部反动小说，而是一部好书"。

与此同时，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正在举行的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 12 月 20 日印发的《简报》以《〈归国〉一案值得重视》为题，反映了这个文字狱的情况。

李海初在案卷中的记录——

> "（12月）22日下午5时记者离开长沙回京，临行要求：（一）借《归来》带到北京；（二）不要急于结案；（三）要我们与他们合作，统一行动安排。
>
> "我认为上述意见是可取的，向庭长、院长汇报了，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情况又变化了。"12月23日："院长今天来说，此案继续办理，对涉及张扬的问题，除《归来》一书外，其他问题，也要审问一下。
>
> "在这之前，曾向院长说明，张扬是因为《归来》拘捕的，起诉也是这个主罪……但是院长认为，书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其他问题，还是要审问。既然院长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执意要审，那么只好下级服从上级，过问一番。但我估计什么东西也搞不到手，搞得不好，还要被动。"

接着，记录中一一指明罗织在我头上的那些"问题"的破绽、漏洞、经不起推敲之处和纯属逼供信及栽赃诬陷的产物，总数近二十桩。

12月26日，法院的两位庭长听取李海初汇报。汇报后，两位庭长发问。

> A：要资本主义"归来"是怎么回事？
>
> 李海初：分析出来的。
>
> A：说小说鼓吹复辟资本主义，从这本书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吗？
>
> 李海初：省文联的结论是，小说是歌颂社会主义

的，是好小说。现在的问题是烧毁毛选的问题。

A：这是怎么回事？

李海初：烧毁毛选二卷是张扬被关9个月后，第二次搜查从炉膛里找出来的。

A：鉴定一下是不是他的再说，写个案情。

A、B：《归来》小说不能定罪……应退还公安局无罪释放。

12月27日上午。法院小会议室。省公安局（A)、省法院（B）各到会五人，联合研究“张扬现行反革命案”。摘要如下：

A：张扬一案省委准备在常委会上研究，我们怎么说？

B：现在主要是对这个小说拿不准。请示院党委，院党委又说请示政法小组，政法小组的意见是送文联鉴定。鉴定的结果已送公安局同志看了，我们拟无罪释放，正在打印案情。

A：拘留张扬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3月初接受此案的。当时我们就提了拘留根据问题，说是姚文元批了一句话。局长又说不是姚文元批的，是华国锋同志批的……办案过程中张扬说我们审讯中陷害他，咒骂审讯人员。

A：我们看了这本书，说不清。师院说这本书不好，说了不好的地方。文联说好，也有好的道理。他们说好说坏都是原则上讲的。是不是把过去的、现在的鉴定材料都送省委宣传部，由他们定。

B：师院是权威，文联也是权威。

A：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宣传部。

B：我们无权威，这不叫矛盾上交。

B：在向省委汇报时把师院、文联和北京三者意见一起上报，由省委定。

12月29日下午3时，由省政法小组负责人出面，向省委汇报。

省委刘夫生书记的意见要点是：

“烧书的问题，鉴定一下。”

“如果《归国》这部书没有问题，不能再关了，就得放人，抓紧时间结案。”

“《归国》还可以找人看一下，到师院去组织一下座谈会，再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

于是，《归来》又送到湖南师范学院。

1月8日，师院党委宣传部终于送来鉴定意见。

他们在题为《关于对小说〈归来〉的看法》（附座谈会记录）中写道：“根据省委关于对小说《归来》作出鉴定的指示精神，我们组织了三名教师对小说进行了阅读，并于1月6日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大家对小说《归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家一致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赞扬了这本书的一些优点之后，《看法》肯定：小说“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座谈会记录”首先是中文系那位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讲师。他说：“这本书的作者坐了4年牢，这太冤枉了！”他回顾道：“当时组织我们批判，无非就是扣帽子。什么鼓吹科学救国、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等等。现在看来是一些不实之词，应该全部推翻。作者关了4年，与我们过去写文章批判是有关系

的。但我们写文章是上面定了框框的。回过头来看，我写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都是一些不实之词。”这位讲师发出正义的呐喊：“作品的政治内容是好的。对这部作品和作者，省委应该马上给予平反昭雪!”

中文系一位副教授、政教系的一位讲师也都肯定了这本书是好书，应立刻给作者平反。

收到师院这份“鉴定”的当天，刑庭庭长批示：“已看，速送省委。”

李海初于1月11日正式写出《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经审查，主要事实不能认定……建议全案发还省公安局。”

刑庭两位庭长当天批示：“我们同意……请院党委研究指示。”

该《意见》附件共七份。其中第七份是省公安局一处于1978年12月29日以“湘公政四（78）193号”文件给省法院的复函，内容如下：“你们送来被烧坏的《毛泽东选集》卷二一本，经我们鉴定认为，此书上书目字迹和眉批字迹均不是张扬所写。”

不管怎样，至此，这桩文字狱中被苦心捏造、罗织的几十个罪状中最恶毒的一条，终于被否定。

十八、“最后的审判”

事实上，问题比上述卷案所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1978年12月31日，老海去机场送别顾志成、邝夏渝时深沉地说：“这个案子，在湖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那么，”顾志成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回北京去解决!”

“北京……有希望吗?”

"你等着好消息吧!"

这以后，胡耀邦同志对这桩冤案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有力干预。

《中国青年报》在1979年1月7日的第36期《青运情况》上，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释放出狱》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的文字狱，发出强烈的呼吁。

还要说明的是：1978年12月下旬，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赴浏阳，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搞调查，推翻了伪造的"民意"和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回长沙后，她又按照法院的"建议"，多次到省公安局，终于找到了一直回避与她会面的专门负责审问我的人。当她问到"根据目前形势，还有什么理由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时，那人竟回答："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

"为什么?"

"因为他的问题是华国锋同志批的!"

"请问，彭德怀的'问题'是谁批的?"

一句话，问得他瞠目结舌。

经过《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反复努力，终于，1979年1月12日上午11时，顾志成从北京给李海初打来长途电话。李海初在案卷中记录了这个电话——

"我们回北京后，立刻向领导汇报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指示……"电话中还说他们决定下星期一派专人来湖南，来时还要到省法院找李海初联系。目前，要求李海初把张扬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管好，待张扬释放后交他本人。以后还

要邀请张扬赴北京改稿。

电话的最后一段还说，对张扬的冤案情况，他们已准备见报。

这个电话三天以后，即1月15日，省委书记刘夫生便批准放人，并安排我回长沙落户和工作等。

十九、历史是这样的……

1979年1月18日下午3时许，哐啷一声，牢门打开了。我全身神经立刻投入戒备状态。

"典狱长"老头拉开厚重的监门。

我走出去，穿过冷风飕飕的甬道，拐弯，往前走，又拐弯……

每走到一间审讯室前，他都老是朝前面点头，示意我再往前走……

终于，我跨进办公室。

像京剧舞台上常见的那样，呈"品"字形坐着三个人。一侧是我曾见过两次的那位法官，另一侧是省公安局的一位干部，中间显然是个"高干"。介绍了一下他是省公安局副局长于志。他递来一支烟，接着是火柴。

我吸起来。四年没吸烟了，我有点头晕。

满脸笑容。例行性谈话，尔后向我宣布：

"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

我的心一停，接着便咚咚疾跳起来。

"张扬同志，你平反了！"那声音嗡嗡地，有点听不清，"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外等你……希望今后你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我双手支撑着额头，紧闭上发热的眼睑，以免泪水流出……

不久前，1978年12月下旬，报纸上报道为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并举行追悼大会的消息，同时发表了黄克诚同志怀念彭总的长篇文章……

刹那间，我又想起黄克诚同志文章的第一句话："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1979年1月18日下午4时左右，我在老海和刑庭一位庭长陪同下回到家中。

十多年风雨飘摇，颠沛流离，无休止的灾难和打击……我们家不知多少次被震碎了，但这些碎块今天竟奇迹般地重新拼合起来，每个成员都受到深重创伤，却没有一个人死去。

邻居们也来了，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

两个小时后，那辆离去的汽车又开回来了。一个中等身材、前额微谢、操着一口标准北京话的中年男子走上楼来，挤过人群，将右手伸给我母亲，自我介绍：

"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刚从北京来，一下飞机便奔这儿来了……"

他语音浑厚，音调铿锵，带着热情的微笑。

我在一旁愣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到我们家来做什么?"

是的，我还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多少人为我和《归来》的平反而呐喊、奔走和斗争，好不容易才取得今天的胜利!

1979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上方发布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全文发表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并加编者按。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报道

了这一消息。

然而，1月19日夜里我突然发高烧。此后两天里，我躺在床上会见了许多闻讯来访的朋友，接受了《湖南日报》、《长沙晚报》和湖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

1月22日，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派来接我的二编室李硕儒同志乘火车赴京。23日抵京时，邝夏渝、顾志成到车站迎接。一个月前，她俩曾以“书记员”身份在审讯室中见过我。握着两位大姐的手，我百感交集！

我暂住在青年出版社内，但仍然高烧不止。

又过了几天，治“重感冒”的一切药物都用尽了，才开始怀疑是否有别的病。李硕儒陪我去北京医院检查。

胸部X光照片表明，我已“病入膏肓”：左右两侧肺叶三分之二积液，心脏挤压下被推往右侧，胸片左侧大半是白色，令人触目惊心！

长期的饥饿、刑罚和极度营养不良，长达14天的绝食和52天的感冒，是感染肺结核并逐渐恶化的原因。然而，严峻的政治斗争，紧张的思想活动，奇迹般地抑制住了恶疾的发展。一旦出狱，精神上的压力消除了，压抑着的病魔就挣脱了羁绊，病症便一齐迸发了。医师惊叹道：“如果再在监狱中呆两个月——不，一个月，就绝对没治了！”

我转入北京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属“特护”病员，须“绝对卧床”。

全国各地每天飞来大量信件，要求早日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给出版社形成巨大压力。王维玲、李硕儒出面与我商量，是否先由两位责编将《握手》手稿改写成“简易本”发行，待我病情好转后再动笔修订，出版正式本。

我谢绝了，我带着重病，用一块五合板做桌，倚在病床上开始修改《第二次握手》。从1979年3月7日到4月30日，

连续苦战五十余天，将 20 万字的手稿改写成 25 万字的定稿。5 月下旬发稿，7 月上旬付印。7 月 22 日，在王府井书店首先发行。为尊重广大读者的感情，书名由《归来》改为《第二次握手》。

新华社记者杨建业于 7 月中旬到北京结核病院采访了我。7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写的消息：《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全国各报发布了这条新华社电讯。

在送给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海初同志的那本《第二次握手》上，我写了这么一句话——

"当代的况钟，人民的好法官。"

胡耀邦同志在推翻这桩文字狱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他读完了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后对一位领导同志说："看来张扬读过很多书。你见了他，要他今后好好干！"

回首旧事，《第二次握手》是那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她稚嫩，不成熟，然而，正如青年作家蔡测海说过的："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待的日子里，《第二次握手》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她也不会被今后的人们忘记。"

（1998 年第 7～8 期）

吴　江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之下，港人颇想了解一些内地的情况。知识界颇关心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其动机各式各样。1997 年 6 月间香港一位友人来京，他关心中国理论界的现状，就马克思主义向我提出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之间有一场对话。我将这场对话记录于下。“甲”代表友人，“乙”代表本人。

为社会主义唱挽歌为时过早

甲：近年，内地理论界似乎有些沉寂，除了宣传邓小平理论和提倡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外，似乎没有多少能够阐释当前问题的论著问世，这是否同提倡“不争论”有关？

乙：港人一向并不关注理论问题，何况根据“一国两制”，港人并无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义务。你究竟何所为而问？还是请你先介绍一下香港各界有些什么评论吧！

甲：其实香港知识界还是关心马克思学说的，至少是想多了解一些祖国的情况，也有人是出于一种好奇心。香港舆论多根据西方人的言论，认为前苏联崩溃就是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唱起挽歌，苏联的崩溃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所有实验已彻底失败，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最好的生活方式，历史的想象、历史的规律到此结束了。这是一位美籍日人福山的说法，这一说法颇为流行。还有人直说中国在社会转型中早已“礼崩乐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成“落花流水”，倒是儒家思想正在潜移默化。也有人说：“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以后，中共再一次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来挽救它的信心危机。”这是台湾民族分裂主义者的说法，香港早几年就酝酿这种说法了。所以，现在摆到人们面前的问题是：社会进步观念是否寿终正寝？世界向何处去？最近看到有学者写文章似乎颇欣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会停顿。

乙：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社会主义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败，不少人有上面这些看法和议论是很自然的。可以说，普遍出现了信仰危机，丧失了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再重复旧的教条主义那一套，确实没有多少人想听，内地也是这样。但是，现在就要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唱挽歌，我看为时过早。根据一门学说，在 20 世纪居然能够在世界上开创出这样一个新局面，成就如此社会主义大事功，这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即使苏联消失了，人们也不能不深思这个问题，何况苏联的消失，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消失，更不等于人类理想的消失。

甲：英国保守党政府在苏联崩溃以后，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肯定也站不住脚，所以急剧改变对香港的政策，不惜背信弃义，做违反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事，企图

拿香港作为颠覆中国的基地，促进中国的变化，现在事实证明这是估计错误，自食其果。

乙：现在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仍然是一股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那里存在着许多自称信奉马克思学说的政党和团体。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因为社会主义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而后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倒引发更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有人过去并不注意马克思，现在却在找寻马克思，甚至认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人类不能没有理想，社会主义的失利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劣根性及其弊病（社会不平等，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富人专政，层出不穷的犯罪活动等）却并不因此有所消解，有的反而日益严重和突出了。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实验会付出代价，但在付出代价之后，会发现问题究竟在哪里，会有许多问题要重新认识，也有许多事情要从头做起。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一样，我们今天就有一个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甲：现在内地好像正在重新提出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谁是假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有些纳闷：究竟拿什么做分辨的标准呢？中国五六十年代以来把这个问题搞得如惊涛骇浪，愈来愈令人觉得难以理解了。

马克思不满意曲解他的学说

乙：现在，一切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连同马克思主义本身面临着考验。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但是研究马克思的人却很多，并且都自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马克思流派。你的意见很对，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多年了，

现在究竟拿什么标准来判定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谁是假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呢？我请你注意一件事，马克思生前，当有人在他面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郑重其事地说过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马克思说这样的话，固然含有不满意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任意曲解他的学说的意思，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以此告诫人们，不要把他的学说看成“刻板的正统”（这是马克思自己说的话），不要对他的学说抱迷信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要唯他的是非为是非。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学说的时候，就认定教条主义是他的学说的最大敌人，教条主义比直接反对他的人更危险。

甲：过去曾不断反对“修正主义”，反得昏天黑地，现在看来，教条主义的危害比“修正主义”更大。是否可以这样看？

乙：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依据。当然，马克思的学说有它确定的内容与宗旨。“无宗旨，不可与言学术”。香港某些评论家说得对，马克思学说的中心点、根本点是它的辩证唯物史观。马克思由此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倡“剩余价值论”，得出资本主义虽有创造强大生产力的能力，但它在历史上也仍然是一个过渡形态，它将为未来更好的自由、民主、平等、没有人剥削人、人们共同富裕、个性全面发展的新社会所代替。这个新社会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际上，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为未来的新社会（虽然名称各异）所取代，这是过去和现在世界上许多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在内的社会学家、史学家们的共同看法、共同理想，不过彼此立场观点不同而已。因此，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功。

甲：苏联垮台以后，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事功尽失，社会主义理想不过是乌托邦。这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乙：19世纪初期欧洲确实有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中间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不可讳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仍然继承了某些空想成分。但是马克思有一句话你应当记住，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想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空想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母体。这里说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除了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创造的科学民主文明等以外，经济上指的就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化生产的各种科学管理形式，这些东西不是其他社会例如封建社会所能创造的。就此而言，没有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运动，乃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解放新社会因素"的运动。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它和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二阶段的情况大有区别。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始终是摆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的头号问题

甲：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划分阶段还是第一次听说。它们的区别究竟何在呢？

乙：还是先说马克思时代。这就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和估计说起。《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卓越贡献。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至今无出其右者，所以《资本论》一书在今日全世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但

是有人若认为一部《资本论》就穷尽了资本主义的一切，《资本论》已把资本主义的全过程都看透了，这就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也可说是教条主义根源之一。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其他信奉马克思学说的人和不信奉马克思学说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对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就有偏差，一般都是估计过高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可以证明，那时马克思等认为资本主义（至少是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即将结束，资本主义已经响起了丧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来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那时资本主义刚处于其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主义剥削还带有某些原始性质，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迅速，超过以往任何社会，但是其实际水平仍很低。最近读到日本不破哲三（原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一书，其中提供了一个资料，说在马克思活动的19世纪中叶，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美四国的生铁年产量合起来不过824万吨（1866年）。这个材料确否待查，但它至少向我们说明，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还未具备。马克思的看法是根据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如生产不断变革，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资本主义剥削异常残酷，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尤其是周期性的危机一次接着一次等，这一切极易使人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仿佛已经走到尽头。尤其是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助长了革命者的盲目乐观情绪。只是到了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马克思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那时马克思刚写完《资本论》第二卷并准备出版。危机一发生，他立刻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展现它的新面貌，新情况正在发生，马克思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每度过一次危机，其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就动摇了马克思原来认为危机将产生革命的看

法。为此，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必须重新认识，因此毅然决定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

甲：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一般学者做不到，学者都是自信心很强的人。

乙：料史事至难，不能无失，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直到十多年后马克思逝世，在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并未重提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十多年马克思除了观察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外，就是埋头研究他的世界史和人类学史，他又钻入了历史领域。《资本论》第二、三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留草稿整理出版的。所以严格地说，马克思本人只能对《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负责。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到了90年代，那时马克思已经不在了，恩格斯对于他们的急于事功的缺点坦率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并分析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情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这就是我所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

甲：这就是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社会主义新因素在资本主义母体内尚未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到了列宁写《帝国主义论》的时候，社会主义新因素或社会主义应具备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是否已在资本主义母体内成熟了呢？

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以金融资本和垄

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这时资本主义强国激烈争夺、瓜分殖民地，因此亦称帝国主义时代。现代资本主义表示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而垄断并未消减竞争，反而出现了更激烈的竞争，竞争并扩向了国际范围。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关于对帝国主义现象的看法，关于革命策略等等），这种分歧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而加深了，一直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脱颖而出，他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似乎天生就有“世界革命，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和自信，他不但有观点，而且有情绪，对争论一步不让，而且用语超常尖锐，充满火药味。俄国社会民主党早分成两派，多数派倾向第二国际，少数派由列宁领导着，政权一到手，列宁便将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列宁当时改称党的名称，确实是要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任务，这有十月革命初期的做法为证），将多数派开除出去，并领导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对立。也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前苏联崩溃。

甲：列宁因十月革命的胜利而确立了他的权威地位。但是各种社会主义者对于列宁和十月革命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现在来看，你以为如何？

乙：我可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列宁虽然对于“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的判断有误，但是十月革命是人类 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人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实验的开始。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是企图将主观上设想的在资本主义胚胎中已经成熟了的“新社会因素”解放出来（最后证明是犯了急性病错误），那么，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首先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内部没有多少合

格的"新社会因素"存在的国家里，运用政权和其他手段，将应有的社会主义因素创造出来。一个是"解放已有的"，一个是"创造未有的"，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所以列宁遭受的第一个责难就是认为当时俄国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足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那种程度。列宁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回答说：这不能作为拒绝工人阶级在特殊有利形势下（指战争形势）夺取政权的理由，只要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就有可能创造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生产力水平及其他政治文化条件。列宁是在非常困难和十分险恶的环境和条件下作出这种回答的。但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原来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在他 1927 年（那时列宁已经逝世了）所写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感到不满的阶级，即使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只要特殊的历史形势给予它试验的力量，它就要进行试验来创造新的、对它更有利的生产关系。"但考茨基接着又说："马克思主义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取得了政权，就有责任来检验一下，新社会的存在条件究竟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孕育到了什么程度，并以此为根据，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安排自己的实践。……如果在试验中新生产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尽管颁布各种法令，尽管采取一切恐怖政策，这种创造新生产关系的尝试最终还是会归于失败。"考茨基说这番话是在苏联初步站住了脚以后，而苏联当时正笼罩在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和恐怖政策的阴影之下。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错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甲：考茨基在这里似乎是同意了列宁的观点，承认在经济

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也可以进行试验来创造社会主义；但他同时又提出了如果采取错误的政策则这种试验最终还会归于失败的警告，而苏联的垮台好像恰恰是证实了考茨基的警告。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走的列宁这条路呀……

乙：现在回头来看，考茨基所说也不无道理。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失败，也可以不失败，全要看它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看它对于初步获得社会主义称号但是生产力先天不足的社会如何准确定位，看它对于“创造新社会因素”是采取清醒的正确的政策，还是采取盲目的错误的政策。而这里的前提是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命运的估计，不幸的是列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甲：你指的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俗称《帝国主义论》）这本书中所表达的那个观点，即认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高的”即不能再发展的阶段和“垂死的阶段”?

乙：列宁这本书是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前面说过，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意见分歧，列宁持上述的观点，而第二国际负责人考茨基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世界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国家参与等正表明资本主义走向更高的社会化阶段，资本主义将继续获得发展，而工人阶级也将因此日益壮大；考茨基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虽激烈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市场，但仍有它们趋向联合的一面，未来将会出现国际化资本，出现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剥削。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证明，虽然考茨基对于当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新特点、新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和激烈争夺估计不足，但是，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整个看法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基本相符。而列宁的观点则很

自然地引申出一个结论：帝国主义时代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世界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所以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号召交战国的各国工人起来夺取政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当时列宁坚决领导十月革命也和企图借此发动世界革命有关，结果只有俄国一国的工人成功了，但随之又产生了“一国能否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

同时列宁组织了与第二国际对立的共产国际，以贯彻他的世界革命路线。我想现在已经可以初步作个评价：共产国际有功有过，有得有失。其功过得失的比例由历史去评论吧。兹就其“失”的方面略举两端：一是，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其最高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依此划线为界，益惹争论。共产国际没有统一战线的意识，几乎与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为敌，甚至连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这样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也与之“割袍断义”；其二，共产国际对所属的各国党采取组织领导手段，形成上下级关系，使各国党丧失应有的独立自主地位，实际上从属于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杀人，整人，有的党（中国党在内）也杀人、整人。这些都是大失，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还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历史实践证明，这也是不适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不顾自身条件盲目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措施，造成一定损失，即与此有关。

企图超越商品市场经济阶段，后果严重

甲：我记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就提出这个观点，这恐怕是他后来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思想原因之一吧？

乙：且不谈这个问题。与列宁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看法和对

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直接有关，当然也与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关，在国内政策上，在解决“创造新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上，列宁一开始就采取了“左”的冒进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几乎葬送了刚获得的革命成果。本来，在资本主义发育不充分、生产力先天不足而封建遗留还很多的国家如当时的俄国，要创造出“新社会因素”来，必须借助于商品市场经济，并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舍此没有别的路。然而，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列宁的目标恰恰是企图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并将民主革命任务当做简单的遗留问题交给社会主义革命去附带完成(实际上是取消了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而直接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经济上则企图直接以产品调拨取代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计划经济，并且幻想借助电气化使俄国在十几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像列宁不久以后所承认的：他犯了严重的错误，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他这样做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反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因此，如果不实行退却，苏维埃就有灭亡的危险。

甲：列宁能够很快发现错误并承认错误，倒是证明列宁算得上是一个具有严格科学精神的革命家。有的人则不能，他们是危险的“一贯正确论”者，最多讲“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

乙：那时候不纠正错误就是灭亡。列宁所说的“退却”，就是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退回到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并利用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来挽救社会主义。列宁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公式：社会主义就是“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的总和=社会主义。”列宁甚至说：“要用资本家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列宁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使经济进入国际市场，并以优惠

政策吸引外资到苏联来投资，甚至提出“租让制”准备对外资作出大的让步（列宁本人特意跟美国资本家哈默打交道，就是为此目的）。可以说，十月革命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突出地提到社会主义者面前来了，迫使社会主义者不能不郑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公平地说，列宁当时的主张方向虽然正确，但并不彻底，其所采取的措施也有限，更未能打消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的恐惧与戒心，前来投资就更谈不上了。不久列宁逝世，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提前结束，苏联从此又回到直接向共产主义冲击的“左”的政策和道路上去，并在不久之后宣布苏联已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考茨基恰于此时发出警告。总的来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也曾为国家创造出一个强盛的局面，对苏联国家利益甚至对世界都是有贡献的，甚至有大贡献，但其本身实在算不上是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生产力方面，而且在实现自由、公平、民主的社会理想方面，后者甚至反社会主义之道而行之）。最后如果能够采取正确的改革步骤，社会主义本来还可以挽救，苏联也不致于解体。但是，到了最后被迫不能不进行改革的时候（苏联的改革比中国晚十来年），改革却迷失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苏联终于垮台了。

苏联的垮台，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激烈的军备竞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为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法西斯气势汹汹，加强自己的军备是完全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偏重于发展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世界霸权和扩张势力范围而从事军备竞赛，可又竞不过人家，徒耗尽了自己的国力。美国政府特别是里根政府则有意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在这方面苏联可说是上了美国的当。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甲：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沉痛的一页。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虽不像恩格斯形容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样“只是

一个幻想"，因为破天荒地开创了社会主义局面毕竟是事实。但是，要在生产力先天不足、"新社会因素"孕育极不成熟的国家里创造出社会主义来，要在这个问题上恰当地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列宁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为社会主义者遗留下这样一道难题。

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

乙：还应当提到，在政治上，主要在国家问题上，列宁的"左"的倾向也为社会主义留下了严重的后患。我指的是列宁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及其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空想社会主义的遗留较深，认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马克思语），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对于国家的产生和作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倒是比较全面些，他一方面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镇压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具有执行某种社会公共职能的作用，而且政治统治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否则它就不可能维持下去（见《反杜林论》一书）。然而，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却只片面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并且强调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仅仅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旦当镇压的任务完成，国家本身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对国家来说，列宁实际上强调的是暴力，是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列宁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因此，一般地无区别地反对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之说（仅仅为了反对 19 世纪 70 年代社会民主党人曾提出此说）。

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证明，“人民国家”的出现已经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难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真正的“人民国家”吗？列宁在建国之初株守原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不过是即将废除的废物，因此除了着重于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以外，很少顾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尤其将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排除于视野之外，以致一开始便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随意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将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和党领导人之手。大家已看到这样做的后果的严重性。列宁在去世前对此虽有所察觉，并痛恨官僚主义的猖獗（实际上这种官僚主义不是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而是党的官僚主义和独霸作风），但已无法纠正。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都承袭着这种做法。因此在下认为，按照原则和情理，上述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应予修正。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

甲：我接触国内理论界不多，但也翻阅一些刊物杂志，给我的印象是，内地在理论上还是四平八稳，不敢进行认真的反思，不敢重新审视那些写在书本上的条条。自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似乎仍然滞后。奉命写作者多，纷纷在竞相“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但真正有研究的论著很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乙：原因不容易说清，大概是因为要改变过去那种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式很难吧。我想，现在就可以来谈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他的社会主义事功了。“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面临着空前艰巨的任务：极左思潮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的残余势力到处存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党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

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要从头作起，而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改革又采取反对的态度。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改革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开创一个新时代。

甲：邓小平并没有留下专门的理论著作，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他本人好像也没有这种打算。邓逝世后，世界上几乎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很少有人谈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香港也一样，内地一般将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围绕着这个提法写文章，现在又好像将邓小平的理论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乙：我以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并没有能够概括邓小平在理论上提出的新东西，但这个提法是邓小平自己认可的，本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应适合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我个人认为，即使照此本意，这个提法亦应改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方较全面。邓小平本人着重政策与实际事功，他并不空谈理论，他对于来自苏联的反对声音也置之不理，他的理论观点常通过他的政策表述和简单的论断表示出来。在邓小平那里，理论与政策（也就是理论和实际）浑然一体，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特色。举两个例子来说。邓小平提出当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提法奠定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例如，中国宣布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备竞赛），在理论上（依我看来）却要胜过整部《帝国主义论》著作。我说“胜过”，是指《帝国主义论》虽是煌煌理论巨著，但邓小平只用简单一句话，并没有附加多少论证，就正确点明了当前时代的特征及世界形势的特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修正了《帝国主义论》用千言万语阐明的那个至今尚被一部分“左”倾共产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世界革

命时代”的论断，意义重大。邓小平的话当然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但这句话无疑是真理，它对建立当前世界新秩序和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第二，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各方评论很多，苏联的理论家反对，中国的“左”派反对，称之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然而一般头脑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则表示赞同，并且评价很高。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以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包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措施和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位，是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新的轨道，也就是对于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因素”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十月革命以来，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获得政权就是获得了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并非难事，只要经过很短的时间，十几年，数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想、幻想。

邓小平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旨在说明：获得政权并获得社会主义称号并不等于获得了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从这里起步到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像中国，至少需要百年以上时间，而且还要不走大的弯路。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成分并存。这时候，在政治上将认真补上民主革命的课，以创造自由、公平、民主的社会生活；在经济上则将长期处于商品市场经济阶段，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必须容纳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如此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相应的政策的推行，实际上使社会主义进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必须跟上这

一新的形势。

甲：你的这番宏论使我对邓小平的理论和事功顿开视野。如此看来，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重大历史背景的，是科学地务实地回答了（或扭转了）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照有的理论家的说法，这就是向一直猖獗并制造无穷祸害的“左”倾共产主义势力提出严重的挑战。邓小平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记得，他的反面回答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等等。而他的正面回答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就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首位，使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我想知道的是，邓小平有否为社会主义下过定义，国内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下了新的定义。

乙：据我所知，没有。估计邓小平不会这样做。下定义有时等于自缚手足，或者只是提供某种僵化教条的公式，于实践不利。邓小平只是指出社会主义（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及其基本特征和理想目标。我还要提醒你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对于历史上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涵盖面很广，这里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甲：这正是教条主义者所忌讳的一个问题。你几次提到这个问题，这里的困难是否在于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姓“社”姓“资”的争论就是这样引起来的吧？这里是不是也真的包含着某种风险？

乙：马克思的“解放新社会因素”，是从资本主义的胚胎

中解放出来的，是在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成熟的；列宁的“创造新社会因素”也不是凭空创造的，更不是用“土法”创造出来的，这里首先要继承、吸收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形式及其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而这又必须依靠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排除自然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旧因素。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商品市场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之后的一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创造了商品市场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将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虽然资本主义是将商品市场经济大大地推进了），商品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我们改变旧计划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到国内来，开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等，包括在国内一些特别地区（港澳台）采取“一国两制”政策，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个别地区可以长期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收到互补互助之效。总之，举凡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好东西，无论市场、计算机、股份制、跨国公司等等，只要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的，都应当拿过来，经过吸收与改造，使之为社会主义所用。这样做自然也会有某种风险，但比起教条主义者、“左”倾共产主义者造成的风险总要小得多。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

甲：“一国两制”问题，我们过去从政治方面着眼，而未

从经济方面着眼。像你所说的，“一国两制”的前提固然首先在政治上，在主权上，但同时也在经济上。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原来就有紧密的关系，实现“一国两制”后，香港的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经济无疑将会对祖国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消除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疑虑（像列宁时候那样），以便吸引大量外资注入国内。中国的经济也容易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处理现代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点，我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乙：再拿内地的私营企业来说吧，我们对私营企业（亦称民营企业）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自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不妨计算一下，中国现有的私营企业已吸收了多少剩余劳动力，向国家缴纳了多少税金；而在私营企业中从事劳动的人又并不是马克思书上所说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大多数是家有生产资料又有余力出外打工挣钱的人。我想，如果国家能够对于私营企业的利润分配规定一个合理的办法，并积极引导其发展方向，那么，这些私营企业在性质上也不应看作就是《资本论》所说的那种纯粹的私人资本吧？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也要跳出框框想问题。

甲：现在，无论香港也好，国外也好，内地也好，都有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内地的“左”派朋友则直说现在还有“走资派”。我看内地理论界也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回避正面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被人称为“羞答答”。可不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缺，至少是一个弱点。倒是邓小平本人旗帜鲜明，他屡次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回答从各方面来的挑战。今年香港

一家杂志有一篇文章，记述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曾提到他在 1992 年 6 月间（那正是“南方讲话”以后）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他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搞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那些极严重的错误?”

乙：没有坚强意志和非凡气魄的人讲不出这样一段话来。这是回应 1990 年和 1991 年那次“批邓”风潮的。以我为主，资为社用，“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当年列宁曾这样想过但没有做到，如今邓小平做到了。是否会冒风险，全看是否做到了“以我为主”。邓小平所说的“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毛泽东思想捍卫者”，就是那些散发“万言书”的人，他们中教条主义的毒太深。看来，现在不仅应当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应当弄清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近几年，中国突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常到香港去，你如果有机会同他们接触，不妨向他们请教，问问他们究竟研究清楚香港的自由经济没有？进而也可以问问他们是否到过不同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像马克思一样深入研究过它们的经济？

甲：我请教过一位经济学家：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了后我仍不得要领。

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时间不多了。说到理论问题，我想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老一辈在有些问题也很难和旧的一套完全脱钩。例如，明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有弊病，仍无法下手进行改革，也许目前尚非时机，目前首要任务是经济改革。然而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他们大都没有能够从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着眼来弄清这些弊病的根源所在，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从这个空想成分较多的领域中跳出来。而这正是1987年政治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8年第2期）

李 锐

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从报上看到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报道及有关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问题。这确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个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否则今后还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

离职十多年来，主管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从一大到十三大）的编纂工作（省地县三级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将面世）；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50年代的经历和有关研究毛泽东的书。因此，回顾历史，感想颇多。古人说得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趁这次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着知无不言之旨，就回顾历史谈一点感想和意见。我今年（1997）已满八十，来日无多，以后这样的机会恐也难得了。

一、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总结;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绩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1957年至1978年,二十来年,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灾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但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此,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最近流传的几个《万言书》和某些署名意见书,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复辟,实质上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版。可以说,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近二十年来,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

鄂豫西、鄂豫赣三个地区共杀了45000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五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执行，说“特务如毛”。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可是《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是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1950年在长沙时，我翻过全部日记原件（《日记》现已出版）。

建国以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50万人。“四清”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上述历史情况？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

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认识上有偏差，包括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讨论时虽然平反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是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并没有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

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回顾 1945 年《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真是不胜感慨。

上述情况同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东风压倒了西风，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的后果，导致我们长期的反修防修，同国内“左”的路线紧密结合。

总之，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二十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一个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等。同过去路线相比，可说“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步履

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都有待新的发展——前无古人的发展，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际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二、发生以上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长期“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经提到，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说得简单一点，两个时期都吃亏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马恩的学说产生于19世纪的西欧，他们根据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得出来的结论，怎么可能适用于一百多年后的东方与全世界呢？马克思自己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是不能停滞的（真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有同有异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要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况我们并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全部颠倒了。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理想提出来的。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只能从道德上抨击初期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无法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根据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社会两极分化，看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力量所在，从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

的前提是"消灭一切私有制"。他们对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公有制，不可能作具体设想。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过程。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路线，反而批判布哈林，从理论到实践，认为只有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几次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可是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在经济的失败（现在还有40%的国有制），民心不满首在商品的匮乏。国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种教训。

我们走过长期的痛苦的弯路，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过去我们讲惯了"兴无灭资"，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只能永远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近二十年的对外开放，来往交流，终于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相信马克思活着也会这样说的）。因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制度的崩溃，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全球市场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资本与市场，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蓝领"缩小，"白领"扩大）。总之，生产力在变化，生产关系也在变化，更不要说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的走向健全。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还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们两者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与交叉之处呢（西方有一种“趋同论”，我们理论界有人批判过）？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包括股份制）发展，就包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们从来反对“改良主义”，能够逐渐改良，用和平的手段发展、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苏联“和平演变”了，究竟是他自己之过，还是人家“演变”的呢？应该弄个清楚。立场只应当一个：走共同富裕道路，手段各自为之。

除开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外，根本原因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得很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

我国是一个有长达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和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顺理成章。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解放以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因为敌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于是阶级斗争更转入思想意识领域。毛泽东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

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的讲话。讲话着重讲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

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当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向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搞特权，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摘引这么多"讲话"的原文，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经过 17 年之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很不受重视，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会全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十二个问题中有四个问题同上述"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

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准则》这些话写得多么好。可是 18 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

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党及其领导威信的建立，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除开要解决民主化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科学化、知识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这“四化”也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党几十年来，领导革命与建设尤其后者，这“四化”的建设与贯彻，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这“四化”的保证，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三、应当开始总结这20年（1978～1998）来的经验教训

本世纪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的趋势。总结最主要的成功经验，更要记住最关键的错误教训，避免再走弯路，21世纪走上康庄大道。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然，什么时候办这件大事，要由时机成熟而定。但这件事是非办不可的。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前两个“历史决议”当年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尤其第二个“历史决议”，全国4000人参加，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去掉一切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前途为重，指导思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相信这件事终能办好。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20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20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问题不能回避讨论：

——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这20年“左”的表现，今后如何防“左”？如果说这20年有右，“右”又在何处？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否即引进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其发展同西方是否会有同有异？革命时期就有“红色”资本家帮我们的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资本家、企业家是否会多少带些“红色”？

——国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的区别或关系，如何以公有企业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异何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具体定性，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方面，以及同历史上人家（苏联东欧）与自己（1978年前）及马恩列理论的同异何在？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几代人，几十年，一百年？还是更长或说不清楚？

——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为保证党今后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使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更加顺利发展，考虑我们有哪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粗粗想来，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是否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存在？家长制、搞特权、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情况如何？最近看到一份《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一共26起，多逼得农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也有打死人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县、乡干部共135人。其中山东10件，湖南6件。

（二）人们都议论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失去民心，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界定？过去骂蒋介石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恐怕从来是实情。记得反右前，毛主席说过，要鼓励民主党派同我们唱对台戏。随后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当时可能真是这个念头。无奈波匈事件，“右派鸣放”，整个历史就走入弯道了。我们党如何进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除了任期制、选举制、民主生活制度，

还应有什么制度？自己是难以很好地监督自己的。中纪委（监察部）如何加强权力，发挥作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管什么？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过去是吃尽这方面苦头的。党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然受到三种限制的（恩格斯说三条：历史时期、知识经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一条：个人品德）。

（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左右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出现？如何防止这个阶级对社会生活发生严重的副作用，国家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种经济成分如何服从“三个有利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如何相得益彰？

（四）国外威胁问题。对国际形势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种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如何对付？苏联的外部教训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的崩溃起了哪些作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搞过“反对和平演变”，应当怎样认识和估计这一举措？

（五）香港与台湾问题。要充分认识香港（尤其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争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归。目前香港总产值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均已超过英国；向内地的投资占全国外来投资的60%。如何发挥香港的正面作用？香港对我们有无危险，危险在何处？大陆、港、台经济能否做到“一体化”？如何分化台独，争到民心？解决台湾问题关键何在？台湾对我们的危险何在？

（六）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已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导致洪水灾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系统应该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木将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七）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又素质不高，社会无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经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普及义务教育，如何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世界今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即是人才的竞争。关于提高素质的教育，人的素质靠什么保证？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使我想起鲁迅说的一段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1997年9月8日于北京医院

（1997年第12期）

李 锐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大跃进”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

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而思想影响更其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同样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任何生动威武的表演，都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制约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理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那时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他不可能预见到 20 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分配社会产品，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必不可免的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形"；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

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各具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在内，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紧密相关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有四种类型：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②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③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④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在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30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

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5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以苏为鉴”，却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反而“创造”出“大跃进”的荒唐局面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的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14.7%的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了96%；粮食产量达到390亿斤，比1952年增长了19%。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

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个旧墟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 1955 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 年 12 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 1955 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 年至 1956 年之际，毛泽东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 年 2 月中旬，毛泽

东开始分别听取中央 34 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 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泽东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 1955 年到 1956 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泽东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如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

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合乎逻辑的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 年 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 50 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 1958 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作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 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

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畸轻畸重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了，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

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下，运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 1958 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小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 1957 年 24.9%陡然超过 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比上半年增长 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验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精神对驰骋想象的束缚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

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如西谚所说：伟大与可笑只相差一步。在成都会议上，毛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鲜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泽东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象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想象的束缚。“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还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的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诗人。这种气质用于革命，很有好处。战争年代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常能解决问题。1930 年打长沙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精神，导致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也要依靠群众，可是，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1958 年，“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言，却迎来经济的大倒退。

革命时期当然“无法无天”。实现“专政”，搞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也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错

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科学的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 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6 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的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我们这些人个别随谈时，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主义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

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着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适应水平以及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些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分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开其端，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紧

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 年 7 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该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当年王任重是很被毛泽东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主要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

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领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搁共产主义的那样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泽东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鼓吹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

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

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的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6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6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要求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速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泽东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泽东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

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前的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泽东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

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炉"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浪费了几十亿元钱，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离群众需要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哄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取其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违反客观规律，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

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少走一些弯路。1957年以后，“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5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判断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苏联方面也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毛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

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 1958 年，又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泽东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号博士头衔”。苏联的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30 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 50 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 1928 年时的五分之一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 1959 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须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 1958 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泽东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当然还是源自于毛泽东，是他当时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本人既为 1957 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热衷于搞群众运动，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 1956 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党的八大报告中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更加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

局面的兴奋剂。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赞赏“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此话列宁说过，斗争王明路线时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过“只要正确，就不要推，不如我独裁”的想法。因此把批判“反冒进”同反右斗争相联系，早已越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本身；实质上这是毛泽东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定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泽东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是4000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年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毛泽东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

"大跃进"年代还出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账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交心真话。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过："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象、任意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

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泽东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月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正式公布了毛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毛泽东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政合一）和“公”（提高所有制范围，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吸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

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象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的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有了深刻感触和一定的思考。1918 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国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材料无疑

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材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最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观念。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地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能使人的精神境界纯洁而高昂，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泽东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

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泽东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极分化。1953 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 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样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由于那些类似"新村"的做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对，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 年 11 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中急于过渡，已引

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的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的展望。例如1958年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年12月7日、10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传统中国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运动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富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仍执著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可见他所受到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

当然，仅仅从思想材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泽东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但问题是，毛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好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 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泽东的这种空想，即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做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

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着对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要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非使社会有所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拢，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我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由历史证明是办了蠢事。如不加以彻底清算，悲剧难免重演

我在《龙胆紫集》中有这样的句子，“看时容易做时难，事非经过不知艰，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倾囊赌棍然。”这是指毛晚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并希望大家能引以为鉴。“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历史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而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

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1997年第7～8期）

刘建明

以言治罪的悲剧

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把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意见视为危言，采取高压政策，大搞文字狱。而专制统治者个人的意见却不受约束，言出法随，要求一呼百应，庶民稍应诺不及，便会祸降宅室。新中国不同于旧制度，摧残言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谁曾料到，又粗又长的极“左”路线也造成一幕幕舆论悲剧，在几代人心灵里刻下深深的疤痕。

反思历史，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记取历史教训，才能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一个社会不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意见，舆论监督将化为泡影，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健康的肌体。

一、“四大”乱国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舆论方式（以下简称“四大”），曾被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法宝。但在实际上，由于“四大”本身超越法律约束（实际上，当时中国还谈不上法

制），常被用来进行人身攻击，言论自由遭到严酷的践踏。

早在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大辩论的高潮，号召弄清农业合作化的是非问题，这是“四大”在中国的发端。但到反“右”斗争，大辩论被大批判所代替，被批判的人没有发言权，大辩论在“四大”中名存实亡。从此，“四大”已经变调，成为压制不同意见和诬陷他人的手段。那些怀有政治偏见、图谋报复以及借“四大”表现自己在政治上可靠而妄想捞到好处的人，异常活跃，纷纷举起“四大”的棒子向一身正气的人、向人民安宁的生活狠狠地砸下去。每次政治运动，总有一些人“四大”瘾连连发作，唯恐天下不乱，使错误舆论急剧高涨。

把镜头推向1957年。《北京日报》一间屋子里正在批判一位普通编辑徐钟师。会场外贴满了大字报，会场内一片质问声和口号声：“你是蔑视反右斗争!”“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先整他的态度!”“叫他低头!”……这种“四大”不给对方说理的机会，完全以势压人。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徐钟师，只是在鸣放中对工作提了些意见，被诬陷为“右派”进攻，只好接受“四大”的洗礼，任人“言”割。

再把镜头转向十年动乱。“造反派”把“四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到处响彻“四大”的沉雷。1967年7月中旬，北京街头和中南海大墙外，贴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近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红旗、大字报、横幅标语如海如潮，上百个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高呼：“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国家主席尚且如此，一般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可想而知。许多人被大字报诬陷为特务、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张大字报便给人“定性”，置人于死地。

“四大”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主。借用“四大”发表意见，

揭发问题，不受“诬陷罪”的惩处，必然成为互相攻讦的手段。“四大”一盛行，许多人肆无忌惮地侵害他人的民主权利，最终导致每个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陷入动乱，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在言论禁锢的年代，一些群众来不及思考，更不会正视“四大”的破坏性，“四大”最终成为思想禁锢的反叛。在言路堵塞的社会，压制言论达到极限，又鼓励群众“演习”言论自由，人们就会用极其危险的方式表达意见，这是舆论一律的悖反。“四大”作为极“左”意识形态的产物，必然带来极“左”的后果，舆论行为最终走向它的反面。

二、引蛇出洞与舆论阳谋

在大鸣大放中，让人放心、放手发表意见是关键一环。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言论高压下往往不敢发表真实观点，“引蛇出洞”便成为极“左”年代制造舆论的一种策略。

1957年5月上旬，大鸣大放的言论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接连发表半个多月，从民主党派人士的高谈阔论到中小学教员的微言附议，汇成浩瀚的舆论海洋。报纸上大量刊载批评性言论，大有一面倒之势，这对鸣放闸门彻底打开起到诱发作用。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各种言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但这不是容纳不同意见，而是“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引蛇出洞”的舆论策略就这样制定了出来，有的人把它称作阳谋。但，从骨子里反对共产党的只是极少数人，鸣放虽然被“引出洞”，大都是对官僚主义的尖锐批评，言论仅仅是过火而已。

1957年那舆论阳谋使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

迫害，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连中共中央主管部门在多年中也无法核实清楚。1958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此后不久，又说有40万。1959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说，右派有45万人，1979年进行最后平反时，实际错打的人数有552877人，1980年5月最后确定有96人不予平反，这个数字不到万分之二。阳谋的舆论策略使55万多人蒙受二十多年不白之冤，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人格受到歧视。

1957年的悲剧只是开端。1958年又以阳谋的方式引诱人们“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至1960年又启发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这两次政治运动把全国365万党员干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全国党员总数2600万），遭到批判或下放。仅中央国家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重点“帮助”了2714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在这两年中，究竟有多少党外群众遭到打击，是无法统计的。

更为卑劣的阳谋手段被极少数基层掌权者用来迫害青年学生和靠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他们掀起所谓“向党交心”运动，在大中学校和党政机关鼓励人们“挖思想，献忠心，紧跟党，干革命”，诱导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不满言论。党委先是称赞和表扬敢于提出不同见解的人，然后偷偷把认为是反党的言论录入档案，作出政治定性。有的被打成反动学生，有的被定为异己分子或内控分子，阳谋已经变成十足的阴谋。

这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中国人应当在舆论悲剧中沉思：言论不违宪，就不应视为恶意。

不以言治罪，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政治文明。极“左”路线

不仅缺少这种文明，而且千方百计引发对立面舆论，寻找打击对象，搞得人人自危。在这条路线的迷惑下，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搜罗同事的言行记在小本子上，或打小报告，或在批判会上积极发言，争当“左”派，陷害多年的同事或老朋友，人际关系反目为仇，播下人际内耗的孽种。

三、大批判的殉难者

大批判是没有硝烟的战斗，在笔墨横飞中虽然听不到枪炮声，却有一批批人倒在血泊中。上至国家主席和久经沙场的将军，下至普通干部和中、小学生，有数十万人在一场场批判中在劫难逃，命落黄泉。大批判是杀人的舆论短剑。

在80年代初，人人皆知张志新的事迹，但下一代人却对她的不幸感到迷茫。为使这种不幸不再重演，每一代人都不应忘记她的光辉形象和政治枷锁对她的杀戮。在那个时代，江青、林彪被鼓吹为真理的化身。在真理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谬论，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

张志新这位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普通干部却看不透或不愿正视这种污浊的现实，公然要“做70年代的哥白尼”，“坚持真理永不放弃”。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她失声痛哭说出心里话：“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不信任！”“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张志新的言论惊呆了周围所有的人，先是被隔离审查，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于1975年4月4日惨遭杀害。张志新运用民主权利发表个人见解，却撞到了枪口上，她对真理的追求过于执拗，更没有想到几句尖锐的意见引起“四人帮”的恐慌。显然，她错了，她不了解极“左”路线的残酷性。历史的发展，绝不允许这种骇人听闻的悲剧重演。

还有些殉难者是鲜为人知的，由于大众传媒没有报道他们的遭遇，只有亲友在每年清明节缅怀他们短促的人生时，才能记起这些不幸。1962 年 11 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杨献珍在给学员作报告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该校两位教师听了报告深有所感，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清样经过杨献珍修改，发表在 1963 年 5 月 29 日的《光明日报》上。康生、关锋等人读到这篇文章后手舞足蹈，大为惊喜，立即判定：“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抓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向《光明日报》负责人发出“引蛇出洞”的指令：“很显然，‘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按理说，对某个学术观点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然而，康生却别有用心，亲自主持成立了领导小组，全面围剿“合二而一”，很快在全国掀起大批判高潮。到 1964 年底，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五百多篇，中央党校院内的批判活动紧张激烈，各部门分配专题，组织专人搜集材料、写出发言稿，审稿、试讲、试演，犹如大敌当前，昼夜奋战。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 154 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江苏有一个“五好”战士，因写过同意“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被判处死刑。广东一位作者给报社寄去研究“合二而一”稿子，报社把稿子转回去原单位，这位作者被指控为“杨献珍的黑干将”，关押多年。仅这一桩冤案，全国有三百多人遭到批判斗争，被加上“合二而一”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双料特务等罪名。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一切抱有不同于极“左”观念的政治、学术和艺术见解实行空前的大迫害，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象，损

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据统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诬陷迫害 739511 人，其中 34800 人被迫害致死。

1983 年 12 月，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提出避免发生以往舆论悲剧的伟大战略思想，严肃地指出“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是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极‘左’的立场上。”邓小平这段话，是思想斗争和学术研究的座右铭！又是一具震响天庭的警钟：以言治罪和社会主义的法治水火不容。社会进步对科学问题需要宽容精神！

（1996 年第 10 期）

周正仁

欺君有罪

中国古代，历来尊重儒家学说，“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治国之本。所以，不管哪个朝代，朝野上下都达成共识：“欺君有罪”。意思是说，无论是公侯百卿，皇亲贵戚，还是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只要欺骗最高统治者——皇帝，都视为有罪。轻者丢乌纱帽，稍重则发配充军，天子盛怒之下，可判处欺君者死刑。历史上用酷刑处死欺君者不在少数，甚至连带累及无辜，灭三族，例如西汉时，史书记载的新垣平欺君案。

据《前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记载：“十五年，……公孙臣明服色，新垣平设五庙。……后元年冬（公元前 163 年），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

新垣平的诈术在《前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以及一些列传中有零星记载，大抵是：汉文帝刘恒崇尚黄老之说，实行无为而治，有点迷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不轨之徒趁机利用迷信来哄骗刘恒，赵人新垣平是其中之一。他生性乖

巧，专好欺人，跑到首都长安，逢迎上意，邀宠求荣。他的骗术很多，例如，他说他一向善于观察“气”，他发现当时首都长安东北角上，有神气氤氲，结成五彩，是五帝呵护，蔚为国祥，要刘恒上答天瑞，就地立五庙。一番鬼话，哄得刘恒欣慰异常，破格提拔了他，封为上大夫。后来他又欺骗刘恒说，某日太阳西下后，又重新倒回来变成中午，这本来是胡说八道，偏偏就有一位“马屁”史官也出来作证，说确有其事，是皇上德比天高。前有骗子用诈，后有史官作证，刘恒信以为真，心花怒放，于是下诏改元为后元元年，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有年号的先河。他的诈骗连连得手，得意忘形，又哄骗刘恒说：山东泗水有宝气，大概周鼎又要出现。圣人出，黄河清；明君出，周鼎现。刘恒又相信了，在汾阴修建庙宇求鼎。就在新垣平忘乎所以时，一个朝臣参奏了新垣平一本，说他欺君罔上，弄神捣鬼，没有一语不是虚谈，没有一事不是伪造。刘恒顿然醒悟，勃然大怒，将新垣平革职问罪，交给名臣张释之审讯。张一向痛恨新垣平所为，认为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一经审讯，新垣平只得将鬼蜮伎俩，和盘托出，张释之立即将新垣平谳为死罪，禀呈汉文帝。刘恒过目后，龙颜大怒，不仅杀了新垣平，还夷了新垣平的三族，冤及大批无辜，刑场上血流成河，百官无不股栗。

中国古代，凡是要维持封建统治长治久安，无不以杀戮立威，对欺君者施以酷刑，无非警告百官刁民今后不得欺君。即便如此，欺君事件在历史上仍然层出不穷。做官不要脸，骗君不怕死，历朝大奸大恶多半这样。

欺的含意比较广，谎报军情，以不实之词哄骗皇上，隐瞒灾情不报，虚报政绩或妄报祥瑞，以取悦皇上谋取晋升，甚至贿赂考官、考试作弊以谋取官位都是犯了欺君大罪。自然，欺君成功而飞黄腾达的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能够使皇帝相信欺君

者的鬼话，欺者必然有一套过人的骗术，且精通人性。欺君者对皇上、甚至对上级态度，一言以蔽之是：无时无刻不卑躬屈膝，无时无刻不投其所好，无时无刻不察言观色，无时无刻不见缝就钻。欺君者一般具有高超的技艺，阿谀奉承时，恰到好处，使皇帝抑或上级听了谀辞媚言后感到心情极其舒畅，觉得献媚是忠心、爱心而非别有用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非奸雄莫属。

在现今中国，无论改革开放前或者改革开放后，舆论界、法律界都不太谈及“欺君之罪”，或许有人认为“君”乃封建社会的象征，现今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君”已随大江而东去，因此也无须有欺君之罪。然而在物极的反面，却滋生了部分奸佞之徒罔上的心态。他们认为，“欺骗上级领导，欺骗中央领导”，不过是一些非罪的无足轻重的小节。事实也正如此，几十年来，谎报政绩，谎报军情，报喜不报忧，隐瞒灾情，夸大灾情，妄呈祥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以欺骗上级领导，愚惑民众者，无论东窗事发与否，都未曾因此而落罪。有些人甚至还认为“欺君”是一门学问，为官之道，非学不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目前刑法上只认定诈骗有罪。何谓诈骗罪？法律学家解释，“以诈骗公私财物为目的”的行为即为诈骗罪；没有以诈骗公私财物为目的的欺骗行为，尤其是欺骗上级，乃至欺骗中央领导，法院不认为有罪，一来无此法律，二来无原告，三来没有诈骗公私财物。新中国建立以来，地方官员谎报政绩，乱呈祥瑞，欺骗上级领导，欺骗中央领导的事情屡屡发生，只听说欺骗成功，得到提拔，却极少听说有人为此而获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欺君活动的高潮有两次，一是 1958 年的“大跃进”，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欺君高潮，给中共和全国老百姓带来莫大灾难，教训深刻无比。

1958年“大跃进”中，欺骗毛泽东的事件多如牛毛，顺手拈来即是。195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通讯，标题为《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文中写道：“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问社队干部说：‘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二千斤。’毛主席笑着向吴芝圃（笔者注：吴是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说：‘对！有这样一个，就会有好多个’。”

当时农业社的社长不是“官员”，是平民。毫无疑义，当时王文生是在“蒙骗”毛泽东。这种行为和古代奸宄之徒谎称“祥瑞”哄骗皇帝的行为一模一样。他自己是种田人，种了几十年田，哪有不知皮棉在当时不可能亩产超过一千斤，他为迎合大跃进理论，以达到私人目的，曲意蒙骗毛泽东。

那年，相当多的官员也参与蒙哄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视察河南省长葛县时，垂询了县委书记吕炳光。文中写道：“……毛主席称赞了这些生长良好的玉米。毛主席问县委书记吕炳光今年的产量，吕炳光说：‘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吕炳光在光天化日下欺君。40年后的今天，科技如此发达，没有一个正直的县委书记可保证全县玉米亩产1500斤。1958年，一些官员上下串通一气“放卫星”，共同欺罔中共中央领导。河南遂平县5亩小麦亩产5105斤，河南全省早稻亩产1000斤，广西省环江县早稻亩产130334斤……

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由于“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而震惊全球，共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三十多名外国人和三千多个国内单位的人前去参观，连赫鲁晓夫都派了一个记者专门去考察。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通讯，标题为

《徐水人民公社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是一个著名作家写的，轰动全国。文中写道：徐水县漕河公社党委书记刘廷奎介绍他的实验田亩产120万斤山药经验时说："杀了四条狗，用狗肉汤浇灌山药，增产极其有效。还给山药打针，打了20毫升葡萄糖。"这个谎言编造得拙劣万分，简直荒诞无稽，和两千多年前骗子新垣平编造的"日当再中"如出一辙，正直的人们谁也不信。但是，事情就有那么凑巧，偏偏就有那么一个蜚声海内外的科学泰斗，在当时《人民日报》著文发表高见，认为从科学角度出发，亩产上万斤是绝对可能的，并提出一个公式来证明。既有骗子售欺于先，又有科学泰斗作证于后，令毛泽东不由得不信。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李锐曾经问过毛泽东何以相信了这些谎言，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精明无比的毛泽东，曾指挥过千军万马，几十年南征北战，一统江山，想不到也不敌欺君者全方位的进攻，上了圈套，历史的教训多么深刻啊。

当时中共有党员一千六百多万，其中忠臣良将，能人异士如云，并非如此易受蒙骗。例如，1959年6月12日清晨，那时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接见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时，就针对河南省的欺君罔上恶劣行径说：河南省"有一条独特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弄虚作假，力争全国第一，为个人取得无上荣誉。"杨献珍对这种泛滥全国的欺诈逆流，痛心疾首，他对参观团的人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

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他激昂地说：“讲这些话一定要得罪人，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杨献珍：《1959年记事》，《求索》1984年第4期）1959年7月14日，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他著名的致毛泽东书中，列举1958年种种问题后，提出了两点意见，十分含蓄地说：“(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把一些骗子哄骗毛泽东行为叫做“浮夸风”、放在第一条，用心良苦，我猜想他的本意是避免过分刺激毛泽东。

彭德怀、杨献珍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丢掉乌纱帽不讲，“文化大革命”时，彭德怀活活被整死。

那一些欺罔毛泽东的人后来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似乎没有听说谁有罪。相反，撒谎者中一大批成了有功之臣。由于大批欺君者挤进了官场，或提拔了，他们网络一起，心照不宣，瞒上欺下，使中共中央无法得到下面真实情况，造成瞎指挥错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跌落到崩溃的边缘，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多，惨痛无比。(林蕴晖等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由于得不到真实下情，难于正确决策，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号召，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要亲自作调查研究，最好回原籍，从自己的乡亲，亲戚那里获得真实民情，或者去自己过去蹲过点，比较熟悉的地方，直接向百姓询问。政局到了这样地步，可见欺君行为发展到何等严重程度。

国家主席刘少奇带头，在1961年4、5月间，回到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和自己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足足调查了44天。1962年1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痛定思痛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真实情况还这

么难，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有时得经过曲折斗争，需要充足的勇气！”他又气愤地说：“那两年有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在同一个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也痛心地说：“当时提拔了一大批惯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王光美：《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1日)。

毛泽东不在乎谁欺骗了他。因为凭借他的才识与胆略，对那些刁猾之辈的阿谀奉承，如同戏猴般游刃有余，因此也常表现出伟人般的宽容与大度。1958年11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专把作假搞一条，工作方法写一条。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这个东西人家就不注意。因为现在横直是放卫星，要有名誉，他没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撒谎。我看，没有一项里头没有假，有真必有假。这也许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说没有假，哪有真呢？就是因为有假比较才叫真。”1959年4月29日，他写了著名的党内通讯，他在信中说：“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1卷，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567页）1959年7月11日晚他说：“关于下面讲了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当时欺君者鱼龙混杂，并非都是“上面压出来”而讲了谎话，有的纯粹是品质恶劣，故意蒙骗毛泽东。古代欺君，可用酷刑凌迟处死，夷三族。在此情况下，欺君不怕死的人大有人在，何况现今无此法律。那时蒙骗毛泽东的，都自称左派，打的旗帜都是热爱领袖，所幸“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许多人真实嘴脸暴露无遗，教训了元老，也教训了百姓。中国当代最

大“左派”如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到头来还是遗臭万年。

观今宜鉴古。现在国内不仅假酒、假烟、假商品充斥于市，甚至假材料、假新闻、假报道、假教授、假证件、假产值、假产量、假统计、假赢利、假亏损、假汇报、假考察遍地开花。官场上的腐败，已经波及到考场上的腐败，各种考试的腐败作假的程度，简直无法置信，什么学历，什么职称，都有作假。过去常说：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腐败，一看官场，二看考场，这是千真万确的。治假先治官。打假要成功就得整治吏风。一些行政官员满口假话，瞒上欺下，从何谈起打假？自己都是靠讲假话升官的靠讲假话发财的，靠讲假话欺骗上级来掩盖自己的丑恶嘴脸的，靠讲假话一手遮天营私舞弊的，自己就是欺君弄假的祖师爷，打什么别人的假？欺君误国！欺君误国！

是制订一个法律或政策的时候了，“凡是谎报政绩，谎报军情，报喜不报忧，妄呈祥瑞，虚词构陷同僚”，一经查实，视为有罪，均要依法处置，直至死刑。所有官员，都得如此，无一例外。再不制止几十年来欺君之风，后果不堪设想矣！

1996年5月2日定稿

（1996年第11期）

高 光

良知的魅力

中国历代优秀学人，多在逆境中自信自尊自强，于艰险困顿中爆发奇异的生命力，点燃起绚丽的思想火花。一介书生，位卑名微，却为人类留下百代共享的心灵之果。追踪先哲们的心灵轨迹，不难发现此种超人的精神力量，端赖坚定不移地把握和捍卫人类的良知。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不仅满怀深情地颂扬一代史学大师的人格力量，同时披露陈的弟子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貌，宛如众星拱月，更加显示出这些学者的良知的魅力。

作为反右派斗争的“余震”，1958年的中山大学，又以10万张大字报的声势，批判教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矛头的重点，指向未被戴帽却内定为“中右分子”的陈寅恪。领导运动者认为：不批倒陈寅恪，便是没有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的旗帜。

陆键东在复述当年荒唐情景时深为感慨地说：“一种对学

人的人格与传统品格无情摧毁的做法出现了，那就是教师之间开始互相贴大字报，相互挖所谓消极落后甚至反动思想的根源，相互批判。……少数人甚至开辟了'凭批判换取功名'的人生道路。"

然而，正是在这种兵临城下、泰山压顶的危难局势下，陈寅恪的弟子刘节教授，在批判"厚古薄今"的会上发出振聋发聩的议论："科学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学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刘节当即成为众矢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他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会。有人暗示刘节，只要他批判陈寅恪，便可立即解脱。但"劝说"的结果，是刘节在大会上发出爆炸性的辩驳。他说："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

刘节还对当时正进入疯狂状态的浮夸风大发"逆耳之言"，"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当刘节一人面对全系大部分师生的"炮轰"时，他依旧坦荡地表白，"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显示出他的坚不可摧的文化品格。诚如陆键东写至此处击节赞叹："在灵魂的'拷问'中，最早登场的总是良知。"

无独有偶，在"左"祸泛滥的日子里，固守良知的，还有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教授。在一次歌颂"大跃进"的会上，轮到蒋发言，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便拂袖而去。十年浩劫中，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被诬蔑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以示抗议，并且说"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令极"左"者哭笑不得却无法辩驳。难怪陈寅恪无比信赖地把晚年

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权全权授予蒋天枢。这是毕生事业的生命之托。师生间名山事业的延续弘扬，端赖良知的交相融合。

通观几位学人的坚守良知，敢于和如狼似虎的谬误、邪恶抗争，大都限于学术研究领域和治学原则之争。但是，他们和时代的思想政治良知是一脉相通，交相映辉的。1959 年彭德怀元帅不计个人安危，上书毛泽东批评浮夸风；十年浩劫中张志新、顾秀兰烈士，先后上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打倒刘少奇主席，要求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制止“文化大革命”；遇罗克慷慨著文，批驳猖獗一时的“血统论”……这些先烈为捍卫人类良知而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坚守良知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同样，陈寅恪及其忠实门生，坚韧不屈地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赫然光照百代，彪炳千秋。

陈寅恪及其弟子刘节、蒋天枢的良知，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把握，终生燃烧着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生命之火。他们坚信：自古以来的大师巨子，都是心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不仅能在承续先哲之业，以命相许；而且能够开拓新的学术领域，补益前贤未竟之业。他们的著作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昭示未来轨程。这一坚定信念，凝聚成高尚的文化品格。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中流露了这种义无反顾的品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们把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看得比自身生命更为贵重。在这种品格主宰下，自能泰然面对一切世俗利害的困扰，沉着冷静地辨认真假、是非、功罪、利弊，做出服膺真理，无愧无悔的人生抉择。

良知诚然魅力无穷，然而要充分展现这种力量，还必须具有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强胆魄。否则，在浮名俗利的诱惑，声色犬马的腐蚀，风雪泥泞的

险阻，监禁刑杀的威逼等等情势下，很难坚守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十年浩劫中，同在中山大学的另一位史学家，因投靠江青而成为“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昧起良知为虎作伥，终至身败名裂。这决非认识上的差误。当时广大农民都在田头斥骂江青是祸国殃民的“妲己”，难道是他们的知识比教授高吗？非也，主要是他们敢于维护自己的良知。

与这位“青云直上”的教授成鲜明对照的，是宁折不屈的刘节教授，前后共遭受六十多场批斗，以至在拳打脚踢下被迫爬出会场。但这位铮铮铁汉却充满自信地说，每次批斗会，我就在心里背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这是何等璀璨的人格魅力！

刘节的坚守良知，源于恩师陈寅恪的谆谆濡染。陈自述敬佩宋代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风格，默念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曾收到寄自香港的食品包裹单，寄件人署名“陈汗亮”。陈对此名很陌生，尽管包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眉豆等食品近二十公斤，是一宗为数不少的“雪中送炭”，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收这批来历不明的食品。百般困窘中，坚决不吃嗟来之食。这和40年代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品，同样高唱出中国优秀学人的正气之歌。

在陈寅恪文化品格濡染下，女教授冼玉清1964年赴香港探亲治病。当时不少人视港澳为“天堂”，以为冼玉清肯定一去不返。而终生未婚，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的非党女教授，在生命之火将熄前毅然回到广州，向省委统战部交上遗嘱：共计捐赠给统战部50万元港币。而分给她的妹妹和六个侄儿的仅共有18000元港币。高洁的品格，使高尚的良知显现出壮丽无比的风采。陈寅恪十分欣喜地赠诗给冼玉清，把她赞誉为“海外东坡死复生”，当不为过。

追忆学人风范，不能不反思往昔造神运动中的混懵懦弱，更加痛感维护良知、独立思考、坚守节操，实乃精神文明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的良知，亦非皆为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往往是极其质朴，极其单纯，如同维系肉体生命所必需的水、空气、阳光。人一旦抛弃良知，屈于私心，必然像拒绝水、空气、阳光那样，精神生命就会枯萎、僵硬、死亡、腐烂。

只有紧紧拥抱良知，坚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才能使自己的头脑发挥应有的思辩功能，在学术研究中，思想的探索中，不做随波逐流，曲学阿世、仰俯势利的可怜虫。

（1997 年第 1 期）

高 光

义无反顾地探索

——读《顾准日记》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皆缺、人类独有的天性之一，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不倦地探索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规律，乃是人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的看家本领。

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真正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索，犹如探险，注定要遭遇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注定要付出难以忍受的牺牲，甚至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我们目光所及的中国现代历史，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寻找摆脱孱弱屈辱、愚昧贫困的强国富民之路。以牺牲数千万人的宝贵生命为代价，才开创出今天的局面。

历史的曲折难以预料。中国人民在摆脱外国侵吞掠夺和国内剥削压迫之后，好不容易面临千载难逢的民族崛起的良机，可以健步进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建设。孰料刚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又遭受“左祸”的熬煎。明明是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而阶级斗争的风暴却越来越猛烈，势必发展为穷折腾、

“窝里斗”。于是，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十年浩劫更使上亿的人遭受迫害。以至于闹到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那些荒唐岁月里，忧国忧民之士，焉能不疑惑那些喊声震天的豪言壮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究竟有几厘真理？难道只有受穷吃苦才算社会主义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上下求索。于是，李云河等探索出挽救和发展农业必须实行包产到户，马寅初探索出节制生育，胡风探索文艺的规律，“右派”中的先觉者探索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彭德怀元帅探索出“三面红旗”的危害，遇罗克探索出“血统论”的反动本质，张志新、顾秀兰探索出应该立即停止“文革”。

在这些仁人志士中，有一位值得大书特书却没有书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

顾准探索的目光所及，十分博大深邃：他不囿于一隅，而是瞄准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他沉思着祖国和人类的命运。他不但大胆探索当时设为禁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而且探索希腊文明与中国史官文化的对比，以探索民主的目的和中国民主制度的必然趋势，他还探索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

在当时造神运动席卷全国，舆论一律，严禁独立思考的形势下，任何探索都被视为异端，都会招来大祸。南京有个名叫“探索者”的青年文学小组，其成员都被错划为右派。罪名就是“探索到资本主义那里去”。笔者曾在1956年的省级党代表大会上发表“发扬民主，独立思考”的意见，居然成为1957年把我错划为右派的重要“罪状”。个人的身家性命、得失荣辱，毕竟事小；而中国现代化建设白白延误二十多年，民族崛起的良机一再错过，凡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怎能不为之扼腕痛

惜，深沉思索!

对照顾准，深感惭愧，我缺乏他那种义无反顾的探索勇气，在农村劳动改造时，走上探索中医药这条避重就轻之路。而顾准却在两次被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之初爱妻自杀，子女与他断绝关系，孑然一身，极端孤苦的处境中，他的名字叫顾准，却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顾不准，硬是义无反顾地去顾那些可以招致杀身之祸的探索。何等坚毅的大无畏精神!

读近日迟发的《顾准日记》，这种义无反顾的探索精神跃然纸上，令人肃然敬佩，幡然自省。《天涯》杂志摘登的《顾准日记》，页码不多，日期零落，仅有 1959 年 20 天，1960 年 5 天，1970 年 1 天，1971 年 2 天。短短 28 篇日记，足以充分显示顾准在险恶处境中，从未停止他的艰苦卓绝的探索。

1959 年是“大跃进”浮夸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顾准在河南商城县劳动改造。由于长期提水提粪，他的左股骨下挫。当时已闹粮荒，劳动队三餐都吃红薯叶，吃得顾准泻肚。他在日记中专门记载他的服装和手的变化：手套、裤脚、大衣下摆都沾上大粪；手已经磨砺得“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经完全不适宜抚摸妻子孩子”。而精神上的折磨更加痛烈：“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顿，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就在这种不堪忍受的磨难中，顾准白天劳动，夜间还要奋笔疾书，写他的探索笔记，有时写到深夜 12 时。由于他生活在最低层，亲自尝到饥饿的痛苦，亲眼看到农民因饥饿浮肿而死亡（1959 年 12 月 17 日记载：劳动队在 9 月 10 月两个月有四十多人浮肿，11 月一个月就增加到七十多人浮肿），他一针见血地认为：口粮标准下降，强迫日夜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由此他已预见到，在农民饿病浮肿的情况下，强行大量发展畜牧，而且是大办集体大猪

场，用以达“气可鼓而不可泄的目的”，是注定行不通的。“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还可以观察一番。”

他从农村现状，看清了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在于公开说谎成风。明明是哀鸿遍野，却硬把灾荒报成丰收。只能遵守唯一的原则：根据上级规定的高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主观意图做调查，才不致被“拔白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在1960年1月9日的日记中，尖锐地批判“阶级斗争还有20年甚至50年”的谬论：“严重的是，现在的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而在这个斗争中，据说又要分别具有本位主义思想的干部，受影响的好农民，与真正的反动农民云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老田鼠，你掘得好啊！’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不幸真的被他言中，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骤起，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几位开国元帅，都成为必须斗倒斗臭的对象。

但是，由于独立沉思的科学探索，顾准没有在严酷形势下悲观绝望。而是充满信心地认定：“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他对自己的探索工作也信心百倍。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肆虐的年代，顾准无所畏惧地写下如下誓言：“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他在1970年元旦日记中说：“我决心在五七干校一面劳

动，一面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北京藏书，大体上已经利用过……使我眼界开阔到上下古今，……即使这些全部丧失，我也写得出东西来了。……一个人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顾准的自信告诉我们，真知灼见，来自用自己的心血去独立思考和科学探索，然后变成自己的血肉。生搬硬套书本的所谓理论，注解经卷式的所谓研究，人云亦云的看风顺势，只会离真理越走越远。

读罢《顾准日记》，禁不住掩卷沉思：斯人已逝，他遗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当被充分珍视。他那种义无反顾的探索精神，理应大大弘扬。

顾准的胆识风骨使我心折。我愿引用他弟弟陈敏之的话，来表达对这位卓越的探索者的敬仰之情：“如果认为做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陈敏之：《告别》，转引自《天涯》1997 年第 4 期。）

可以庆幸的是，邓小平同志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前，江泽民同志近来多次号召在改革开放中要大胆探索于后。这实在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之举。但愿大胆探索精神真正溶入所有领导干部的血脉，但愿一代又一代的科学探索者茁壮成长。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类幸甚。

1997 年 8 月 2 日于杭州塔影楼

（1997 年第 11 期）

傅白芦

昨日的一则故事

——一篇顾准遗作的抽换及其他

《顾准文集》出版后，在知识界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博得了不少发自内心的推崇。

有几位老友或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询问其中一篇文章曾在一家杂志被抽下的情况，因为我参加过这家杂志的筹办，并且作为总编辑们的助手，参与了每期杂志稿件的审读、编辑计划和组织实施的工作。老友垂询，理应如实奉陈。只是事隔多年，记忆恐难准确，好在手边存有当年的日记，记载虽很简略，倒也有助于为这件昨日发生的故事勾勒轮廓，尚望健在的知情者纠讹匡误。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杂志，在 1980 年 1 月正式创刊之前，出过一个“样本”，也就是“试刊”；它是 1979 年 8 月至 9 月初编就，10 月 6 日付印的；月

底印出 200 本，分送院部负责人和各研究所以及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所），征求意见。

这“样本”中，刊有顾准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文前，有个简短的介绍：

> 顾准，1916 年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组长等职。1974 年 11 月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
> 此文是 1973 年 6 月作者在被当作“专政对象”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这是可以讨论的。
>
> 本刊发表此文时，只对个别比较明显的错漏字句作了订正。

这个介绍，与其他 12 篇的介绍有所不同，说明了作者的死，他的写作条件，并希望引起讨论。

二、

编辑这个“样本”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还不足一年，解放思想起步未久，理论的探究比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农业的加快发展显得更为步履艰难。而杂志又刚刚创办。

在选稿过程中，张闻天遗作《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是备选稿件的一篇。它对那种急于过渡，总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甚至置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顾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正确的理论批判，这实际上是张闻天当时提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建议以及有关问题的论述的理论根据。读过这

篇文章的编辑们，都很想在创刊号上将它公开发表。但传来院部一位负责人的话，大意是，这篇文章争议很大，院刊刚创办，不宜抢先刊载，还是让《经济研究》发表为好。也就在“样本”将要编好之际的1979年8月25日和2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随即将它们编印成单行本；《经济研究》的1979年第10期，也就将《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公之于世，而198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仍未见将它辑录入内。

顾准的文稿，是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转介来的。在我的记忆中，不止于这一篇，好像还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等多篇。他的文章，博见中外文典，显现深阅世变，学术性甚浓而无老学究气，思想性颇强但无党八股味，且文字清新，写于“文革”中毫无“大字报语言”。读过它们的编辑大都叫好，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评价更高，认为展示出了作者的理论功底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于是选用了它。

三、

“样本”送出后不久，陆续收到不少的意见。有的在总体上表示赞赏，有的对学术文章的思想性表现出较高的要求；有的认为，刊登寿臻耄耋的老学者的论文如《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和《智骞“楚辞音”跋》，表明杂志对他们及其治学方法的尊重和肯定，是在事实上纠正“左”祸连绵中常见的“偏差”；有的觉得，过于冷僻的文章，不宜成为综合性刊物的选题；有的还对个别文章的论点、论据提出质疑……真是异议蜂起，使编辑人员深受教益。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遇险，则是始料未及的。院部的二把手认为，“应当抽下”。理由似乎是，党中央早已将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还有什么需要考证？编辑部内也有一人竭力拥护，坚决主张抽下。大家正犹豫中，时过两天，幸好院长胡乔木发了话。他不以为这篇考证应当抽下，他以为在党史研究中弄清一些还不清楚的问题，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册，被认为是对党的创建史研究中的一项不可多得的成果。

此时，对顾准遗作，还无人触及其去留问题。

四、

距离预定出版日期（1980年1月10日）只有半个月了。

1979年12月26日，院党组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样本”。杂志社总编辑黎澍本是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历史片”即多个历史研究所），因而就不必另邀负责人列席。晚上10时许，黎澍打来电话，说会议讨论热烈，乔木有较长发言，散会很迟；会议决定，抽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详情以后传达，速作补换稿件准备，以不影响按期出版为前提。由此开始了连续五晚四天的紧张工作。

院党组决定抽换稿件两篇，实际抽下的是三篇，加上了“书评”《一本值得重视的经济学著作——读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这是编辑部自己商定的。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一文，有不少篇幅与孙冶方商榷，认为孙的基本理论有很大偏差，虽然批驳了“价值工具论”，而自己主张的却也是“价值工具论”，云

云。“书评”则对孙把理论研究的焦点聚集在价值规律上，确认是重要的见地，因为经济体制中的不少缺陷，恰恰都和对价值规律的作用缺乏正确的充分的估计有关系。当时考虑，发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便于读者去作出自己的评价。现在，那一篇已经抽下，“书评”的发表就不是必要的了。

三篇稿件抽下，需换补八万多字，且牵动全盘布局，有关工作人员频繁往返于相距约 20 多公里的新华印刷厂与编辑部之间。29 日，乔木的秘书来电话询问进行情况；30 日上午，英文版（季刊）主持人赵一鹤还带病来到编辑部，商量英文稿件的换补问题。有意思的是，接替顾准遗作的，是顾准的老友骆耕漠所写的《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四种交换关系的分析》。

五、

12 月 30 日是星期天，下午仍不休息，黎澍主持召开编委会，传达院党组的意见，宣读了从院部办公室借来的乔木发言的记录稿。

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属于大政方针的，如指导的思想、执行的方针、坚持的原则、提倡的学风和文风、对发表文章的要求等等；二是涉及刊物特性的，比如，乔木就明确谈到：首先不要考虑看的人多少，而要着重考虑解决了什么重要的学术问题，只要确实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即使与当前现实问题没有直接联系，看的人很少也可以发表；三是关于两篇稿件的抽换。乔木在发言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谈的较多，他认为，作者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即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这个基本论点是不能接受的；文中有关经

济形态和经济规律的探讨，虽有不少很好的见解，但由于它的前提不能接受，就必然会影响它的公开发表。乔木进一步提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后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严重的失误，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不能够说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对顾准遗作，乔木谈的并不多。他认为，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能写出这样的读书笔记，很不容易；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要讲得很清楚，要做到根据可靠，论证周密，也是很困难的；顾准同志已经辞世，我们又不可能和他交换意见，请他补充修订，还是以调换其他稿件为宜。

就这样，本拟于1980年1月在北京发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发展》，一年多以后的1981年5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面世。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顾准的另一著作《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在又一年以后的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其时，我已调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历史编辑室的同事为它的问世，在校订、整理、核对外文中文引文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还写了颇为得体的出版说明。这才没有让陈敏之在“后记”中担心“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的忧虑成为事实，我也有幸成为它的较早读者之一。

讲完昨日发生的这则故事，不免要引起一些思索：

——解放思想到思想解放，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运动过程。现在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事，在十七八年前每每仍“习焉不察”，这大概也是个规律罢。

——一篇文章也许只是思想火花的一闪，一个文集却能够将火花聚结为光束。文集出版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此。

——从一篇遗作的抽换到众多遗作的结集出版，说明了历

史的进步。它是作为对历史灾难的补偿中的一个迟来的插曲。

——青年顾准在追求真理中接受真理，中年顾准又继续对真理的追求，直到 1974 年离开人间。他不足六十岁的短促一生虽则“历尽折磨”，但他却为人间留下了实在的不朽。

1997 年 8 月于长沙

（1997 年第 11 期）

汪澍白

反思历史还要反思自我

——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

《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以下简称《天道》）一书，颇为引人注目。此书封面虽印有“权延赤作品自选集”的字样，但封里“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却注明为“革命回忆录”。翻看内容，上集4章记述周惠1978年复出的经过和他在内蒙古的功业，其中又穿插了他的身世和早年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些故事情节。下集9章记述了周惠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又加上了毛泽东身边卫士在某些具体情节上的补充。合上下两集13章，基本上是周惠的一本口述自传，经权延赤等记录并加工整理成书。

在此以前，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已于1988年共同推出李锐作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李锐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庐山会议，并参与了文件起草和会议记录工作。后来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幸而保存了一些会议的原始记录，平反以后，他又作了一些补充调查，终于撰成《实录》一书，被海内学者奉为

信史。

周惠是作为湖南省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他在庐山曾经有一只脚踏上了“彭、黄、张、周”那只船。40年来人事沧桑，当年的风云人物零落略尽。周惠是幸存者之一，现在他还能打起精神追述当年所见所闻所感，并托人笔录成书。这对于人们从多方面来研究波谲云诡的庐山会议，自然是难得的史料。

不过，《天道》与《实录》的写法不同。其一，此书“尾语”自称为“一段长篇的夹叙夹议的散文纪事”。议论横生，带有反思历史的意味。其二，循名以责实，“天道”是一顶大而无当的帽子，庐山会议是背景材料，周惠才是全书的主角。显示出浓郁的个人色彩，但却缺乏自我反思。

就历史反思来看，书中第131页写道：

> 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他认识到毛泽东不是神，也有错误，而且说不得，更不能容许有隔阂的人说；而毛泽东又功高如山，在全党享有极高权威，在他面前，整个中央委员会都不得不屈从。这种带有封建特色的政治结构，必将导致独裁，则全党只能寄希望于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一旦他不英明不正确，则全党将在劫难逃，因为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可以挽救党和国家不走向歧路。

周惠通过他的切身经验，清醒地认识到个人迷信和独裁的危害，并公开发出从体制上进行结构改革的呼声，这是可贵的。此外，他还对毛泽东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施用权谋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见风转帆等消极现象，有所议论，这也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评议。其具体情节，此处不赘。

我想着重指出，反思历史与反思自我是互相联系的。反思

历史达到一定的深度，必然要反省和批判自我。同时，也只有敢于反省和批判自我，才会真正提高反思历史的深度。巴金的《随想录》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因为他在反思历史时，时时处处严于解剖自己。周扬在文艺界长期执行“左”的路线，整倒过不少人，但晚年在反思历史时，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察与悔悟，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周惠这本口述自传的致命弱点，恰恰是过多的自我吹嘘，而缺乏最起码的抚躬责己。此书第336页写道：“在内蒙古，在中央，大书几笔，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无愧此生。”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他会独独漏掉了在湖南的功业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回避。据我所知，他在湖南的确做了一些亏心事，最遭人非议的有两桩。

第一桩是1957年的反右。

周小舟是一个谦谦君子，言必有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他对中央关于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在学术文化领域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贯彻一直是积极认真的。待到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6月中，中共中央下达反击右派的指示，周小舟的思想就跟不上来。周惠却是得心应手，而且独到地把湖南反右的重点由党外推向党内，将矛头直指《新湖南报》编辑部。

原来《新湖南报》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李锐与朱九思分任该报社长与总编辑，报纸办得很出色。当时，周小舟是省委宣传部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报社看大样，同编辑部的人相处很好。两年以后，李、朱相继调离，由副社长邓钧洪与副总编辑苏辛涛主持工作。稍后，省委换班，周小舟受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惠为省委常务书记，并兼管报纸工作。周惠对邓钧洪说：“省委的指示和文章要登头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

周惠不仅要求自己的讲话和文章在版面上要特别突出，连他所主管的农村工作的经验与技术，也要在版面上压倒一切。邓钧洪对贯彻周惠的指示不积极，被调离。接着，周惠便将他在益阳地委书记任内看中的官剑平安排到报社当总编辑，官到任以后，曲意奉承周惠的指示，让版面上塞满指示、布告以及农业技术经验的报道，把一张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招致广大读者不满，编辑记者也感到十分苦闷。编委为此于 1956 年展开了关于办报方针的讨论。周惠为了给官剑平撑腰，先后安排书记处的李瑞山、胡继宗以及华国锋等领导人前来参加讨论。但李、胡持中立态度，华国锋一言未发，官剑平在社内依然十分孤立。周小舟强调："真理越辩越明。"主张把讨论继续下去。周惠却恨恨地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的问题，是一码事。"

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周惠认为机不可失，便动手拿《新湖南报》开刀。周小舟迫于形势，无力阻挡。他眼看编辑部那些熟悉的朋友，即将划入敌人的阵营，感到"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见《周小舟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 页。）于是，他急电中央请假去青岛养病，并举周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接手以后，便责令官剑平，将在 1956 年办报方针的争论和 1957 年整风鸣放中对自己的领导稍有不满者，一律打入另册。报社编辑记者 145 人，打出右派 54 人，占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党员与领导骨干在右派中的比例又特高。编委 10 人，除主持反右的总编辑官剑平与秘书长孟树德以外，其余 8 人，无一幸免。就这样挖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反党右派集团"！

"文化大革命"中揭批"走资派"，多属捕风捉影、诬蔑不实之词，但也不排除偶有歪打正着者。官剑平即是一例。他在历次运动中都依靠保护伞蒙混过关。到"文化大革命"时，失

去了保护伞，终于查明他早在30年代就追随“反共救国团”，打杀过共产党人。抗战时期，接受特务训练，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又伪造历史，混入中共党内，窃据要津。他填的履历表，姓名、籍贯、年龄、工作经历，全都是假的。只有性别一栏，男性是真的。官剑平的伪装剥开以后，新湖南报反右斗争的实质也就暴露得非常清楚：它不是左派打击右派，也不是所谓“反右扩大化”，而是一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帜下，由国民党人整肃共产党人的离奇冤案。据史料记载，1957年9月8日下午3时，周惠在蓉园1号楼代表湖南省委向毛泽东汇报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湖南日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主党派、高等院校。”（见《1953～1975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8页。）为什么当年敢于以制造“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一案向中央主席邀功，今日在口述自传中却对此只字不提？

第二桩是1959年的反右倾。

庐山会议从反“左”转向反右时，毛泽东要狠狠打击的是彭德怀。对在庐山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的所谓“湖南帮”，包括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则极意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但经过多次劝说，只挖过来一个周惠。毛泽东最关切的是周小舟，专送丘迟《与陈伯之书》给他读，望其“迷途知返，不远而复”。不料周小舟毫不动心。原来他早在1959年5月从湘西考察归来，亲眼见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给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便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决心向毛泽东披肝沥胆进忠言。（见杨第甫《吹尽狂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庐山进谏失败之后，他做好了成仁取义的准备，并一再向周惠“托孤”。

《天道》第49页描绘下山以后的周惠：

> 张平化接周小舟的班，他在职务上留任一年，这是稳定局势的需要。账迟早还要算，但没有料到清算得如此厉害，株连二万多干部落马，甚至被抓。当初下山，周小舟向他‘托孤’，惹他放声大哭，痛哭一场。

这段话歪曲事实真相，亟待澄清。第一，湖南的反右倾搞得最为凶狠，“株连二万多干部落马”是实，但事情并不是发生在 1960 年周惠下台的时候，而是发生在 1959 年庐山会议结束，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大抓反右倾的时候。第二，周小舟的确曾向周惠“托孤”，但他的回应却是以追穷寇的精神穷追狠斗周小舟。湖南的老人知情者甚多，此处且举邓钧洪与王宁的话作证。

据邓钧洪说：1959 年周惠从庐山回来，便派省公安厅长李强等进驻报社，召回“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还开出一个嫌疑犯 17 人名单，叫一并检举揭发。周惠并亲自到场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剑平）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说到得意之时，他索性用双脚蹬在沙发上说：“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见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1989 年第 6 期）挖墙脚的手法，自然是得之于庐山的口授心传。但其表演的姿态，却又活现出周惠个人所独具的特色。

周小舟落难以后，我还有幸与他作过一夕谈。1960 年春，

我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洞庭湖畔的国营千山红农场。1962年秋，我代表这个农场赴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趁机去梅花村拜望了当时已从浏阳大瑶公社上调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的周小舟及夫人王宁。（解放初期，王宁与我都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小舟说，1959年党群战线大张旗鼓地批斗我，省委机关出动很多车辆，会上发生对抗，他当天就得知信息，深为担心。王宁则说，周惠从庐山回来就翻脸，落井下石，多方加罪于小舟。小舟忍无可忍，只好向中央派来的张磐石（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反映周惠的情况。于是，到1960年，周惠也被清算。这就是《天道》所说的“走麦城”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读《天道》一书，不免勾起对一些往事和故人的怀念，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特别是周小舟与周惠，同是昔日湖南省委的老领导，又同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但两人在狂风浊浪中的表现却大相径庭，“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

（1997年第12期）

胡绩伟

宝塔山上的徘徊

每当我想起延安，《延安颂》这首歌总是脱口而出。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我反复地吟唱着：“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今年4月21日，正是49年前（1948年）光复延安的喜庆日子，我回到了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的延安。

一个81岁的老叟，再一次登上了宝塔山，我的心绪仍然像当年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那样无比兴奋，无比激动，仿佛全身充溢着精气神儿，憧憬着展翅高飞、翱翔蓝天的未来。

站在一千一百多米高的宝塔山上俯视延安，一个新型的现代城市展现在眼前。如果不是置身于宝塔山上，一时间很难辨认：这就是曾经养育我锤炼我的母亲——延安吗？

一、

1939年11月，我奉党组织之命，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成

都，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开始了我人生旅途中长达9年的延安报人生涯。当时的延安，只不过是一座被群山环抱、流淌着一条小河的小城。从全国各地涌来了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在这里从事抗日救国斗争。青年人在一天的工作、学习之余，当夕阳辉耀着山头塔影的时刻，大都走向延河两岸的河滩，散步谈心。人们褒贬时局，指点江山，谈笑风生，引吭高歌；也有不少情侣，悄声细语，谈情说爱。而今的延安景色完全变了。延河两岸新建了两条宽阔的大街，竖起了鳞次栉比的高楼新宇；在狭窄的河谷两旁，筑起了高高的河堤；在宽广的河滩，开辟成满布塑料大棚的菜园。当年人们只能踩着石头涉水而过的延河，如今已架起了三座大桥，车如流水马如龙。当夜幕降临，桥上的灯火宛若一条辉耀着金光的巨龙，在延河上空遨游。萤火虫闪烁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

1949年5月，西安解放。6月，我奉命离开延安，去西安继续担任《群众日报》的总编辑。当我向宝塔山告别时，我们敬仰的宝塔已被蒋军破坏得遍体鳞伤，令人目不忍睹。如今，这座八角九层的唐代古塔，已经修补得更加完好。塔基的四周浇注了混凝土的地坪，整个山体修建了很多护坡，公路可以直达山顶。50年代，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宝塔山公园。1956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延安主持召开了西北五省区的青年造林大会，动员全国各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在山上植树种草；耀邦同志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号召各省参观团在山顶种植纪念林。如今环抱宝塔的山峦郁郁葱葱，松柏苍翠，野花竞开。44米高的宝塔矗立山顶，显得更加庄严雄伟，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在宝塔山上，我久久不愿离去。下山之前，我又沿着环山的甬道慢慢地徘徊了一圈。边走、边看、边想，不时地停下来凭栏远眺，一幅幅历史画卷在眼前闪过，一缕缕暮年的遐思，

引起无限惆怅。

二、

人们说："延安起飞了！"我眼前的延安，的确在起飞。

从西安到延安的铁路，1992年就正式通车了。33万伏的变电工程已经建成使用。1920路的光缆通信工程也全线开通了。这次，我们乘坐一辆道奇越野车，在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奔驰。铜川以南是高速公路，铜川以北是二级公路，路面平坦，畅行无阻。沿途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队油罐车穿梭往来。延安地区新建了两座新型炼油厂，当年原始开采的小油田不仅在生产技术上已经更新换代，而且产量大增，年产原油150万吨。石油、煤炭、卷烟、电力四大支柱产业是促使延安起飞的动力。我们到达延安时，陕西省正在这里召开全省农村三通现场会，延安已经成为村村通电、通公路、通电话的先进地区了。

延安市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尽管延安市有如此大的变化，但同全国各先进省份相比，延安地区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贫困地区。全区13个县，还有8个县没有摘掉贫困的帽子，有百分之四十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为此，我特地回到我当时经常去的南郊（现在叫宝塔区）柳林乡吴家枣园村看了看。这里是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著名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家乡。1943年，毛主席发动大生产运动时，号召在全国各解放区开展学习"吴满有运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多次发表过吴满有的模范事迹，还发表过题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表彰劳动英雄模范大会上，吴满有是边区第一名特等劳动英雄，边区政府给他颁发了特等劳动英雄的荣誉奖状。我当时作

为《边区群众报》的主编，经常到吴家枣园去蹲点采访。毛主席还派他的刚从苏联回来的儿子毛岸英，特地背了一袋小米去拜吴满有为师，在那里上了半年的“劳动大学”。那时，吴家枣园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村，是丰衣足食的典型。

吴满有早已于1959年去世了。时隔五十多年吴家枣园的面貌变化不大，吴满有的后代早已离开了吴家枣园，他住过的旧窑洞已坍塌。在他侄儿的土窑洞里，我坐了一会，同一位了解吴满有的老农谈了谈。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农说，现在粮食多了，吃得好了，穿得也好了，很多土窑洞改为砖石窑洞了，每个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千元左右，手头比以前松动多了。从老农的话语中，我感到了农民对生活的满意、知足，可是以我所看到的，却深感不足和歉疚。吴满有侄子的窑洞里仅有的几件简单的家具已很破旧，木椅子、木板箱，连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也没有。看得出来，这个原来相当富裕的村子，45年后还没有进入现代农村的行列。

这当然不是延安地区的独特现象，整个中国都曾被卷入1958年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1960～1962年三年大灾荒的破坏之中，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延安当然也逃不脱这场全民族的大浩劫。现在延安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开始起飞，还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改革开放的结果。

50年前，延安是党中央的首府，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民主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是十几个解放区中的模范解放区。在全国解放四十多年以后，为什么还是贫困地区呢？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徘徊思索。

宝塔山的石碑上，篆刻着明弘治年间延安知府李延寿的诗，诗中有两句：“斑鬓莫嗟随日改，黄花犹似去年香。”这诗句引起我对“去年黄花”的眷恋。1942年，蒋介石又一次发

动了反共高潮，除了军事围剿，又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陕甘宁边区军民。毛主席号召开展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国各解放区在延安的带动下，都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山坡上开荒种地，院子里捻线纺纱。“四三年那么嗬嘿，大生产那么嗬嘿，边区的男男女女稀哩哩哩哗啦啦啦嗦罗罗罗台，齐动员那么嗬嘿。”大生产的歌声此起彼伏，热闹欢腾。记得有一次我们送粪上山，《边区群众报》的一些秀才们从山下到山上排成一字长蛇阵，我和两位同志卷起裤腿，跳进茅坑，一脸盆一脸盆地往外掏那些稀糊糊臭哄哄的粪汤，然后像接力赛一样，一个传一个地传送到山坡上。送上一盆，我们就大叫：“一盆红烧肉来了！”“一盆油炸丸子来了！”大家边劳动边唱歌边开玩笑。边区老乡称赞我们真是干得热火朝天。我还自己动手织了一件粗线毛衣，胸前织了一个大红五星，又套织上四个白色大字：“自己动手”。可惜这件毛衣后来在延安保卫战中丢掉了，如果能保存到今天，那真是一件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宝贵纪念品。

三、

从宝塔山眺望，延安城南新建了一个很大的圆形建筑，银色的屋顶亮晶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十分引人注目。延安日报社的同志说：“那是新建的体育馆，还有室内游泳池。”在我记忆中，那里是原来练兵的南校场，是延安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记得1940年2月1日，我刚到延安一个多月，边区政府在南校场召开了一次3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声讨汪精卫卖国求荣。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听到他讲话。他在大会上作了《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用很形象生动的语言对比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不同，概括

解放区有十大特点。他说：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注：指不抗日打内战的人），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

也恰恰是在这之前，毛泽东1月4日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郑重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我一到延安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这一伟大著作。我同全国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当时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投奔延安，之所以对毛泽东、对共产党那样佩服，那样倾倒，就是因为当时党所提倡、所力行、所推动、所追求的，正是新民主主义。当时我虽然已是入党三年的共产党员，老实说，我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懂得什么，当时我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

当年，毛泽东和我们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主义。它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各种主义百家争鸣，这种国家独立和社会自由、平等、民主、富裕的前景，是多么令人神往啊！万万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把新民主主义作为反动理论来批判，把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成反革命来永远开除出党。而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想入非非的社会主义，还要赶在苏联之前建成幻想中的社会主义，然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想呀想，我的眼前忽然出现大跃进的狂热、三年困难的饥荒、“文化大革命”的残暴，以及一场一场政治运动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我的眼睛昏花了，头有些晕眩，我立刻紧紧抓住山边的铁围栏，镇静下来，定一下神，才摆脱了沉痛的心

境。

四、

宝塔山从下到上都留有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遗迹。山下有他手书的三个隶体大字“嘉岭山”和字迹已很模糊的“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题字。半山上，在原来“嘉岭书院”（又称“范公书院”）的遗址上又建起了新书院。范仲淹为官一生，不顾个人安危，屡屡犯颜直谏，多次受到“圣上”的贬谪。宋仁宗时范仲淹任陕西转运使。在国家危急关头，他自请兼任延州知州，来到与西夏作战的主战场——延安。他在延安地区屯田养兵。团结边民，整军抗敌，兴办教育，爱民如子。山上还有歌颂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石刻，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是中华民族魂的体现。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些基本措施，正是本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的。记得抗战胜利前的1944年初，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过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指示《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来学习。11月，毛主席还特地给郭老写了一封信，提出我们一定要吸取李自成建立大顺皇朝称帝以后失败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指出，“小胜即骄，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当时大家学习，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大胜更骄傲”以及领导层争权夺利和腐化堕落。

可惜，我们一进北京，也开始骄傲起来，忘掉了“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央机关首先住进皇家禁苑中南海，一些领导人开始了脱离群众的优异生活。

宝塔山的石碑上还刻有诗人陈毅元帅的《延安宝塔歌》，

歌词中有这样几句："延安有宝塔，巍峨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塔脚宽且厚，塔腰亦粗壮。方知塔尖高，群砖任鼎扛。塔尖无塔脚，实在难想象。……"令人不胜感慨的是，陈老总歌颂当时党的领导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基础上的至理名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渐渐被一些人置之脑后了。

当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宝塔山时，兴奋的心情被思绪冲淡了。

1997年5月9日

(1997年第8期)

邵燕祥

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发动到 1976 年结束，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史最后宣告它以总体的失败告终。

那么，先它九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伟大胜利”呢？

在 1957 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 1958 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 53 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 53 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 500 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经过批判、斗争、处分，已经赶出了历史舞台，分别到各种基层单位接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控制使用；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孤立，在知识分子中间更不用说在工人农民面前，是“反面教员”，谈不到什么政治影响了。右派以外的广大知

识分子，也都按照运动部署，向党“交心”表白从此对党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两条心”。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毛泽东当时就是这样估计的：“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他说，“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后，毛泽东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一贯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资本家们（甚至扩大到若干小业主）尽管未必情愿，但还是在锣鼓声中交出自己的资产，接受赎买政策，迎接了“公方代表”。他们一般表现得听话，守规矩。在国内，被认为还有资本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就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自恃有知识，而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政治影响是不能像浮财和生产资料那样没收的。这样，知识界便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

反右派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党组织并主要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当然，矛头首先针对右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但被叫作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之同样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无庸置疑的。把中间派同右派加以某些区别，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

决策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是怎样估计的呢？

周恩来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

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分子、中间分子，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不是敌我问题。其中的落后分子也还不等于反革命。

毛泽东在 1957 年春则抛弃了进步、中间、落后的概念，采用左中右的划分。3 月中旬，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种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 500 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 500 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到 5 月中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敌情的估计也向严重方面变化：“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后来划定 53 万右派分子，占 500 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大约就是从这里来的。

毛泽东在是否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两条以外，又提出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标准。他说：“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这就是说，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左派中间，

除了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还有百分之几的左派也许并不那么熟悉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不要紧，毛泽东在40年代就曾指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党的八大（1956）时党员总数是七大（1945）时的9倍，按比例增长，有一千个到二千个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就已经够用。现在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以至七八十万党内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左派，难道还不足以掌握反右派斗争的发展，保证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吗？

正是在反右派斗争节节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全党全国推向1958年的大跃进。他在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上，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已经是针对高层的不同意见的批评。而与全国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则是他提出并在后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认可的关于"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看来资产阶级右派属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些侥幸没有划归右派的知识分子，也确定无疑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从理论上说，这是不以经济地位（是否有剥削，剥削量大小）、服务对象（是否为新政权服务），而以家庭出身、教育状况和世界观（是否已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即是否接受并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根据，

所谓世界观则要进一步落实到现实政治态度——是否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每一项具体现行政策以至每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干部。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和人际关系中，知识界除了出现少数政治贵族以外，右派固然是政治贱民，广大的一般知识分子被称为中间派的也自然成了二等公民；就连左派中的许多人，不能因缘时会、见风转舵、虚夸欺瞒的，也难免往往陷于困惑和惶恐中。

从 1958 年开始揭橥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一个短暂的狂热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破坏，哀鸿遍野。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危及亿万人民生存的失败。这个失败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有没有一些因果上的关联呢？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自己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他承认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各次政治运动都没有“解决问题”。他要解决的依然是如他所说，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坚持他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因此他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还应该七八年又来一次，不断地搞下去。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反右派以前党与知识分子，党与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的关系中逐渐积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再加上国际国内许多因素（包括某些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引起了 1957 年春夏之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及时地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实现了酝酿有年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反右派斗争是历次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政治运动（在两次运动之间则是党的政治工作）的狂飙式的继续。毛泽

东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那就不仅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常态的继续，而终于形成一场毁灭性的民族灾难，直接株连的受害者达到1亿人，还不说因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而影响生计的更多的人们。知识分子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唯一的内容，但从“五·一六通知”的指向，缺口的打开，“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倡导和实施，到实行对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在在又都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

如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实验，如果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过去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强调反右派斗争当时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的高度看，即使不说它如“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一次一时看来似乎胜利而长远看来是事与愿违的实验，不说它给知识分子、给文化建设、给国家民族以至给中国共产党导致一系列恶果，也应该指出，后来实践证明，其发动者毛泽东也认为它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不能算作是胜利。

而如上所述，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右派斗争的失败者。

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我的湖南籍朋友，在划为右派分子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仍然坚持鲁迅研究，卓然有成，进而染指现代史研究的朱正，毅然担当了这项工程。他不以曾沦为失败者而自馁，由春及秋，卜昼卜夜，孜孜矻矻，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这是真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著者嘱为序，我借此机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不成熟的看法，附随宏篇，一起请各方面读者教正。

1993 年 12 月 26 日

（1997 年第 5 期）

曾伯炎

文化怪胎——大字报

弄不懂大字报是什么的小伙子，跑来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得准确些，便翻开汉语辞典去查，没有，再搜索那本新出的《辞海》，也没有。这几十年，社会生活出现的许多新语汇，这些辞书辞典，都收了，这么风流风行一时的名词，竟遗漏了，真奇怪。它在这片大陆上存在的时间，也非一现之昙花，甚至最高领袖，也写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哩！当年满街满巷乃至商店里，大字报多得胜过今日铺天盖地的广告。

没有权威的解释，只好以自己一家之言代替，我问他，知道海湾战争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吧？见过电影里卡秋莎大炮的发射吧？大字报也有那种威力，1957 年便全面使用过，中弹的虽不都丧命，却毫不例外地都丧失政治生命，打在身上的成了烙印，叫“右派”。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这种武器，就更厉害了，颇像武器库中的 B_{52}轰炸机进行地毯式轰炸，挨炸的，即便不像老舍、傅雷、吴晗、邓拓那样死于非命，也会害一种近乎癌的病，病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称“走

资派”的，称“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多达几十种。但是，有罹祸的，必有得福的；我说，今天，你们年轻人只知道彩票中彩，就是漂亮汽车，不知当年争写大字报同今天抢购彩票一样，也有中彩的。那时，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便可走红到中央委员行列，甚至置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宝座哩！

没想到，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20周年，与“文化大革命”“共荣”的大字报，后生就莫名其妙了。后世治史者，避得开吗？古代的《尚书》，失传千年，还有孔子及其弟子收集整理，让后人依稀可见古代的社会形态。已故学者顾准先生，不是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发掘到今天直接的民主选举制的渊源吗？可以肯定，大字报具有文物价值，决不逊于骊山下发掘的秦俑。听说北美西欧不少名牌大学，开设“文化大革命”课程，大字报，肯定也在讲授，或许就是硕士博士的论文题目，就像今天，我们能在哥伦比亚大学查出80年前胡适先生的博士论文一样；再过80年，论“文化大革命”大字报的博士硕士论文，准会让我们的曾孙玄孙们大开眼界，决难消亡。

也许有人奇怪，怎么，你把大字报这种笔墨产品，形容成武器了，开除在文化范畴之外，合适吗？不仅我，也是同时代的人深有体会，这种笔墨制作的大字报一出世，就不“文”化而十分“武”化；咱们的辞汇里，历来便有“刀笔”一词，意指笔可锋利如刀，害人性命。甚至代人作文，也称“捉刀”，笔与刀相通，可能是中国特色，当年这笔杆子完全是代替枪杆子作用的。尽管，它是以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然后上纲上线为能事，却是鼓动着“横扫”的风，充作“砸烂”的拳，还泼着污秽的水，陷人以阱，屈人以威，目的是口诛笔伐，把人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不允许动弹，更不允许翻身，较之真枪实弹的或古代真刀真戈的战争，还厉害。战争够残酷

了，还讲不虐杀俘虏，中国古代的战争，还有“不擒二毛”的规矩，即追杀敌人，发现斑白头发的敌人，也放他一条生路。被做了大字报攻击的靶子，即使你是吴宓教授那样的白发老人，也决不手软；你是陈寅恪那样的盲人院士，也不放过，还不够武化吗？

就大字报这种文体看，它的公式化与八股化，也是一种痞气加杀气的畸形退化。科举时代的八股文，还讲逻辑。以往反对过的党八股，排列地陈述，也还继承了中医开药方招数。而这种新八股的大字报，必是以语录开篇，形势大好起兴，然后笔头一转，抓住被声讨者的只言片语，以断章取义法，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攫住一字，不管其意，或偷换其概念，或张冠李戴，或对号入座，便“金猴奋起千钧棒”，对被批判者进行精神强奸，稍有辩解，随之而来是拳脚交加的“革命行动”了。称为文攻，实为武斗之铺垫耳。今日脂粉生产很发达，人们爱美，求之脂粉，其实，当年风行的大字报，何尝不是一种脂粉？那种趋之若鹜的盛况，不少人认为，这种笔墨脂粉一抹上，便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时髦，甚至某单位有过这样的笑话，一张大字报出笼，人们争着去签名附和，某人提笔也要签名，别人好意劝阻也不理睬，签了名贴出一看，全篇是攻击他的。这种笑话，惜乎刘继昆在香港编的那本《文革大笑话》未收。而大字报现象，今后谁写中国化妆品史时，似不该遗漏。

说大字报具有脂粉功效，却不仅此，还是多功能的。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大字报常常以审判官的面目神气十足。它几乎天天在宣布政治死刑，如宣布的是徒刑，就打入牛棚，让专案组来纠缠了，它使成千上万的人，都过了一次法官瘾。其次，大字报使不少以打小报告为业的人，一贯采取隐秘地递条陈，鬼鬼祟祟弄挑拨，也有一种公开化的渠道，使背靠背的诋

毁，显得窝囊；令面对面的污蔑，变得飞扬。至于大字报这种文体文风，可载入文学史，因其独具假、大、空文风之盛，就其破坏性与中唐韩文那种“文起八代之衰”的建设性，堪称对峙反义的两大高潮矣。那种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痞气与霸气混合、卑劣充高尚横行、异化人性、扭曲灵魂，登峰造极矣。难怪“文化大革命”后流行着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致使今日社会安定后，人们才逐渐醒悟到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之艰辛了。

而且，这种假大空文风，既影响到文学、艺术，也影响到应用文，乃至一代及下一代的行文。许多报刊文字，不少社论，当年就是大字报的翻版；至今，还有脱不掉大字报韵味的。当年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不是放大扩充的一张大字报吗？死了二千多年的孔丘，挨的大字报不少，甚至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多夫》，也逃不掉大字报的声讨，虽然声讨者未必读过他的著作。更可笑的是，对爱因斯坦这种科学权威，不仅未读其相对论，就是读它也读不懂的人，也在用大字报批判哩！学风、文风败坏，亘古未有。这么“精彩”的历史，才 20 年，便不为后生知晓，可乎？不妨在此为出版家贡献一个创意：谁出版一部《中国大字报选粹》，准有文献价值，与孔子整理《尚书》，郑玄辑注古文经说与今文经说齐功吧？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拨乱反正以后，尤其大讲实事求是，大字报已绝种，何必对它耿耿？不然！不久前，北京邵燕祥兄在谈到某评论家时，还感叹说，此人就是水平提不高，著文还是大字报水平。就在我眼前某位“左”派作家，1989 年又冒出来进行声讨，文章写出，给他读过研究生的儿子过目，儿子悄悄对旁人说，我老爸的文章，还是写得活像大字报。大字报魂还在，仍未绝种呵！

是的，大字报确乎是历史了。历史是哲学，又是科学，它的出现与存在，可以罔顾乎？已故萧伯纳有句话说得很精彩，他说："黑格尔曾说过，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嘿！这话真是击中要害。"愿喜欢对历史害健忘症与恐惧症者，深思之。

（1996年第8期）

谌 震

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

——康有为张元济之比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即光绪皇帝宣布“明定国是”的第六天，他在颐和园单独召见两名主事——康有为和张元济。主事相当于后来中央各部的科员，正六品，与内阁中书（从七品）同为起码的京官，按照清廷的老例，四品以上官员才有被皇帝召见的资格。光绪很早就想召见康有为，一再为王公大臣照例拦阻，未能如愿。这次他是决心破例了，在康有为之外，还加上个张元济。这两位都是近代中国文化界的伟人，当时都主张维新，但个性不同，修养不同，他们的作为和成就更大不相同。比较一下他们之间的同异，可能有所启发。

康有为（1858～1927）大名鼎鼎，他从1888年起，到这次召见，在10年间做了几件大事：一是首倡变法；二是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古代的大改革家，借孔子的招牌推动改革；三是发动“公车上书”，冲破了清廷严禁“士人干政”的罗网，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感。这些都

是需要大智大勇才做得出来的，因此他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当时声震中外，身后光照史册。他曾四次上书光绪，把变法的希望寄托于皇帝，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无可厚非。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康有为一介书生，手无寸铁，他不找皇帝又找谁呢？何况，向皇帝上书，在当时正是向全国宣传自己主张的一种有效方式。不过康有为太迷信皇帝的权威了，以为只要光绪宣布变法，广开言路，即刻“天下雷动，期望太平；外国变色，束手受约”。实在把变法也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因此，他对这次召见，简直是感激涕零，兴奋异常，以后短短3个月中，连上许多奏折，恨不得立刻使中国面貌全新，却不顾慈禧已在那里磨刀霍霍。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为之耽心，“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以为险在眉睫。我们不妨说，到光绪召见时为止，康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活动，已是顶峰了。此后立宪派的活动，主要是靠的梁启超，康已作为甚少，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却以清室遗民自命，甚至参加了张勋复辟那场闹剧，未免太糟蹋自己了。少年开风气，晚年开倒车，令人惋惜，也发人深省。

张元济（1867～1959）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对中国文化有伟大贡献，但他的声名远不如康有为之显赫。他比康早3年中进士，参加过爱国志士们在陶然亭的集会，总觉得空言无补，于是放下翰林公的架子，邀请几位京官，学ABC，学x+y。居然颇见成效，吸引了一批子弟参加，不声不响，在北京这个顽固堡垒中办起了一个以英语算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同是开通风气，康从大处着手，张从小处着手，却都引起了光绪的注意。召见之后，张曾劝康及早出京，因为在他看来，光绪既已下令废除八股，那么，单就这一点来说，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那就不知道需要多少仁人志士做艰苦的努力。

后来的史家多只记述光绪召见康有为，而不提张元济；政变之后，张也只得到革职的处分。他却因祸得福，从此摆脱官场，南下上海，从事他自己所向往而又为中国所急需的事业。起先，他因李鸿章、盛宣怀之助，先后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译书院院长和监督（校长），曾有所建树，但因美籍顾问福开森专横跋扈，愤而辞职，遂于 1901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商务是个民营的小书局，由七户股东凑集 3700 银元办起来的。老板夏瑞芳和股东们都是亲戚，都是基督徒，他们沾了教会的光，半工半读，学到先进的印刷技术。他们又受尽外国人的气，决心为国家争口气。因此他们爽快地答应张元济的要求，以“扶助教育”为宗旨，由张主持编译所。一位曾受皇帝召见的翰林又曾当过大学校长的人，却甘愿到一所小书局去与平民合作，一再拒绝高官厚禄的邀请，这又可见张元济的远见卓识。他曾答复友人，说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小学教科书，比起做官，“终日在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其实，岂止高出一层？一个是腐败的封建官僚机构，一个是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张元济凭借后者，在半个世纪中做了古代许多学者当代许多大官们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事业。尽管中国在这期间经过无数次变乱、由皇帝变成总统再变成“执政”、“主席”、“委员长”等等，商务印书馆还是因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巍然屹立，至今还同时存在于海峡两岸。

张元济究竟对中国文化有哪些贡献呢？这里只能简略地举出三点：

第一是在教育方面。本世纪初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只是迫于时势，一纸空文。学校怎样办？课本怎样编？教师哪里来？全没有底。而张元济却邀集杜亚泉、高梦旦等进步学者，聘请日本顾问，反复推敲，编出一套套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教科书，不但自然科学和外语课本是新的，连语文、历史、修身课

本也是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又都配有教授法，学生欢迎，教师更可边学边教。这样，商务的教科书立刻风行全国，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已有 6 万所学校、146 万学生使用（1909 年统计)。反过来，学校的发展又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兴旺。1906 年，商务的资本已达 40 万银元，为初创时的百倍，1932 年被日本侵略者烧毁时，仅是损失的资产便有 1633 万银元，为初创时的 4 万倍，遍布全国各省的分馆尚不在内。20 世纪前期近 50 年中，全国千千万万大中小学生几乎全都读过商务的课本，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人才，这项贡献又岂是金钱所能估算的？

第二是新文化方面。这可分三个时期来说：初期以翻译为主，严复译的八种西方名著，林纾译的百多种外国小说，都是当时译得最好影响最大的，全由商务出版。接着是出版期刊和工具书。商务出版的大型辞书如《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以及各种外文字典和专科词典，不知便利了多少学者和学生。而商务先后出版的 19 种期刊，就学科来说，包括哲学、经济学、文学、自然科学等等，就读者对象来说，包括教师、学生、儿童、妇女等等，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五四以后，则对新文化运动大力支持，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其中有《马克思研究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等等，尤其是《小说月报》改由茅盾主编，历时 11 年，对新文艺的贡献极大，凡是“五四”以来的老作家、老翻译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为了出版好书，商务对于学者和作家的支持也是十分慷慨的。例如清末一般译稿是每千字稿费 2 元，而商务付给林纾的稿费 3 倍于此。对严复的《社会通诠》，则按书价付给 40%的版税，那就远不止 3 倍了。相形之下，现在某些出版家能无愧色？

第三在古籍方面。从 1906 年起，商务每年就拨出数万元

以至十几万元购书，并且取得一些专家学者如傅增湘、缪荃孙等的协助，搜罗了几万册珍本善本，建立了藏书约46万册的东方图书馆。试问从清末到民国，有哪个政府、哪个学校有如此热心，如此气魄？商务还用各种方式出版古籍，如对青年学生，有《国学小丛书》，由名家选注经史和诗文；对学者，有供研究用的《国学基本丛书》，选印的都是清人近人的精校精注本；而贡献最大的是《四部备要》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前者包括477种古籍，3112册，都选用最好的古版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选用现存的最佳的古刻本拼缀影印而成。这样就使历代为皇宫富室所藏的珍本秘籍化为千万册流入寻常百姓之家，既便于学者研究和欣赏，更不怕再遭兵火之劫。自唐宋发明印刷术以来，历代很有一些藏书家热心刻书，但因财力和技术所限，规模都小得很，直到张元济主持商务以来，才能凭借雄厚的财力、现代的组织和技术，加上他个人的学识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三四十年中空前大规模地抢救、校勘和影印古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元济是保护我国古代典籍的一大功臣，而他的日记、书信和随笔等等，又都是目录学和校勘学的重要文献，为后人整理古籍研究古籍的导师。张元济主持商务历40年之久，出书在1万种以上，如果他要同其继任者王云五一样好名，也可以在每本书上加印"张元济主编"五字，决不难做到家喻户晓；但他始终保持谦恭的美德，即使像《四部备要》、《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样的大部头，是由他亲自策划、亲手校勘和十几年之努力才完成的，也不肯署名。其实，论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决不亚于康有为的。至于在个人的品德和思想方面，那就远超过康。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困居上海孤岛，年近八十，不得已卖字为生，仍然横眉冷对汉奸政府中的权要，拒不下笔；1948年又曾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表反对内战的言论。1949年9月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他是政

协代表中唯一见过光绪又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蒋介石又见到毛泽东的老人，他一生都随着时代前进。

把康有为和张元济相比较，可以看到，两人虽同时主张变法维新，但在康有为身上较多地保存着中国封建社会文人的旧习气，而张元济则更多地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务实精神。康有为还保持古代文人那个老传统，不论其如何叱咤风云，归根结蒂还是把自己附属于帝王，因此他长于议论而短于实际，亲近上层而脱离人民；张元济则已断然摆脱了中国古代文人那个依附帝王的旧框架，他宁肯远离政府而保持自己和企业的独立人格，认定一项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事业，就满怀信心、不畏艰苦、脚踏实地一步步前进，终于能够集合全社会的心力而成就其伟大的目标。在20世纪前半截，中国颇有一些先驱者如张謇、张伯苓等等，都走的这条路，不过其中有的人还未能完全忘情于政治，有时也就未免沾泥带水而已。

在我读到的三本张元济传记中，有一本题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我觉得这句话很能说明张元济的性格和贡献。显然在未来的21世纪中，中国需要有更多的集中西文化优点于一身的张元济式的人物。

附注：本文参考：(1)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于整理出版古籍部分特详。(2)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巴蜀书社1985年版。(3) 董进泉、陈梦雄：《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收入《中国大资本家传》第9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996年第1期)

李 新

话说孔子

——兼论现代化与孔子势不两立

一、

中国在二千五百年前出了一个孔子，与当时全人类文化的水平相比较，这确是华夏的光荣。他的学问、文章和道德，特别是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都是值得称赞的。他的影响之广之深，实在令人惊叹。后世尊崇他为大成至圣先师，绝非偶然。

二、

孔子思想的中心在于"入世"，他对世界的本体不甚注意。因此他的哲学多半是关于政治和伦理方面的。"礼"是他的政治思想之中心，"复周礼"是他的政治理想、政治目的和政治纲领。"仁"是他的伦理思想之中心，他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他的政治思想是

礼，而且想复周礼，他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不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他虽周游列国而不能行其道。但是他的伦理理想，他关于仁的许多论述，很有价值，是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一种贡献，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精华。

三、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农业经济和家庭制度成为社会生活的支柱，孔子那一套思想学说与它很适应。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延长其统治寿命，需要施仁政，弃暴政；封建社会的人民，也希望出现施仁政的圣明天子，而反对暴虐无道的昏君。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使汉刘的统治能延续数百年，成为周以后最长的王朝，证明孔子学说在封建社会确有强盛的生命力。

汉以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都曾经盛行过一个时期。宋儒吸收了一些佛家、道家（主要是佛家）的思想而形成他们的理学。理学发展了孔学，不仅体系更完整，而且把纲常搞得更细密，加上科举、仕途都要依靠孔学，于是孔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更加根深蒂固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四、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孔学相对立的思想也开始发展起来，康梁的维新派因为要保皇，所以不反孔，康有为甚至以当今的圣人自居，但梁启超的“新民”则很难说是孔子之徒了。孙中山革命派要推翻帝制，建立“合众国”式的民主制度，当然要反对孔子那一套忠君报国思想。但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革命派没有对孔学进行深入的批判。清朝被推

翻，共和国的招牌也挂上了，但继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复辟。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要为辛亥革命补课而产生的。它提倡的是科学与民主，要打倒的就是孔家店。可见孔子思想正是当时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无形的巨大绊脚石。反对孔子思想，以反对“孝”为最尖锐，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孝”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根本，“百行孝为先”，忠不过是孝的扩大和延伸而已。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家庭制度需要家长，而孝是维持家长制的根本信条。在家要行孝，对国要尽忠，家有家长，国有国君，国君就是一国的大家长。既然实现了共和，那么忠君就该反对。既然要反对大家长，那么对小家长还要行孝吗？因此，打倒孔家店就要反对行孝，反对忠君，反对一切吃人的封建旧礼教。吴虞、鲁迅等人都是以反对旧礼教而驰名天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从 20 年代开始至 40 年代末的革命战争年代，把文化思想斗争与整个革命斗争融为一体，并成为其中的一翼，从而使它的作用不再那么突出，乃至有时还被人忽视；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中，一切进步的文化战士，没有不反孔的，因为革命要反帝反封建，而孔子思想就是封建主义的代表，它的中庸之道，也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不打倒它，人民便不会觉悟，革命就难以进行。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统治下，一切尊孔派都是大大小小的军阀和政客，都是当权者和他们的“帮凶”或“帮闲”，而一切反孔派都是革命者或对统治者不满的人，而反孔的遭遇也总是被屠杀和受迫害，极其坎坷。尊孔和反孔不仅思想旗帜鲜明而且政治界线也很清楚。

五、

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革命运动都需要反对孔子思想。1953 年以后的三大改造运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需要反对孔子思想。尽管 1957 年的反右派和 1958 年的“大跃进”，已经太激进而完全脱离了实际，但它更需要反对孔子思想，因为“反冒进”主张平衡，而平衡就有中庸之嫌。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沦于十年浩劫，在这场浩劫中演出了一场“评法批儒”的大闹剧。哪里是什么“评法”，其实是“尊法”；哪里是“批儒”，其实是“批周”；“批林、批孔、批周公”，周公者，周恩来也。有人说：这是江青搞的。但“郭老从韩退，不如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样的诗，除了毛泽东谁能有他这种妙不可言的手笔？（编者按：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说：1974 年 1 月 24 日、25 日，江青在两次万人大会上念了此诗。张耀祠把江青讲话录音连放两次，认真把诗记下交给毛泽东看。毛“看了看，摇摇头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如此。’”录供读者参考。）有人问：林彪死了，毛为什么还要批周呢？道理很简单，林彪死后，1972 年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运动，势必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场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革命”，是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样的丰功伟绩岂能允许周恩来把它否定？因此批周是势所必至，虽然它已是势所不能的了。最后的结果是发展到 1976 年，两人同归于尽，周先走一步，毛亦继之而去，两人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英名？恶名？谁胜？谁败？留与后人去评说吧。

六、

由上述可见，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前，反孔是有积极意义的；胜利之后特别是在“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的批孔，不但毫无积极意义，而且酿成了大祸，后患无穷。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但因其好斗好权，并没有真正领会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深刻教训。他崇法，知道法家讲究耕战，用严刑峻法以治民，用愚民政策使其盲目屈从于无上的权威之下，为一人的万世之业去效劳、去打仗、去开疆拓土打天下。毛泽东推崇秦皇汉武，他为秦始皇翻案，认为坑儒几百人太少，他坑的儒比秦始皇多许多倍。中国历代王朝多半以武力开国，但取得天下之后，就懂得“马上得天下，却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或用黄老之术让人民休养生息；而为长治久安，则常用儒术，施仁政，使士农工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下，上下相安，各得其所。毛泽东则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息，不以历史经验为鉴，连马克思发展生产力的基本理论也置诸脑后。解放后斗争再斗争，运动又运动，使国家贫穷落后状况有增无减，毛泽东不引以为忧，反而认为那是好事，在白纸上好作最好的画，写最好的文章。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限制人口，毛以他的“人手论”去反对马的“人口论”，说人有两只手，一张口，人越多越好，人多热气高。他有权，因而也就“有理”，把马寅初的北京大学校长撤了，听任中国人口在发展，至今发展到十几亿，难以控制，虽力行节育，每年还是要生出一千多万人，相当于生出一个不小的国家。由于知识分子不听话，于是从反右派开始，大整知识分子，到“文化大革命”，连文化的命全都革了。当全世界的科技大发展，生产力也随之大发展的时候，我国却把知识分子赶下乡，赶上山，让

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行“五七指示”的结果，不仅达不到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它是自欺欺人的，所以便出了时时手捧红书、天天高喊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林彪。林彪爆炸，按当时的人心理应由周恩来继承，但毛为保护他的“文化大革命”，怕中国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为免遭斯大林那样受“鞭尸”之苦，于是出现“评法批儒”运动，为“四人帮”特别是女皇江青篡权创造条件。因为这个运动太脱离实际，太不得人心，所以搞不起来，而“四人帮”也随之灭亡。

七、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胡耀邦由于能顺人心而上台。邓小平睁眼看世界，中国落后于世界太远了！于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停止搞运动，全力发展经济，主要靠科技的进步。为此，他又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的面目已大为改观，但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却出现了一股尊崇儒学的逆流。有人把邓小平思想中的“中国特色”，解释为东方的儒家的特色。这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一样，有人想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世界。但结果是西方文明并没有破产，而中国的贫穷落后依旧。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破坏祖宗的成法定制，妨碍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因此统治者必定要把孔子祭起来反对改革。这已经成了一条规律，当前的一些现象又何足怪哉。

八、

中国要现代化，必须批孔，（当然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现代化与孔子势不两立。现代化的中国当然有特色，正如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有其特色一样。即使到了大同社会，各国仍会是有小异的。但现代化的中国，孔子绝不会有大成至圣先师的地位。家长制休矣！一切专制魔王休矣！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已不能逆转，大成至圣先师的命运，呜呼哀哉！一切吹捧孔夫子的门徒们，其命运也一样，呜呼哀哉！但是，人们不用担心，孔学精华是不会湮没的。现代化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光大它，使其汇入世界文化的总库而为全人类服务。不过孔学中的糟粕，也就是自古至今孔学门徒所吹捧的那一套，什么孝呀、忠呀、三纲五常呀，毫无问题，将被人们抛入垃圾堆中去。

当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和物质要求是：

提倡家庭和睦，反对家长制，反对孝道。

提倡爱国主义，反对独裁，反对忠君，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振兴中华。

提倡睦邻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称霸。

提倡民主，保障人权，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节制生育，提高人口素质，保护资源，保护人类环境。

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提高文化，发展科技，提高生活质量和文明水平。

孔学中只要是不违背这些宗旨的，都可以提倡和发扬。那样，孔子作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哲人，将和古印度、古希腊以及世界各国一切古代的哲人一样，会永远被中国和全世界的人们

所尊敬和纪念。

1995 年 12 月于北京

(1997 年第 11 期)

李冰封

从"传统"说到"皇权"

——汪澍白教授的一本书和一篇论文读后

探讨各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主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联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然而却并非容易的研究课题。它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从中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一中国当代巨人所起的正面及负面影响，藉以昭示来者、鉴戒后人。但困难却在于：过去设置的研究禁区太多，可供研究的资料不足，遂影响此项研究向纵深发展。近年，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变化，随着研究禁区的不断突破和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正不断问世。

老友厦门大学教授汪澍白兄的近著《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正是近年我读到的有价值的此类研究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本。这部著作，好就好在，它既不神化毛泽东，也不贬损毛泽东，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抓住关键问题，用简洁明了的文字，作中肯的剖析，把一个作为人并非神的毛泽东，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找出他各个时期的思想渊源，写出令人信服的评说。

青年毛泽东，曾师从杨昌济。湖湘文化中各种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诸如，程朱理学，张栻的湖湘学派的哲理，王船山倡导民族大义的学说及其哲学，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谭嗣同的“心力说”及其冲决罗网的改革精神……都通过杨昌济的言传身教，薪尽火传。也就是这些传统文化，启迪、熏陶着青年毛泽东。

除了湖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也都影响着这位历史巨人。举其大者，从《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到顾炎武、颜元、康有为、梁启超……在汪澍白的书中，也都作了剀切的说明。

汪著另一特点，是把过去因“为贤者讳”而被列入研究禁区的若干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比如，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即是此类问题之一。犹忆 70 年代末，李锐同志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修订本时，在书中《学校与老师》一节内介绍杨昌济时，附带引用了毛泽东“语录”：“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算是率先突破禁区；而突破时却有人说了近乎无知的闲言碎语。由此可知当时要对此类问题作实事求是的研究，是何等困难了！过了十多年，这个禁区算是进一步突破了。汪著评说此问题时，就详尽明白，从毛泽东曾认为，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者只有“曾文正”起，进而介绍他极口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理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抱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故奉之为国学津梁。此外，还介绍毛泽东如何认真钻研过曾国藩军事策略，并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吸收了曾国藩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为己所用。连 1928 年 3 月，毛泽东手订《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时，如何参考并搬用了曾国藩当年组建湘军时，创制《爱民歌》，也都提到了。这类问题，读者自可在阅读此书时，详加领略。

笔者在读完此书后，给汪澍白兄写信，认为书中对中国传统中的皇权思想给予晚年毛泽东的影响，写得过于简略，是个缺点。因为笔者认为，毛泽东在青年时，是抨击、反对君权的激进革命者，为什么到了晚年，竟会以革命的名义实质上维护君权，这一重要历史问题，如不加以认真研究，使国人对此彻底明白，并有清醒认识，则中华民族就存在着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不久，即接汪澍白兄回信，并寄来 1993 年发表于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他的一篇论文复印件：《毛泽东与中国百年——从破除迷信到揄扬崇拜》，此论文对中外皇权主义传统及其对毛泽东影响的剖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阅后深受启发，兹简述我对此论文（以下简称汪文）的读后感如下：

1. 所谓皇权、王权、君权以及现、当代各种式样的极权，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及运作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实质却是一样。这就是说：英国霍布斯在 17 世纪所维护的君权“利维坦”(Leviathan）和苏联布哈林在 20 世纪所指出的各种具有“利维坦”的特点和弊端的“新利维坦”，实际上是一回事。实质上都是反民主的。汪文指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其一是权力机构非选举产生；其二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不可分割；其三是最高权力不能转让，实行‘终身制’。符合这三条的，在封建社会，有中国的历代皇帝；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德、意法西斯；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苏联的斯大林。”笔者以为，在这三条以外，不妨再加上一条，即：最高权力不受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相信科学与崇拜个人的界限，大搞宗教式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扬秦批孔，写“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那样的诗，实质上就是要为全面复活皇权主义扫清道路。这种皇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且实质上是相抵触的。

2. 在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众多的小农，是滋生皇权主义最适宜的土壤。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的第七节，特别着重阐述了这个道理。因为小农是千百万分散的独立生产单位，生产落后，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不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代表他们自己，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且希望找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侵犯。这种绝对权力就是皇权，或各种各式的极权。中国在本世纪 50 年代起，曾大体依照苏联的做法，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小农走集体化道路，变个体农民为集体农民，想使农村通过这样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样做基本上行不通，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变农村落后的经济面貌和广泛提高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所以现在农民基本上仍属“小农”范围。在这样的气候和土壤下，农民拥护皇权及滋生各种各式的迷信思想，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3. 中国经历封建社会约二千余年，时间特长。封建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盘根错节，封建传统深厚。1949 年革命胜利后，在思想领域中并没有下大力气去做全面消除封建主义影响的有效工作，这就使许多封建思想得以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加以我国至今经济落后（在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现代化的最低国际标准是 3000 美元以上，我国 1995 年仅 400 美元），文化落后（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进入现代化的国际标准为超过 80%，我国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仅有 11.4%。总人口中且有一亿多文盲。以上统计数字见 1997 年 8 月 9 日《文汇读书周报》第 6 版），加以人民素质普遍不高、民主习惯普遍缺乏，这就使我国在人民中彻底破除封建皇权主义传统的影响，任务十分艰巨。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皇

权主义的错误，应该是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毛泽东自己说过，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举国有识之士，就他所做的两件事中的一件，群策群力，加以剖析，使后人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对于国家走向兴旺、人民得以幸福，无疑都十分重要。

以上是我读汪文后的主要感想。

附带提一件事：最近我还读过一篇谈王权思想的极好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已去世的、可尊敬的、文武双全的革命前辈吴有恒同志。文章的题目是：《史学家的困惑》。此文写于 1988 年 10 月，收入《同舟共进》百期作品选《告别"万岁"》一书。此文从作者亲身经历入手，痛斥王权思想，写得通俗、生动，且极深刻。读者如有兴趣，也不妨找来细读。值得引人深思的是，吴有恒和汪澍白都是老共产党员，他们都曾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艰辛备尝。他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发自肺腑的呼声，却是如此相似。难道人们不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党心、民心的反映？

1997 年 8 月 15 日，长沙

附注：利维坦（Levaithan），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著（1651），是一本维护君权的书（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97 年第 10 期）

黄一龙

奇怪的“信心”

——一篇《代后记》读后

《中国可以说不》，据介绍是一批年轻的先生写的。看那书中出现的名字，作者一共有七，其中六位均系初见，想来年轻是指他们而言；因为书末《代后记》的作者喻权域先生，各界当不陌生，知道他在一切意义上都早已算不得“年轻”了。年轻人写书，有一老者押阵，或为掌舵，或为点睛，或为招徕，或为助威，都是常见的。这篇后记的作用，看来大抵也是如此。

对于前面六位的作品，讲好讲不好的都有。分析地看，作者们爱我中华之情跃然纸上，他们对于外国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者的霸道行径的抨击，对于中国某些人士的洋奴心态的揭露，应当说是反映了中国百姓的“情感选择”。可是那种用“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来对付“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以及按照民族或者国家来分辨好人坏人的“情感”，倒须年老的先生掌一掌舵，以免它走入“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扬我国威！”（慈禧向八国宣战的

"上谕")和"亚细亚勇士张大吃人的血口"(30年代"民族主义"文人黄震遐所著《黄人之血》)那样的"情感选择"里去。可惜的是，老先生的"后记"，却恰恰在发扬那后一种倾向，这就至少应当用年龄来责备他了。

"后记"看来是喻先生的一篇独立作品，题为《访美归来，更有信心》，放在此书之后，所以叫做"代"后记，说明全书的主旨就在"信心"。有信心才"可以说不"，而它的依据，据年轻人的正文里面讲，有人口世界居第一，东方文化了不起，美国其实要被人类文明所抛弃等等因素。论据虽然幼稚，可是究竟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莽莽撞撞，也有几分可爱。而喻先生的文章就很老成，开宗明义就讲，所谓信心，就是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一个庄严的命题，比正文站得更高了。可是就在这个题目上，老先生把读者也把作者带上了一条莫名其妙的道路。

据喻先生说，他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大的信心(原文是"更有信心"，就是说原来也有，但那时可能还留有余地)，是在"访问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以后找到的。中国能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飘洋过海到美国去找，此举本来就很奇怪；而他找到的，竟是一条谶语："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这种说法，把书中已经存在的逻辑混乱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正文里，中国之所以"可以说不"，是由于上述云云，那么依据逻辑，如果那些条件不成立，中国就只好说"yes，sir!"依此类推，其他没有中国的条件的国家，就命里注定只好跟在西方大国的屁股后面，永远不能说"不"。而根据喻先生所说，情况就更加不妙了。如果西方经济并未如他预言出现"大问题"，或者虽然出现但却在"15年"以后，那么中国连"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行了。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呢，还是骨子里的极不自信

呢?

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国情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是常识，中学生都能答对的。怎么在喻先生那里，它却决定于别人出不出“大问题”了呢？这还不算，喻先生还告诫我们，在这一卦被证明灵验以前，我们须要“挺过 10～15 年”。这就更奇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遭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确实“挺”过了多少年，只好关门搞建设，后来终于打破了他们的封锁，并且认真地吸取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一新世界公众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士的耳目，使他们不得不佩服这一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新兴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是为人类开辟一条走向正义而富裕的道路的力量。怎么到了喻先生那里，却成了缩着脑袋准备挨打的“挺”呢？“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毛泽东讲了此话近半个世纪以后，今天我们倒是更有充分的理由重复它，这才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更有信心”的根据。比起这样的理由来，喻先生所增长的信心，不是显得太受《红楼梦》里赵姨娘的影响了吗?

而且喻先生的“挺”，不仅是一种情绪的表露，还是一种须加实行的对策。立足于 15 年敌人必将大乱的战略构想，喻先生贡献的“挺”策有两条。一是“腾出资金和精力做扎实的经济建设，发展教育、科技，解决这些年积累的社会问题，不使西方利用我国的国内矛盾把我国搞垮”。“扎实”的经济建设现在就在搞，15 年内当然都该搞，这点喻先生想得没有错，虽然据我们通常所了解，其目的主要不在消极地防御坏人把我

"搞垮"，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强盛。可是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改革。改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必要，想来无须向喻先生解说了；但是他的"挺"策里面居然只字不提此事，应当不是出于疏忽。看他用"扎实的经济建设"来反衬他所不提的改革，好像那东西属于虚假或者更坏，春秋笔法啊！这样推测，喻先生未必愿意承认，可是在他的15年对策里面，没有改革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说明他至少认为此举可有可无，如果不是必须取消的话。他的这种"信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相差得真不可以道理计呢！

另一条"挺"策是，对外开放"而又不帮助（或少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渡（原文如此——引者）过危机"。这条原则更加奇妙。怎么叫做"帮助"别人渡过危机呢？派顾问去出主意吗？给他财政拨款挽救破产吗？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吗？应当都不是吧！对外开放，就要和外国人平等地做生意。生意既云平等，得利就是双方的。如果认为我们得利的同时也让别人得利，就是帮助别人渡过危机，甚至就是卖国，因而绝不可取，或应严予取缔，那么结论就该是不做生意。如果规定只准我得利或者我该多得利，生意场上你这样想他也这样想，这个生意还做得成吗？据喻先生分析，美国"打开中国市场"有三种办法，其中两种都是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办事，即只准他得利或他要多得利，不同的是或者搞垮中国政权占领中国市场，或者"让中国政府控制全国"但又"顺从美国"。这个情报的信息量和重要性不小，当然很值得注意，不过说到底那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只要我们这里不是"顺从美国"的卖国贼当政，这样的生意肯定做不成。剩下一种就是"按中国政府制订的'游戏规则'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喻先生又报称美国嫌它"利益不大"，并不甘心。根据这样的分析，对外开放还有必要

吗？对外开放还有可能吗？加上喻先生的前面的预言，“美元崩溃”和“世界金融危机”指日可待，我们还和他们做生意干什么？不如重新关起门来，“扎实”“挺”它十来年，静待美国“出大问题”，是不是这样呢？

以上的议论，是就喻先生文章的主旨而言。喻先生究竟老于文字，与小儿辈的情绪化笔法甚至效法蒋介石口吐“娘希匹”那样的脏话大不相同，他的文章真还耐读。多读两次，就会发现里面机关不少。举例来说，他把在美国的中国人，主要是留学生，分成两类：吃“买办饭”的和不吃“买办饭”的。这种分类本身，就有点暗藏杀机，因为照此办理，我们还可把他们分为杀人犯和非杀人犯，自杀者和非自杀者，因为确有一个留学生杀了人，也确有人 自杀，还可分为随地吐痰者和不随地吐痰者等等。总之，你想贬损他们，总会找出适当的分类方法来的。说“吃买办饭”意在贬损，根据是“买办”这个词，在旧中国已有特定的含义，就是指那些为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服务的整整一个阶层，其中还成长起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杆支柱。现在在美国和中国的美国公司里，有一大批中国人就业，很多人的“业”就是在中美贸易之间居间联络，促成交易。他们的头衔即使仍叫“买办”(我未听说)，那么此买办和彼买办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很多有志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尽力的青年正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并且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介绍市场，引进技术，在中美交流之间充当了桥梁。不讲这种区别，把“吃买办饭”的帽子往别人头上一扣，无异于把他们打成了洋奴二鬼子卖国贼。就是这样的小机关，也是为作者的主旨服务的。因为这样一大批人被打入另册，对坚持开放一定没有用处，当然对于反对开放是一定有用处的。如果喻先生要的就是后一种的话。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对付新世纪的挑战，

我们舍改革开放之外别无出路。这里说的“我们”，也就是喻先生所说的“我们全党全国人民”。但是他给我们开的药方很不好，不利于“全党全国人民”。当然，如果把喻先生所说的“我们”和“全党全国人民”分开，他说的“我们”就是他及他周围的同道，那该又当别论了。不过，对于这样的“我们”以及他们的献策，我们还是多个心眼为好。

（1996年第11期）

韦 弦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读孙越生的《干校心踪》

作者孙越生先生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一生从事社科文献资料的编译工作。1992年从中国社科院离休后养病在家。业余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官僚政治、美学、易学等，写有这方面的专论、散文、随笔百余万字。本书是他在一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用水彩风景画和诗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记录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反映了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反抗现实的特殊心态和方式。现从其人格、其诗画、其含义三方面对本书作出介绍。

特殊而又一般的人格

孙越生自我介绍说，他属于"和党同路又自己随便走走"的同路人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之初，他也曾天真地立志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做党的驯服工具，但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生活检讨会，他就打心眼儿里腻味做

驯服工具。所以他只能埋头从事编译工作（出版约四千万字）来实际表现他与党“同路”。与此同时，他又以对党、对党的方针政策及其实施和马列主义理论的独立思考精神来表现自己“随便走走”。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为了采用一位自学青工的投稿，同压制他的党员所长发生激烈争辩。对方以青工之父为右派分子和一些派性诬陷之词为由禁止刊用此稿，后又要求删去一半。在对方拍了桌子的情况下，他忍无可忍，也拍了对方的桌子，并说：“除非你撤了我主编的职，我用定了这篇稿子，除非你能指出这篇首次报道近三十年来国外藏学研究概况的文章哪一半不重要，我就是要四万字全部照登。”最后他愤怒地告到社科院领导那里，终于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并嘱他在按语中表扬这位二级青工。当这位副院长关心地问到他是否想解决组织问题时，他竟然回答说：“这样的党我不入！”经过“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又遇到“文化大革命”后党员领导无端压制的他，说这样的气话，除了坦率，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和这位院领导闲谈中他还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要从一位伟大死人手里讨回自由，他赞成。

这些事例，说明他继承了乃师王亚南先生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

1946年的一个深秋，他和王亚南的一席谈话表明了他这种追求独立自主的性格倾向。他问起王先生室号“野马轩”的由来并获得如下回答：“每滴海水越是按照自己的自然规律自由地活动，大海才能成为威力无比的整体，每个人越是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理想也就越是临近。你应该知道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定义（指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结成的公社）。”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困扰过他的问题：“您的意思，是不是也可以理

解为：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呢?”他得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隽永回答：

“‘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的座右铭，是他最懂得什么叫做自由。只有像他那样不愿在别人脑子里跑马的人，才不会让别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跑马。”(《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果然，孙越生在开始发表文章后，就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命题作出了修正。如对劳动创造人类论和国家必然消亡论，等等。

这样一位在“听党的话”和“不听党的话”之间摆动，“和党同路”，又自己“随便走走”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二代在业务部门和党政部门工作的、党和非党的中国知识分子群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差异仅仅在于“驯服”或“不驯服”，“独立思考”或“欠独立思考”的程度不同和主客观条件不同而已。包括主观上以为自己和党同路，实际上被党或领导视为异己甚至“反党”的种种冤屈情况在内。

这样一种是友而非敌的地道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端迫害和残酷斗争，包括抄家、隔离审查、挨斗、挨打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和保持怎样的心态，当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历史个案，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人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传统而又创新的艺术样式

从艺术形式看，孙越生的诗画配显然继承了中国国画，特别是文人画的诗画合璧的传统，发挥了以诗配画、以画配诗、互相阐述、互相生发的特色。当代漫画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利用了这种传统艺术的优点。孙越生的诗画配有所创新的地方，

在于用现代水彩风景画和诗歌相配合，以心灵和自然对话的意境，来表达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的心声，并且是自己作画，自己赋诗。从这一角度看，孙越生大概是用这种艺术样式来创造性地表达这种历史题材的第一人。

下面介绍诗画配如何水乳交融地来阐述事件的。可以分下列四类：

1．表达受迫害而又无理可申的绝望情况下自然而然产生的消极厌世情绪。这种情绪若非“牛鬼蛇神”当事人，是很难具体体会到的。如《夕阳普照》中写道：/我的身/筋疲力尽/我的耳/厌烦人声/我的口/懒得发音/我的眼/不愿看人/我的心/只求安宁/我和坟中的尸/多么接近/。而画中的主景，则是一座乱草披离的孤坟和一个惨淡无力的夕阳。此情此景，诗与画相互生发出多少绝望的悲哀！但是物极必反，良知毕竟在愁云惨雾中开始觉醒和思考。在诗画配小引《晚霞，心灵留恋的苍茫》中表达了情和知结伴而行的这种心路历程。开始是写孤独的身影：/无边的晚霞/散发出余烬的光芒/我拉着板车/孤独地走在田径上。接着是良知对自己地位的自觉：/卑微的身躯/在瑰丽的自然中神伤/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彷徨。进而良知对现实发出批判性质问和感叹生活的乖张：/为什么今天又要用渺小/去渲染伟大的荣光/还要用愚昧/来塑造圣殿的辉煌/生命多么短促/生活多么乖张/在那长眠的墓地/黑梦也不能悠长（指一位自杀的学员埋后又被盗墓）。最后由于良知深信这种状况不会久长，所以才使最难挨的黄昏时光变成美的、可留恋的时光：/晚风阵阵吹来/余霞渐渐烧光/只有求知的心灵/留恋自然的苍茫。与此类似的还有《日暮春浓》等。

2．对迫害采取嬉笑讽嘲的轻蔑态度以示反抗。例如，在《池边的林荫道》里，作者对于诬陷他是“苏修美蒋特务”根本不屑一辩，而只是写了一首俏皮的自嘲诗：/一个苏修美蒋

特务/天天徘徊在这条林荫道/他窃取了水池边/绿荫婆娑的情报。画面上绿荫婆娑，生气勃勃，光影嬉逐，美不胜收。一种高尚的美，战胜了最卑劣的丑。在《水库·麦收时节》中，画面的黄色调烘托出盛夏的燠热，列队而来的云阵和它们映在水库里色彩斑斓的倒影仿佛给画面带来某种童话气氛。于是听到了作者以王八为话题的如下心声：/听说水库有王八/午间上岸晒盖甲/王八不必独自夸/干校也有午休歇歇乏/但是王八晒完就回家/没有批斗等着它/老九挨完斗/还不让回家/王八的福气/要比老九大/但是老九有良知/决不当王八。人在天地间竟不如鱼鳖自由，这不是对天堂进行最不可抵赖的愤怒的控诉吗？在《疏林池塘》里俏皮地表示他宁愿去当浮萍，也不领学习班让他重新做人的情：/我宁愿化作青萍/去陪伴她的倩影（指疏林的倒影）/也胜似学习班上/让我重新做人的恩情。学习班这种变相镇压工具，披着伪善幌子的丑恶，哪里比得上婀娜多姿、仙女般美丽的秋树。把秋树池塘画得越是美丽，学习班的失败就越是可信。在《池塘秋色》（可惜比原画浅了许多）中作者潇洒地配诗道：/碧云黄叶疏桠/远山平畴农家/波光水影塘洼/金风飒飒/书生在写检查。作者名为在写检查，实际上早让检查见鬼去了。画面上一派秋高气爽、心旷神怡的气象，哪有半丁点儿写检查的沮丧色彩。在自然美的怀抱里，应该说是没有丑恶的地位的。特别值得一谈的《残霞》：天幕横陈，被残霞的浅橙色余辉照亮，清晰地映出池边裸树鲜活的身影和田野村舍清幽宁静的景色。池水的影映，倍增了余辉的亮度，使人有骤然间心明眼亮的感觉。作者写道：/残霞渐渐烧光/自己最后的希望/却给人们留下/一个美妙的印象/裸树想临风招展/秀发上的幻想/却在水中实现/自由的荡漾/我要烧光/人格的羞辱/涤荡心灵的创伤/眼前却升起/超然物外的明亮/大彻大悟的/精神解放。什么大彻大悟的精神解放呢？作者没有明言。经

过询问，才知道他获悉恩师王亚南已于1969年被现代专制官僚政治迫害致死之后，决心重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并对现实官僚政治作一剖析。这样，他就从个人的苦难中超脱出来，使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可以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解放天地。后来，孙越生果然发表了多篇关于官僚政治的文章，如官僚政治的起源和元模式，其上下限，以及官僚政治的某些活动规律，如《蚯蚓现象》、《官胀揭秘》等。前者曾得过1988年风华杂文征文一等奖。

3. 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如《雪后初晴》中，揭示“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诉/这是科学的踌躇/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这是民主的踌躇。作者特意把瘦弱裸露的小杨树林画得分外高耸挺拔，以表示弱小生命抵抗暴风雪蹂躏的不屈精神。在《汝河春色》中用春天匆匆的脚步来暗示世界科技飞快进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日新月异，从而形成令人堪忧的对比：/你们不在乎时间地/只争朝夕写（自己的）春秋/我却在乎时令节气的遵守/……/你们战火纷飞/尸横遍野/换得几年热坑头/我若多情又善感/早已哭瞎两眼无泪流/君不见/汝河春色年年稠/汝河春荒年年有/荒到何年方罢休/愁连愁还在斗！《打麦场的黄昏》揭示天道循环、世事沧桑，无非一堆麦粒，聚了又散。作者写道：/此生不再/还是现世最珍贵/莫借口千秋万代的甜/就把我们往苦里推/别指望演演戏/来换取我们的泪/你我本是草一堆/为什么我当麦秸你来堆/我是贱来你是贵/你是金子我是灰/你是仙来我是鬼……/因为权在你手里/我只能认倒霉！值得注意的是《雪后》：/出于对纯洁的向往或眷恋/人们乐于接受白雪的欺骗/人也惯用人间的白雪/美妙的伪装和谎言/来掩盖卑鄙的心术和丑恶的嘴脸/道貌岸然

/好粉饰寡耻鲜廉/野心膨胀/表面恭谦/为饿汉效力/是饕餮的宣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当老爷的本钱/耍权力的/就得把宝书摇马列念/贪赃枉法的/有关系网才保险/政治斗争的疆场/无诚实可言/经济建设的舞台/要靠喜报导演/文化学术战线/以歌德为条件/看够了文革后/再想想文革前/你会感悟到/降雪与融雪的经验/……/文革也各有自己下雪的心眼。

4. 身在囹圄，心系国是。作者画完《潘庄早春》后情不自禁地写道：/衰败的田地/衰败的路/衰败的房屋/衰败的树/男的苦女的苦/老的苦少的苦/世世代代苦还得将就过/与侯门朱墙比/也算是人类住户/冬天的瑞雪/夏天的雨露/春天的初绿/秋天的嘉禾/自然的一切恩赐/虽都令人惊喜/为什么改变不了/这里的穷苦。接着作者批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口号的荒谬愚蠢：/无权的知识/和贫困的农村相结合/有多少建设性成果/让受教育者看到教育者无知的苦/却不能消灭这种苦/让教育者看到/受教育者比自己富/却自己不能富/过去隔得远/反差不显著/现在拉近了/正好看清楚/所以常听老乡说/别看下放干部穿的破/腰里有硬货。作者说原本还有两句：/如果天下一大乱/首先抢你们下放干部。前述自杀学员尸衣被盗就是先兆。至于老乡组织抢收队收干校的庄稼，追急了，农妇脱裤“退敌”更是屡见不鲜。如此看来，作者说，这类口号岂非“伟大的愚蠢”。有趣得绝无仅有的一则诗画配是《麦收时节的傍晚》。它记述了某军宣队员借手中掌握审查大权逼奸一位女“5·16”分子的事，揭示了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和是“白纸一张，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口号十分主观片面：/黄昏昏黄/桑间濮上/两情相悦/尚可原谅/挟权逼奸/赛过流氓/白天马列/天黑混帐/阿弥陀佛/如此宣讲/为官弄权/千古一样/广阔天地/白纸一张/无论美丑/皆可画上/风景如画/隐藏流氓/不笔不削/后人全忘。画面上一阵清风吹得小杨树都弯了腰。仿

佛天地蒙羞，风也要来扫除新官僚们的秽行，美丽的浮云也为这许多知识分子身心遭受摧残凌辱而为之黯然。在《明毛铁路》中作者写道：/一条轻便小铁路/把明港和毛集连在一起/沿途风景真美丽/车里却装着贫穷和拥挤/天公多么慷慨/让贫穷也那么美丽/但美丽得那么贫穷/是否天公太小气/不管是阔气的小气/还是小气的阔气/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作者心目中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

个人而又社会的含义

仿佛是对个人这段苦难经历的心态作总结，作者在《暮秋》（可惜画画的蓝色印得深了）中写道：/兰棹过处痕难休/伤到心时怨难休/是也难休/非也难休。一旦强烈地伤了一个人的心，怨恨的种子就会在心里生根发芽，管它是非曲直，都难以消除。何况"文化大革命"是个绝对的错误，十足的愚蠢，地道的镇压无辜，分明的争权夺利。言念及此，气就不打一处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有深入总结历史的教训，认真探讨造成领袖个人迷信、专制擅权、恣意妄为、漫无法纪的体制性根源，并全面彻底地予以根除，否则，没有任何消除怨恨和恢复信任的办法。

曾经问过孙越生，他和党的距离现在如何？他坦率地回答道：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后比"文化大革命"前远多了，改革开放后拉近了一些，但是官僚主义的剥削欲和权威欲肆意膨胀造成的腐败和行政专制，又把它拉远了。

一叶知秋。孙越生个人的苦难历程及其心理反应，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特殊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现象。如果说，老一代真心诚意自觉跟党走的知识分子，在伤害了他们的身心之后已经人为地拉大了与他们的距离，产生了信仰危

机，那么，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遇到从这种社会体制总根源派生出来的社会弊端后会如何对待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孙越生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官僚主义探源》中说的："人民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弊害，但不能指望他们能忍受越来越大的官僚主义弊害，对于同样的官僚主义弊害，今天比昨天不可忍耐，明天比今天更加不可忍耐。这是经济和历史进步法则所使然，也是人类脑力体力劳动再生产费用递增法则所使然。如果人类忍辱负重的能力与日俱增，这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

其次，孙越生又说："文化大革命"要用一种貌似先进的思想，强加给知识分子，它所遇到的，首先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抵抗，无论如何这种强制推行不可能不受到知识分子固有的独立思考精神的质疑。无视这种抵抗和质疑，就是"文化大革命"反人道、反知识、反民主和必遭失败的原因。它越是强制推行，它所遇到的心理反抗也就越大。一种思想或文化，哪怕是先进的，只要用非人道的强制方式推行，就会如诗人歌德所说，使思想变成暴君，而把受众变成奴隶。更何况它所推行的是社会封建专制主义。

根据这种观点，他对当前某些时髦而又陈旧的口号提出质疑。例如，什么文艺工作者要做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啦，要用什么什么来塑造人啦，如此等等。这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实质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把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现代化核心问题有意无意看落，谁有资格塑造别人？又怎样塑造？塑造成什么模样？如果不要千人一面，你又在手头准备了多少塑造的模子？

（1998年第4期）

马为民

历史不饶人

——法国审判帕蓬历史案

1997年10月8日，法国波尔多市重罪法庭开始审理一桩历史旧案。被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府的地方官员莫里斯·帕蓬，罪名是“反人类罪”，罪证是他参与流放过大批犹太人。预计，审判将持续两个多月，于12月23日终审判决。审判期间，将有一百多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前总统和几位前总理等政界要人。

一时间，这场审判成了法国及欧美报刊关注的焦点。法国各大报刊均不惜版面地予以报道、分析，《解放报》于开庭当天用了整整9个版。英美大报也作了详细介绍，并且配发了评论。

一桩旧案何以激起如此大的波澜？原因在于，审判远远超出了帕蓬本人的毁誉荣辱，它已成为法国对自己的一段历史的再批判，是法兰西民族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又一广阔而深入的重新审视，其思想意义超过国界。

四朝元老

法国政体更迭之多，非其他西方国家所能比拟，简直有点朝三暮四。即就现代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它是第三共和国，战争期间冒出个维希政权（法西斯），战后改行第四共和制，到 1958 年，戴高乐将军又创立第五共和国。这都是历史使然。

然而，今年（1997）87 岁的帕蓬从 25 岁步入仕途起，尽管政治风云变幻，政体更迭频繁，他却依流平进，官运亨通，到 70 年代末还当了预算部长，掌握起共和国钱柜子。帕蓬堪称“四朝元老”。

莫里斯·帕蓬生于 1910 年，自幼聪颖好学，就读于巴黎大名鼎鼎的路易大帝中学，大学时修法律，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935 年，他经考试进入内政部，开始了公务员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辗转中东一带，不久转入特工部门，担任情报站长。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一流强国竟如纸搭的宫殿顷刻坍塌，贝当随之执掌国柄。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英雄”，此时甘当“狗熊”，声称要“为法国赌进自己的人格”，建立了同德寇合作的维希政权。10 月，帕蓬退伍了。

此时，摆在帕蓬面前的有两条路：或前往伦敦，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抵抗运动；或留在国内，加入维希法奸政权。据说他曾考虑走前一条路，但是，“聪明人”最终是要选择没有风险的道路的。于是，在贝当跟希特勒握手 10 天之后，帕蓬到了维希，重返内政部。法国档案记载，他对维希政府“忠诚”；德国档案记载，他跟德方“合作得很好”。1942 年春，死心塌地的法奸赖伐尔再度出任总理，帕蓬被调往德国占领下

的纪龙德地区，担任警察局秘书长。他负责的事务中有犹太人问题，结果把手指伸进了罪恶的齿轮系中。

1943年秋，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初具规模。此时，聪明的帕蓬开始嬗变。他先是拒绝了一次令人企羡的晋升，随后又秘密接待过几位著名的抵抗运动成员，给美国飞行员提供过便服，并且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前10天，适时摆脱掉所监管的犹太人事务。这样，在法国即将解放之际，他已经为日后积累了虽说不多却大有用处的资本。

波尔多解放前两天，他把警察的头头脑脑召集起来，介绍给抵抗运动派驻当地的共和国专员，要大家日后听从专员调遣。帕蓬这一手实在是高，这不仅把他在维希时代的种种劣迹一笔抹掉，还为他购得了跻身新政权的门票。果不其然，波尔多的卐字旗未降下，他就当上了共和国专员的办公室主任，还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接见。当地报纸祝贺他从“地下斗争转入公开”。这样，维希政权的“忠诚”官员又成了共和国的“勇敢仆人”。

不用说，他相当顺利地躲过了战后初期的政治清洗，1945年再返内政部，先后担任副司长、内政国务秘书办公室主任、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省长等职。在阿期间，他成了“绥靖”动乱的铁腕人物，“秩序”的化身。他在此期间推行的“铁血政策”也是其“反人类罪”的重要罪证。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弗林姆兰请他出任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他拒绝了。他看得又很准：第四共和国已奄奄一息。

当时的法国，天下汹汹，近乎爆炸。帕蓬又在设计自己的前程。他像象棋大师和桥牌高手那样长于心计，能在纷繁之中抓住要领；他这个巴黎警察局长终于搞到一张“抵抗运动志愿战士证书”。这可是他日后的护身符和万能钥匙。什么叫“老

谋深算”？什么叫“牵牛鼻子”？这就是。

第四共和国待他不薄，第五共和国对他更好。戴高乐总统亲自确认他继续担任巴黎警察局长，要他“管好巴黎”。帕蓬的仕途依然是一路绿灯：当过戴党的司库，选上了议员，并且主持过议会的财政委员会，1978 年，又被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命为巴尔政府的预算部长。帕蓬成了法国政坛上没谁敢碰的人物。

东窗事发

行文至此，可以搬用《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话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帕蓬的晦气是从跟一家小报交手开始的。

1980 年，法国著名的讽刺性报纸《鸭鸣报》刊文，指摘帕蓬对两个女婿的减税额过高。这本是小事一桩，但“小不忍则乱大谋”。气焰过盛的人处理小事时往往容易失手，从而酿成大祸。当时，帕蓬轻蔑地说：“你们的问题丝毫不值得回答。”其实，他还是回答了：几个月之后对老“鸭”来了一次税务大检查。

1981 年初，《鸭鸣报》收到其合同记者斯利坦斯基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帕蓬当年逮捕和流放过犹太人。斯利坦斯基是犹太人，他父亲 1942 年在波尔多被捕、流放，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本人侥幸从屋顶逃掉。他战后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调查，并据原始文件整理出一份材料。

1981 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 4 天，《鸭鸣报》刊出一篇文章：“帕蓬，副官。吉斯卡尔的预算部长，流放过犹太人。”这条消息如同炸弹爆炸，震惊了法国。帕蓬立即表态，说这是“卑鄙的捏造”，是“政治阴谋”。他还以攻为守，请求著名的

抵抗战士组成荣誉审查团，以决断是非。审查团经过好几个月的争论，于年底作出了这样的裁决：既肯定他支持过抵抗运动，又指出他“本应于1942年7月辞掉秘书长职务”。

这后一句话实际上确认了他参与过流放犹太人的事实。从1942年他就职波尔多到1944年波尔多解放，有10批约1600名犹太人被强行押上火车，经由巴黎东北的德朗西，被转押到德国的集中营。关于这几起流放的文件均有帕蓬的签字。对于这些事实，帕蓬本人现已供认不讳，但他坚持：其一他是奉命行事；其二他曾使一百多名犹太人免遭流放，还设法减轻被流放者在旅途中的痛苦（提供饮料和棉被等）。

从1981年受害方提出控诉16年以来，帕蓬案几经曲折。法院对其“反人类罪”正式起诉过三次，预审法官换过多人，均虎头蛇尾，未能推向正式开庭。其原因错综复杂。比如，此案涉及到在任总统密特朗在维希政权初期的行为，密特朗的干预影响了对帕蓬的法律追究。帕蓬曾于1991年致信密特朗，对他发出过相当明确的政治威胁。

帕蓬指责某些人搞“政治阴谋”，倒也并非信口开河。据报道，斯利坦斯基曾说过，他发表那条爆炸性消息前，一个社会党背景的人找过他，说出于争取犹太人的选票，“密特朗同意发表”，密特朗日后当选，会感激他的。当然，此事的真伪与帕蓬案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从政道德

16年前案发之初，帕蓬的顶头上司萨巴蒂埃（维希时代纪龙德地区警察局长，1990年去世）、布斯凯（维希政府的警察局秘书长，1993年遭暗杀）都还在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这两个人的罪行，对帕蓬案不太重视，当时，主要控告人之

一、历史学家克拉斯菲尔德甚至公开表示，只要帕蓬主动辞职，并且公开道个歉，他可以不提出指控。然而，当时炙手可热的帕蓬部长，连这样的姿态也不肯做。于是，随着司法调查深入展开，面对自己签过名的流放文件，帕蓬不得不认账。

现在有人出于为帕蓬辩护，提出了如何看待投诚者的问题，说“不能堕入非黑即白的历史观”。法国解放前夕，确实有许多转向抵抗运动的维希官员，即所谓“灰色人物”；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从伦敦发出的号召书中，也确实要求过这些人“留在职位上”，“如果这对抵抗运动有益的话”。但是，号召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参加“不可接受的行动”。而帕蓬呢？他继续参与流放犹太人，直到波尔多解放。所以他并不完全符合“自由法国”所宣布的投诚标准。而这个标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为，如果允许人们以大批无辜者的生命做代价去效力抵抗运动，那么抵抗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成了问题。

还应当指出，近十年来，法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人类罪”已经进行过两次审判，而审判帕蓬的意义不同。1987年审判的巴比是里昂的盖世太保头子，是个德国人；1993年审判的图维埃虽是法国人，但他是法奸组织“保安队”的头子。而这次审判帕蓬，则是法国战后初期以来第一次以“反人类罪”审判一个行政官员，所以审判带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奉命行事”是帕蓬自我辩解的主要遁辞。他曾经这样写道：“服从政府命令，良心上就不会不安。”这就涉及到从政道德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奉命行事”的诡辩是经不起论证的。

首先，命令本身有对错之分。就说帕蓬所执行的命令吧，即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其正确与否也是一目了然的。那1600名犹太人尤其是其中的二百多名儿童，何罪之有？如果要使用“罪过”这个词儿，那么他们的“罪过”仅仅在于他们是犹太人。维希政权迫害他们，就是搞种族迫害。攻读法律的

帕蓬不会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另外，下命令的又是什么政府呢？这更是不能不提的问题。维希政权是投降德寇、镇压人民的法奸政府。贝当认为法国战败是因为存在“反对法国的力量”，即犹太人、共产党人、外国人、共济会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他们的反动法律，而这并没有德国的压力。赖伐尔重掌维希的大权之后，这个政府的法西斯面目更是昭然若揭。“服从”这种政府的命令，不就是甘当赖伐尔的爪牙、法西斯的帮凶吗？帕蓬恰恰就是在此时赴纪龙德任警察局秘书长的。而且，他既然曾在去伦敦和留国内之间犹豫过，那么当时对维希政权就应有了基本的认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帕蓬还硬要用“服从政府命令”为自己开脱，实在可悲。如果接受帕蓬的狡辩，那就等于允许人们今后仍然可以在“执行政府命令”的名义下为非作歹。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方面，国家根据它所制定的法律去判定是非，按照它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去褒贬予夺，这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历史这个法官手里的标准只有一个：人民的利益。它没有别的标准，它仅仅用这个标准去区分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是非判定，同历史的最终裁决往往不尽一致，其原因即在于此。以帕蓬为例，他被维希政权视为“忠诚”官员，战后被授予荣誉军团勋位，70 年代当上部长，但是历史要审判他。历史不饶人。

因此，一切从政者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从现实与历史统一中去把握和确立自己的从政道德。

走出误区

今天，帕蓬被推上了被告席。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是帕蓬一个人。"《今日美国》的评论更加不留情面，说受审的是整个法国。

的确，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从戴高乐到密特朗，历任总统都没有认真清算过维希政权，结果形成一个历史脓包，成了一个政治禁忌。1944 年巴黎解放后，许多人急切地要求恢复共和制。8 月的一个晚上，戴高乐将军在市府大楼里抛出那句名言："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存在，维希等于零，完全无效。"这寥寥数语可不能小视，它把那段黑暗的历史抹煞得干干净净，为"理想的法国"与"真实的法国"提供了最佳的调和色，捂住了维希的盖子。既然维希不曾存在，法国也就无须向任何人道歉。从此，各届政府都是"按既定方针办"。密特朗主政之后，由于他本人同维希政府有过一段关系，对清算这段历史更少热情，甚至从消极方面干预过。直到 1995 年 7 月，新任总统希拉克才勇敢地站出来表了态：法国犯下了"集体错误"，做了"不可弥补的事情"，并代表法国向犹太民族道了歉。最近，法国教会和警察工会也分别做出了同样的举动。这赢得了公正舆论的称道。

不过，仍然有人固守戴高乐的教条。他们甚至还这样理直气壮地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谁代表法国？是维希还是伦敦？言下之意是，当时只有在伦敦的抵抗运动才能代表法国。这实在是强词夺理。不错。以戴高乐为代表的"自由法国"从来没有屈服过，但法国战败之初，国内并不存在有组织的抵抗活动，直到 1943 年春，才有了全国规模的抵抗运动。当时，德国直接占领北方，南方是维希政权。国家是不能搬来搬去的。维希的法国就是德国控制下的法国，就是同德寇狼狈为奸的法国。维希的所作所为也是法国的所作所为，这是历史的事实。

关于这段历史，法国还有过一种"剑盾之说"：戴高乐将

军领导的抵抗运动是“剑”，以攻击敌人；贝当政权是“盾”，以保护人民。这纯粹是为投降辩解的花言巧语。历史已经证明，维希政权是镇压人民的政权，它不是“盾”，而是压制人民抵抗的枷锁。

法国人一向爱谈论自己的“伟大”，开口拿破仑，闭口戴高乐。对维希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很少提及。直到1962年，在法国中学历史课本里，“维希政权”这几个字才第一次出现，到1980年，有关内容也只占到一两页。近十年来，通过对巴比、图维埃和目前对帕蓬的审判，法国人开始正视自己历史上这耻辱的一页。据报道，波尔多的一个中学生在谈及这场审判时说：“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父辈们、祖辈们做过些什么事，受过些什么罪。”捅破历史的脓包，才能看清历史真相，而这须要斗争。《解放报》社论说：“真理同民主、自由一样，是一种战斗，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真理并不是谁一下子给予的。”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陷入精神误区的情形并不罕见，关键是要有走出误区的勇气。如果说掩盖侵略历史是日本的精神误区，那么，抹煞维希这段历史就是法国的精神误区。而今，法国正在走出误区，日本仍然陷在里面。

听一位同事说过，他在同日本友人交谈中提到日本应走出精神误区，对方的回答令他震惊：我们对侵略的胡涂观念同你们之于“文化大革命”恐怕也有些相似之处。显然，这两个问题决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对比于我们可能有某种警示意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公正判决，但是，后面的事还很多，所以又不能视“文化大革命”“等于零，完全无效”。这样，才不至于真的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误区。这或许是这场对帕蓬历史的审判给我们的另一点启示。

1997年10月23日

（1997年第12期）

蔡德诚

摆脱人身和思想依附的三大瑰宝

“开题”前言

本文原题为《透明的市场，刚直的科学，平权的民主》。本来，“市场”、“科学”、“民主”是无需加任何修饰定语的，但1997～1998年初亚洲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告诫我们，倘若市场、科学、民主不能三位一体地谐同发展，良性互动，必致使市场运作不透明，科学屈尊于权力，“民主”附庸于特权。这种情况下，纵把市场、科学、民主喊得震天响，喊得再有“亚洲龙虎模式”特色，“东亚文明”的特色，最终仍不免把自己引入深重冗忧的危机中去。实践告诉我们，时间和历史总是客观、公正的，它们只遵循规律，从不迁就任何“一厢情愿”。笔者认为，只有“透明的市场”、“刚直的科学”和“平权的民主”，才是20世纪使人类摆脱人身依附和思想依附的三大瑰宝。

一场世纪性的大实践、大对比和大选择

20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冲突之烈，变化之快，发展之迅疾，前所未有，令人目不暇接，更常使人“思难适变”。有多少事，令人百思不解，又有多少事使人豁然开朗。对一切以思索、求索人间真谛为人生最大乐事的人来说，能生活在这个百年之间，真可谓是万世难得的幸运际遇。

20世纪种种大变化、大发展中，最令人叹为观止，令人难以逆料的，莫过于人类以空前的规模，空前的代价所进行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两种社会体制，两类社会形态的社会大实践、大对比，和最后亿万人民毅然决然的再选择。这种大实践，大对比，大选择所展现出来的直截了当的事实和结果是：

以马克思理想作为国家目标的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民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大半个世纪的奋斗、磨难，乃至种种牺牲后，猛然发现，不论从哪个方面，哪个标准看，几十年下来，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实际上都偏离了，甚至远离了马克思原来的理想，原来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近一个世纪来，那十多个发达国家、地区的近十亿人民在许多方面却在实际上大大趋向，大大接近了马克思的理想目标。

那么，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理想目标”具体是指什么呢？

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他倾其一生，做了那么多的研究、思考和求索，写了那么多的宏篇巨著，而他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却是极其鲜明，极其简洁的。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可以归纳为三个目标和三个检验标准。

三个目标是：

1．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物质极大的丰富；

2．在上述基础上的社会普遍公平、公正；

3．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

三个检验标准是：

1．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

2．是否消灭了城乡差别；

3．是否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相信，对上述三大目标和三大标准的归纳和表述，是任何一个熟悉、了解、敬仰马克思理论和理想的人都会完全赞同，不存疑义的。

在20世纪的大实践、大对比后，按照上述三大目标、三大标准来衡量来检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恰恰是那些只把马克思当做学者、思想家来尊敬的北美、北欧、西欧、大洋洲，乃至日本等国家及他们的亿万人民，倒是大大趋向，大大接近了上述三大目标和三大标准。我想，一切尊重实际，尊重现实，尊重科学，尊重理性的人，都会心服口服地承认和面对这个世界现实的。难怪我们一些一生诚挚追求理想社会的老革命、老同志、老领导，在北欧国家深入城乡，对普通居民家庭作随机调查访问后，不禁怅然长叹：看来人家是真正接近了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我们这一辈子好像是白干了！

但是，任何理想、理性的执著追求者，是不会止于叹息的。叹息之后必然是不可遏制的深思——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怎么会是这样的相反相成的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大课题。我想，这可能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要给予最大思考的大问题之一。我想，这也正是促成近二三十年来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民一场大改革、大选择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

以下，谨奉献我的一些思考，并诚恳地向一切真诚的智者、识者请教。

我以为，在辩思、辩识上述巨大历史反差这个不争的事实时，我们首先应该摈弃多年来那种“唯我独革”、“唯我先进”、“唯我是社会主义”，以及“风景这边独好”等一切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先验说法。因为很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文明、经济基础达到最高水平的阶段。而推动这种发展的主力和主体，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达社会。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理，我们只能得出结论：由最先进、最高水平的经济基础所衍生出、所折射出的上层建筑也应该是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在最先进、最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衍生出、折射出的精神文明，也应该是最先进、最高水平的。至少从社会的主流来说是如此。我想，上述结论对任何一个讲科学，讲理性，讲求实，讲唯物辩证的人来讲，都会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诚诚恳恳承认的。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任何可能，可以自夸自诩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精神层面如何优于别人，胜过别人。在历史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认认真真，诚诚恳恳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我们必须深切地认识到，人家趋近、接近马克思的理想目标，从根本上说，那也是这些国家，那些地区的亿万人民大众几十年、近百年劳动创造的结果，是他们努力捍卫自身权利，努力理性调节，理性处理种种社会矛盾和种种发展障碍的结果；是科学界、知识界各方专家学者有效介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实际上那也是人家近十亿人民运用自身不断扩大的权利，不断影响不断左右当权当局，使之尊重各方人民意愿，尊重各界人民利益的结果。应该说，这一切对真正持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动力”这一科学史观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毫不费解的。

历史和现实的真正启示——一切要以人为核心

马克思的三大目标，说到底其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间普遍的需求和幸福；是为了发挥一切人的潜能潜力；是为了一切人的真正解放。“为了人，为了全社会的一切人”，始终是马克思三大目标，三大标准的核心魂魄。

20世纪大规模社会实践的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当初的三大目标，三大标准，是科学的，经过大规模社会实践检验后证明，这个伟大的科学预见正越来越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他关于社会主义因素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预言，也是一种深邃的科学预见。他确实无愧为一个伟大的经济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但，无庸讳言，几十年来，不论在什么地区、什么国度，不论以什么形式，什么口号，以什么为藉口搞“阶级斗争为纲”的，其核心要害就在于——不是为人，更不是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实质上却是为了“权”，为了某些人的“权位”，甚至要以“某一个人划线”，为了一个人的“权位”，并且要求人人都要成为“驯服的工具”。即使这种斗争一次次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祸害了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人，仍然要“千万不要忘记”，仍然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七八年搞一次”。不言而喻，这种“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从事情的本原上，就背离了马克思的三大目标，三大标准。因此，历史的后果也是铁面无情的。

经过大选择、大改革后的再实践、再对比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即：“经经济

建设为中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则是符合马克思的三大目标、三大标准的。近二十年的历史鲜明地展现了这个论断。

个性的发展，必须以摆脱人身的依附和思想的依附为前提

如上所述，解决人类社会种种难题必须"以人为核心"——即要始终以每一个社会人的实际需求，普遍权益为核心。一切应该以此"划线"，为着眼点，为落脚点。很显然，上述三大目标中，马克思讲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个性的全面发展"，不是孤立的，割裂的，不是指在生产力发展后，物质丰富后才讲个性发展的，也不是在社会公正公平后才求个性发展的，而是三者互为条件，同步发展，交错促进的。

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成员普遍的个性自由发展，对三大理想目标的实现，更具有某种带动性、促进性的决定性作用。

何以作这样的判断？对个性的发展予以尊重，予以自由，果真会有如此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20世纪普遍涌现的几个对比现象中得出这个肯定的答案。

摆脱人身依附，是解放一切生产力的首要核心要素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但后者却释放和创造了与前二者有天壤之别的空前生产力。其根本的缘由，乃是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使人们逐步地摆脱了人

身的依附，首先是摆脱了人身的生存依附。作为一个工人，不论是工业工，或是农业工，他当然要受雇主的选择、雇佣，也时时可能被雇主解雇，“炒鱿鱼”。但这种雇佣、被解雇关系越来越演化为具有双向选择性，劳动者也变得可以选择老板，选择雇佣地区、部门、选择岗位，不合心，不满意也可以主动“炒”老板的“鱿鱼”。靠自身的劳动找生活，不依附老板，不依附土地，不依附社会帮派势力，凭自己的劳动技能和本领，“东方不亮西方亮”。随着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这种双向自由选择也导致了劳动者个人经济地位，经济基础的普遍确立，一旦有了可以自主自立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摆脱对他人的人身依附也就有了实际的保障。一个摆脱了人身依附的人，他的劳动首先是为自己，劳动的创造首先归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必然会自动、自发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如果社会上每一个劳动者普遍都获得了这种人身的独立性、自立性和相应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社会生产力当然会像裂变反应、连锁反应一样爆发出来。20 世纪人类的大实践表明，正是那种可自主选择的劳动，那种可公平竞争的机会，以及公开、透明的市场运作机制，对社会全民的经济独立、人身独立起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可以保障个性独立，保障个性发展，可以导致个人能量主动释放的个人经济基础和市场机制，恰是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石。经过 20 世纪大实践，大对比，人类社会重新、普遍地选择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其真谛奥妙也恰在于此。因此，我们在 20 世纪末叶，在邓小平倡导下毅然决然选择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确实是明智的、及时的，这一划时代的选择，真可谓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多少苦难和挫折之后，不幸中之大幸。

摆脱思想依附，是促成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力迅疾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20世纪里，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能把科学技术，把现代生产力推动、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为什么他们总能囊括诺贝尔科学奖的绝大多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他们除了普遍实现了摆脱人身依附外，还很早就使社会广大公众解脱、摆脱了思想、精神的依附！（这里当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依附关系，非指宗教信仰上的某种精神依附。）

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人类从神权、王权下的一次大解放。这次解放对冲破种种人身依附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文艺复兴实际上也是人们从思想、精神上摆脱依附的一次历史性大启蒙。随后，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商品经济社会迅疾兴起。到19世纪末，在普遍解脱了人身依附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感到有需要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独立，开始日益感到进一步挣脱、解脱思想依附的迫切需要，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诉求变得日益迫切。由此，以维护个人思想自由表达，个人意志自由选择为核心内容的“人权”要求变得日益高涨起来。20世纪的社会实践表明，“人权”概念和“人权”诉求，是人身解脱依附之后，进而获得思想解脱依附的基石，也是普遍实现“民是主，官是仆，主可择仆，主可制仆，主可逐仆”的民主体制的法律基础，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最高准则之一。最近，我国政府正式确认了这个准则，并准备逐步签署有关的全部国际公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明智之举，值得高兴值得庆幸。至此，全国上下，全国各界都有义务，有权利切实推动之，努力贯彻之。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20世纪里，上述以维护思想自由，解脱思想依附为特征的“人权”运动，也大大触发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大发扬，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大促进了广大公众民主意识、民主要求的广泛觉醒。这实际上也是20世纪人类进步史册中最辉煌之一页！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是解脱思想依附，激发人类创造创新潜力的力量源泉

提到科学，提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时下已成为一种时髦，有时调子唱得“高得不能再高”了。但20世纪人类实践馈赠给我们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科学，作为人类一代代探知外在客观，探知各种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作为一个后人不断补充，不断修正，乃至推翻前人认识的不断进取的过程，在20世纪得到了空前的推动和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悟性和理性。依据我个人的体会和感悟，我认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具体构成，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要素，即：

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

以上五大要素，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中“须臾不可离”，“缺一不可为”，“缺一难为继”的基本要素、基本准则，相信我国一切严肃、严谨的自然科学家都会有此切身体验的。我也相信，我们的许多真正具有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在这几点上，多年来更是有拂之不去的难言之隐、切肤之痛的。真正掌握并身体力行这五条要素的

人，或者说，真正获得了这五条权利的人，才算是真正解脱了思想依附、精神依附的人。必须看到，人，人类，作为高级动物，高级生灵，其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会思维，会理性思维，会通过语言表达思维，通过行动实践思维。而这种理性思维中，又以创造性思维、突破性思维、发展性思维为人类的最大优势所在。人类自身，人类社会恰恰是依靠了这种创造性、突破性、发展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的。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打击、压制、限制这种思维，实际上就是打击、压制、限制了人类的——人人都普遍具有的——这个最大优势。其结果，只会造成破坏性、迫害性的后果，以致大大阻碍、阻缓了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睿智、理性的发展。20世纪人类社会大实践，大对比，最后促成重新大选择所反映出的最深刻最实质性的焦点也恰在于此。人类社会中一切落伍的地区，落伍的民族，落伍的国家，落伍的领域，莫不是有意无意地限制、压制了人的自由思想，造成广泛的思想依附的结果。因此，以科学的思想启示人，以科学的精神激励人，以“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这五大科学要素武装人，从根本上解脱解除任何思想依附，是20世纪留给人类最为珍贵的瑰宝之一。当今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之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他们的诺贝尔奖人才之精英辈出，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悟到我们的不足，悟到我们长期以来的病根所在。否则，我们即便有十几亿人口的“数量优势”，但十几亿人中人人都具有的最大的潜在优势——即创造性、突破性、发展性思维，仍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被置于受压受限的状态，那么继续落伍，更加落伍，将是必然的。20世纪的实践证明，由此导致的历史的裁决是不能抗拒，无法摆脱的。

民主，是人身依附、思想依附解脱之后必然的历史性诉求

广大社会公众一旦摆脱了人身依附、思想依附，不仅经济自立，进而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由此爆发出的生产力，所爆发出的现代科技创造性、创新性潜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巨变。在这种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随之而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发展中，普遍的民主诉求，包括知情权、参政权、选举权、监督权、意愿表达权等诉求的高涨，以及要求相应的法律化、制度化保障，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了。

20世纪世界性的大规模的民主实践也证明，民主有两个层面，两个核心内涵：一个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思想、意志、权益，以及意愿选择的公开表达、公开实践的权利；一个是各种个人权益之间，各阶层利益之间的相互理性妥协，理性谐同，理性互动，亦即一种相互宽容、相互兼融、相互谦纳的良性社会互动。20世纪实践告诉我们，民主既是人人手中都应拥有的保障个人意志，保障个人权益的“权利盾牌”，民主又是保障不得侵犯他人，保障尊重所有人权的一种理性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因此，民主决不是“聚众闹事”，不是“大轰大嗡”，不是“势众压人”，更不是会使“天下大乱”的“洪水猛兽”。一句话，民主对广大公众，对一切讲科学，讲理性，讲良知，讲社会公平公正的人，是十分可亲、十分可爱的，而决不是可怕的。

题末寄语

“市场”、“科学”、“民主”，是20世纪人类社会大实践、

大对比、大选择后，留给人们的，并得到全球公认、共择的人类瑰宝。也是人类由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更高文明发展的前进基石。也更是我国从“20 世纪此岸”迈向“21 世纪彼岸”的“过河石”。让我们继续邓小平开创的现代化事业，迈开新的历史性步伐，看准这几块石头，摸准这几块石头，“过河”，“过河”，坚决的“过河”！历史已不给我们任何退路了，只有坚决的、义无反顾的摸准“市场”、“科学”、“民主”的石头过河，过河，中华民族才会有真正的光明前途！

一切善良的、理智的人们，一切禀赋着历史良知的人们，让我们共同怀着宽容、理解，怀着兼融、谦纳的共识和良性互动，共同携手，上下配合，有准备、有部署、有步骤地跨出历史的新步伐，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去迎接中华民族更光辉的前程！

（1998 年第 5 期）

萧 乾

展望与祝愿

一进入12月，各地不少友人就寄来贺卡。对于我们接近九旬的老人，这五光十色的贺卡有两重意义。首先就是相互告知：我们都还健在。这意义有时大于祝贺。它使同龄人相互放了心。当然，看着贺卡上覆着白云的松枝，以及艳丽多姿的花朵，也感到浮泳在友情的暖流中。

一年又过去了！距离21世纪还只差三年了。我也许能——也许不能跨进这新世纪的门坎，无论如何，我坚信那将是更繁荣、更美好、更合理的世纪。许多残余迷信将会被破除，许多更好的理想将会实现。我祝愿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更健康、干净、宽敞、更如人意。中国人虽不傲气，可胸脯将会更加挺直，民主空气将会更加发扬，霸气将不再得逞。吃得太饱的，减减肥；半饱的，能果上腹。

希望少搭些彩牌坊，多建点民房。让露宿的，头上有屋顶。除了沿海大商埠，希望建设者心目中也有内地。让功劳记在人民心上，政绩以全体人民的实惠来衡量。

民主不应是一句空话，更不可当做招牌。民者大众也。民

主就得以民为主。文化也好，繁荣也好，都得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不可捂着盖着，尽可能让大众心明眼亮。越敢面对现实，就越不怕说三道四。捂着盖着不表示坚强，绝不沉醉在虚幻的太平中。

所以与其在角落里窃窃私议，不如让话都摆在桌面上。这可需要气量和风度。唱者再多，单音也形不成大合唱。四部合唱才更宏亮，更和谐，更能唱出气势。

我们永远不可自满，应时刻着眼在差距上。承认落后和甘居落后不是一码事。甘居就没出息了，承认才有志气，才有希望。我们的开国者，不管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是脚踏实地的大人物。他们都志在追赶。有时性急了一些，但急也是为了追赶。

就文学而言，无论创作、理论还是翻译，都还得先着眼于基本建设。论点需要争，时兴的需要赶，但底子基础还得厚。多少世界名著还没有中译本，史诗型的创作也不多见。但我们有雄厚的历史底子，也不乏智者才子。在放眼世界的同时，我们总会创造出震撼世界的经典。

好不容易才闯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关口，至今仍然健在当然是幸运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的铁姑娘和硬汉子。如今，那些挥舞棍棒的已化为粪土，而敢于顶撞他们的却成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不朽人物。他们的气节和气概是咱们这民族的光彩，是永恒的榜样。

历次运动都以道歉或改正煞尾了事，从来也没有认真总结过。这不合辩证唯物的认识论。道歉或改正关系到个人，总结更重要，因为那关系到民族的未来。

尽管我们是个具有大智的民族，可今后仍难免会失误。可我仍希望不重复过去的失误。

（1997 年第 2 期）

柯 灵

化干戈为玉帛

——欢庆香港回归

1948～1949年间，为了参加《文汇报》到香港复刊出版，我在那里愉快地生活过一年。《文汇报》在上海“孤岛”时期创刊，明确的目标是为了抗日，不久就被摧折。抗战胜利后复刊，目标转为争取和平民主，复兴祖国，但再度遭到明令停刊。“不到黄河心不死”，《文汇报》东山再起，到香港复出，是利用了香港的新闻自由，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祖国命运的执著，锲而不舍。遗憾的是，香港虽好，却是英国的殖民地，旧中国的一根耻辱柱。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全世界的注意力聚焦香港，等待6月和7月之间首尾相衔的那个时刻，因为香港回归的盛大典礼，预定在维多利亚海边填海新建、美轮美奂的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届时国际政要，风从云集，济济一堂，将为这古今罕见的重大史事作证。“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万众瞩目，是很自然的事。

英国强占香港，是19世纪中叶至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

战争中发生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影片、电视正在全国和海外献映，义旨所在，是“落后就要挨打”这六字真言。照我的理解，落后的含义，不仅指国家实力和文明程度，还应包括领导阶层有没有远大的识力和恢弘的胸襟，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世界大势，迎头赶上，力争上游。中英交恶，追源溯流，还可以推前到 18 世纪。早在 1793 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乘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派了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致送礼物，表示祝贺，目的是要求建立关系，开放口岸，优惠税则，扩大通商。那时乾隆驻跸热河，不在北京，但皇帝万寿，自有许多封建排场，繁文缛节，劈面而来的第一碰撞，就是礼仪上难解的死结：见皇帝必须跪拜，否则即藐视君上，论罪当诛，而马戛尔尼却抵死不肯。三跪九叩首，有一套严格的动作规范，中国人跪拜惯了，不以为异；英国人没有这个规矩，也没有这套技巧，而且无疑看作是对他们的侮辱。那时英国正在西方崛起，享受工业革命的甘美果实，到处寻求市场，其欲逐逐。乾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的思维轴心是中国乃天朝大国，世界的中枢，神圣不可侵犯。“万国衣冠拜冕旒”，进贡是应该的，通商却不受欢迎，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给英王乔治第三下了谕旨，下面摘录片段，和读者一起，瞻仰一下皇帝的威仪：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福，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与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

“尔王表由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臣，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

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之制，恐尔王亦所知悉。

“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按：英国要求在北京开一商行），收贮货物……更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

“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详加开导。遣令返国，恐尔使臣回国后，禀达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聆悉。”

真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从这道圣旨里可见双方隔膜之深，距离之远，沟通之难。后果如何，自然也不难想见。若仅就国势强弱立论，在鸦片战争中订城下之盟的道光朝，固然已经是有清一代日薄崦嵫的时候，在乾隆朝却还有丽日中天的气象（虽然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但也决不是船坚炮利的英国敌手。而平等交易，互通有无，也无损于天朝之尊。乾隆懵懵，以“十全武功”自诩，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夜郎自大和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的痼疾，要作认真深刻的反思，决不能忽视这痼疾的顽强性，因为反思的目的，不单是反刍痛苦的经验，而是发掘失败和受辱的原因。

中国和英国是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大国，都有过灿烂的文化，被称为“老大帝国”。但在近代史上，英国一直走在前头，中国一直落在后面。英国是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领地遍于全球，有“日不落国”之称；中国因为大而弱，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多的国家。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种局面才起变化。在1997年7月1日零时前米字旗在香港岛上缓缓降落，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接着缓缓升起；英国从前用炮舰轰鸣的方式开进蓝色的维多利亚港，现在在添马舰基地举行庄重的告别式以

后，她派在香港的末代总督将坐上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在晨光曦微中鼓棹而去。天亮了，两国之间的历史旧案已经了清，平等友好、合作互利的历史新页可以揭开了。

香港回归之所以值得如此隆重的庆祝，激起如此热烈的回响，不仅因为中国洗雪了百年的耻辱，表明了她强大的威望和实力，俯仰由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还因为这个事件为世界外交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创例：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理智代替情绪，以文明礼貌代替武力较量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公道的胜利，和平的胜利，文明的胜利，是中国的大喜事，世界的大喜事，也是英国的大喜事——因为体面地退还殖民地比恃强夺取殖民地光彩得多，更合于绅士风貌。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国两制”的创立和实行，充分表现了中国的智慧与自信，是政治学上富有诗意的天才创作，必将在全世界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改朝换代太频繁了，每次易代，不可避免地要使敌对双方大量流血，还要使许多不愿随波逐流的知识精英和无辜的百姓遭受无妄之灾。香港回归祖国这样的大喜讯，就一度被很多香港人看作“天上一片云”。近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传媒关于香港的报道，特别留心读香港《文汇报》。——可惜我能看到的港报只此一家，眼界不广。我欣喜地看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播种，抽芽，蓓蕾初展，长势喜人。新的行政长官，临时立法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官员、公务员和警务员，全部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照旧正常工作，香港居民照旧按照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安居乐业，海外移民纷纷还乡，激进的民主派照样示威游行，在公园的夜空下开烛光会，并不妨害一片熙和的太平景象。除了政权更易，香港还是香港，惯于挑剔中国的一两个西方大国，不断设法杯葛，他们期待在香港出现的混乱和衰退并没有出现，许多现象表明，化干戈为玉帛，香港的明天充满希

望。

我这篇文章是昨天应约开始写的，现在完稿，已经是6月30日下午1时，休息片刻以后，我将和我的老伴打开电视机，收看全国和海外华侨欢庆的热闹场面，直到半夜看完香港政权交接和新官上任的宣誓仪式。因为这是百年难遇的盛事。

让我们为香港深深祝福！

1997年6月30日

（1997年第9期）

邵燕祥

同情高检

我同情高检。高检是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

有人写文章说，希望报上的批评性读者来信能有下文。殊不知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一个省里也竟能拖延两年多顶着不办。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遭遇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一般新闻监督的报刊批评，更不用说身陷冤案的普通公民，何足道哉!

岁尾年头，翻阅旧报，重温了石家庄的一件未了积案，即1990年出版的《中越战争秘录》一书在石家庄以“投机倒把罪”立案侦查一事。公安机关经过两年多调查取证，最后得出此案不构成刑事犯罪，当事人闫少卿无罪的结论。石家庄市和河北省两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对此案作出相同的认定。

然而，尽管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提出“撤销对此案的侦查”的意见，并报经公安部批准；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检察机关也同意上述结

论；但都遭到河北省“有关部门”的强烈干预，迟迟不能依法结案，且自1993年初反而升级。

此案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的工作日程后，认真核查的结果，经院领导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3年年底将高检的意见电告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要求撤销石家庄市检察院作出的逮捕闫少卿的决定，尽快结案。

又是两年过去了，据说河北省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我们饱经冤假错案之祸的中国人，不是一般地同情弱者，而是对一切身陷不公正处境的当事人感同身受。而这一次，人们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应该有力地主持公道，维护法律尊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时，却发现有禁不止，有令不行，高检原来也无可奈何！高检是否具有它应有的对执法机关实施监督，进行最终裁决的权威？不能不让人怀疑；而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沦为实际上的弱者，还不值得同情吗？

在这里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高检的威信，还有国家法制的形象，以至普法教育的可信性。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矛盾需要法律的调节，社会稳定有赖于法制的保障。而当人们发现“法律”（应该说是执法部门）只管守法的人，不管或管不了不守法的人的时候，当人们发现执法部门有时不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反而屈从于非法的干预，甚至在这种干预下明知故犯，作出违法之举的时候，当人们发现只有无权的人信守法律，某些有权的人不但不遵守法律，而且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不惜践踏法律，却可以不受任何制约的时候，我们的普法和法律宣传是不是会落到自打耳光的尴尬境地呢？

在上述案件中，据说关键只在于“省里曾经有人对此事批（示）过”，这使人惊讶“两个凡是”的阴魂未散。犹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才得以平反大量冤

假错案，而"两个凡是"指的是毛泽东生前的指示；怎么在如今的河北省，个别人的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意见竟能凌驾于公检法机关之上，超乎法律之外，享有了毛泽东所不再享有的特权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全都法有明文。按说高检的决定在地方上应该通行无阻，但在河北省硬是不能执行，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落实"情况也还有待检查。我们向来对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持批评态度，然而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所受的干预和掣肘，其消极影响倒有点接近我们所批评的"三权分立"的弊端了，例如从效率说，石家庄一案已迁延五年多之久，还嫌不够长吗？

从这个案件的迁延中，我们看到俗谚中的"现官不如现管"还在起着作用。高检虽属"最高"，毕竟"天高皇帝远"；而"省里"（即使是"个别领导"）却"近在眼前"，于是什么法律呀，原则呀，全都让位于服从"顶头上司"的实际考虑了。这不仅反映出官场陋习，尤其暴露了权与法之间、上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性裂缝，这无疑是"反体制"的人们所乐见的权力体制的"解构"，而不能不引起维护体制的人们的忧心：那些置高检的决定于不顾的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跟某个当事人过不去，也许只不过想牺牲一个无权无势的当事人以证明所作指示的正确吧，但无论具体动机如何，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请注意：这一对高检的抵制行为已经形成对国家公检法权力及其体制的"解构"！

因此，"同情高检"云云，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看来

也许远远不能充分表达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

1996 年 1 月 7 日

附注：有关此案，1995 年 6 月 23 日《南方周末》和《中华工商时报》、《北京青年报》、《文摘报》均有报道，1995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19 日《法制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过评论。

（1996 年第 2 期）

邵燕祥

论“真正的共产党人”

读李雅民长篇新闻报道《泰山脚下的较量》，其中说到1996年1月17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听取省检察院对胡建学的初查报告后，一致同意撤销胡建学的一切职务，由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十几位常委义愤填膺”，说“这不是解决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解决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领导权，能否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的大问题”。（10月5日《南方日报》）

胡建学贪污受贿达到巨案标准的事，突破重重阻力，揭发了，处理了。胡建学被证明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能像胡建学那样。离开泰山脚下，别处还有胡建学没有？

前些时候还揭发处理过山西平陆县常乐镇前村村委会主任裴安军横行乡里、打骂群众、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一案。据报道，此人在常乐镇党委眼皮下作恶，却年年评为先进党员；镇党委书记郭某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予以公开表扬，称赞他打老百姓耳光“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的威风，打出了社会主义的

威风"！群众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还算不算共产党员？"（1996年9月18日《中国青年报》，转引自1996年9月26日《报刊文摘》）

群众问"算不算"也就是够不够格，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大约也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之谓；鱼肉乡民的土豪恶霸不算，那个称赞坏人"打出共产党的威风"的书记郭某自然也不算。

在湖南娄底地区，1996年4月发生一起青年法官伍治东在地区公安处遭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逼供的案件：在列入全国十大必破案件的"3·30案件"侦破过程中，新化县公安局某副局长以一件校服为线索，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将新化县人民法院干部伍治东传到公安局隔离审查，又未经新化县法院同意，押往娄底地区公安处收审所监狱。因伍不肯乱说，被认为不老实，升级为收监审查；整整一个月中受了十三天三十多种非刑折磨。伍治东受刑时抗议说："你们这样严刑拷打是要负责任的。"打手则猖狂宣称："在共产党手里，告状是没有用的。"（1996年9月6日《湘声报》）

据1996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伍治东的冤案至今没有一个"说法"。试问在此案中，打手不算，究竟有几个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依法办事的"真正共产党人"？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1996年10月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检察工作会议上说："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渎职、侵权犯罪，践踏了国家法律，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依法从重从严予以惩治。"

请看，这里所举的各项坏事，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不该干，岂独限于"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那不但违犯党纪，而且是违犯国法的！

过去总听人讲，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

里；今又有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之说。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那么好分辨的；我头一回听说这个称号，是“文革”中1970年那次庐山会议之后加给陈伯达的，如果早能看出他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什么委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重任呢？——今天的年轻读者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个“组长”，多少元戎曾闻之而丧气，多少热衷者抢当“勤务员”，也因为它类似“组长”什么的，实指“一把手”也。

假马克思主义者不好指认，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轻易就能拿出证明来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则不然，组织部里有党员花名册，只要还没开除党籍的，都是名正言顺的共产党员。“假党员”有严格的界定，是指冒充党员的人，重在没有合法的党籍，并不在于实际表现。胡建学是假党员吗？不是。如果他是假党员，怎么当得上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党代会选举时的资格审查是怎么做的？胡建学的党员资格是真的。一个真的共产党员，怎么又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

我想，当山东省委常委们强调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手里时，是因为他们认为买官卖官、行贿索贿的胡建学之流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末，一个党员只要没有买官卖官、行贿索贿，或者虽有类似情节但是没到立案的标准，或者虽然受到某种处分，但是仍然留在党内，换句话说，虽已违法乱纪只要没有法办，没有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就都可以叫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了？果然如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变得多么廉价！

当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和一切党派团体一样，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也和一切公民一样，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所有的执政党成员都在这个意义上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们身上不发生张思卿检察长指出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

供”等践踏国家法律的行为，反腐败斗争便可以大奏凯歌，至少社会风气会有很大的改观。因此，把“真正的共产党人”标竿定在遵纪守法的高度上，未必是降格以求，也还不算跌价(中国共产党要求其每个党员都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嘛)。不过要想让所有具有共产党党籍的人都成为遵纪守法的人，只是党章上的要求，按之实际，则是奢望。

现实在我们面前摆着：如胡建学之流，还有像山西平陆常乐镇、湖南娄底和新化一案中某些共产党员，都是“真党员”，在党籍的意义上，谁曰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娄底打手宣称的“在共产党手里，告状是没有用的”云云，记者问道：“是不是他们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共产党’呢？”问得好。胡建学在泰安市一手遮天，拉帮结伙，把严格执法的检察长公丕汉视同仇敌，不是分明有一个与现行中国共产党党章不同的自己的“共产党”吗？然而他又分明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没有更高的党政机关干预时，胡建学这个他们自己的腐败的“共产党”不是“名正言顺”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行使一切权力吗？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员的国家工作人员、泰安市检察长公丕汉在行使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的权力时，是何等艰难，他和他的同事们遭到胡建学之流在组织内外施加的多大的压力呀！

胡建学不止一个，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好在人们同时看到，公丕汉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胡建学们背后是共产党内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势力。而公丕汉们代表着共产党内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健康力量，也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健康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甚至我们民族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于上述两种力量的对比。“泰山脚下的较量”所告诉我们的，就不限于泰山脚下的一桩公案了。

如果读者同意这个表述，我以为这比表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非‘真正的共产党人’”之争可能更确切些。

再赘一句，我看过有关材料以后（我知道我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材料远远不能包括事态的全部），对公丕汉同志和坚决支持他的上级和同事们充满了敬意。我知道公丕汉们为了坚持原则和人格尊严冒着多大风险，准备做多大牺牲，我还知道公丕汉甚至一度濒临精神崩溃的危机；在向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我还不得不表示对他们今后处境包括人身安全的担忧。腐败势力经营多年，盘根错节，休戚相关，“共存共荣”，他们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合法”的乃至非法的手段加害于健康力量；此类事过去多有，今后亦难杜绝，毋宁说还将更加频繁地发生，一切关注共产党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们，都宜加以注意。

1996 年 10 月 14 日

附记：再三体会山东同志们所谓“真正的共产党人”之说，实指胡建学之流作为共产党员属于“假冒伪劣”。歧义盖出于我们习惯上对“假冒”和“伪劣”不加区别；胡建学的表现对照党章要求确是“伪劣”，不那么“货真价实”，然而不管怎么说却并不是“假冒”的。放眼商场，名牌的没落，固然一半是受冒牌货的冲击，一半甚至更多怕也是因货色低劣而丧失信誉。打“假冒”、打“伪劣”，于物已不易，于人则尤难：如在思想理论上鉴定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就还没有一个能孚众望的质量检查机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何况鉴别“伪劣”共产党人。好在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查处大案要案过程中正在积累这方面的经验。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1996 年 10 月 19 日

（1996 年第 12 期）

邵燕祥

场外说官

官场在哪里?

一说官场，人们就会想到《官场现形记》，以为不堪。其实，运动员的活动大半在运动场，演员在剧场和排练场，经济活动有有形的商场和无形的市场，文人之所谓文坛不是又称文场么?从政者的活动空间可谓大矣，而台前幕后归结到一个范畴，还是定位在：官场。

天有九重，地有八极，官场者，坐落何处?曰：在党与人民之间。这样说有这样说的根据；一位被树为模范的干部说，要上不愧于党，下不愧于人民。因知干部定位在党之下，在人民之上。干部即官，官在民上，既符国情，又合物理：不管机构怎么臃肿，冗员怎么众多，总是民多而官少，若是把民搁到官的上头，岂不是倒金字塔?危乎殆矣。

不必讳称官

有人不爱听“官”长“官”短，强调今天的干部不同于昔日的官，把今天的干部叫做官，似乎就把新中国混同于旧社会，把共产党混同于蒋介石、北洋军阀、历代皇朝了。

事情哪有这般严重呢？世界上除非不具可比性的事物，总是有同有不同。今天中国大陆上的官，跟过去蒋介石国民党的官员，跟军阀时期和历代皇朝的官员，以至跟西方世界的官员，相同的是都隶属于执政的实体，是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的公职人员；按我们过去习惯说法，都是吃公粮的脱产干部，所谓公家人或官家人也。至于政权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另当别论。

然而，官民对立，盖有年矣。古所谓君，说是万民之首，其实准确地说是百官众臣之首；他们当中有明白人，也不乏好人，可是他们无力改变众多官僚腐败无能、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的现状，于是官逼民反了，于是造反的民把所有的官作出全称判断“一勺烩”了。套用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民视君如寇雠”的话，可以说“官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官如寇雠”。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中不就是这样的吗？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起来造蒋介石国民党的反，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权机构，把其中的官员作为一个阶级打倒。

一句废话：官僚主义总是不好的

在翻天覆地的革命形势下，作为革命者的各级干部，是不会把自己同“官”、“官员”更不用说“官吏”、“官僚”联系在

一起，甚至认为这样的称呼是混淆敌我，是别有用心，是对自己的侮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这种思维惯性而把旧时代的清官贪官视同一律，乃至说清官比贪官更危险更可恶，因为他们助长人民对专制统治者的幻想云云，虽是违反常情常理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革命时期的言论和行动，经常以革命对象的言论和行动为参照系，以敌对一方为反面教员，“反其道而行之”，虽略嫌简单，但不无收效。直观教学，强烈对比，在处理军民关系、干群即官民关系方面，大决战中的共产党远胜蒋介石一筹，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全国范围掌权以后，在原先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某些干部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等有违初衷，也违背了对人民的许诺的现象。毛泽东在私下谈话里曾经指责过所谓“死官僚”，其意当近于顽固不化或死不改悔的“官僚”吧，革命者心目中的“官僚”是如地主恶霸一样反动，以至尤有过之的反动政权的代表人物骨干栋梁，分量很重；而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则限于“官僚主义”，解释为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病毒侵入了我们的肌体。从政权的阶级性质不同这一论点出发，也还有论证过我们今天的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反动政权的官僚主义不同，虽然没有说我们的官僚主义比别人的好。论者的用心不见得坏，毋宁说是补天补台一派，意在阐明解决旧的官僚主义唯有用革命推翻旧政权、打倒旧官僚一法，而对待今天的官僚主义，则要靠发扬革命队伍里传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想，不管怎么说，官僚主义总是不好的。

一个常识：古今老百姓一样反对贪官

古之贪官是利用职权把不义之财中饱私囊，今之贪官是利用职权把不义之财捞进口袋；古时贪污的是民脂民膏，今天贪

污的是人民血汗；古今的贪污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古今的老百姓对贪污的义愤也没有什么两样。

不但古今，而且中外，要清正廉明的官，不要贪腐无能的官，并无异议，几乎不受社会制度不同的影响，尽管官员产生方式不一，任免、升降、奖惩的规矩不一，不同国度或不同时期的吏治宽严也不一，而且不管“官”对“民”怎么看怎么要求，“民”对“官”的基本要求没有多大的变化。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官是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有了剩余劳动，分化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以后产生的，由劳力之民养活着对全社会进行管理以至统治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总是少数，他们的表现和他们与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无疑影响着经济的盛衰、社会的治乱、政权的绝续。拿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朝来说，官分九品，金字塔的顶端是皇帝，明白的皇帝为了自己社稷的兴亡，也要考虑人民对官吏的要求，提出朝廷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所谓官箴。

又一句废话：古时的明白皇帝也要治贪官

我们可以批评这些官箴以及无数类似的书面东西的虚伪性、欺骗性，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形诸文字的对各级官吏的具体要求，虽产生于官本位的社会条件下，可是在我们今天依然适用，许多是我们也要悬为目标，并不就那么容易做到的。而在古老年代里，不仅有官箴，更有律法，有一些朝代规定和执行得十分严峻。和珅那样的大贪官不必说，就是科场舞弊案，竟也往往适用最高刑：处死。哪里像我们今天对待出卖试题一类违法案件那样当成小菜一碟，轻轻放过。

我不想美化皇权专制时代，那时的明白皇帝，知道科举取士是遴选候补官员，关系重大，不容假冒伪劣混迹充数；但万

岁爷说了算的体制下，毕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不可能真有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不可能真正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连我们今天办案还得硬着头皮突破一层又一层的关系网，对付一个比一个官大的说客呢，焉敢厚责古人！

在“官官相护”之外

贪官和其他坏官之能够孳生不已，官运不败，官官相护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大家知道，我们的干部队伍虽然庞大，与人民群众相比仍是少数。亿万人民面对腐败，怎么竟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呢？假冒和伪劣产品泛滥成灾，不是有人就问中国的消费者为什么不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吗？被称为旋风的龙应台女士也发出过惊人一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也许等于说：你为什么不对官员实行监督？

监督：谈何容易

要实现“民”对“官”的监督，除了人民群众须提高文化和政治素质以外，还得为这种监督创造相应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舆论环境，以及一定的条件；例如要“知情”，不“知情”而言监督，不是瞎监督吗？

从理论上说，对官有法律的、行政的、党内的各种监督，还有舆论的监督，如果全都付诸实行，那么为官的还真得兢兢业业，甚至如履薄冰，庸官也许会被迫辞职，至少在他管辖的范围出了差池就非引咎辞职不可；贪官也会有所收敛，不敢那么有恃无恐，扬长过市，“潇洒走一回”。

我们每逢处理一件较有影响的案件，需要向人民有所交代时，反复总结出一条颠扑不破的教训：有腐败，有违法违纪行

为的地方，必定是监督不力或没有监督的地方、部门和薄弱环节。再好的干部没有监督也会变坏，这好像是几十年前斯大林说过的；我不知道哪些坏家伙原是“好干部”，也无法指认哪些“好干部”正在变坏，但我确知有不少本来就不那么好的干部，又没有监督，得以肆无忌惮地恣意妄为，他们能把自己的坏事说成好事，而把不同意他们干坏事的打成坏人！

如果没有监督，就已是腐败格局

我们常常说，没有监督导致腐败；能不能说，没有监督的格局就已是一种腐败的格局，从这一腐败格局的基础上会孳生出各种的霉菌和蛆虫。因为任何一个健全或力求健全的政治社会，都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不止限于现代，古时候就是这样：监督机制正常运行，则肌体正常健康；监督不力直到完全废弛，结果是部分地腐败以至完全彻底地烂掉。

监督之于官，集中到两点，就是政绩与政纪。

做官没有政绩行吗？什么叫政绩，还用解释吗？做官总要做事；于一方百姓有利的好事，就是政绩，传播众口，就叫政声。政声有真假，有水分，因为也可以“炒”，不光有了市场经济才有炒作，计划经济时期的“大跃进”放“卫星”，还不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上下结合制造泡沫新闻么？名者实之宾，政声附丽于政绩。现在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某些地方、部门据说有甚于 1958 年，就是这么一种游戏。还有，是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动人口号下，只顾短期效应，损害长远利益，搞什么首长工程，有的已经不只是哗众取宠，而是祸国殃民。严格地说，这也就不只是政绩问题，而是政纪问题了。

上级是“实”，群众是“虚”

有两句话，我们共产党的官没有不知道的（不管在实践中是否遵循，若是不知道，政治考试都通不过），就是：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然而知易行难，“真正要做到就不容易了”。

特别是对谁负责这一点，上级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具体，很直观；可群众呢，相对说来就比较抽象，群众中的任何一个都未经授权代表全体群众，倒是上级可以说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一切听上级的，不是足以自圆其说吗？

关键还不在于要自圆其说，为自己辩护，因为并没有这种必要。真正必要的是：让上级满意，才能保官，才能升官；归根结底，官是上级任命的，谁给官做，对谁负责，似也是逻辑的必然。（古人就此有过无数精辟的议论，近读丁东先生写郭沫若治学一文，其中引用明海瑞语有云：“仁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

什么样的上级选用什么样的下级

对上级负责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组织原则里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嘛。从理论上说，组织，便是上级与下级的辩证统一，上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上级便代表组织，还有什么说的？问题是，即使暂时让群众靠边不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干部的任免虽说总是经过某一级组织，以致跑官的往往要跑遍码头，从干部部门的主管到党委的每个成员一一拜到，广结善缘；然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令的第一把手。除非这个党委内部存在派别且势均力敌，在用人上会出现某种妥协的兼容；

一般说来，是第一把手说了算，用人者想的是谁对我好，被用者想的也是谁对我好，乐于效命，许以驱驰，进一步就不是在工作中对谁负责的问题，而流于结党营私。这样的事例，我们在基层见得还少吗？

我们在干部的任用上反对过“任人唯亲”，同时又宣扬过“内举不避亲”，但事情一旦向坏的方面发展，有时会有始料之所不及，我们遇到的“任人唯坏”、“任人唯臭”，就是这么来的。

好人要做官，而且越大越好

从政绩的大小、有无和真假，说到用人这个环节，若说官场的阴暗面，也就接近要害了。要害也简单，在于有些人心中没有人民，没有社会，没有国家，只有做官，从做官捞好处，官要越大越好，捞的好处越多越好。

尽管如此，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官总是要有人做的。我不同意“好人不做官，做官没好人”的偏激说法，我只是说，要做官，先做人，做了官，还要继续做人，做好人，做好官。过去我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现在经过现实的摔打，在现实政治的层次，我持“好人要做官”论。好人不做官，难道都叫坏人去做？

“好人要做官”论还有一层意思，即如能胜任，倒也还是官做得越大越好。前年我在一个场合说过：从希望官越做越大的心理来说，除了某些人认定官大权重才便于攫取更大私利以外，不能否认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有在更大范围做出政绩的条件。所以我认为不宜把仕途上期望晋升的一概指为“官迷”。从事业务技术的知识分子希望获得高级职称，为什么要从政的公务员只能安于小吏呢？不过，如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升官，也要取之有道；人们的反感，多半是因为许多人的当官和升官太不够“君子”了的缘故吧。

做官与做人：不是废话

最近似乎是在深圳作过调查，说有六成的地方官员“对通过仕途实现个人抱负有更高的预期”云云。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希望官做得更高，好实现更大的抱负。我欣赏肯这么说、敢这么说的人，要紧的是别光找头头去表决心，而要把话讲在群众当面，讲在你的竞争者当面，一言出口，大家作证，将来也好据以考察，考察你怎么为官，也从而考察你怎么为人，是不是为了做官，忘了做人。

有人质疑说，你的愿望善良是无疑的，尽量让好人做官，这当然好，可是你能保他做了官能不变坏吗？我说，不能保证。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另一句无端侮辱有钱的妇女，从略），这句话未免以偏概全，多半是没钱的男人的牢骚，不过从金钱对人的腐蚀这一点立论，让人想一想财富和道德的关系，也不失其警示的意义。至于不管男人或女人，会不会一当官就变坏，我说过我不同意所谓“当官没好人”的说法，认为做官与做人，当好官和当好人不是截然殊途、不得两全的事。

金钱腐蚀人，权力也腐蚀人。权力会导致腐败，那么做或大或小的官，掌或大或小的权，是不是一定陷入或大或小的腐败呢？有这个危险，但端看自己的选择。过去不是说尖兵最易成为俘虏么？但又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令人顿生敬意。我向甘冒艰险而不视仕途为畏途的勇者致敬！

“滥好人”不行

我之“好人要做官”论所指的好人，看来得加个小小注解：他们应该是洞悉官场的腐败，懂得做官要想不同流合污搞腐败，就得跟腐败斗争，并且不怕因此丢官罢职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只是个“滥好人”，不能抵制贪官坏官，倒让贪官坏官用来挡风、打掩护，完全无助于官风和吏治的净化。那不反壮了贪官坏官的声威吗？

如此所述，好人云云，符合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我们遇见过“好人没本事”，“无才便是德”(有位周天先生的文章里说有一种“学而劣则仕”)，不行；我们也遇见过坏人，确有一方面的本事，但干坏事的本事更大，也不行。

为官不易，选官亦不易。但我国毕竟有 13 亿人口，能做官的好人总不会空缺到非以坏人填充不可吧。我虽不以人口众多作为中国的夸耀，但在这里我还是颇有信心的。

场外说官也只是说说罢了

至于怎么样让够格的好人适逢其会地做上需要他们做，他们也愿意做、做得了的官，他们做了官以后，让他们乐于接受监督，并不认为好人无须监督、坏人才须监督，而他们是好人，只能是他监督别人而不容别人监督他，等等，这涉及一连串具体操作问题，不是我们场外说官的人所能尽言的了。

场外说官，犹如野老献曝，听不听由你，说不说在我。中外古今，有各式各样的官场，假如今之官场比古之官场，中国官场比外国官场，少些丑闻，多些清明空气，不是你好我好大

家都好吗?

两点声明

附带声明两点:第一,这里笼统称官,没按公务员法细加区别,因为这里不是资格铨叙,实际上也远未分流。一个才从税务学校毕业的小青年,上岗没几天,就知道在他管片的二三十家工商户轮流报销饭钱;其实他还够不上“官”,但说官场陋习包括此类琐屑细节,恐也不算是扩大化。上行下效,具体而微乎?

第二,这里说官,篇幅已满,更不暇涉及其他。社会风气,官风固然起主导作用,但如说“世风”出了问题,那么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风”也不能辞其咎。且不说强调干部知识化以来,输送了大量有大专学历的人去做官;就是业务技术人员甚至专家中,学风上缺乏独立思考的“唯书”“唯上”,以及为了获得某种认可而曲学阿世,跟刚才说的某些干部——官员的表现,不是如出一辙吗?详略不关厚薄,因为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1997 年第 1 期)

黄一龙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诸葛亮引用历史经验告诫阿斗的话，语见《出师表》，说“此先汉所以兴隆也”。这条方针的意思并不高深，犹如说“要吃饭，不要吃屎”，为的是皇帝好。所以历来的皇帝都懂得，历来的皇帝都同意，没有人提出“亲小人，远贤臣”的口号和它竞争。

可是它却难于实行。紧接着上述那句话，就是“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说明在实践上“要吃屎，不吃饭”的已经大有人在。接着下来的事实是，他所谆谆告诫的对象本人，在遵行他的教导二十来年以后，实在闷得发慌，改而积极参加吃屎党，亲黄皓，远姜维，宫内府内被他搞得污七糟八，几年之间就把蜀汉玩完。而以后像他一样的皇帝，代有传人，各领风骚若干年，总是搞得国破家亡民穷财尽而后已。同意“亲贤臣，远小人”的方针，却实行“亲小人，远贤臣”的政策，而且世代相传，生生不已，真是千古之谜。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坐在他们的宝座想想，谜底也不难求得，这就是在

如何界定贤臣和小人的问题上，宝座上下发生了分歧。宝座下面认为是贤臣的，上面却以为是小人，反之亦然，自我感觉却是认真执行“亲贤臣，远小人”的方针，群小包围成了群贤毕至，诛杀忠良成了除恶务尽，好个雄才大略的主子！有了这种幻觉，不到山穷水尽“仓皇辞庙日”，一般不会醒来。

单单责备这些当最高领导的智商不高，认黑为白，我看未必公平。因为上述的界定贤臣小人的问题，其实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一大难题。对于封建王朝，什么人是贤臣呢？首要的条件自然是“忠”。可是这个“忠”的内涵却是双重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死谏，武死战，是忠，忠于国家。可是视皇上如同老子，胜过老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找乐子，臣挖空心思筑酒池设肉林选美女做清词修宫殿造龙舟，也是忠，忠于皇帝本人。“忠”的双重含义，使古来多少当臣子的伤透了脑筋。要忠于国，国家的事就不能胡搞，搞垮了君臣都要倒霉。可是“忠言逆耳”，逆了君的耳，让他不舒服，还算忠于君吗？还能令君觉得这是忠于他吗？所谓“伴君若伴虎”，历来认为这是由于当皇帝的脾气都不好，我以为倒是这个“忠”字的歧义在作怪。它不仅使臣子难当，而且使君王难做。“家天下”者，国就是君的家，君王自然不想败家，所以从主观上讲，没有希望亡国之君，所以臣下还是以能进“忠言”的好。可是一个君王如果成天“让人讲话”来使自己不舒服，这个家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最好有这样的贤臣，忠心为国，不谋私利；又忠心娱君，不说“阴暗面”。而历史事实是二者不可得兼，那就只好靠君王自己跟着感觉来判断谁是贤臣谁是小人了。

而感觉却又常常靠不住。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最易接纳小人的贡献，以声色狗马再加称颂圣上英明为有趣，向脑袋发出错误信息，所以常使君王们“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之时犯判

断错误，以小人为贤臣以贤臣为小人。不说历史上的荒淫庸懦之主，就是公认的伟大人物，也难免受此欺骗。唐太宗就曾把那个常进逆耳忠言的魏征恨得咬牙切齿，差点把他的这面“人镜”“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直到封建社会完蛋，建了人民共和国，“贤臣”小人之辨依然是个难解之题。一代伟人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对于历代君王们在这上面栽的跟头洞如观火，可是他自己也难免犯亲林彪远彭德怀亲江青（不是说夫妻关系）远老革命的错误。真是千古难题啊！

不过人民共和国总给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现实的条件，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诠释那个宝贝的“忠”，使它只有一种含义：忠于人民忠于祖国，除此以外一概不认。当然，这不过是书生之见，书生对于君也臣也两无体验，纸上谈忠罢了。

（1998 年第 3 期）

黄一龙

梦里的爱国主义和清醒的爱国主义

“亘古男儿一放翁”，已是对于爱国诗人陆游（放翁）的定评。论诗，他不算古今第一，但就诗里体现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至少前无古人。只是他生不逢时，遇着那个老是挨打受气丧师失地的宋王朝和老是治国无术腐败有方的历任皇帝老子，“辜负胸中百万兵”了。所以他的一腔热血，全部灌进诗里，还灌进梦里，连做梦也想着恢复中原。他的《剑南诗稿》里记梦的甚至梦中作的诗凡十几首，而其中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过半。“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用古代关于“因梦”、“想梦”的分析，此梦既有窗外风声雨声的“因”，又有日夜期望恢复故土的“想”，真是对于梦的极完整的诠释。

在陆氏记梦的诗里，有一篇的题目很长：“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

(标点为我擅加)，而它的特点还不在于其长，却在透露了古来的“爱国主义”里面不大为人注意的一个信息。

陆游梦见他跟着皇帝西征，不止打回中原，而且打到“西凉府”。诗里说“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云云，指出唐初所设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之地，于安史之乱以后就陷于“胡”，事实上是指吐蕃回鹘二族，到南宋则该地属西夏和西辽。以南宋的版图而论，要打到属于西夏的西凉，首先得越过金国所占京兆府即今西安，所以收复西凉府也标志着收复自唐以后汉族政权失去的大片领土，那该是比今日收回香港更辉煌的胜利。陆游有幸梦到这个景象，真够他高兴一夜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高兴于收复失地，而且高兴于“见城邑人物繁丽”。如果五百年间置于异族统治之下的“城邑人物”荒芜败落，那倒不怎么值得意外，并且一定为“城邑人物”现在之脱离苦海，获得解放而高兴。因为所以日夜梦想恢复故土，除了复我“汉官威仪”以外，应当还有拯救苦难同胞的意思；依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主要应是后一层意思。可是当陆游发现那些被拯救的同胞并未受苦，城池也很繁荣兴旺，那么他的“喜甚”就只能落实到“岗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即国家疆域政令的恢复上了。我以为，这样的喜，即使到“甚”，体积也不会极大，一个清醒的爱国头脑该有更大的容量去思考它更多的意义。就陆游的时代来说，那个江南小朝廷的文恬武嬉、醉生梦死的政治，东南一隅“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的残破的经济，真当令人想想“五百年间”我们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为何积弱至此，居然比不上大漠之中“化外”的一个小城！

这是说对于清醒的头脑的要求，陆游当夜是在做梦，当不清醒；所有的胜利和繁荣，也是梦境，当不得真。可是他在梦里的思维方式，衡诸我们清醒的同胞，却远非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秦皇一统，汉武开边，历来被认为伟大的胜利，也的确是伟大的胜利，可是秦始皇把海内变成一座大监狱，汉武帝把游牧民族一赶千里，也是这些胜利的组成部分，关心这一部分的人倒很少了。这说明历来的“爱国主义”的“终极关怀”，不过定位在领土主权上面，至于有了领土如何治理，有了主权如何享用，以及爱国主义如何同“爱民主义”相统一等等，基本不在考虑之内。这算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吧。

陆游的梦境，今天倒真实现了一个，就是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办法当然不是“大驾亲征”，而是化干戈为玉帛，和抢走了香港的英国谈判，并且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包括“干戈”作后盾，谈是谈不回来的。所以它也证明了祖国的强大，值得“喜甚”。现在我们是清醒的人，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下收回了一个“城邑人物繁丽”的香港，所以我们该在“喜甚”之余，比做梦的陆游想得更多一些，例如一百五十年间香港人民办到的事，我们办到了多少，为什么？

（1998 年第 1 期）

李 普

江青·女皇·卒子

江青梦想当女皇，想学武则天，曾经大谈其“面首”。亏得她是个大草包，连慈禧那点儿本事也没有。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可能还要遭更大的难，受更多的罪。

可是，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有些人把江青估计得太高了，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好像她真有惑主弄权之术，结帮窃国之能。我想，过于轻信了她自己的吹嘘，可能是原因之一。

读了《炎黄春秋》杂志1997年第5期《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一文，大有收获。作者苏双碧以确凿的史料，让我们可以看清江青的本来面目。这篇文章很长，其中有关江青的两件事可证。

一是组织姚文元写那篇评吴晗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不错，这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个战略部署中十分重要的一步棋。江青把“花环”戴到自己头上，说她本人如何如何在北京受压，如何如何只得跑上海找人写文章，如何如何像在旧社会做秘密工作一

样，吹得天花乱坠。

其实，这是毛泽东的策划，那篇文章也经他看过。以后江青曾经说，她是奉命去上海办这件事的。苏文中说："毛泽东是要从吴晗的《海瑞罢官》找出一个足以撼动政界的重大政治问题来。……在吴晗的后边有条'黑线'。"不过毛泽东这个意图，当初江青是否完全心领神会，恐怕也不一定。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时机不到，他自己是半个字也决不透露的，以免打草惊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制定《二月提纲》，认为批判吴晗应是学术性质，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也是时机不到，先要"稳住对方的阵脚"，刘少奇等人果然长时间蒙在鼓里。

二是那个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这是用来对付前述党中央《二月提纲》的，标题前面还赫然冠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13个大字。这件事江青更是大吹特吹。说她本人召开那个座谈会是利用解放军的力量，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事实是，这件事，也是毛泽东的安排。他认为时机成熟，要以批判吴晗为契机，打倒所谓"刘邓司令部"。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极为重大的一步。那个《纪要》，是毛泽东多次修改定稿的。他并且在1966年3月17日指示"此件用军委名义"。所以，冠在标题前面的那13个大字，究竟是毛的亲笔还是别人根据他的指示写上去的；特别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事先是否同林彪打过招呼，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苏文没有说清。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历来文件上和权威人物口头上都这样说，毛泽东本人也确认这个事实，确实一点不假。这两件具体事的经过还表明，"文化大革

命”又是他亲自指挥的，而不只是一般的发动和原则领导。不过，这亲自指挥有个从后台逐步走到前台的过程。江青参与的这两件事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战略部署的大事，江青把自己吹嘘得很厉害，其实正如苏氏所说，她“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卒子而已”。后一件事尤其足以说明问题，“她是没有力量搬动林彪，更没有力量搬动军队的”。

（1998年第4期）

牧 惠

必也正名乎

孔夫子很强调“正名”。既然叫做“觚”，就得是上圆下方，腹部作四条棱角，足部也作四条棱角，容量限于两三升的酒具。而对着从上到下都呈圆形而且容量远不止两三升的酒具，孔夫子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叹息。仅仅从这个细节看，咱们实在难明为什么孔夫子对此区区小事大发牢骚，更不懂为什么他的学生还得把这句“语录”刻在竹简上流传下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总算找到他关于为什么那么强调正名的用意。《子路篇第十三》有一段说，子路问孔子：“假如卫君聘你去主持国政，你准备从哪儿入手?”“正名。”“你老人家干吗那么迂阔呢！用词不当能严重到这个地步?”孔子批评子路胡说八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所谓正名，指的不是一般的用词不当，而是名实相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名。君不君，臣不臣，就会乱套。

这样看来，孔夫子的主张有一定道理。咱们今天没有什么君臣；但是，假如上级不像上级，下级不像下级，公仆主人名实不副，也可能出现“民无所措手足”的情况。

咱们是不是也有“觚不觚”的现象呢？

恐怕是有的。

以工人阶级这个“名”为例。在50年代我们被教育说，在夺取政权以前，工人被资本家剥削，不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应正名为“无产阶级”；全国解放后，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工厂是国家的工厂，工人当然也是工厂的主人。不仅如此，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因此，工人再也不是无产者，称“无产阶级”不妥，得正名为工人阶级。于是，无产阶级这个词，仅适用于历史，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

几十年过去了。工人阶级是不是工厂的主人，工人到底是工人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最近却遭到了公开的挑战。

事例之一：山西省寿阳县木器厂在工厂绝大多数职工的反对声中，被主管部门以80万元的价格出卖了。工厂卖掉后，工人按工龄长短得到一定的补偿金；但同时必须写出辞职报告也即是同意被解雇。面对工人的质询，县长助理、县劳动就业局局长李福祥说，党的十五大以后，企业全都要卖给个人，工人只是劳动者，不再是什么主人翁。县委书记吴兴文对上访的工人这样说：“十五大的精神就是卖，就是快卖。”

因为不再是什么主人翁，所以寿阳县木器厂的工人，即使要求搞股份合作制也不行。吉林省物贸大厦的工人比寿阳县木器厂的工人幸福多了。这个国有企业1997年10月搞股份制，从总经理到员工都要（注意这个“要”字）交股本金，中层干部2.5万元，一般职工1.5万元，合同工8000元。10月底，有43人未交，于是被勒令下岗。在吉林，类似的企业还有。

有顺口溜云："职工加股东，才是主人翁。"显然，"职工非股东"，就"不是主人翁"了。

诸如此类不止一两桩的事例，显然对工人阶级再也不是无产阶级这种说法扔出了白手套。"5000 元买回了主人翁意识"云云，似乎并不是个别记者的创作。

也许可以说，这是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歪曲？也确实如此。宪法写得清清楚楚，咱们这个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国有企业怎么会没有工人的一份呢？从理论上政治上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主人翁地位，绝对错误。报纸发表山西、吉林这两则新闻，也是当做居然有此咄咄怪事、居然有这样的县委书记、县长助理而加以揭露的。

如果仅仅如此，我这篇文章写不写也无所谓。非常不幸的是，实践却无声地证明这位县委书记、县长助理歪打正着——在此之前，工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主人翁。最有力的证据是，虽然可以说"少数"、"个别"，但"穷庙富方丈"现象的大量存在谁也不会否认。对于发不出工资的厂长买豪华轿车、出国"考察"、大吃大喝，工人无法制止甚至因为反对而被赏以小鞋。1997 年 3 月 27 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登出戴煌的一篇报道：齐齐哈尔市有一间帐篷厂，被六任败家子厂长从"六好企业"弄成连年亏损，奄奄一息。工人奋起投票罢免渎职厂长，那结果是被罢免的厂长临走还大捞一笔，民选的厂长被暴徒威胁得退下阵来，再选出的厂长和她的丈夫、儿子被殴，住房被砸，积极分子的老伴被砍死在自家的沙发上。对于这一起起事件，市有关领导采取沉默的态度。这就是想当真主人的"活教材"！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理论与实践严重背离的情况呢？这个问题显然值得深思深思。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在社会主义国家企业里，到底是生产管理者从属于生产者，还是生产者从属于生产管理者，谁有权作出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工厂、企业（扩而言之，包括管理工厂的有关领导如市、县、区政权，农村里还包括村、镇政权）的管理者由人民选举、罢免，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委派强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即使难以避免也不会那么严重。咱们不是反复讲解放生产力吗？人的解放也可以说是生产力的解放。真正解放了成为主人翁的工人，不仅免受变质（由公仆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主子）的管理者的压迫剥削（少劳多得、不劳而获）和横加屈辱，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全部聪明才智。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到底会不会有成效，看来是个问题。

1998 年 2 月 26 日凌晨，日本东京都国立市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发现，分别经营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流通的 3 个中小企业的社长在各自的房间里自缢；3 月 3 日，又一名经营制造镜框的小公司社长与其妻在家中双双上吊自杀。后者的客厅桌子上留有遗书，上写“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我已无计可施，只有选择自杀。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但我没有钱发给大家，对不起了”。只因为企业面临困境，职工拿不到工资，便选择了自杀，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匪夷所思。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只听说资本家因为破产而跳楼自杀的，因发不出工资而自杀实在新鲜。在我们这里，别说私营企业家，即使是国有企业，工厂破产、工人受穷，企业家们照样脸不红、心不跳地吃香喝辣，运气好点的还少不了继续加官晋爵。有人就此怪事的接连发生说，日本人有一定渊源的自杀倾向。涉嫌贪污的官吏悬梁自尽，发不出工资的厂长也觉得对不起人自杀。不知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但是，除此之外，暂时咱们还找不到符合阶级分析、

阶级斗争理论的更理想的答案。

由此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成语。把日本资本家的这类事例搜集起来，印制成小册子，组织那些搞垮了不止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和例如齐齐哈尔市的有关领导们学习讨论，我很担心那效果是足以使他们笑掉大牙。“攻玉”？他根本就不是一块玉！究竟应当“正名”为什么呢？可惜这答案在《资本论》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也无法找到。朱镕基当选总理后，提出了不少适应民心的措施，人们颇受鼓舞，很希望他成功。但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不解决，再加上还有一些“理论家”和实力派当他们的后台，坚决捍卫“富方丈”的财源“社会主义”，那结果如何，人们仍不禁为此捏一把汗。

必也正名乎？需要正名的事物多着呢！

（1998年第5期）

钟叔河

高家堰故事

新华社1997年1月13日报道，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保证大江大河安全度汛，“哪个地方出问题，由哪个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报纸上登出这条消息时，我在病床上打吊针，枕旁只放一册《清稗类钞》，里面正好有一则《高家堰决河案》，说的是170年前发生在江苏的一件事。原来那时候那里溃堤成灾，地方的“主要领导”也是要负政治、法律责任。不能换上夹克便装，到灾民中去走一转，拍几个电视镜头，便可以完事的。《清稗类钞》原文为文言，现将这一则译述如下，算是讲个故事吧。

——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苏北发大水。在一次风暴中，高家堰十三堡的大堤决口，洪泽湖水泛滥成灾，淮安、扬州两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皇上得知后，极为震怒，派大学士汪廷彦、尚书文孚到江苏处理。

第二年正月间，汪、文一行（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取证之后）到达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南河总督衙门（当时黄河不

入山东、由此东流入海）。在黄河北岸万柳园河督衙门辕门外，站着等候的人员有：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孙玉庭、漕运总督（负责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饷的行政长官）魏元煜、南河总督（负责江苏、安徽境内黄河水利工程的行政长官）张文浩以及他们属下的文武官员。

官员们站立了一些时候，只见一人骑马奔来，高声喊："中堂（大学士的称呼）请漕台魏大人准备恭请皇上圣安！"听到只招呼漕督一人，孙玉庭和张文浩便知道自己已经被撤职，得准备接受处分了。

汪、文一行进了衙门，魏元煜跟着入内请过圣安，仍复退出。接着，便传呼孙、魏、张三人接旨。这时中门大开，有四位办事人员捧护着皇上亲笔用银朱写的谕旨出来，肃立在专门设立的香案前，孙、魏、张三人跪下听宣。当听到："孙玉庭辜负国恩，疏忽职守，犯有不可原恕的罪错，皇上问孙玉庭知罪否？"孙玉庭连忙摘下自己的官帽，口称"孙玉庭昏愦糊涂，辜负天恩，只求皇上从重治罪"，同时不住地往地上磕头。谕旨随即宣布："孙玉庭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听候处理。两江总督一职，由魏元煜代理。"魏元煜叩首谢恩。

钦差继续宣旨："张文浩于防汛时不接受正确意见，刚愎自用，处置失宜，以致造成此次洪灾，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其罪行尤为严重，皇上问张文浩知罪否？"这时张文浩已经换去官帽官服，听后伏地痛哭，自称祸国殃民，罪该万死，求皇上明正典刑。上谕："张文浩革职后立即拘禁，先加刑具在当地示众两月，再从严究办。"执法人员早已将刑具准备好，乃是用木板做成的一副枷，长宽各尺余，上用黄绸覆盖（因是皇上特命，用于枷系大臣，故加黄绸），拿来枷在张文浩的颈上，便把他带到河堤上示众去了。

接着便召集道、厅、营级官员齐跪庭中，宣布旨意："钦

差临行时，皇上当面交代，自古刑不上大夫，何况张文浩官居总督，为什么还要戴枷示众？乃是因为，国家最重人民生命；设官行政，都是为了保护人民。堤防决口，人民生命不保，百姓家园被毁，被迫漂荡流离，实是朝廷的耻辱。故不能不严惩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官员，以示国家对民命的重视。两淮官民，务须体会皇上的用意。”

然后，汪、文一行回京复命。张文浩最后定罪，被充军发配伊犁。

这则故事是讲完了，有人也许会说，大水大风都是天灾，河督大人戴枷充军，总督大人撤职查办，未免过当。为此我特别查了《清实录》，原来在高家堰决口之前，张文浩已因办理河工不善，迭经上谕切责，还被“拔去花翎，降为三品顶戴”；孙玉庭也因未能“早为参奏”张文浩，受过降级处分。高家堰决口后，派汪、文南下察看，又先查问过有关道厅官员，知道了在黄汛来时，各道厅曾禀请堵闭御黄闸，放泄洪泽湖水，而张文浩固执己见，不肯听信，应闭不闭，应开不开，以致湖水过高，掣塌口门二处，坍卸石堤一万一千余丈，故此张文浩确实应负主要责任。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己未，即汪、文到达清江浦之前，皇上还阅批过孙玉庭一道奏章，孙奏称堤防决口，“实由暴风狂猛，人力难防，张文浩但为节省启闭钱粮，迟堵御黄坝，蓄清过旺（黄汛到来前所蓄清水水位过高），转致棘手”，竭力为张文浩也就是为自己开脱。皇上批云：“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误国溺职之人，朕断不能姑息也。”

“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是皇上的批语便以人废言。堤垮了，垸倒了，当然是因为水太大，水太大便是天灾。但人在天老爷面前从来就不是无能为力的，不然又何必要修水利？何必要设官施治，花

费百姓的钱粮？自古国家皆以社稷生民为重，农田（社）、作物（稷）和老百姓受了巨大损失，享俸禄的地方长官即不能不负其该负之责。看来，专制君王所施行的虽是人治而非法治，但当关系“人命至重”的时候，亦不得不严施法度，办几个“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要讲历史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历史吧。

《清稗类钞》提到的“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中华书局印本把文孚错印成“文学”。查《清实录》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辛亥，“命吏部尚书文孚、礼部尚书汪廷珍驰往江南查办事件”，文孚列名在前。又查萧一山《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宰辅表》和《清代军机大臣表》，汪廷珍于道光五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则其充协揆尚在下命往江南之后（也有可能在其到达清江浦之前已授协揆，故能称中堂）。文孚则嘉庆二十四年已入军机，道光元年任礼部尚书，仍任军机大臣，四年又加太子少保，位望实在汪前。而被查办的孙玉庭，却在道光元年就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四年闰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仍督两江，资格比文、汪更老。孙是两朝重臣，政声一直很好，这次也是因张文浩牵连受过；只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守土有责”，即不能不负其责。其时他已 72 岁，第二年就以“编修”退休，降了 12 级（大学士为正一品，编修为正七品）。又过了 10 年，他“重赴鹿鸣”，才赏了个四品顶戴，旋即故去，到死也没能官复原职。

170 年前，对防汛疏忽，溃了堤，死了人，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其处理经过情形就是如此。史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其然，岂其然乎？

（1997 年第 9 期）

冯东书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有人在80年代初曾对我说，中国在极左路线年代生产力所以发展慢，主要原因是“人”太少。当时我挺纳闷，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怎么能说生产发展慢的原因是“人”太少呢？他说，“人”是思维的动物，会创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发展各方面的创造性。在极左路线下，不准“人”独立思考问题，人人都被改造为活工具，只能按领袖的意志行动的活工具，全国只有领袖在那里动脑子，在那里创造。从“人”的本义上来说，中国当时不是人太少太少了吗？因此当时的中国是活“工具”多，而“人”太少。一个国家只有个别领袖能动脑子，能发挥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怎么会发展快。

这话有些尖刻，但细想起来，有点道理。

我们这些跑农村的记者们，在改革以前，千方百计地宣传报道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期农民能提高劳动效率，能提高劳动质量，能提高农业产量，解决中国的吃饭、穿衣问题。但是，年复一年，我们的宣传报道总见不到效果，农民就

是不好好干，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讲质量，种地不种满，不种足，犁地时不犁透，锄地时不锄净草，收获时节，产量本来不高，还到处抛撒，不收净。

怎么回事呢？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这中间的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一部分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弟，以及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对人民公社不满，在那里作怪。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大家都以为这下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了。可是，大家年年、月月、日日抓住阶级斗争，抓了好多年，还是不灵，生产仍然上不去，吃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简直使人有点悲观了。

改革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枷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过去我们搞了二十几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极左路线对“人”的态度不对，在农村就是对农民的态度不对，得罪了农民。在 1955 年到 1956 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强制全国农民“自愿”入社，1958 年又强制农民“自愿”入人民公社。经过这两次强制“自愿”，全国农民就从有自主人格、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变成了简单劳动工具。当时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有这个权利，有那个权利。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去劳动的权利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

他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早上去哪里干什么活，上午去哪里干什么活，下午去哪里干什么活，都是分派的。新媳妇想回娘家，队长不让，自己走了，回来要挨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时检讨了还要扣工分。小伙子没准假，上街办私事去了，回来也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民公社社

员干完活，记多少工分，有的地方还评一评，大多数地方评不了，干部说给谁记多少分就记多少分，经常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差，记差不多的工分。到收获季节分粮、分油、分菜，干部掌着大权，分多少，吃多少，分什么，吃什么，社员没有自由选择权。社员养猪养多了，养牛养多了，是在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让你早睡就早睡，不让你早睡就开会。“选举”干部，叫社员选谁就选谁，民主形式都有，民主的权利没有。山西省沁县有一位老县长对我说：“什么民主选举！村里干部都是我们定的。”农业生产是从上一级一级计划下去的，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怎么种，生产队长也没有多少权，做不了主，他也是执行上级计划的工具。原来社员家里还允许保留一小块自留地，“文化大革命”中也收归集体了。这样，农民就只剩下服从命令去当劳动工具的“权利”了。

中国农民过去最高兴的一段时期，是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最痛快的时期，是黄金时代。因为那时，他们是自己经营自己的土地，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劳动产品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干起活来好像不觉得累。现在一下把他们变成为简单的服从命令干活的劳动工具，当时的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们毕竟是“人”，是有生产经营权利的“人”，有生活选择权利的“人”。他们觉得当劳动工具很憋气，上地的时候互相说：“走，给人家干去！”意思是给干部们干去。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不游行，不示威，不吭气，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手，他们放出了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他们出工不出力，人没有到齐，大家都在地头站着、坐着、等着。干部不去，大家就提前在地头晒太阳或歇凉休息。

过去有个很天真的想法，以为全国都按统一指挥去干，生产不就搞好了吗？其实不然。你越不尊重人，想通过阶级斗

争，用强制的办法统一大家的行动，最后是只会有形式上的统一，千百万群众自有办法对付你。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着实宣传了一阵让人当驯服工具的道理，不仅农民当劳动工具，工人、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当工具。就是叫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啥，不要胡思乱想。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不服气，认为工具就是工具，人就是人，人是创造工具，使用工具的，人有自主意识，怎么说成是工具呢？都是工具了，谁是使用工具的人呢？那时还扎扎实实作了一阵“思想工作”。好在那时任何人都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自己端不住自己的饭碗，再加上思想上的批判，不服也得服，大家也就想“通”了。

农民不想当简单的劳动工具，他们可是厉害得很。一个农民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全国几亿农民的合力就不得了。他们是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他们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软磨硬泡，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结果是油也紧张，肉也紧张，菜也紧张，棉也紧张，搞得全国人民的肚皮受不住了。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下子，是农民教育了我们共产党。这种紧张现象时间长了，党内的有识之士就看出来了，再按极左那一套搞下去，实在是不行了，只好被迫改革。改革都是被迫的，被人民群众所迫。舒舒服服过得好好的，要改革干什么？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意愿，把土地分到户，联产承包，让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让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也可以经商办企业。农民觉得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了，这才感觉自己当了主人。这一下，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以后，干劲大得不得了，个个都活了起来，磨不推自转，不仅两只手解放了，几亿人的脑子也转动起来了，全国哪里有先进技术，他们都能去学来弄来。他们的创造

性发挥出来了。北京过去一亩地打400斤小麦就很不错了，现在在普通的地方也要打七八百斤，好的地要打1000斤。他们养虾也会了，养鳖也会了，养蟹也会了。马上，全国的粮也多了，肉也多了，水产也多了，油也多了，菜也多了，果也多了，以至多得卖不出去，没库房放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地上有两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改革以后，又有两句话："极左路线把人变成工具，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极左路线把人变成工具以后，在改革开放中可暴露了极大的副作用。改革了，开放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放手让人自由投入市场去干了，这时有的人痛苦了。原来当了20年工具脑子退化了，现在没人指挥，没人开动，他们竟不会自己走路了。

（1998年第4期）

曾伯炎

精神文明与精神行贿

行贿受贿，这种社会病毒，谁也明白在腐蚀着社会肌体；有愤懑者，有诅咒者，但是厌恶一阵之后，临到去办一件事时，还很难拒绝这种蝇营狗苟之行。据云，一位在医院做手术的病人，听说自己的红包遭到医生拒绝，竟优心这手术不成功哩！讲人道的医院也变成风行贿道了，其他行业的清白，也就可想而知。例如新闻传媒，代表着社会良心，也被“有偿新闻”这种贿风，把良心换成财心了，不惊心骇世吗？

面对这种揪人心魂的贿风，曾有人说这种病毒感染，是国门开放，从外面钻进来的。此说貌似有理，可认真一考究，便发现；行贿受贿，原是地道的土特产，并非舶来货。明代社会的腐败，在吴承恩的笔下，也表现在他那部《西游记》里。当唐三藏师徒历尽磨难，到了西天，因为没有给阿傩、伽叶二尊者好处费，便受欺诈，只得到一些“无字真经”。这不是吴承恩在讽刺社会，连西天这片净土，也无贿难办事吗？再看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王熙凤不识几个大字，也会索贿三千两

银子，帮人化解一桩命案哩！在明、清两代，国门都是封闭的，既吹不进西风，也吹不入商风、行贿之风，不是依然大刮吗？我少年时，在一个交通闭塞的典型的农业小城市，同一条街上住着一位前清遗下的刽子手，他不过是封建专制的小小工具而已，但他凭手中一把行刑的刀，也可向死刑犯索贿：给他银两多，可一刀了结，少痛苦，如果不给，就等于凌迟处死了。像阿Q那样的穷光蛋，肯定死得很痛苦的。把行贿受贿的发明权，推给夷狄之邦的外国人，太不实事求是了吧？

诚然，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尤其是“三反”、“五反”期间，贿风曾受到过打击与遏制，一度式微，可是并不彻底。这不彻底，不仅经济领域中行贿受贿的腐败未根除，而且精神领域里的行贿受贿，并未引起重视，也从未扫除。不仅未扫除，还无形有形，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与助长。本来从未根除的行贿受贿心理，在经济上大行平均主义的大气候下，便以吹牛拍马这种精神行贿方式，风行于世。这种精神行贿比起物质行贿来，可说是低成本、低投入，高收益，并且风险特别小。而且学吹学拍，比学任何济世济人的本事容易，不需要文化基础，文盲半文盲都可一学就会。另一方面，这些低文化者以往处于仰视贵人，俯首于富人足下，一旦斗转星移，机运一来，摇身一变，就以新的语言和新的方式重操旧业，而且技艺越来越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只要“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硬通货”盛行的日子里，那位副统帅林彪就捞到不少政治资本。当然，说这种精神行贿是空手道的无本生意，是低成本，不过是用一般的经济尺度度量的，而用另一种尺度，就是高投入了。因为行贿者不仅要付出良知、道德，甚至全部人格。今天，我们常感慨的所谓素质低下，使精神文明推行受阻，未必没有这种人性变得丑恶的祸患。历代的王朝，其帝王、官僚都要靠那种溜须拍马的精神行

贿以敷其面子，壮其威仪，迷其心性；宦官、弄臣，就是历代封建王朝专业化的精神行贿人物。溯远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就透露了那些人物很擅此技。商鞅去见秦孝公，他身上就揣了两种方案，见讲王道不受青睐，便改说霸道。帝王喜欢听什么就给什么，于是立即由布衣而卿相。只有孔子、孟子这些儒家，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目的，而无察言观色的机巧，更不会违心地做口是心非的表演，也就是不擅精神行贿法，所以，他们做官也只能做几十天，落得周游列国处处碰壁饿肚子，末了只好去执教鞭。

现在，行贿受贿，虽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可是只限于物质范畴。而溜须拍马一类的精神行贿，不仅未见收敛，还有人包装成什么“现代公关学”云云。如有人篡改民国初年李宗吾那本《厚黑学》，把种种精神行贿垃圾插上各种堂哉皇哉的标签，大量推销于市。

看来，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还需要继续，许多颠倒的是非，还需再颠倒过来。过去，我们把物质的行贿，认定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可是，对精神行贿却偏爱，还误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朴素阶级感情”，使这种精神的丑鄙恶行披上极其堂皇的皮，这无异于发予通行证，焉不贿风如炽；更何况以丑鄙为高尚，并奖以党票与官职，就更使人趋之若鹜了。尽管那些吹之，捧之，谄之，媚之的言行，令人发呕，可有些人却认为很受益很实惠。于是，精神行贿成为某些人跻身革命行列的化装术，图谋晋升的登龙术，不落入法网的护身术，打击实事求是派的杀手锏。在此势态下，说真话的逼得说假话，慕君子之风者也只好做小人了。过去，我们在痛斥“精神污染”，骂这污染那污染，恰恰不注意这种通行于世蔚然成风的精神行贿之污染，警惕着门外户外的细菌，却忘了门内户内的病毒，用外因论代替内因论，还自诩为革命观点。今日一些人大讲本土

传统文化的优越，其中也确有不少优质的，灿烂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因素，可是像鲁迅揭示的我们国民精神中的那些痈疽与病灶，岂肃清乎？别说精神行贿在社会上、官场中，就是在庙宇、祠堂，请看那些庙神、家神，无不在接受芸芸众生的香火纸钱的贿赂。类似这种国民行贿的心理惯性，也就是今日从官场到市场贿风流行的肥沃土壤，是人们甘于匍匐在特权足下行贿的一个根源。

有不谙吾国国情的外商，以为做生意是等价交换、合同行为，不知生意做不成，卡在何处？未行贿也。而咱们行贿受贿之“国粹”，又在教唆外国人，搞行贿“输出”。在许多场合，我们大讲要国格尊严，可是在这里，却什么面子都不要了。

我理解，今日建设精神文明是一项灵魂的工程。如今干什么事都爱用工程名之，姑且借用。此项人的灵魂工程，不是古典文明，必须是现代文明，也就是说不是小农的文明，而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文明与市场文明。要是种种精神行贿不被屏弃，不为社会彻底厌恶，不从官场与市场内清除，那么，人的灵魂恐怕始终是佝偻着的，心志是蜷缩着的，气质是在鄙俗丑陋中泡着的。别说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站立起的人没能站立起来，就是现代市场社会那种平等意识的人也难规范出来，更别说我们经常呼唤的那种大写的人了。如果我们中国还是《法门寺》中贾桂那样的状态，还是鲁迅讲的阿 Q 那些德性，骨子里还是几千年的封建遗传基因，那么，尽管穿起这文明那文明的衣装，抹着很文明的脂粉，戴起很文明的面具，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文明风气，理想的文明秩序吗？恐怕很容易产生如蝇如蛆那么多的伪君子，人的本性异化的怪胎。

我并不是在此对文明的理想说泄气话，而是热心话。憬悟到既然已经害了不文明之病，不能光治标，更要治本而已。

（1997 年第 5 期）

毛志成

呼唤“权力学”

说某位官场人物“精通权力学”，他听了之后一定有受辱感，乃至会沉下脸自辩说：“我就懂得为人民服务，根本不懂什么权力学！”

其实，作为一门科学的“权力学”，非但不是什么不正派的东西，而且应该是官场人物的必修课。例如上面那位，说的就是很漂亮的外行话，“就懂得为人民服务”，这当然是好品质，但它仅仅能玉成一个人成为“好人”，未必能证明他一定是“好官”。

评论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个人形象在质地上的优劣，和评论一位官场人物权力行为、权力形象的是否上乘，标准很不相同，前者只需依据“心眼儿好坏”之类的模糊尺码就可以了，后者则必须严格地衡定他的权力品质、权力效应。

将一位官场人物的个人行为和权力行为搅在一起，浑然一团，就是“权力科学”不健全的重要标志。贪官、赃官、昏官不必说了，他们个人行为和权力行为都很龌龊；即使好官，个

人行为上的某些优点也未必能代替权力行为上的差劲儿。一个长官周济几个叫花子，用自己的工资救助几个失学儿童，这虽然都是"好人"之举，但都不一定是"好官"的标志。也许，他那个辖区之所以叫花子多，失学儿童多，恰恰是他的权力行为和权力效应质量太低所致。更何况，这种"公私不分"的评官标准，最容易使政绩伪劣的人进行自我掩饰或自我粉饰。

必须建立权力学，使权力科学化、高质化。权力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应当写清几个"限定"，诸如：

一、时间限定

权力的生效期必须与权力的法定期同步，一点也不能含糊。在位的前一天，你的行为就不具有权力效应，哪怕你是某位在位者的亲友、心腹、红人；退位的第二天，你就该是正常意义上的老百姓，能教书就去教书，能做工就去做工，什么都不会做就摆个小货摊什么的。官场应是流星世界，不必顾什么面子，致使那些登场的人永不退场；把一个角色演砸了，便给他换个角色演，如"平级调"、"降级使用"、"退居二线"等等。

二、空间限定

一个有某种权力的人，只有"上班"的时候，"就位"的时候才有权。下了班，离开衙门，就是"个人"，给下属使什么眼色、打什么电话都不再生效。走进商场买东西，别人花三元钱买一斤鸡蛋，商场经理算你一元钱一斤，你就应该脸红，意识到有卖权之嫌。下馆子或设家宴，必须百分之百自掏腰包，稍有"猫儿腻"都是涉贿。

而且，权力不许扩散。市长的老婆、孩子只是市长个人的老婆、孩子，无须泛称什么市长夫人、市长公子、市长千金，让他们一点也沾不到“官光”。

三、权力取向限定

一个做官的人，在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后，尽可以处理家务，有一点私心也没有什么。一经“就位”，就必须将自己的兴趣、精力、心思百分之百“交公”，只想国事、民事，稍一走神儿想家事、私事都有渎职之嫌。若是坐在“公位”上却将大部分时间用在想自己的“鬼心思”上，就属盗位者流。

四、权力效应限定

越权发号施令固然不行，权力疲软、效应低微也不成。任何一级权力机关，都不能供养超越合法权限的霸主，尽管此种人有老资格，有硬根子，也不能白白养着一批既无作为又“不犯错误”的“本分食客”。在权力机器上，任何多余、失效部件都必须清除。

五、待遇限定

“官到穷时乃是清”，标准太高，不必作为规定来强调。这里只取线：限制一切超待遇的索取和消费。什么是腐败？不要等到犯了大案、要案时再认腐败的账。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的个人消费、家庭财产、衣食规格、行为排场超过了你的正经收入、合法待遇，就是腐败！说一千道一万，不敢搞“财产透明”，别的都不大可信。

中国一天不建立起这样的权力科学，一天就会累得去说许多含含混混的话。

（1997年第1期）

张 扬

难道要事事“惊动总书记”

看到1997年5月9日《南方周末》上载有鄢烈山先生一篇《桂冠现象》，便读起来。从文章中得知，《南方日报》正在连载《“官司”惊动中南海》……

我不清楚中南海内的机构设置，但我知道与“官司”有关的国家机构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安全部及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人大各有关委员会都不在中南海。既然如此，什么“官司”，怎么会“惊动中南海”呢？

往下读，才得知有个当过县委副书记的刘建军，他“在台上时，按照党章赋予的权利，向省委领导写内部材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地委书记的一个严重问题（其公子有人命案被判了刑，却可以头顶国徽、腰佩武器‘执法’，影响极坏），就被以‘分裂党’的吓人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得到了比那些玩忽职守或挥霍公款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人严厉得多的处分；而以他曾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过的经历，写了上百万字的申诉书，找了很多大衙门、大人物，数年下来竟如铁案一般难翻，要不是幸

运地直达总书记，他恐怕只有蒙冤到死……”

哦，原来事情一直限于党内，没有涉及司法程序，所以“官司”二字加了引号。然而党内也不能事事“惊动中南海”。一般来说，党中央管大事，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管中事小事。那么刘建军的事有多大呢？他本人不过是个“从七品”，芝麻官；他“反映”的地委书记，也不过比芝麻官高一个“档次”，至于地委书记的儿子，则不仅不是官，甚至不是公民，而是个刑事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小人物；几个小人物之间，只发生过一点小事，即刘建军按照党员的基本权利向省委领导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点情况而已。然而正像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他遭到了打击报复，开始上访告状。对他申诉的问题，本来很容易解决，各级党组织及其某些部门的职能（或部分职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这类问题的。然而不行，他写了“上百万字”材料，找了许多大衙门大人物，毫不管用。多亏我们党有这么好的一位总书记，而刘建军的某一份申诉书又“幸运地直达总书记”，事情才有了转机。不然，“他恐怕只有蒙冤到死”了。鄢烈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也知道，很多与刘建军情况相似者确实“蒙冤而死”！

我一面为刘建军庆幸，一面也难免忧心忡忡起来：假若刘建军遇上的不是这么好的一位总书记呢？大家知道，中共历史上的各位总书记，情况也很不一样的。此外，万万不可小觑刘建军“曾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过的经历”，这段经历至少使刘建军的申诉书比较容易送达中央书记处和总书记手中，使他认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很可能包括总书记本人——尽管如此，仍“数年下来他的问题如铁案一般难翻”！换上没有这么一段经历的普通人和普通党员，又会怎么样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著名官司——那个官司不加引号，是“正宗”官司，好几个报刊报道过，我手头是 1994 年

2月24日的湖南《今日女报》，标题《一个惊动总书记的简单案子：女画家遭县委书记强暴案》。江苏沛县县委书记阎长印强奸了女画家小李，小李及其丈夫开始告状，然而告来告去不管用，“阎长印仍然很‘红’”，小李及其丈夫却搞得危机四伏，“案子一拖再拖，小李夫妇只得一会儿南京，一会儿北京，该找的单位都找了……小夫妻省吃俭用，历尽千辛万苦”。“中央又来人了。巧就巧在其中某领导随从——工作人员中有人认识徐州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得知小李遭遇，突然想起《红灯记》中李玉和在热粥里密藏电码的情节，顿生一计，立刻找来小李，把‘申诉书’装在信封里封好，写上××部某人收，书的外层又包装徐州的当代画册，再写给××部某人收，接着再裹上几本挂历，写上外交部某某人收，最外层用一张大牛皮纸糊好，封面上贴一张16开白纸，上面写着：书给什么人，画册给什么人，挂历给什么人，画给什么人，唯独不写‘申诉书’给什么人。

“大千世界，好人居多。那位带画人认真地将这一大包东西逐一送到了，当然必须拆到第五层才能请可靠的领导送到总书记的手里。江泽民总书记阅后及时作了批示“请乔石同志过问”——此后，阎长印终于在1992年7月21日凌晨1点被捕，1993年12月24日被判有期徒刑5年。

“当把阎长印已经被逮捕的消息告诉小李时，小李嚎啕大哭起来”——老实说，读到这里，我也双眶湿润了：唉，多不容易呀！

李玉和将密电码藏在热粥中是为了对付日寇，此案中的好人们将申诉书藏在层层“伪装”之中是为了对付谁？宪法和党章都保障人们向各级领导机关直至最高当局反映情况的权利，何以实际反映起来却如此艰难，艰难到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了也没有用或根本无法反映的地步？既然如此，宪法党章作那些规

定还有什么意义？还有，刘建军和阎长印同为“七品官”，同在县委工作，区别在于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好人遭打击报复长期不得申冤，坏人被包庇长期不受惩罚——这么下去，谁还敢做好人，谁还怕干坏事呢？不错，像中国旧戏中常见的那样，最终善有善报（刘建军和小李备受摧残折腾多年之后得到那么个结果，究竟是否“善报”，不深究也罢），恶有恶报（阎长印除强奸小李外，还动用手中权力调遣公安人员，对小李及其丈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跟踪、诬陷和迫害；此外，据他本人宣称，他奸淫过的妇女“十个八个也不止，三十五十没数过”，则杀头也够格了，判五年徒刑是否“恶报”，也大成问题），但那是总书记直接干预的结果。

难怪在《今日女报》报道的下面紧贴着一篇短评题为《假如总书记收不到“御状”……》——假如总书记收不到“御状”，结果恐怕跟刘建军的申诉书未能“幸运地直达总书记”而“蒙冤至死”一样，会是小李及其丈夫的“含恨而死”！

若干年来，经常有某某问题拖延多年情况日趋严重多亏总书记或某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才得以解决的消息。每当得知这样的消息或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总是又喜又忧。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们有这样好的党中央，这样好的总书记！忧的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成千上万的问题，难道都该推给党中央去解决，推给总书记去“批示”吗？成千上万的案件、事件和有关申诉，有幸送达总书记的毕竟极少；那么，其余的“绝大多数”会怎么样呢？还有，是否自党中央和总书记以下，我们的衙门太少，官员也不够多呢？谁都知道，恰恰相反！衙门不仅很多，且分工很细；官员数量不仅早已超员，且“素质”比十来年前大不相同，几乎都拥有大专、大学或更高的文凭。尽管如此，办事效率却似乎越来越低，有些单位有些干部几乎处于静止状态或“冬眠”状

态，根本不办事，或准确些说，根本不办该归他们办但他们却不想办的事。刘建军不是一般百姓，更不是傻子，他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过，又是县委副书记，不会乱告状。他写的上百万言申诉书，绝对都投给了依法依章该受理这些申诉书的部门；他找的那些“大衙门大人物”，也都一定依法依章该管这事——然而他的遭遇怎么样？我们的报刊天天责备“法盲”，说他们不相信法律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党，才抓起了复仇的刀枪酿成大错。女画家小李并非如此，她笃信法律笃信政府笃信党，因此被强奸后怒斥阎长印说“我要告你！”但告来告去，情况怎样？“小李向领导申诉，但一些领导不是推托不属他管，就是看报、看文件不理，甚而根本不再接见。小李夫妻到一位领导家里二十余次，其家人从门上的‘猫眼’见是他俩，就不开门了。”与此同时，“小李本来认为此案在徐州是可以解决的，但没想到她几乎每天找市领导，轮番告了近两个月，阎长印仍然很‘红’”，“反而比过去上电视镜头更多，今天扫雪，明天耕地，一会植树，一会访贫问苦”——老实说，换上我，恐怕也抓起刀枪甘当“法盲”了！当然，小李夫妇比我强。他们继续告，“一会儿南京，一会儿北京，该找的单位都找了”——南京是省会，北京是首都，“该找的单位”都在这两个城市，总不成找联合国；然而，态度显然跟徐州的“市领导”并无二致！在这里，别忘了小李和她丈夫都是国家干部，婆婆是离休干部，公公当过武装部领导，认识不少上层人物，但仍然告不动一个在职的“七品芝麻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小李一家是普通农民工人，情况将会怎样？假如阎长印的官职更大一些情况又会怎样？或者如《今日女报》所问：假如总书记收不到“御状”，那么又会怎样？对绝大多数“告状”者来说，总书记收不到“御状”不是“假如”，而是事实！

必须使一切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各级官员依法依章投入运

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否则就治以渎职罪或玩忽职守罪，不能再事事都“惊动总书记”了。——不是说改革吗？能办到这一点，就是实现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第8期）

吴 非

谁是马克思

谁是马克思？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向有文化的人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大概一定会得到满意的回答。但是我错了。

有位青年朋友在德国留学，来信说了一件奇事。每次国内有朋友去柏林，她都要带他们去看看马克思广场。这个广场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身铜像，马克思坐着，恩格斯站立一边。故事就出在这里。到这里瞻仰两位革命伟人的，有许多是中国人，这也很正常。这一次我的朋友又邂逅一批来自江苏的参观者，老乡见面，亲热一番。代表团领队是一位来自苏南某市的年过四十的企业党委书记，在铜像前合影之后，书记提出要和一位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前再合一个影，书记说："我站在马克思旁边，你站在恩格斯旁边。"然后他就站到他认为是马克思的铜像一边，那一位也就站到了被认为是恩格斯的铜像旁边了。——但是，他们都站反了。我的朋友这才发现原来这些人根本就搞不清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要不是

别人提醒，笑话还不知要闹成什么样。

党委书记分不清马克思和恩格斯？我的青年朋友极为感慨，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也只好瞎猜：也许少见多怪，他们一见到外国人长胡子就分不清；也许他本来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即使在“读一点马列”的时代就是个只吹不练的把式)；也许是这几年忙于搞经济，头晕了……想来想去，也是茫然。但我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某年，我曾就“四项基本原则”问过一些干部，结果七八个人，竟然没有一人答全。

四十多岁的党委书记不识马克思，又使我想起一些旧事。“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农村，农村干部也与城市一样，中央叫学什么，也就学什么。比如“认真看书学习，方能抵制王明一类政治骗子”时生产队干部也都发了书，我那个识不了多少字的生产队长就“辅导”过我们学习《反杜林论》；公社的一位干部更绝，硬要说《共产党宣言》是“马恩列斯合写的”，而且“有画像为证”。这些倒也不用去说它。使人感到难堪的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开会，坐在草垛旁晒太阳，一边在破衣服上找虱子，一边口出豪言：“我们以后反正都要去见马克思的了……”——我那时觉悟也低，总以为马克思是穷人的首领，后来才想到，如果这些悬鹑百结，面有菜色，不敢思富，自称是信徒的一群跑到马克思老人家那里去，那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

然而果真是那样的结果，马克思未必不愿见，革命的确是艰难的呀，道路是曲折的呀。而今之自称的信徒，不该再是饥寒交迫了，但脑子里是否还有马克思，则不容易讲清。比如，肚子里有用公款塞下去的鱼和熊掌，打的是茅台喷嚏，“桑拿”过了，轿车换过了，房子占好了，儿女全送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不发达的看不上），人也出去探过亲了，人民币全换成美钞了……当然，年纪也见长了，这时候，他说他等着“去

见马克思了”……你说：他是真的想见马克思吗？可他对马克思的本质以至形象也没搞清，万一他拉住一个华尔街的肥仔喊祖宗，却又让人如何是好？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不论是以穷为荣，还是贪得无厌，这些人怎么都认为自己有去见马克思的资格呢？

这回因想到了苏南某市的那位企业党委书记数典忘祖，才受到启发：把马克思挂在嘴上，不一定真的识马克思，更不用说信仰了。

（1997 年第 6 期）

吴 非

赵括纸上谈兵的背后

纸上谈兵的赵括被赵国任命为将，与其说是赵孝成王任命的，还不如说是秦国人“选拔”的。秦赵长平相拒，廉颇持重，坚壁不出，秦军无计可施，便派出间谍放风说：“秦国最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是个蠢才，立即以赵括代廉颇。当时反对派中，有蔺相如者，蔺相如指出赵括的毛病是“括徒以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这是说赵括只会空谈。赵奢生前评价儿子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这里所指出的赵括毛病，就不光是一个纸上谈兵、不谙权变了，原来赵括还是个爱说假大空话的人物。

最令人意外的是括母之言。赵括为将，括母上书给赵王，请求不要让赵括为将。赵王问其缘故。括母说，赵奢为将时，亲自捧着饮食敬奉给军中的长者，那样的人物有几十个，他在部属中交的朋友有几百个。大王和皇室赏赐的东西他都分给了部属。一旦受命，就不问家事，现在赵括一担任了将领，坐在

高位上接受部属的拜见，那股神气，部下都不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给他的东西，他都藏回家，每当看到合适的房舍地产便买下来，你看比得上他爹吗？赵王不理睬妇道人家。括母声明："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乎？"这一句话，算是看到头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从来的人说起赵括，总拿他作空头理论家的典型。我们研读括母的话，总算知道赵括除了是个教条主义者之外，个人品质也有很大的问题。他自私贪婪，目光短浅，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蔺相如、赵奢及秦人只看到赵括的空言大言、不谙权变的弱点，而括母视角虽然单一，但是因为是局外人，所以看得最为透彻，所举之事也最具说服力。赵括专制狂妄，不体恤部属，领军之际，还求田问舍，其品格与治军之道与乃父截然相反。其实，纸上谈兵还不一定是致命伤，如果一个人有纸上谈兵癖，但是为人厚道，有亲和力，至少有人会劝谏他；如果他不通权变，但是不专制，那也会有人愿意出以公心，辅佐效命，最终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偏偏这个赵括身上毛病太全，所以注定要大败。

纸上谈兵，一般不至于涉及品格问题。但是在政治生活中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却不能不是品格问题，说大话说空话的目的，低级一点的，不过是逞强好胜；逞强好胜之外，只能是邀宠，谋官。靠大言惑众邀宠谋官，靠说假话吹牛皮保官升官，这种人的品格，是极其危险的。仅仅是思想方法机械，缺乏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还不足以造成全面的失败。赵括私欲膨胀，是他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直接原因。所谓大言惑众，"大言"是手段，惑众是目的；而惑众，又为的是掩盖自己的无能。试看今之吹牛家和浮夸王，有几人没有道德品质上的问题？而靠浮夸虚报、吹牛皮、说大话，常能官运亨通，所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成了一些地方的痼疾。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也能认清说大话者的品格。那些喜欢拍胸脯子许愿发誓、慷慨陈辞的人，紧要关头常常偃伏得无影无踪；能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站出来收拾残局的，常常倒是事前不发一声，事后也只有淡然一笑的人。

在当今中国，1958 年是最有名的年份之一，这个 1958 在中国人眼中，与“浮夸”、“吹牛皮放大炮”几乎到同义的地步。最能遗臭万年的例子是关于粮食亩产的牛皮。我见到的最怵目惊心的标题是《湖北麻城水稻亩产 15.6 万斤的经验介绍》，这是报纸登出来的。曾有农村干部告诉我，这不算稀奇。那一年公社打擂台，从早上 9 点打到晚上 9 点，早上敢吹亩产 5000 或 1 万的，立刻就被作为“右倾保守”轰下台，撵回家；到了下午就打到了 18 万斤，晚上 9 点到 27 万！ 9 点以后，“右倾分子”被留下训话，第二天大家都想开了，闭了眼睛乱喷唾沫星，有人开口就是亩产 35 万！

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不高，胆子小，再加上有的人连巫婆神汉的话都信以为真，遇上领导者启发自己吹牛，他看到不吹牛就要犯“政治错误”和“右派”一样下场，那为什么不吹一吹呢？所以当年的祸根子不在农村的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们，如果有兴趣翻翻 1958 年的旧报纸或旧杂志，还能看到说空话说大话的人物的风采，其中有不少还身居要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是专家、理论家。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在一个农业国，是基本常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多农民出身的高级干部，也敢带头在这里说大话空话假话！虽然并没有对 1958 年进行清算，但 1958 年的浮夸风造成的灾难也给中国人上了一堂政治品格课。

现在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 1958 年，有政治狂热和现代迷信，但在造成灾难的种种因素当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个人的政治品质。有人为了邀宠升官，大搞浮夸，把指标压到下

级身上，逼他们与自己一道吹牛，最终被祸害的是百姓。为邀宠而吹牛的人为什么能得到重用？因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而不说假话的人反被斥为无能，免官削职，打入另册。出现因浮夸而饿死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不少干部从1958年的现实中得出了错误的判断：做官吹牛皮说大话，不是品格问题，而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则必定要在政治上摔跟头。

要杜绝“假大空话”。仅仅将“假大空话”定为教条主义，实则等于开脱。只有把这种习气同品格挂钩，认识到它的可耻可鄙，“假大空话”才会逐渐地失去市场。

长平一役，赵国四十多万男人全被活埋，留下几个回去报丧。这个故事已经有两千年了，我们还没能全面地研究赵括。如果限于材料的匮乏，那么根据遗传学说，也许正可以从当代的世象中选取归纳出若干标本，推导出历史上赵括其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特点。当然青出于蓝，赵括也许还真的不如1958年的牛皮大王那样放肆。

讲读书，总是有点背时。现在不少公仆，卡拉OK唱得好极了（有的地方还专搞“公仆卡拉OK比赛”），这或许是吹牛以外的另一种乐趣，是能消磨去不少时间的。当然，即使有时间，他们也不一定有兴致来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的。

（1997年第10期）

闵良臣

多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

写这个题目，最先是因看到蓝翎的《龙卷风》定下的。话说《龙卷风》到手，急急翻“序”和“后记”。见作者在“后记”末尾写道：“有些当年真正参与机要的知情人，我却无法从他们那里了解少许真情。有的表示记不得了，有的讳莫如深，有的另眼看人。这也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实在没得办法。若他们能认真写出来，定然比我写得好看。但愿能出现这样的作者，写出这样的文章，以丰富历史。”读罢这节文字，边是激动边犯起傻来：那有些知情人为什么不将真实写出来？为什么要将仅仅是自己知道的实情只吐出一句外交辞令“无可奉告”呢？

后来才明白，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于是我由此想到，历史上的记载，遗漏和遮掩了多少历史的真实呵！

真是可怕。

不久收到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寄来1995年第12期样刊。在这本杂志中我读到了北京的张扬写的《李锐与庐山会议

实录》，明白了一些人之所以不愿意“丰富历史”或说不愿多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的缘故。作者这样写道：

> 只要我还想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还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感，我就不能忘记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了解庐山会议本身——我相信，很多人同我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要求。
>
> 然而，关于庐山会议，各种文件、决议很多，笼统的、“原则”的说法很多，实际的、现场的、直观的记录却很少。而只要没有这种第一手的材料，人们的体会就不会深刻，历史的教训就会随时间推移而冲淡乃至湮灭。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死去，但也有很多人健在，或虽然谈不上“健”却仍然活着，至少还能回忆、讲述或写作；但是由于种种不难想见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之中一些人当年在庐山上的表现并不怎么光彩，对后来的灾难或多或少都应承担些责任——因此，他们都不想、不说或不写。

这就是有些历史真相，至少是庐山会议的真相一直不被外人所知的大缘故。可我想说，只有这真相可以“曝光”了，这一段的历史允许大家弄清楚了，以前的批胡风、打右派及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至今的历史也才能正视也才会弄清。

接着作者又写道：

> 一些堪称杰出的人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庐山上的表现却那么猥琐！他们或根本不了解人民疾苦的

> 真情实况，或明明了解情况却装作不知，在无形的指挥棒下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格、操守和良知，起劲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拍桌打凳，装腔作势，哄闹围攻，残害忠良，不但在当时铸成一大冤案，尤其贻害以后，导致“左”灾泛滥，造成千百万人的饥饿死亡，更为十年浩劫埋下契机……

这段话使我们明白甚至可以说找到了一个注脚，即让自己抬起手来狠掴自己的耳光，那简直是要命的事。当我读上面这段话时，当即在文边空白处写下了这么几句：我们看到上面这些，也就不必再去嘲笑那两千多年前当赵高指鹿为马时一些马屁精们是如何地助纣为虐——帮助赵高残害不肯认鹿为马的人的举止。因为两千多年后，那“一些堪称杰出的人物”在本质和人性上可以说与赵高时代的马屁精们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又读邵燕祥，读牧惠，读于光远，读朱正，读许许多多人的文章，看到大家都在呼吁：我们要给后人留下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邵燕祥先生在《史外说史》中指出：

> 不能不承认历史是靠文字流传，但真正的历史是在文字背后，文字以外的，是独立的存在，是一经发生就无可更易的。
>
> 没有信史——即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的，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述，我们就会在现实中迷路，我们以至下一代甚至可能重蹈覆辙。

他又在 1996 年第 5 期《随笔》上发表的《遗嘱·遗产·后遗症》的结尾处写到：“大而言之，截至我们的这一代人，将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又将会留下一些什么后遗症?”“倘

若没有遗产而只有后遗症，或者说后遗症是唯一的遗产，就太可怕了。这样的先人还不应该诅咒么?"

是的。如果这“后遗症”不是别的，而恰恰正是虚假伪造的历史，那就更要怕上加怕。就像朱正先生所言：“读历史，古代史也好，近代史也好，总不免遇到许许多多颠颠倒倒糊糊涂涂的事。”（《留一点谜语给你猜·张作霖用人》）将来读“今天”这一段历史，我们的后人会不会仍是在“颠颠倒倒糊糊涂涂”之中呢？难说。

不久前，在1996年9月16日第387期《瞭望》新闻周刊杂志上，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老《关于回忆的可靠性》。他主要是谈关于茅盾先生向人回忆鲁迅给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发电报的同一件事，竟然有不同记载。一种记载是诗人臧克家的《往事忆来多》，另一种记载是茅盾先生侄女沈楚的文章《忧患见真情》。胡绳老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加任何评论，只是在结尾时说了一句：“所以不能设想，他（指茅盾——引者注）会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向两个人作出完全相反的答复。”而这一“不能设想”，那上面这两种记载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用胡绳老的问话就是：“这两段回忆记事完全相反，该怎样解释呢?”既然不好解释，也就说明了我们有些回忆录的可靠性不那么可靠。想来这也许是胡绳老写这篇短文的意思呢。

不过这种记载不同并不可怕，正如于光远先生在《“文革”中的我·小引》中说：

>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而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那些不该过分淡化的东西

淡化得慢一些是另外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一回事。应该把这三者区别开来。

不需要自己掴自己耳光，也更不含一丝一毫的什么“政治意图”，甚至是极其光荣的回忆，记载下来尚难免有出入，那么整个历史记载的可信度究竟还有多大呢？更不说像批胡风、打右派，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这样的历史还能留给后人多大程度的真实？贾植芳先生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晓风著〈胡风传〉序》里感叹道，在胡风先生去世后，“一篇小小的悼词，还闹了许多的风波，以至在去世七个月后，追悼会才得以开成！这么明摆着的政治迫害事件，却要平反三次，可以说是极耐人寻味。尽管有些当初迫害胡风的人后来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可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的受迫害是真正的冤案，而胡风却是活该！”这也许真的找到了问题的一个症结。参加庐山会议而仍然在世的有些人不愿讲出当时真相，除了顾及自己脸面外，还有没有类似的“理由”？

近些年来，笔者注意到，我们的历史——姑且算历史吧——总是被一些研究者们研究出某些不实处。这固然未必就可信，但也提醒和告诫今天的人们在记录历史时，要力求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至少不让“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否则我们的后人就有理由不相信今天这个“历史”，使我们又重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悲剧。

这几年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文化大革命”已过去有些年头了，至今没有一部关于整个“‘文化大革命’史”的书。巴金老虽然一再呼吁，并且身体力行建造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可“文化大革命”过去已经20年了，至今仍只是一个愿望。关于这方面，邵燕祥先生今年在第8期《民主》杂志上

也有几句很好的发言："在'文化大革命'这所大宅院门前，一直有人建议进去打扫打扫，清点清点，然后布置开放，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从这个博物馆或纪念馆汲取必要的历史教训。"不然，难道能把"文化大革命"这所大宅院"原封不动一笔糊涂账地留给下一代么"?

从建立新中国至今，近半个世纪里有多少风风雨雨，有多少天翻地覆，我们是秉笔直书，还是粉饰或敷衍，这已不容我们再迟疑了。现在每年出几百上千部中、长篇小说，还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也是一篇接一篇，但有几本能像蓝翎的《龙卷风》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样真实可信？有些人知道内幕，因为牵涉的有自己，就是不愿意如实地说。当然忌讳是有的，可总不能今人反不如古人吧？《春秋·左传》中记载几人为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而掉了脑袋之后，不是仍然有人坚持"据事直书"吗？

杂文家吴非今年（1997）在第六期《上海滩》上发表《"选妃"丑史记旧》，文章结尾的话虽然不是怎样地好听，但于留下历史的真实还是很有些道理的："那个绝密的'选妃'计划究竟传达到哪一级，到现在还没有人出来说清楚，但从上到下，即使多数人被愚弄，终有一批人内心是极明白的，其辈当时心态何如，现今如何反思，都不见有人评说。当其事的人不肯开口倒也罢了，学中国历史的人，如果连这点问题也搞不清楚，或者不愿意搞清，那大概就要有愧于博士硕士证书的。"

（1997年第6期）

赵 牧

深圳人不应该忘记

1997年初，在《南方日报》(1997年1月22日)上读到一篇令我吃惊的文章，该文题为《历史铭记住这些记者》。此文记述了历史上第一个建议成立“深圳特区”的记者连云山的事迹。

1961年，《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到还是渔村的深圳采访，这里到处是低矮破烂房子，他把一百多个村子走了个遍，所见之处均呈破败之象，几乎整村的人都逃到香港新界，剩下的大多是走不动的老人，不走的中年人几乎都是村干部，他们对连云山说，我们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啊。不是我们不管而是管不了，连村干部的儿女都跑，不跑怎么办？活活饿死在这里？

情况触目惊心，连云山征求报社意见后，决定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最高层，便连夜写了深圳大逃亡见闻等四篇“内参”，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四点。一是介绍了香港的富裕情况。二是描述和分析了深圳地区百姓大逃亡的严重情形以及深层原因。三是建议划出一个范围——大致是以沙头角至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沿香港九龙纵深的50公里，把这个区域列为特殊区域，

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允许自由买卖。四是分析了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事情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的趋势，并陈述了他的理由和根据。

四篇“内参”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手里，反应是沉默，没一人对深圳大逃亡说过一句话。直到半年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才给这一事情“定了调”，他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反映的情况符合实际，但其建议极其荒谬。全党要服从中央，大家要提高警惕。

这篇文章有两个地方让我非常吃惊。一是作为一名普通记者，连云山在60年代初那个极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提出如此富有远见的建议，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实在令人钦佩；此外令我极吃惊的是，我在人民日报社也工作了十多年，却从不知有过连云山这个人。这篇文章的标题令人不胜唏嘘——连云山曾工作过的地方的人都不知有过这个人，历史又从何“记住”他呢?

连云山，今天你在哪里？我知道，人微言轻是常见的历史现象，因此连云山自然无法“英明伟大”的。当然，生活中为良知驱使的人又有谁会想到这些呢？老实说，我更关心的是，当“建议极其荒谬”的这种隐隐然含着杀气的总结出来之后，连云山的命运怎样了。

36年弹指一挥间。屈指算来，深圳特区的建立已经十多年了。算起来，连云山也起码是六七十岁老人了。这篇短文拟动笔已久，由于想说的太多反不知从何下笔。今天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以表达我对连云山这位第一个建议成立深圳特区的前辈的真诚敬意。当然，我也希望深圳人能记住这个人。

苏格拉底曾说，不了解历史的人，不足与其谈未来。我想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地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

（1998年第2期）

乐 朋

丢脸种种

中国人的爱面子，也许可上吉尼斯纪录，可惜迄今无人去申报。为了一张脸面，我们活得很累，因为时时处处都要提防着丢脸。

然而，国人丢脸的事时常发生。鲁迅先生称，脸面问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故对种种丢脸，须得作点研究，看看脸面后头的奥秘。

人都有脸，也都怕丢脸，但最怕丢脸的却是官人。平民百姓人微言轻，脸面狭小，再丢脸也就是村前村后，方圆几里的范围；官人则不然，人家是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隔三差五地要作报告，上电视，登报纸，脸面金贵，丢不起也。他们干了丢脸的事，比如嫖娼挟妓之类，只要不是连带有贪赃枉法的罪过，或像王宝森、管志诚、刘国修那样上了黄泉路的人，媒体曝光时大抵以种种含糊称呼指代，“讳”其姓名，给留些脸面。可也怪，我们的一些媒体对国外政要的绯闻总津津乐道，就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吧，其尚未坐实的“性骚扰”、“性官司”消

息，都报道得不厌其详，成心要他在中国人面前丢脸似的。看来对官人的丢脸，我们也是“洋为中用”、“内外有别”的，胳膊总得往里拐，合乎情理，但过于厚此薄彼，又显出些不厚道。可怜我们的某些官人死不争气，丑闻闹不完，有的竟把脸丢到万里之遥的巴西去了。巴西方面前些时候决定，伊泰普水电站每年接待中国考察团的极限为四个，余者概不欢迎。理由说来脸红，大批到此“考察”的中国人，其意多半不在水电而在山水，都来此作公费旅游。可恼的巴西人竟还规定，被允前往的四个团队中，须有真正的水电专家。一道老外的禁令，堵死了许多中国官人出洋观光的门径。我们经常讲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下了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这回却要巴西人来给我们把关，你说丢不丢脸？但是，一批批到伊泰普观光露脸的中国官人，我们可曾见其尊姓大名？他们把脸丢到了巴西，我们又何须还要顾及其脸面？官人的脸面就那么值钱，真似老虎屁股般摸不得，也碰不得！

俗话说，人不要脸鬼都怕。但脸面这东西颇难捉摸，尤其是国人的脸面，圆滑善变，“要面子”与“不要脸”常混淆不清，于是露脸与丢脸的界线也说不明道不白。比如 1997 年亚洲足球十强赛，中国队以 2:4 负于卡塔尔队，本没有什么丢脸的，体育比赛有输有赢，何况足球又是圆的，偶然性大；可赛后总结原因，有人居然说是因为大连东方大厦某女副总经理上了中国队的车，冲了好运，沾了霉气，某些“国脚”竟亦当真。他们兴许觉得输球丢脸，想把责任开脱一二，才甘听此无稽之谈；但这种荒唐的迷信，反倒更丢脸，显出自己的无知、无聊。人大概都想露脸，但闹不好露脸也会变作出丑。如 1998 年初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国手”们摘金夺银、升国旗、奏国歌，好不风光，露了大脸；可同时却爆出六人涉嫌服用、携带违禁药物的“新闻”。能夺金牌，为国争光，当然是

给国人露脸的好事，但要凭真本事；如果靠吃兴奋剂拿金牌，以弄虚作假露脸，极不道德，也极不光彩。有了这类丑行，竟怕丢脸，用掩耳盗铃的“个别”、“误服”搪塞国人和外人，甚至以攻为守地指责别人挑剔、诬蔑，想挽回脸面，我看就是一厢情愿，乃至是有些不要脸。不要把国人都当成“阿斗”，不要把国际游泳界人士当作傻瓜！丢脸已然可怕，丢脸而死不认账，反诿过于人，顾左右而言他，那就不只是丢脸，而成了丢人。丢脸，总得有脸才行，倘然本无脸，或已把脸丢尽，人丢够，还有什么好丢的呢！袁伟民同志讲得好，使用兴奋剂，是给国家抹黑，它的坏影响绝不是拿几块金牌能抵消的。如此丢脸，不但害了我们的游泳健儿，也大大损毁了国人在世界的形象。中国游泳界的某些人，是该撕破“水幕”，洗心革面了。我们的传媒也别再沉默，为他们掖掖藏藏，去维护什么“金牌大户”的脸面了，因为他们脸面扫地，为世人所不容！

做人行事要不丢脸，说难也不难，说到底是诚信二字。《礼记》云：“诚其意者，毋其欺也。”一不自欺，二不欺世，诚信做人，诚实办事，自爱自强，就不怕丢脸，也不会丢脸。

（1998 年第 3 期）

编后记

两年前，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百期作品选《告别“万岁”》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不但得到政协委员的好评，而且受到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曾予推介，《文汇读书周报》、《南方日报》和香港《大公报》等均发表了评介文章，在知识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读者建议我们编选《告别“万岁”》一书的续编。1998年7月，适逢《同舟共进》杂志创刊10周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何燕屏同志的热情协助下，遂有这本《领袖们的千古难题》之成书。全书分为事件与人物、阅读与思考、杂感与随笔三部分，收录了萧乾、柯灵、于光远、吴江、李锐、李普、李新、汪澍白、王若水、秦川、邵燕祥、黄一龙、张扬等先生近两年发表在《同舟共进》杂志上的文章五十余篇。这些文章，或对于以往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历史反思；或针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各界人士的不同意见；或从眼前见闻生发开去，议论国是，针砭时弊；或远观四海，借鉴他山之石，介绍人类民主进程中的点滴进

步。——都与《同舟共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创刊初衷相吻合。

本书书名选自书中一篇同题文章。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说过："两千五百年前，希腊人首先提出民主这个概念，并指出民主的基本内核是让人民当家做主。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严格地说，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还远没有实现。"看来，这确实是古往今来领导一个国家的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90高龄的老作家柯灵为本书写了一篇精彩的序，用笔委婉而用意隽永，殊不可作寻常序跋视之。感佩之余，特向老人再致深切谢忱。

萧蔚彬

1998年6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作者=萧蔚彬主编
页数=485
SS号=0
出版日期=